THE MYTH OF MALE PO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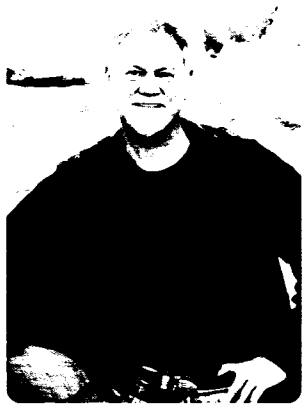
男权的神话

[美] 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著
孙金红　译

一本被誉为两性关系的“大宪章”的书

如果男人掌握着权力，那么——
为什么他们是自杀率更高的那个性别？
为什么一百年前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短一年，
一百年后却比女人短了七年？
为什么男人赚钱更多但他们的资产值更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

美国性别研究的知名人物，约翰逊总统曾称他为“杰出的青年教育家”，2011年世界精神中心将其选为“世界精神领袖”。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在50个国家出版。法雷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社会性别问题。他的《男人何以如此》（*Why Men Are the Way They Are*）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被《纽约时报》称为“关于爱、性与亲密关系”的最重要的书。

THE MYTH OF MALE POWER

男权的神话

[美] 沃伦·法雷尔
（Warren Farrell）著
孙金红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权的神话 /（美）法雷尔 (Farrell,W.) 著；孙金红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7
书名原文：The Myth of Male Power
ISBN 978-7-5100-9928-1

Ⅰ.①男… Ⅱ.①法… ②孙… Ⅲ.①男性—社会角色—研究 Ⅳ.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4821号

THE MYTH OF MALE POWER by Warren Farrell
Copyright ©1993 by Warren Farrell, Ph.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男权的神话

著　　者：[美] 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
译　　者：孙金红
责任编辑：黄秀丽　于　彬
策划编辑：黄秀丽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　　编：100010
电　　话：010-64038355（发行）、64015580（客服）、64033507（总编室）
网　　址：http://www.wpcbj.com.cn
销　　售：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27
字　　数：375千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01-2013-7905

ISBN 978-7-5100-9928-1　　**定价**：5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目录

致　谢 …… 001

引　言 …… 001

第一部分　男权的神话

第一章　初步印象：男权真的是神话吗？ …… 003

第二章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谁被解放了？ …… 021

第三章　“权力”“父权”“统治”和“性别主义”意味着男性支配一切吗？ …… 047

第二部分　被随意支配的性别

第四章　高危职业：“我的身体，但我不能做主” …… 091

第五章　战争英雄还是战争奴隶？ …… 113

第六章　男人，自杀的性别 …… 159

第七章　为何女人更长寿？ …… 179

第八章　疯狂之路 …… 205

第九章　暴力对象是谁？ …… 223

第十章　像拯救鲸鱼一样拯救男人 …… 241

第三部分　作为替身丈夫的政府

第十一章　综　述 …… 249
第十二章　两套不同的法律系统 …… 253
第十三章　十二大“女性专用”的辩词 …… 269
第十四章　性之政治学 …… 307
第十五章　强奸政治学 …… 335
第十六章　从丈夫到山姆大叔：作为替身丈夫的政府 …… 379

第四部分　接下来怎么办?

第十七章　结　论 …… 391

致 谢

我的父亲（Tom）、继母（Lee，与我父亲结婚24年了）和妹妹（Gail）给了我爱和稳定性的基础，我的写作灵感就来源于此。当我看到父亲八十高龄时仍坚持滑雪、打网球时，我看到了希望；母亲饱受癌症折磨，他一直陪在左右支持她，他教会我如何去爱；我们一天天长大，关系更加亲密，这让我内心感到平静。目睹母亲病卧在床继而“移居”于教堂，我的信念增强了，我的内心受到了鼓舞；她倾听别人心声的方式为我树立了一个典范，这让家庭成员团结在一起，每个人的心声都能被听见。得知妹妹耐心地、满怀慈悲地对待她所教的孩子们时，我对未来不再感到迷茫。

Joyce McHugh帮我打理家庭办公室，管理我的电脑，帮我安排演讲。她同时也是我的私人编辑——审核编排是否准确、清晰，仔细阅读这本书十几份草稿的每一页。我的编辑Marilyn Abraham有着地球母球般的灵魂。她有一把编辑之斧，总是知道每一斧应该砍向哪里。这本书里充溢着她坚定的信念，仿佛本书是她的孩子。

这本书的每一章都困扰着我，因为我发现我所观察到的现象与政治上正确的理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Nathaniel Branden，Jeremy Tarcher和Elizabeth Brookins帮助我克服了内心唯唯诺诺的对政治正确的纠结。Nathaniel渊博的知识、Jeremy独特的社会意识以及Liz强大的洞察力和

爱都告诉我，虽然我走的是一条不同以往的路，但是这条路并不崎岖。

我收到了数百封男士们的信，告诉我他们读过《男人何以如此》（*Why Men Are the Way*）之后的感受，这更让我坚信我选择的道路能够帮助男性敞开心扉；我也收到了数百封来自女士们的信，说她们读过《男人何以如此》之后与男性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于是我很安心，我不是在拆散那些鸳鸯而是让他们更亲近。

为了这本书，Lisa Broidy和Dayna Miller查询了几千本书刊，并不辞辛劳地再次确认书中的上千条索引来源是否准确。同时我也感谢Marla Robb和Mary Colette Plum协助我做了查询工作。感谢Julianna Badagliaca，Monica Chandler，Melissa Rosenstock，Karen Wilson，还有Richard Doyle，感谢他在作品《解放者》（*The Liberator*）中所做的法律研究。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几位朋友。感谢Steve Asher，他坚持每天搜集剪报；感谢Eugene August，他几乎对每一章都提出了诚恳的意见；感谢Donna Morgan和Spring Whitbeck以从容、平和的方式管理办公事务；最后感谢Keith Polan教我使用电脑。

来自30位读者的意见大大提升了这本书的品质，包括Suzanne Frayser，Ron Henry，Natasha Josefowitz，Aaron Kipnis，Judy Kuriansky和Sari Locker的深刻见解，以及以下读者的章节评论：Rob Becker，Randy Burns，Tom Chadbourne，Ferrel Christensen，Deborah Corley，Greg Dennis，Sam Downing，David Gilmore，Herb Goldberg，Bruce Hubbard，Rikki Klieman，Ziva Kwitney，Alex Landon，John Macchietto，Roman Mathiowetz，R.L.McNeely，Becky and Tony Robbins，Chris Ruff，Jim Sniechowski和Bill Stephens.

顾问们的意见不仅让我受益匪浅，也令这本书增色不少，包括Devors Branden，Helen Fisher，Maurice Friedman，Fred Hayward，John Hoover，

Joseph Kinney，Michael Mills，Marilyn Milos，Jim Novak，Joe Pleck，Jon Ryan，Murray Straus，Ivan Strauss，Robert Wade 和 Richard Woods.

最后，除Marilyn Abraham以外，我要感谢Simon & Schuster出版公司的女性友人们为这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努力和奉献，她们是：Dawn Marie Daniels，Joann DiGennaro，Marie Florio，Eve Metz，Victoria Meyer，Carolyn Reidy，Isolde C. Sauer和Jennifer Weidman.

引 言

在我研究男性与女性问题的二十几年间，从来没有看到男性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像现在这样缄口不言，也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适合男性打开心门。我看到男人们在寻找探寻内心世界——男人们唯一不愿触碰的地方——的方法。未来二十年，会有很多机会让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成为探索男性内心世界的先锋。他们的发现会帮助男性摆脱孤独——进而帮助他们远离药物、离婚、抑郁、自杀以及因孤独而造成的英年早逝。

男性的苦恼并非只是需要男人去关心的问题。一个男人自杀，势必会影响他的妻子、子女、父母、同事和友人。男人的英年早逝、嗜酒成瘾、贪恋美色……同样会对他们周围的人产生影响，甚至还会影响企业的收益和国家生产力。男性成为受害者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男权的神话》并非要回望20世纪50年代的男性，而是要展望21世纪50年代的男性和21世纪50年代的女性。这本书旨在阐明男女两性的角色为何在数百万年以来功能协调，而现在开始运转不良。

为男性代言的代价

我曾在全美妇女组织纽约分部的董事会任职三年。在向女人们解释何为女性眼中的男性时，我常常会看到女人用胳膊肘捅捅与她同行的男人，就好像在说“看吧，连专家都说你们是这种人”。

慢慢地，我开始倾向于说女人喜欢听的话。因为我很享受接下来长久而热烈的响应。

其实，我的观众中90%是女人，而剩下10%的男人大部分也是被女人拉过来的。这一点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女人更开明，而男人相对“保守”。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观点——它能让我把自己看成一个新好男人。曾有女权主义学者问我：“我们怎么做才能成为你？”这更加深了我对这个观点的自豪感。每次演讲之后，我都会收到新的邀约，这让我在经济上也有了些保障。

很多年过去了。很多我的忠实女粉丝离婚了，我只能猜想问题应该出在她们丈夫身上。她们都表示赞同。但是我注意到这些持女权主义观点的女性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点：对男人的怒气越来越多，而且在她们眼里事情永远都有更深层的含义。

突然有一天（在某个极少数我内心安定的时刻），我想到听我演讲的女性数量远远多于男性，是不是因为我更愿意倾听女性的心声，而不是倾听男性的？从一开始到那时候，我已经与上百位女性组和男性组的观众交谈过，我回头翻看当时的录像带，我注意到我当时的用词：在女人们挑剔男人的时候，我称之为“洞察力”，而男人批评女人的时候，我却说他们有“性别歧视”。很快，男人们就不再表达他们的感受了。然后我又怪他们不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决定尝试用一些方法让男人们开口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我注意到男人往往在第一次约会时最乐意说出自己的感受。在第一次约会时，女人常常会用到我称为“惊叹法”的方式——眼神中流露出“哇……好厉害”的意思，男人就会感觉到这样说是安全的，然后就会敞开心扉。

因此，当我的男性组中有人开口说话时，我也试着使用“惊叹法”。它真的奏效了。我听到了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观点，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

视我的生活和我的动机。重新审视的结果造成了新的窘境……

当女人们问“为什么男人都害怕承诺”，或者女权主义者说“权力都在男人手中”的时候，我会用兼顾两个性别的观点来回答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我长久以来的、一直能得到的热烈响应烟消云散了。我的财源也枯竭了。

老实讲，我也想过重走老路，只充当一个女性观点的代言人。很快我发现相对于为女性代言，为男性说话需要更强大的内心。或者更准确地说，同时为两性说话比只为女性说话需要更强大的内心。

幸好凡事都有两面。虽然长久以来得到的女性的拥护者逐渐减少了，但是最开始反对我言论的一些女性后来写信给我，告诉我当我所说的话在她们心底“扎根”时，她们就会发现自己更爱丈夫、父亲和儿子，或者更爱在工作中的男人。这让我有了把这些观点变成文字的想法。

如何对待女权主义?

如果这本书被误用，被人认为在攻击女权运动的合法性，我会很伤心，因为我花了十年心血的研究正是为了这些问题。我们要在超越女权主义的同时珍视其贡献，这在日前来说是个挑战。而且女权主义确实做出了很多贡献。

如果没有女权主义，很多企业就不会尝试聘请兼职员工，不会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不会提供儿童照顾服务，也不会采用更好的安全标准；如果警察岗位中没有女性，警察部门就不会发现有95%的冲突事件是不能靠比谁身强力壮来解决的；如果医生岗位中没有女性，就不会有医院为医生们每周减少9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如果没有女性治疗师，所提供的短期咨询和伴侣咨询服务就会远远不够……女权运动使无数个工作场所被重新审

视；女权主义不仅让女性能在各个工作场所工作，也将女性的能量带到了这些场所。

看见女孩子玩棒球时，一想到她们正在学习团队合作，我就会为她们感到幸福而眼噙泪水。如果没有女权运动，这些女孩子只能站在边线上观战；如果没有女权运动，成千上万的女孩子只能看到她们的母亲只能是“母亲”，而她们也只能成为“母亲”。结果就是，更多地，她们会为了钱而结婚，而不是为了爱。她们也会很害怕衰老。

常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让我对早期的女权运动产生共鸣。常有人认为一定是因为我妈妈或者我前妻是活跃的女权主义分子，但这两者都不是。我的妈妈不是女权运动的一分子。但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七年级的时候我当选了班长，那天我回家后很骄傲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还告诉她说：“我们星期五有班会，到时候我要站在讲台前主持全班的会议，我星期五那天能不能穿上熨得漂漂亮亮的衬衫去学校？”她回答说：“当然了。”然后毫不犹豫地拿出烫衣板，演示给我看要怎么熨衬衫。

那段时间，妈妈的回应似乎一直都很一致，她总是说：“我是你妈，又不是你的保姆。”我长大后，重构了这些经验，我将它当作妈妈表达爱的方式——不是将这些事大包大揽，而是教我如何去做这些事。所以在女权主义最初以平等主义的姿态登上舞台之时，我做好了准备，很容易接受它。毫无意外，成年之后，我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支持女权运动中的这些部分：赋予女性力量为自己撑腰，不再埋怨自己，不再把自己当成牺牲者。

写《男权的神话》意不在成名。跟其他提升自我修养的书不同，这本书并非鼓励女性要自信，而是换一种方式去爱护女性。

历史是男性的研究课题?

研究女性时，男性往往被排除在外，最常见的辩词就是：“历史是男

人的事情……女性的研究只是试着让女性平等地得到男性已经拥有的。”对吗？不对。女性的研究往往在质疑女性担任的角色，而从未质疑男性担任的角色。历史书籍告诉男孩子，传统的男性角色都是英雄，是执行者（performer）。[①]每本历史书都是执行者角色的大篇幅广告。每一课都告诉男孩子们：“如果你是执行者，你就会得到爱情和他人的尊重；如果你不是，你就一文不值。”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历史会给他施压，让他成为执行者，而并非让他从这种压力中解放出来。女权主义运动旨在将女性从传统女性角色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么对男孩子来说，历史和女性的研究课题并不对等，而它正好是女性研究课题的对立面。

女性的研究不仅质疑女性的角色，同时还告诉女性她们有权利扮演男性的传统角色。但是没有人告诉男性，他们有权利扮演女性的传统角色——在妻子支持的情况下有权选择做全职或兼职奶爸……

在女孩子眼中，历史书上写的全是男人，同样，站在男孩子的角度来看，“学校”里到处都是女人。从小妈妈教他要听她的话，到了学校女老师们教他怎么成为一个男人。一方面，历史书告诉他，男人就是要成为敢于冒险的英雄，而另一方面，女老师告诉他不要冒险——不要打架，不要不假思索就喊出答案，不要说脏话，不要讨论性的话题，不要不注意形象，不要弄脏衣服。就像对女性的研究会帮助女人取得在商学院的任教资格，对男性的研究会帮助男人看到，他们也有担任小学教师的权利。

女权运动为什么有必要研究男性？

女权主义者认为上帝可能是女性，但魔鬼并不一定也是女性。女权主义明确指出了男性的阴暗面和女性的光明面，却忽视了女性的阴暗面和男性的光明面，同时也忽视了两性中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阴暗面和光明面

① “performer”有行动者、演员之意。——编者注

这一事实。性骚扰这个问题浮出水面时，有人告诉我们“男人‘不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男女两性都不“理解”这个问题。男人不明白女人作为被动方，会害怕被骚扰，而女人不明白男人作为主动方，会害怕在性上被拒绝。两性都过分在意自己这一方的脆弱，而不去“理解”对方的脆弱。

区别在哪里？女权主义告诉广大女性，如果她们被男性性骚扰或者在约会时被男性强奸，应该起诉他们，但实际上男性只是对错误的人或在错误的时间采取了主动行为；却没有人告诉男人，如果发生性关系时女方说“要”，然后又说“不要”，然后又说“要”，然后又说“不要”，结果造成性创伤，这种时候也要起诉女方。在性关系上，女权主义赋予了女性三种角色——她们原有的角色、“男性化”角色和“受害者”角色。而男性连一个角色都难保，依然被希望担任主动角色。但是现在，如果他们没有扮演好这个角色就得蹲大牢。对于那些尚未了解性的青春期少年来说，这半个角色是有点吓人的。

女权主义让全世界都相信，这是一个男性至上，由男性主宰的、父系的世界，从而证明女性有“受害者的权利”。《男权的神话》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两性都被歧视，既由男性统治也由女性统治，既是父权制也是母权制——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书中也解释了为什么“父系社会”和“男性的主宰地位”成了可以随意支配男性的代码。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强化了女性的光明面和男性的阴暗面，以至于以女性为受众的杂志、脱口秀、“自我修养提升”类书籍以及电视上的特别节目都采取了女性是受害者而男性是施害者这一“先进”言论，而鲜有言论称男性是（诬告、情感虐待、被剥夺探视权等的）受害者而女性是施害者。很快，媒体中又形成了批评“男性议员”挑起战争的风气，却没有人称赞说有了他们才有了民主社会。电视上有“隔壁男邻居

会不会调戏女邻居？”的特别节目，却没有叫作“隔壁男邻居会不会救女邻居？”的节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看见6名消防员解救了几个女人，可是从来没有哪个特别节目取名叫作“男人是救星”，告诉大家那6名消防员都是男性——或者被消防员救下的女性数量要远远多于被男性加害的女性数量。

去认识完整的真相不再被看作是进步的，倒变成了专制。女人们都去买那类书籍，出版商也像政治家迎合利益集团那样迎合着女性。于是，女人是可爱的而男人是可憎的（女性的光明面和男性的阴暗面）……这种迎合方式使女性的长处——了解两性关系——转变成了女性的不足：误解男性。

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每天的新闻里都充斥着女权主义的气息，就像水里的细菌一样——我们消费着它却不了解它，既不知道它好的面向，也不知道它不好的面向。站在男人的角度而言，女权主义将“雌雄争霸战”变成了一场“每个人只有一个面向的战争”。[1]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男人并不擅长倾听，因为女人能很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们确实听说了，也吸收了很多新的概念（“性对象”“玻璃天花板”“赡养费”“受虐妇女综合征”“不尽责父亲”“女性化贫穷”），也听过了几十种关于女性关怀的口号（“女性有选择权”“男女同工同酬”“我的身体我做主”），也看见了自己这个性别被视为各种施害者（性骚扰、强暴、色情、乱伦、强奸、约会强奸）的情形。

男人不只是听听而已，他们也认为一些歧视女性的言论就是事实（女性是暴力的最大受害者；相对男性健康而言，女性健康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① 引用律师Ronald K. Henry的话。

视；女性同工少酬；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更多；男性的权力更大；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至上、由男性主宰的、父系的世界）。很多男人谴责这种“歧视女性”的行为，同时他们认为“歧视男性”是必要的。这些“歧视行为”包括女权运动；几乎各州各县政府都设立了女性津贴；进行女性课题研究；建立女性俱乐部；政府专为女性、婴儿和儿童运行一些项目……

男人不说，女人就无从倾听

我们是否被女权主义误导了？是的。这是女权主义的错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男人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来。现在男人必须把说出自己心中所想当成自己的责任——将“每个人只有一个面向的战争”变成“双方畅所欲言的交流”。

我常常很惊讶，男人总是将两性关系的话题看成是关于女性的话题。如果有本像《男权的神话》这样的书出现在编辑部办公室，男记者通常会条件反射似地说：“这本是给Mary的，用在家庭版面——她的专长就是‘女性’课题。”现在是时候让男人结束这个“两性关系的问题即女性问题的时代”了。

将女性看成两性关系的核心，正如把地球当成太阳系的中心。但是对伽利略来说，他的发现只是他工作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将他的发现公布于众。大部分男人还在通过保护女人的方式来获得她们的青睐。而很多女人也仍将对爱情的投资放在享受这种特殊的保护上，如同受害者被保护一般。

在调整我们对两性关系的设定时，常常有如用砂纸在我们心上打磨。房产销售的金钥匙是“地段、地段、地段”，而两性关系的金钥匙则是“倾听、倾听、倾听”。我们倾听男人心声的程度，决定着对话的结果到

底是一种交流还是一场战争。

如果将来女人能在倾听对方心声方面比过去的男人做得好，那么男人也不必多费未来20年的口舌了；如果女人变得情绪化不想继续听下去，而且总是用“是啊，但是……”的方式打断对话，以人身攻击的方式回击对方（“你肯定是讨厌女人”），或者告诉男人“我接受能力很好，是你选错时间跟我说这个问题了”，那么，男人从此就会守口如瓶。这样的话，想让男人得到平等的被倾听的机会就要再等上不止20年。那些我们害怕听到的话，从来就不会有正确的时间去说出来（因为它总是会像砂纸打磨在人的心上一样让人饱受折磨）。

女性已经摆明了她们的态度，在我们准备好综合双方意见之前，男性也要拿出自己的态度。

男权神话是女权主义的反面?

男权神话容易被视为女权主义的反面，但其实并非如此。女权主义认为“这是一个由男性主宰的父系社会”，其反面应该是“这是一个由女性主宰的母系社会”。我会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是由两性共同主宰而且既是父系也是母系的。书中解释了男性为什么能被随意支配，但没有否认女性也有同样的遭遇（例如一个男人为了两个20岁的姑娘抛弃了自己40岁的妻子）。这样才是在全面考虑问题。

女权主义是如何让我们将一种单方面的理论看成是全面的呢？它不是告诉我们“女性认为这个世界是由男性主宰的，是男性至上的、父系的”，而是说“这个世界是由男性主宰的，是男性至上的、父系的”。女权主义将自己的理论刻画为事实的全局，这是一种性别歧视，正如“大男子主义”说他们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来看待这类问题的一样。

我是男性解放论者？女性解放论者？两者都是？还是两者都不是？

和其他人一样，我愿意被人倾听，但不愿意被打上某种标签。个人标签确实能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之中有立足之地。这样我们做出任何影响外界的行为时，都会在公众心中生成一种身份——或个人标签。

如果男人的解放意味着两性能够享有平等的机遇、承担对等的责任，那么我就是一位男性解放论者（或者说“大男子主义者”）。如果女权主义者赞成机遇和责任在两性面前是平等的，那么我就是女权主义者。如果两者都认为自己才是受压迫的那一方，所以“我们这一方更应该享有权利”，那么我两者都反对。因为那不是性别解放，那是性别赋权之战。

但最终，我并不会支持来一场女性运动或男性运动，而是赞成一场“性别转换运动”（gender transition movement）。不过我不赞成直接跳过男性运动。因为只有通过这场运动让男性真正能平等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后，我们才能准备好开始综合双方的观点。

致男人们

将来会有人与女权主义者讨论这本书，因为她们可能是对性别角色最感兴趣的人。这就像男人拿着一本质疑《圣经》的书去找重生的基督徒（born-again Christian），因为基督徒是对宗教最感兴趣的人。每天研读《圣经》的人就是最不可能质疑《圣经》的人。

如果你的“家人”中有很多女权主义者，那你必须正视你自己需要她们对你有多认可。这本书会带给你很多新的感受。阅读时你必须很小心，因为有可能这不是你自己阅读之后得到的感受，而只是“同意”有这种感受而已。

找一群支持你的男人，开始跟他们探究这些感受吧。作为男人，我们

常常将自己所有的“情绪蛋”（emotional eggs）放在我们所爱的女人的篮子里，我们害怕说出点什么会不小心将它给打碎了。而一群人可以提供情绪上的支持。在群体中，你可以梳理那些值得讨论的情绪，免得自己说出来就后悔了。

男人间彼此交流自己的感受到底能有什么发现呢？举个例子。在过去几年里，我向上万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美国和加拿大的男人们问过同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在每个孩子出生后全职在家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其中80%以上的人愿意全心全意在家照顾孩子——但条件是他们的妻子同意而且家庭经济状况不受影响（约17%的人愿意兼职照顾孩子，约3%的人选择仍然全职工作）。

但需要注意的是，参与调查的男人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然而有很多人羞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一个男人与其他男人相互交流自己的感受时，他们会在内心问自己相同的问题。他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希望得到一些他们从没有开口要求过的东西。这个发现激励着他们去思考，为什么以前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要求。

为什么？男人们下意识地觉得讨论自己的感受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告诉我老婆我想辞职在家带孩子，账单都由她付的话，就会吵架，结果就是我会输给她，而且她会要求离婚，那说了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这个“有勇有胆的性别”如此害怕妻子提离婚呢？这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有的“情绪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一群人的帮助才能解决的问题。

这本书会帮助你成长。但对个人来说它是一个挑战。它可能会和爱情发生冲突——对两性关系来说它也是一个挑战。下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你所爱的女人愿意了解你真实的感受。其中的难处在于：怎么才能在成长的同时不让我们的爱人变成我们的敌人。首先，你要摘录书中一些片段，这

些片段要反映出你们双方都认可的价值观，然后读给她听。（将这本书介绍给女性时，千万不要对她们说："你应该看这本书。"）你的语气一定要显示出，你对这本书的理解，可以赋予她力量，而且会让你更爱她。

致女人们

对女性来说，其挑战在于如何像对待女性的无力感那样对待男性的无力感，像介意女人为了金钱而出卖身体那样介意男人为了金钱而参军。在这些挑战面前，男人会将事情复杂化，因为他们一辈子并没有花多少时间练习应该何时或如何向你表达那些感受。所以他们读了一本可以让自己做些改变的书之后，表达时可能语气里充满怒气，或者挑错了开口的时间。妙的是，即使知道怒气里有一部分是指向你的，但是如果你能听进去并且认同了他的感受（而不是跟他争论或者用"是的，但是……"打断他，让效果大打折扣），他会很快将你视为同盟军而不是敌人。当他明白自己可以在这个安全的环境里敞开心扉时，他对你的怒气会很快消散，而对你的爱会愈加深沉。

女人们告诉我说，她们如果能时刻记得提醒自己"这是他的看法，并不是我也得这么想……我得重新审视自己"，男人们那些新的看法就能帮助她们以更加柔和的方式对待他们。书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通过了有关男性"看起来是真的"的测试；除了那些统计数据，这本书里面写满了男性的感受。这些数据只是用来帮助你了解他并没疯。

职业女性——或强势的女性——常常是最难理解男性无力感的群体。为什么呢？强势的女性往往接触的是强势的男性（弱势的男性——如清洁工——对她们来说是透明的）。而在她们眼中，强势的男人都是虚伪的：这些男人最擅长的莫过于压抑自己所害怕的东西。

强势女性宁愿花时间记住自己秘书的名字也懒得理一个清洁工。于

是，她更了解她的秘书对男人的看法，而不是清洁工对女人的看法。因为弱势的女性大多在办公室里工作，而弱势的男性则大多在办公室外工作（比如较为危险的工作），结果就是她更为清楚在她周围工作的弱势女性的窘境。

职业女性感受不到自己秘书的超短裙、乳沟和调情的力量，但是男人可以。在工作场合，强势的女性往往对这些力量的使用非常谨慎，因为她有其他形式的力量。

总之，这些因素使职业女性看不到大部分男性的无力——这部分人不在金字塔顶层，而在金字塔的底层。而很多女性的性权力却没有处于金字塔的底层。

有一些女性，一旦稍微看到自己对男人的误解程度，就会不知所措，会问："那我要怎么办呢？"幸好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从男性的角度来讲（并非那种"四海为家"或者"魅力四射"型的男性的角度），大部分男性只是希望能感受到有人欣赏他、理解他。所以只要给他时间让他展示真正的他就好了，而你需要做的就是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不是离开他），哪怕他的一些感受是对你的批评。我还从来没有遇到哪位男士告诉我说："我想离婚，我的另一半太理解我了。"

我一直收到一些女性的来信，信中说，她们在聚会时、和男性交流这些观点之后，很快她们发现周围有很多男人向她们吐露心声！所以她们看待男性的观点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就是在这种时候，女人们才开始真正爱上男人。在这以前，她们爱的只是男人的外在（或许可能都并不爱男人）。她们爱的只是男人的外在这并不是她们的错，因为男人就只展示了那么多；只展示了自己的外在也并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以为那就是她们所爱的。

男性越是被剥夺表达自己感受的权利，最终感到自己的心声被听到时，就越会感觉自己被深爱着。对这个新的男性观点有所体会的女性就会

变得很特别，因为这样的女性太少了。

致男人们和女人们

《男权的神话》违背了两性在生物遗传学上的、保护女性的本能。这里的保护女性指的是倾听她的需求、压制他的需求——甚至到死亦如此。所以发现书中的不足，然后把这些不足当作挡箭牌，拒绝倾听男性的意见，也是自然的了。书中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我要告诉你，不要指望我能做到完美无缺，你倾听男性意见的能力并不取决于此。

如果书中的数据看上去不太可信，你可以看看注解。在我最开始的书稿中，包含的数据比现在的版本要多出100多个，经过仔细推敲后，我觉得这些数据似乎不可靠，所以我最后决定弃之不用。尽管如此，如果我遗漏了什么东西，不要让我的疏忽影响了你深层次的理解。

有人认为男人在寻求内心世界的变革。正如苏联人，他们看懂了自己周围的世界之后，感到更加自由了；如果男人看懂了自己周围的女人，他们也会感到更加自由。苏联人开始质疑，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强势国家”的看法只是源于不愿面对自己的无力感。和苏联人一样，男人已处于质疑自己的边缘，他们开始怀疑男性是“强势性别”的看法，其实只是不愿正视自己的无能为力之后所产生的错觉。男人已经开始适时地将自己看作“正在成为的”新性别（a Third World sex）。或者说我主张……但是我没有支持这种说法。男性的权力真的是个神话吗？让我们来看看吧。看的同时，你可以跟我聊聊你心里的想法，我可以从你的意见中得到成长，并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让你看到我的成长。

沃伦·法雷尔博士

1992年2月4日于美国恩西尼塔市

The Mgth of Male Power

第一部分

男权的神话

第一章

初步印象：男权真的是神话吗？

男性的弱点在于给人以强大的假象，而女性的长处在于给人以柔弱的假象。[1]

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在很多方面都会更加有无能为力的感觉：对怀孕、衰老、强奸和约会强奸感到恐惧，害怕被强迫做某些事情；不及男性那么社会化，因此找不到支持丈夫、养活孩子的职业；较少参与团体性运动——其中既要竞争又要合作的状态对职业准备有很大的帮助；婚后在子女教育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不论是否出于自己的意愿，都可能需要放弃自己的事业照料子女；不能成为“老男孩”网络中的一分子；泡吧时很难不被打扰……

幸运的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认可女性确实有这些遭遇。不幸的是，他们认可的是只有女性才有这些遭遇——其结论是女性“有”这些问题，而男性“是”问题的原因。但是男性有着不同的遭遇。一个男人，婚姻失败后需要支付赡养费，他的家变成了他妻子的家，孩子们心理上抵触他，但还得付抚养费。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是在为讨厌自己的人操劳。他如此渴望爱情，却害怕下一次婚姻可能最终带给他的是又一份按揭贷款、几个抵触他的孩子和更深的绝望。所以有人说他有“承诺恐惧症”时，他觉得没有人理解他。

当一个男人为了应付各种花销而加班加点工作后被认为“迟钝无趣”

时，为了排解压力而饮酒却被称为“酒鬼”时，他不会认为自己强大，反而觉得自己很无力。他害怕当自己哭着希望得到帮助时，得到的总是“别哭了”；也害怕他希望有人倾听自己的心声时，对方的反应总是“是啊，但是……”于是，他跳过这些步骤，试图以自杀的方式来求助，或者干脆就直接自我了断了。就这样，作为较为沉默的那个性别，男性也慢慢地成为自杀者较多的那个性别了。

本章只是概论，所以会出现很多的“是的，但是……”其他章节都用来回答这些“是的，但是……”因此本章有一些看似可信的说法，但是最终你会另有看法。这一章也印证了“一知半解最危险”这句话。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们会对两性有更为平衡的看法——并不是因为这本书所述的观点更为平衡，而是因为这本书的观点平衡了我们目前的看法。我们来看看吧……

男人就该做男人该做的事

词条：想象一下，你正在车里听着音乐广播。突然有一个声音打断了美妙的音乐：“我台刚收到总统的特别公告。”（出于某种原因你并没有换台）总统先生宣布，“由于美国已有120万男人死于战争，为了公平起见，在我的新计划中，我们将在全美征召女兵，直到战争中女人死亡人数达到120万为止。”

整个美国的邮局里都有服义务兵役的海报，上面提醒着男人：只有男人必须登记服兵役。如果邮局的海报上面写着“犹太人就该做犹太人该做的事”…… 孕妇肚皮上写着“女人就该做女人该做的事”……

问题是，怎么能按照出生时就有的特征，将其划分为是否必须登记兵役的人群呢？ 如果这个群体是黑人、犹太人、女人或者同性恋，我们马上就会认为这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但是为什么男人因为他们出生时的性别

而被挑选出来服兵役，却被称为拥有“权力”？

有一些事情，对其他人群来说都是无能为力的事情，而在男人接受的教育里，这些事却象征着力量。这就是走进男人内心所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战争里死亡的都是男性，我们没有称其为“性别歧视”，却称之为男人的“荣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一场战役（索姆河战役[2]）中就有100万男人丧命，我们没有将其称为“大屠杀”，而是“救国救难”。那些只选择让男人上战场牺牲性命的人，并没有被冠以“谋杀犯”的称号，而是被叫作“选举人”。

女性的口号是：“女人的身体，女人做主。”而男性的口号是：“男人就该做男人该做的事。”

生命的力量

词条：1920年，美国女性比男性的寿命长1年。[3]现在，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7年。[4]男性和女性在平均寿命上的差距翻了6倍。

我们承认，黑人比白人少活6年这一现象反映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现实。[5]但是男性比女性少活7年，却很少被视为这是美国社会中男性脆弱的体现。

男女寿命相差7年，这是生理性的吗？如果是生理性的，那么1920年时这个差距就不会是1年。

如果是男性平均寿命比女性长7年的话，那么女权主义者早已帮助我们认识到，平均寿命是衡量哪一方更有力量的标准。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力量就是控制自己生命的能力。死亡则表示失去了这种控制能力。平均寿命就是最重要的指数——我们在生活中承受的压力与生活对我们生命长度的嘉奖之比。

如果力量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控制力，那么也许平均寿命排行

最能说明性别角色和种族歧视对我们生命力的影响了。排行如下：

平均寿命，[6]一个衡量哪一方更有力量的因素

女性（白人）	79
女性（黑人）	74
男性（白人）	72
男性（黑人）	65

白人女性比黑人男性寿命长近14年。想象一下，如果一位49岁的女性会比一位62岁的男性先去世，会有多少人支持进行反歧视行动。

自杀是无力的

就像平均寿命是衡量力量的最佳指标一样，自杀率是衡量哪一性别为弱势群体的最佳指标。

词条：9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的自杀率一样；

10~14岁的年龄段，男孩自杀率是女孩的2倍；

15~19岁的年龄段，男孩自杀率是女孩的4倍；

20~24岁的年龄段，男孩自杀率是女孩的6倍。[7]

词条：在每一个男孩成长期间，他们都会慢慢体会到作为男人需要承受的压力，他们自杀率也增长了250倍。[8]

词条：85岁以上男性的自杀率是同年龄组女性自杀率的13.5倍。

被忽视的暴力受害者

词条：Rodney King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时，我们把这一事件看成对黑人的暴力，而不是对男性的暴力。如果是Regina King[①]遭到殴打的话，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是在对女性施暴，不是吗？

① “Rodneg”为男子名；“Regina”为女子名。——编者注

传言：年长的女性是受到暴力犯罪伤害最多的受害者群体。

真相：年长的女性是受到暴力犯罪伤害最少的受害者群体。美国司法部发现，相比其他群体而言，年纪在65岁以上的女性是最少遭到暴力犯罪伤害的人群。而且，她们受到暴力伤害的概率不到同龄男性的一半。[9]

传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暴力对待。

真相：男性遭到暴力犯罪伤害的比例几乎是女性的2倍（甚至包括强奸）。[10]被谋杀的男性的比例是女性的3倍。[11]

《时代》（*Time*）杂志曾有一个封面故事，讲述了仅仅一周内就有464人遭到枪击，文章中得出结论："社会中最容易遭到迫害的人群是：穷人、年轻人、被遗弃的人、病患者和老人。"[12]当你读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群体中的男人？有人曾经数过用于统计这些数据的照片中的人脸，发现84%是男性。实际上，这些人群就是穷男人、年轻男人、被遗弃的男人、患病的男人和老年男人。不过那期封面上也有女人——只有一个女人。在美国，男性是被忽视的暴力受害者。

净值权力

词条：美国人口调查局发现，女人为户主时她的净值是男人为户主时的141%。[13]

统计数据中的净值就是用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债务责任减去各自的财产之后的剩余价值。女人的平均净值为13885美元；男人的平均净值为9883美元。这是因为，作为户主，男性虽然总收入和总财产较高，但是他们的消费责任也更大。相对于妻子给他们的支持而言，他们要给予妻子（或前妻）更多的支持，因此他们的收入不仅用于自己的花销，还要用在妻子和孩子们身上——除了伙食和住房以外还有学费、保险费以及度假的消费。房子是男人出钱买的，孩子是男人出钱抚养的，但是一旦离婚后，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女人既得到房子又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女人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

所以她们的收入没有男人高；男人收入更高但是他们的经济付出也更多。

词条：在美国最富有的1.6%的人群（财产达到50万美元或以上的人）中，女人的净值大于男人的净值。[14]

女人并没有在企业中身居高位，可是为什么最富有的人中会有这么多女人呢？一方面是因为她们选择了在企业中身居高位并且比她们年长的男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的支出能力很强但支出义务较少。

支出能力

一项关于购物中心（包括男性用品商店和运动用品商店）的研究发现，女性个人用品在商场中所占楼层面积是男性个人用品所占面积的7倍。[15]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购买女性商品较多。个人是否拥有财富并不取决于一个人赚了多少，而是取决于他决定在自己身上花了多少——或者在他的指示下花了多少在他自己身上。

总之，实际上女性掌控了所有的消费类别。[16]有了消费力，跟着就会有其他形式的权利。女性掌控了消费，于是她们也掌控着电视上播放什么节目，因为电视上播放什么取决于赞助商。加上不论哪个时间段都是女性看电视较多，[17]所以电视节目也付不起忘恩负义的代价。女性与电视节目的关系就像老板与员工的关系。结果呢？1991年出产的250部电视电影里，有一半都将女性刻画为各种受害者——题材均为“各种各样的生理或心理虐待”。[18]

消费责任差距

在餐厅，男人买单的频率是女人的10倍——餐厅消费水平越高，男人买单的次数就越多。[19] 女人常说：“因为男人赚得比较多。”但是，如果是两个女人一起去餐厅，她们就不会认为应该是赚得多的那位买单。这种期望男人为女人频繁买单的现状造成了“消费责任差距”的产生。

一想起我第一次约会时的情况，我就会感受到这种“消费责任差距”。那时我才十几岁，我很喜欢做临时保姆照顾小孩。（我天性喜爱孩子，而且当时这也是能让我赚取生活费的唯一办法！）后来我到了要约会女孩子的年龄。可惜，做临时保姆一个小时只能赚到50美分。修剪草坪的报酬是一小时2美元，但是我讨厌修剪草坪（我当时住在新泽西州，那里虫子多、湿度大而且中午的时候太阳很毒，就算没有生活费，也没有在这种地方剪草坪这么难受）。尽管如此，我开始约会的时候就开始剪草坪了。

修剪草坪的事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对男孩子来说，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为了赚更多的钱而舍弃我们更喜欢的工作。到了初中，男孩子们会压制自己对外语、文学、艺术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兴趣，因为他们知道学工程学的人赚得比学艺术史的人多。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男孩子对日后的消费责任有不同的认识（他可能得在经济上支持一个女人，而不能指望女人在经济上支持他），在大学里，选择工程专业的学生有85%以上都是男生，而选择艺术史专业的有80%以上是女生。[20]

其实男女双方很早就知道做工程师会赚得比较多，所以这样看来，女性艺术史学者和男性工程师的不同成了一项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实际上，在同样缺少经验的情况下，女工程师比男工程师平均每年多赚571美元。[21]

简单地说，消费责任使得男性选择自己没那么喜欢但报酬较高的工作，这是一种弱势的表现，并非力量的体现。但是男人做了这种工作之后，女人往往都认为账单应该由他来付，因为“毕竟他赚得比我多”。于是，双方对男性的这种期望让他们更为弱势。

影响力

天主教堂常引用这句话：“孩子6岁之前带他到我们这里，我们能造

就他的未来。”我们承认教堂对一个孩子所产生的影响，却常常忽视一位妈妈对她的孩子们产生的影响——包括她的儿子。但是，让孩子早点睡觉的是妈妈，端走孩子点心的是妈妈，孩子不听话时下禁足令的也是妈妈。正是当初轻晃摇篮的那个人决定着一个孩子每天的喜怒哀乐。

很少有男人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虽然理论上来说，男人是“一家之主”，但是大部分的男人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来到妻子城堡里的游客，这和女人来到丈夫的工作场所时的感受相似。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男人的家是他的城堡；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女人的家是他的按揭贷款。

在“女性主导”的家庭结构中，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男性主导”的政府机构和宗教机构中，只有少数男人能占据重要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妈妈都是小企业——她们的家庭——中的董事长。在日本，这种现象更为显而易见，每个家庭都由女人掌握着家庭财政大权——直到1992年日本股灾发生后，美国大众才发现日本的这一现象，当时成千上万个女主人投资在股市中的数十亿美元打了水漂，而她们的丈夫根本不知道家里有这些投资。[22]相反，大部分男人只是这些小企业流水线上的一员——或物理流水线，或心理流水线。

对生命的控制力

虽然影响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但是如果我们告诉那些妈妈们：“你的孩子越多，你的权力就越大。”她们肯定会大笑。如果我们还告诉她们：“你的孩子越多，你得到的爱和尊重就越多。”妈妈们这时就会感到压力，而不会感到权力的增强。如果我们告诉男人：“你管理的人越多，你的权力就越大，”他们会认同这一点。真正的力量不是因为受到压力而扩大的责任，而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控制。

过去，身为丈夫的男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老板——这是他收入的

来源——的眼皮底下度过的；但是身为妻子的女人，她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她丈夫——这是她收入的来源——的眼皮底下度过的。因此，比起男人来，女人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保障力

过去，禁止离婚的法令让女人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有所保障。但是男人在他的工作场所没有什么保障。他的老板可以炒掉他，但是她的“老板”却不能炒了她。即使时至今日，如果他辞职的话，没有离职金可以领。但是如果她提出离婚，她可以得到这个“企业”一半的财产。

“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权力

在20世纪90年代，一对男女做爱时，如果女方对男方说她采取了避孕措施而实际上并没有，她有权在男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下这个孩子，10年20年之后（视各州的法律规定而定），她还可以起诉他，追溯子女的抚养费。这种情况下，男人迫不得已选择报酬更多但是压力更大的工作，因而造成他英年早逝。虽然身体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去做奴隶（明明得不到他人的回报却为了他人而工作，或迫不得已为他人工作），要么触犯法律。Roe诉Wade案[1]给了女性为自己的身体权力投票的机会。男性至今没能为他们的身体权力投上一票——不论是在爱情里还是在战争中。

---

① Roe诉Wade案：1969年，美国女子Roe（化名）提起诉讼，挑战德克萨斯州“堕胎为刑事犯罪”的法律。Roe认为，一个孕妇有权单独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以何种理由而终止妊娠，德州刑法剥夺了她的选择权，因而违反了联邦宪法。1973年，美国联邦法院裁决Roe胜诉，确定妇女有堕胎权，也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此法案被视为过去一百年中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判决之一。——编者注

被感谢的权力

词条：在拳王Mick Tyson因强奸案而接受审判期间，陪审团被隔离在一家酒店。后来这家酒店失火了，为了救出酒店里的人，有两名消防员牺牲了。

Tyson的案子加深了我们对男人作为强奸犯的印象。而在火灾中消防员的牺牲却没能加深我们对男人作为救世主的印象。一个男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两个男人挽救了他人性命；被那个男人伤害过的女人仍然活着，而救出了几百号人的那几十个男人却失去了两位战友。但是我们更在意前者。美国各城市大概有一百万名志愿消防员，他们都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他们中有99%都是男性。[23]他们希望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感谢，而得到的却是他人的忽视。

工作责任差距

在做家务和照料孩子这两件事上，女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各种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报道，得出的结论是“女人承担着两种职责，而男人只需要承担一种”。这是一种误导大众的说法。女人在家里工作的时间多，但是男人在外工作的时间更多。而且，男人当上父亲以后，会花更多的时间打理庭院、修理家电家具、粉刷墙壁等。如果把这些家务加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普通男性每周工作61个小时，而普通女性每周工作56个小时。[24]

男性的工作时间只是近期发生了变化吗？实际上并非如此。在1975年，一项最大的全国性家庭抽样调查显示，如果把花在照顾子女、做家务、在职场工作、往返于工作单位以及打理庭院上的时间全部加在一起，丈夫的工作量占了全部工作的53%，而妻子的占47%。[25]

免费保镖

词条：Steve Petrix是圣地亚哥的一名记者，他家离我的住处很近。每天中午他都会回家与妻子共享午餐。前不久，有一次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听见妻子在尖叫。有人闯进他家用刀刺中了她。他把那个行凶者从妻子身边赶走了。但是就在他妻子打电话报警的时候，Steve死在了行凶者的刀下，年仅31岁。[26]

我有个朋友曾经这么说："如果你受到攻击时有个人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为了让你有时间逃跑，他帮你拖延时间结果被杀害了，如果这个人同意这么为你牺牲，你会付他多少钱？保镖的时薪是多少？你知道的，每次和女人出去的时候……不光是自己老婆，而是所有女性，作为男人，当保镖就是你的工作。"[27]

做女人的私人保镖和做志愿的消防员，除了主角都是男人，这两个工作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它们都是免费的。目前男性尚未开始研究自己承担的这个免费角色……

"受压迫的"男人

在女性运动早期，《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上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受压迫的"女人》（"Women as Nigger"）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女权运动积极分子（也包括我自己）将女人的遭遇比喻成黑人所遭受的压迫。[28]男性被描绘成"压迫者""主人""奴隶主"。黑人女议员Shirley Chisholm曾说过她所遭受的歧视中，多半因为她是女人，远甚于由黑人身份带来的歧视。她的该言论也被广泛传播。

这个对比使得女性也得以享受民权运动中得来不易的权利。但是这个对比以及呈现出来的并非是真相。我们当时并未意识到，其实不论男性还

是女性都是对方的奴隶，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因此没有哪个性别是“受压迫”的那一方（“受压迫”指的是单方面遭受压迫）。

如果当时是“大男子主义者”找到了这么一个对比的话，他们就会完全跟女权主义者一样理直气壮了。这个对比非常有用，因为直到它出现之后，我们才意识到男人也是女人的仆人，我们才对按性别划分工种这一现象有了清晰的认识，因而才会发现将任一性别比喻成“受压迫的”一方都是谬论。首先……

在奴隶制下，白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强迫黑人种植棉花，致使黑人寿命很短。在征兵制度下，男人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他们战死在沙场，其他人却从中受益。黑人和参战男性受伤后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困扰，战后更容易成为杀人凶手，而且更容易早逝。奴隶和男人为了世界的和平和自由而牺牲，自己却无福享受。

奴隶有了孩子后却被人强行带走；男人有了孩子，也要被强行带走。我们告诉女性“你有权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却告诉男人“你必须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由于奴隶制的存在，黑人被迫做着社会中最危险的工作；由于社会化的需要，男人也被迫从事社会中最危险的职业。过去，“高死亡率职业”中完全是奴隶和男人。如今，男人依然从事着这类职业。

奴隶让座给白人被视为“屈从”，而男人让座给女人被视为“礼貌”。同样，奴隶会在主人进入房间时起身，这叫作“屈从”，但是女人进入房间时男人起身，却叫作“礼貌”。奴隶应该向其主人鞠躬，而在传统文化中，男人也要向女人鞠躬。[29]奴隶要为他的主人披上外套，男人也要为女人披外套。而且到了现代，男人依然会为女人披外套。男人对待女人、奴隶对主人，其间象征性的顺从和屈从有共同之处。

无家可归的黑人比白人多，无家可归的男人比女人多。监狱里的黑人

比白人多，监狱里的男人数量是女人的20倍。黑人的寿命没有白人的寿命长，男人的寿命没有女人的寿命长。黑人能上大学或者能从大学毕业的比例小于白人（46%：54%），男人能上大学或者能从大学毕业的比例小于女人（45%：55%）。[30]

种族隔离制度迫使黑人为白人进行钻石开采，大众期望男人到各种矿井去工作，好为女人赚取钻石。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压迫阶级为了讨好被压迫阶级，为了给她们购买钻石而辛劳工作，而且还希望被压迫者能更爱他们。

为了赚钱和学到一些技能，黑人比白人更愿意奔赴战场；男人也为了同样的原因比女人更愿意参与战争。为了赚取金钱、赢得尊重和爱情，黑人更愿意在幼年时承受残酷的训练，以便从事拳击和足球职业；为了同样的目的，男人比女人更愿意在幼年时承受残酷的训练，以便从事拳击和足球职业。

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一个为了她们而努力工作的“压迫者”阶级（被称为“父亲”），她们是唯一以这种方式受到“压迫”的群体。过去，也有人在田间为统治阶级努力工作——他们被称为“奴隶”。

在奴隶中，田奴被视为二等奴隶，而家奴被视为一等奴隶。（在外工作的）男性角色类似于田奴，或者说是二等奴隶，而传统的女性角色（主妇）类似于家奴——一等奴隶。

黑人户主所创造的净值力远低于白人户主，男性户主的净值力远低于女性户主。[31]受压迫群体的净值力永远不可能高于压迫者。

一个持有50%以上投票权的群体将自己称为受害者；或者说，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在竞选中为他们的“压迫者”所投的票数，多过为自己的群体成员所投的票数，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中是很难找到的。女性是唯一掌握多数票数的少数群体，也是唯一将自己称为“受压迫者”的群体，而实际

上她们掌控着谁将坐在这个国家哪一个社区的哪一间办公室里。权力并不在管理办公室的那个人手上，而在对管理办公室的人有选择权的那个人手上。黑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所能掌握的选举权从来都没能超过50%。

女性是唯一可以与其“压迫者”有共同父母的群体；是唯一出生于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家庭的概率和“压迫者”一样的群体；是唯一拥有的奢侈品数量比“压迫者”更多的“受压迫者”群体；是唯一总是“无酬劳动”，但在每年50亿美金的化妆品销售额中做出绝大部分贡献的“受压迫者”群体；是唯一花在高端时装和品牌服装上的钱比“压迫者”多的“受压迫者”群体；是唯一在任一时间段看电视都比“压迫者”多的群体。[32]

女权主义者总是拿婚姻和奴隶制相比，将女性比喻成奴隶。在美国，有2500万女性[33]平均每个月[34]阅读20本爱情小说，很多都是对美满婚姻的憧憬。所以，告诉她们，对女性来说婚姻就是奴隶制，这简直是在侮辱女人的智商。女权主义者是在说这2500万美国女性对婚姻的憧憬是对“奴役”的憧憬吗？难道这就是Danielle Steel[①]的书在全世界畅销的原因吗？

世界上没有哪个奴隶阶级会花大量的时间幻想自己做奴隶的样子，或者去买大量的书籍和杂志去学习“如何让奴隶主许给你一个未来”。所以要么婚姻对于女人来说跟奴隶制大不相同，要么就是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不够聪明。

非裔美籍的黑人不会认为奴隶身份是“权力”的象征，而在男性的教育中，男性的奴隶身份是“权力”的象征。这就是奴隶和男性之间的区别。如果男人真的是奴隶主，而女人是奴隶的话，那么为什么男人要花毕

① Danielle Steel，美国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共卖出了将近6亿本。其作品包括《查令街44号》（*44 Charles Street*）、《遗产》（*Legacy*）、《家庭关系》（*Family Ties*）等。——编者注

生的精力去支持这些奴隶和奴隶的孩子们呢？为什么不能倒过来让女人像帝王支持他们的子民那样支持男人呢？因为我们了解了黑人的无力，所以我们知道过去对待黑人的方式是“不道德的”。当男人们为了我们浴血战场的时候，我们说那是“爱国”，称他们是“英雄”，然而如果他们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杀错了人，他们就是“暴力”“谋杀”和“贪欲”的代名词。

了解了历史上黑人遭到我们“不道德的”对待之后，我们愿意通过各种反歧视行动和各种福利来减轻我们的罪恶感。了解了男人是一种为了权力和贪欲而战的压迫者之后，我们并没有因为他们在这个战斗过程中英年早逝而产生罪恶感。因为我们相信女性是一个像奴隶一样受压迫的阶级，所以我们把女性也纳入了原本为了补偿我们对黑人的不道德行为而设计的一些特权和优惠政策的范围之内。女性——而且只有女性——能从奴隶制补偿政策中获益，这是她们的不道德。而男性配合这种行为，这是他们的愚昧。

难道男性的这些所作所为是因为他们比女性更无私、更有爱心、更少权力欲？并不是。男性和女性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另外一方的“奴隶”。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双方要这么做；为什么任何一方都不能被称为“受压迫者”；为什么我们更应该赞扬而不是责怪对方；为什么要区别对待那些看不清自己新机遇的国家机构，因为它们不懂得如何周到地履行政策。

注释：

1. Lawrence Diggs，《变迁》（*Transitions*），1990年11/12月出版，第10页。

2. 索姆河战役发生于1916年。英国有42万人在战争中伤亡，法国伤亡人数为19.5万人，德国为65万人。参见John Laffin的《布拉西的战争辞典：3500年的冲突、战役和战争》（*Brassey's Battles: 3,500 Years of Conflicts, Campaigns and Wars from A-Z*）第399页。（London: A. Wheaton & Co., 1986）

3. 数据来源于1920年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于1989年9月26日发行的《生命统计报告月刊》第38期5号增刊第4页。1920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为53.6岁，女性的平均寿命为54.6岁。

4. 数据来源同上，1991年8月28日发行的《生命统计报告月刊》第39期13号刊第17页。1990年，女性的平均寿命为78.8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2.0岁。

5. 数据来源同上，第38期5号同一出处。

6. 数据来源同上。女性与男性平均寿命的精确差异为6.9岁。白人女性的平均寿命为78.9岁，黑人女性平均寿命为73.6岁；白人男性平均寿命为72.2岁，黑人男性平均寿命为65.2岁。

7.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以下简称为USBH&HS）、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以下简称为NCHS）发行的《美国生命统计》（华盛顿：1991年美国政府印刷所出版）第2期A期“死亡率”第51页的表1~9，“各年龄组、种族和性别在72种死因中的死亡率：1988年，美国”。具体数据如下：

各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自杀率（单位：1/100000）

年龄	男	女
5~9	0.1	0.0
10~14	2.1	0.8
15~19	18.0	4.4
20~24	25.8	4.1

8. 250倍是从上一注解的表中推算出的。

9. 在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中，有2.7/1000的女性和6.2/1000的男性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数据来自美国司法部司法项目办公室司法统计局于1990年12月发布的《1988年美国刑事受害报告》的“全国犯罪调查报告NCJ-122024”第18页表5。

10. 数据来源同上，1989年6月发行的《1987年美国刑事受害报告》的NCJ-115524报告第16页表3“1987年个人犯罪”。

11. 数据来源同上。

12. 1989年7月17日《时代》杂志第31页文章《致命七天》（“7 Deadly Days”）。

13. 这是（截止到1992年）最新的可用数据。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989年出版的第109版《美国统计摘要》第459页表747：“家庭资产净值—家庭财产中值：1984年”。其中的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当期人口报告》刊号P-70第7期：1985年调查发现女性收入比男性收入更高，至下一期数据发布时女性和男性收入有了更大的差距。人口普查局将“户主”定义为“将自有或租赁房屋登

记在自己名下的人”。1980年之前，户主通常是一对夫妻中的丈夫。现在丈夫或妻子都可以是户主，但毫无疑问如果丈夫收入更高的话，户主往往还是丈夫。

14. 根据美国国税局1990年的最新数据，最富有女性的平均净值为117万美元，最富有男性的平均净值为111万美元（见1990年8月23日《洛杉矶时报》）。

15. Jacque Lynn Foltyn，《美国文化中的女性美》（*Feminine Beauty in American Culture*）（1987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博士论文）。Foltyn假设如果女性部门没能创造足够的利润（按每平方英尺计），他们不得不将部分面积让给男性用品部门或综合部门。在这个前提下她测量了购物中心和时装店里男性用品商店和女性用品商店所占的楼层面积。Foltyn发现，女性个人用品所占楼层面积是男性个人用品所占面积的7倍。她还发现女性用品占据了商业价值较高的楼层区域（比如，香水柜台总是安排在部门入口处就能看到的地方）。

16. 见1992年《美国人口统计》第38页，Diane Crispell的《勇敢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文章指出女人是个人用品、清洁用品、家居用品和食品的消费主力。在家具和车的消费上，男女所占比例相当——男人只是有技术知识优势而已。

17. 1984年A.C.尼尔森收视率统计数据。

18. 1991年11月11日《新闻周刊》刊登的Harry F. Waters的《抽我吧，揍我吧，给我高收视率吧》（“Whip Me，Beat Me，and Give Me Great Ratings”）。

19. 这个数据是本人在美国各城市演讲时在各个餐厅与侍应生讨论所得出的。

20. 而且，86%的工程专业毕业生为男性，83%的艺术史专业毕业生为女性。数据来自美国教育部教育研究改善局国家教育数据统计中心的1989年和1990年《中学后教育完成率研究》，未出版。

21. 女工程师起薪比男工程师多571美元/年。见工程人力委员会的《工程界女性》（*Women in Engineering*）和美国工程师学会联合会（AAES）EMC公告第99期，1989年12月，表5。

22. Sonnie Efron的《亲爱的，我把养老金缩水了》（“Honey，I Shrunk the Nest Egg”），1992年6月20日《洛杉矶时报》头版。

23. 1992年2月11日，美国消防管理局的John Oddison在采访中指出，99%的市区志愿消防员是男性。在市区消防员中，96.4万人是志愿者，2.4万人是职业消防员。

24. F. Thomas Juster与Frank P. Stafford的《经验发现、行为模式与测量问题》（“Empirical Findings、Behavioral Models and Problems of Measurement”），《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1年6月第29期第477页。女性在

家和在外工作加起来的平均时间为每周56个小时，男性为61个小时。

25. Martha Hill，《在时间、消费和健康中的时间利用模式》（*Patterns of Time Use in Time, Goods and Well-Being*），编辑F. Thomas Juster与Frank P. Stafford。又见Joseph H. Pleck的《职场妻子/职场丈夫》（*Working Wives/Working Husbands*）第41页表2.3。（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5）

26. 见1988年5月21日《圣地亚哥联合报》，记者Carol J. Castaneda。

27. Frederic Hayward，《男性的免费角色：保镖和保护者》，见Francis Baumli博士的《男人解放男人》（*Men Freeing Men*）第238页。（New Atlantis Press，1985）

28. Naomi Weisstein，"'受压迫的'女人"，发表于《今日心理学》1969年10月刊第20页。这篇文章被视为女权主义文献中的经典之作。参看Wendy Martin的《美国姐妹情：殖民时期至今的女权主义文献》（*The American Sisterhood: Writings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第292~298页。（New York：Harper & Row.1972）

29. 与"屈从"相关的这些对比是根据Lawrence Diggs的一些想法得来的，来自他的录音带"认识男人的问题"。

30. 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1991年教育统计文摘》第167页表161"高等教育机构总人数"中显示，已注册的大学生里有54%是女生；第234页表228"高等教育机构获得学位人数"中显示，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生中有55%是女生。

31. 女性当家做主时，她的净值比男性当家做主时的净值大141%。这是截止1992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最新数据。见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1989年美国统计摘要》。

32. 数据来自1984年尼尔森收视率。

33. 数据来源于1985年2月18日与John Markert的会面。他是一位独立研究员，是《浪漫时代》（*Romantic Times*）的贡献者，当时正在写题为《营销爱情》（"Marketing Love"）的论文。

34.《福布斯》（*Forhes*）杂志的数据显示，1991年爱情小说的读者平均每个人花1200美元购买这类书籍。1991年爱情小说的均价为5美元一本，所以每人一年大约读240本爱情小说，或平均一个月读20本。那些和朋友相互交换书籍阅读的女性平均每个月阅读20本以上，不和朋友交换书籍但是购买精装书的女性平均每个月阅读量在20本以下。见1992年7月6日《福布斯》第70~75页Dana Wechsler Linden和Matee Rees的《我饿了，但不是肚子饿》（*I'm hungry. But not for food*）。

第二章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谁被解放了？

从角色伴侣到灵魂伴侣

过去的几千年中，大部分人的婚姻处于第一阶段——重在生存。二战以后，人们的婚姻开始慢慢进入第二阶段——重在自我满足。在第一阶段，大部分夫妻只是角色伴侣而已：女人负责养育孩子，而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到了第二阶段，夫妻们慢慢地开始希望对方是自己的灵魂伴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因而“加大筹码”，对爱情有了新的定义。

在第一阶段，一个女人遇到一个能养她能保护她的男人，就觉得遇到了“爱情”；一个男人遇到了一个长相俊俏又能持家带孩子的女人，就觉得遇到了“爱情”。这时候，爱情意味着一种劳动分工，同时也把男女双方的兴趣进行了分工。到了第二阶段，爱情意味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共同的价值观。爱情的定义正在发生转变。

甚至在二战以前，有一些父母对爱情的定义已经有了变化。然而通常他们只能在最后一个孩子“嫁出去”之后才能那么做，就像《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1]中的Tevye和Golde一样：

Tevye：Golde……你爱我吗？

Golde：我爱你吗？

25年来，我为你洗衣、做饭、扫屋子，给你生孩子、挤牛奶。

25年后，你来问我爱不爱你？

Tevye：但是我父亲和我母亲说我们应该学习如何相爱……

你爱我吗？

Golde：25年来我跟他一起生活、一起努力、一起挨饿。

25年来我的床就是他的床。

如果这不是爱情，那什么是？

最容易重新定义爱情的人就是嫁给成功男士的女人。这些女人开始提出一些第二阶段的问题，比如："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只懂得给我钱却不懂得爱我的人呢？""为什么别人要叫我某某太太——我是谁？""为什么我老是伺候他还要听他的话？""孩子们长大以后，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她害怕丈夫不尊重她，然后她会为太过在意他的想法而责罚自己。她将自己的关注点大声说出来。她的顾虑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妇女解放运动。

他的关注点却被压抑下来。他的妻子似乎对孩子、逛街和她自己的兴趣比对他的兴趣大，而他只能独自伤心。他加班回家后似乎得到的责怪比称赞更多。对他来说，妻子和他交流大多是听她表达她的负面情绪，她并不会听他说自己的想法。她也不像在享受而是在躲避性生活。婚后，妻子不再注意体重，在不见人的时候衣着邋遢，他觉得有些受伤。

得不到关注和感激，他内心不免产生了诸多抱怨："我到底从这段婚姻里得到了什么？餐厅的饭菜更好吃，而且菜单上有那么多菜色可以选；雇个管家也花不了我一半的收入；我的秘书更漂亮、更尊重我，工作上也更配合我。"他的顾虑演变成身上的溃疡、心脏病、癌症和酗酒。

如果他真的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别人会把它看成"男人的中年危

机”。从本质上来说，女人的解放和男人的中年危机是同一个研究课题——都是关于个人成就、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和爱情的。但是女人的解放被视为身份的提升，而男人的中年危机被视为一种身份危机。同样，女人的解放被视为顿悟、自我发掘、自我成长，也就是变得更成熟；而男人的中年危机被视为“寻欢作乐的时期”和自私，也就是变得不再成熟。男人的危机口碑很差。

第二阶段的爱情是无条件的还是条件更多?

我妈妈常说：“不能赚钱回家的话，爱情会飞走的。”

——41岁的Brian谈第一阶段爱情的不成文规则

如果第二阶段的爱情是无条件的话那真是太棒了。但实际上，它有更多条件。现在，夫妻们都希望有良好的沟通技巧，能共同教育子女，可以一起分担家务，有美满的性生活，遇到重大决定时能一起商量，有精神交流，能相互吸引也能相互尊重。他们既想要稳定又想要有些变化；既希望能相互依赖又希望另一半能够独立。他们希望有时间成长，也希望有时间发现对方的成长。在第一阶段，考虑这些问题需要从照顾孩子和养家糊口中抽出时间。“好好认识双方”这在第一阶段来说是毫无价值的追求，因为它们会威胁到生存问题。

离婚为什么成了两性关系中的交换物?

那些追求第二阶段爱情价值观的夫妻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第一阶段的婚姻中造就“完美夫妻”的那些品质，成为第二阶段婚姻中“离婚的完美理由”：她总是“忙于家务，十分无聊”，而他总是“忙于工作，又害怕亲密”。在下表中，第一阶段的角色和第二阶段的目标之间的矛盾以及离婚的后果都显而易见：

第一阶段的角色	第二阶段的目标*
婚姻	婚姻（或长期的恋爱关系）
生存	满足感
角色伴侣：男人和女人 结婚创造一个“整体”	灵魂伴侣：“整体”的人 结婚创造增大收益
角色分工	角色公平
女人负责照顾孩子 男人负责赚钱养家	双方共同负责照顾孩子 双方共同负责赚钱养家
生孩子是一种义务	生孩子是一种选择
女人冒着生命危险生孩子 男人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	最完美的是生孩子没有危险 最理想的是不用上战场
我们至死不渝	在变得不幸福之前，我们会在一起
任何一方都不会提出离婚	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离婚
女人被视为财产 男人还不如财产 （希望能死在财产散尽之前）	双方都对自己和对方负责
夫妻双方一切以家庭需要为重	双方会权衡自己的需要和家庭的需要
爱情来自相互依赖	爱情来自相互选择
爱情的条件很少	爱情的条件很多（不得出现语言或身体上的虐待；希望能相互尊重；价值观相同……）
择偶条件	**择偶条件**
父母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父母的意见是次要的
女人希望对方是她的收入来源	双方都不愿意拿出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
婚前条件	**婚前条件**
男人在能给女人提供安全感之前不会得到女人的性和美貌	双方最多也只是失去对方而已

*第二阶段的目标只是理想状态，目前大部分夫妻都不能达到其中大部分的目标。

很多婚姻本来是从第一阶段开始的，但是后来突然冒出了第二阶段的要求。这时婚姻会失败。婚姻会失败不仅因为要求更高了，也因为这些要求是矛盾的。在第一阶段中，对女人来说律师是个很好的丈夫人选。但是

在第二阶段中，律师是个很好的离婚人选，因为他们被训练成争辩多过倾听，在工作中成就他成功的那些品质恰恰造成了他在婚姻中的失败。性别角色的训练往往是一种离婚训练，但是这一训练中却没有离婚这个选项。第二阶段的婚姻出现了这个选项。这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会出现离婚潮的原因。

离婚何以让女人重新定义歧视与不平等

实际上，在90%以上的女人都结婚而只有少数人离婚的那个年代，那些对职场男人有利的歧视，对他的妻子也是有好处的。

当工作中的歧视有利于主妇时，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性别歧视。为什么呢？因为它对女性有利。只有有利于女性的歧视变得不利于女性（因为有很多女性身在职场），它才能叫作性别歧视。比如：

我在全美妇女组织纽约分部董事会任职期间，为了在工作场合争取平等待遇，我曾经组织过企业研讨会。抵制呼声最高的不是男性管理人员，而是他们的妻子。只要她的收入来自她丈夫，那么，如果反歧视运动支持另外一个女人和她丈夫竞争，抢他的（也是她的）收入的话，她就慷慨不起来。对她来说，这就是性别歧视。我那个“为职场女性争取平等待遇”的研讨小组应该理解为“对主妇是不平等的”。对于那些管理者的妻子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几乎70%的男性管理者（副总裁及以上的职位）的妻子都不会在外任职带薪工作，连兼职都不会。[2]她们的收入完全来自其丈夫。一个管理者的妻子往往反对职场中的女性优于她丈夫，不仅因为这会影响她的收入，而且这也意味着她所做的贡献打了折扣：她通常会很努力地支持丈夫去支持他所在的企业——这是她的工作。她会觉得她的努力——她的工作——打了折扣。

当针对女性的歧视被发现时，引发了很多保护女性的措施。1963年，联邦通过了《同酬法案》（*Federal Equal Pay Act*）。[3]很有意思的是，《同酬法案》是在女权运动兴起之前通过的。早在1960年，美国国家统计局就发现，45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在职场中比4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收入更高。[4]这一数据——它们所透露出的信息有悖于“女性是受害者”这种观点——从来不会引起大众的注意，因为只有女性才有自己的组织。

将对大多数女性都有利的事情当成反对女性的阴谋，所以我们都认为男人“欠”女人的。因此第二阶段的权利要求冒出来了：女人有权得到补偿，因为她们过去受到过压迫。我们看不到，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是要发起一场女权运动或者男权运动，而是来一场“性别转换运动”。

在这本书里，我把“力量”定义为对自己生命的控制力。一个男人有义务在一个女人爱上他之前赚得比她多，这不是对他自己生命的控制；在第一阶段，男人或女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而且，就像开篇所说的，男性和女性都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力量（影响他人、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只是方式不同。

性别歧视？还是两性歧视？

性别歧视是个双行道？是的。我们以为，几个世纪以来，性别歧视一直让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强大。但事实上两个性别都不够强大。双方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女性的角色：建立家庭。男性的角色：保护家庭。女性的角色：采集食物。男性的角色：猎取食物。如果男性和女性都受自身的角色限制的话，“性别歧视”就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准确来说是“性别角色”。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并没有简单的性别歧视，有的是两性歧视。

成功男士为何解放了女性却忘了解放自己

Abigail是一位典型的19世纪90年代的女性，她有8个子女。为了生孩子，她两次差点命丧黄泉。她最小的孩子长大成人离开家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Cindy是一位典型的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她25岁结婚。婚后她生了两个孩子。她在第二个孩子长大成人离开家之后，还会活二十几年。

Abigail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叫作冰箱的东西。Cindy可以用冰箱里的东西为家人做一餐饭。Abigail整天都忙于为一大家人采购、做饭。Cindy经常选好鲜美的食材放进微波炉里，等上20分钟饭就做好了。（她常开玩笑说："我不做饭，我只是把饭加热而已。"）有时到了傍晚，她和丈夫Jeremy带着孩子去麦当劳吃晚餐，叫比萨外卖或者由Jeremy烧烤，或"晚餐做Cindy最喜欢吃的菜——要预定"。Cindy和Jeremy的事情，比如当司机或者供子女上大学等，Abigail从来不用操心这些。

Abigail去采购时是骑着马或者驾着马车或者步行去的。Cindy或者Jeremy开车购物或者电话购物。Abigail去买食品杂货得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如果忘记了就什么也买不到。Cindy或者Jeremy任何时间都可以去采购。

Abigail每次餐后都得自己动手洗碗。Cindy餐后把碗交给洗碗机洗。（有时她根本不用碰那些碟子，Jeremy或者她的大儿子会帮忙。）Abigail洗衣服时，得先汲水、然后生火烧水，再用手将每一件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如果碰上下雨天或者下雪天，她就得在屋子里找个角落把衣服夹好晒在晾衣绳上。Cindy只要设置好洗衣机的洗衣和烘干程序就好了。有时她不必自己放衣服进去，Jeremy和她的大儿子会代劳。

Abigail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在冷飕飕的屋子里就着烛光做衣服。Cindy和Jeremy到折扣店去买免熨烫服装。Abigail要花两天时间才能做好一件孩子

的衬衫，想想看要做10个人的衣服得花多少时间。Cindy或者Jeremy只要20分钟就可以在折扣店给两个孩子选好衬衫。

Abigail的8个子女需要什么全都指望她来提供。Cindy的两个孩子需要什么有时看电视就知道了。她还有其他法宝：一个既懂得培养子女又有懂得训练他们的丈夫。

在20世纪90年代，Cindy也可以选择用烤箱烤面包或者手工缝制衬衫，然而这是有选择性的，不是必须得这么做，可以偶尔做。这些事只是她成年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Cindy是否承受着Abigail从未有过的压力？当然了。但是这些新的压力算不上是新增的，只是过去负担的替代物。如果这些是新增的压力，那么女性的寿命就不会在1920后延长了近50%。[5]

然而，为什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寿命差距会从1920年的1年变成了现在的7年？因为男人的工作——发明、制造、销售、派送——拯救了女人，但是没有人将男人从他们所承担的压力中解救出来。她从一个整天围着孩子、厨房、洗衣房团团转的机器发展成一个有时间享受爱情的人。而他从一个离家不远的工作机器发展成一个离家更远的工作机器。他能享受爱情的时间更少了。

男人可以为他们自己把煤矿和建筑工地建设得更安全，但是他们更擅长为妻子创造更美好的家园。男人们穿山越岭，挖公路修铁路，以便文明能进入厨房之中。很多男人死掉了，然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当一个男人的工作地点远离所爱之人时，他的生活就没有了意义……虽然死亡的概率很低。于是，如果他成了成功人士，他就变成了一个男性机器；如果他没有成功，他就得承受羞辱。不论他能否成功，他为她提供的服务越多，他就越比她早死，然后他的血汗钱都留给了妻子和孩子们

去花。就是这样，成功的男人解放了女人，但是忘了解放自己。

除此之外，女权主义都把“男性的科技”，尤其是“男性的医疗科技”视为一种压迫女性的男权式工具。[6]进入第二阶段时，我们责怪男人修建水坝破坏了环境，但没人承认是男人修建水坝后才能发电，也没有人要求女人为女性的消费承担责任，因为这些消费导致对电的需求量增加，结果需要修建更多的水坝。

至于“男性的医疗科技”，它可能是让女性寿命延长近50%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使女人免于因生育而死亡，而且几乎所有传染病都开发出了相应的疫苗（小儿麻痹症、白喉症、伤寒症、麻疹、水痘、黑死病、天花、肺结核）。

在战争时期，实验性药物往往都用于男性身上。如果药物实验失败，那个男人就会死亡。如果实验成功了，男人和女人都可以用那种药物，但是在实验开发阶段女人不用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急救程序、微波炉（在测试阶段，有一个男人不小心被“烤熟”了[7]）和其他男女共用的先进科技的开发阶段，男人被当成了小白鼠。后来，医疗领域男性多过女性，就被打上性别歧视的标签。但是当小白鼠的男性比女性更多，却没有人认为这是性别歧视。

女权主义者认为父权和男性的科技二者的密谋限制了女人的生育自由——女人的“选择权”。但是男人的科技为女性创造了“选择权”，它创造了避孕措施，还创造了安全的堕胎方式。在为女性减负方面，任何事物都比不上男性的科技创造的生育控制——避孕措施，它让女性在性生活中有了多种选择。总之，科技让男性角色拯救了女性，比女性角色拯救男性的程度更深。但讽刺的是，如果没有这些科学技术，一些抱怨“男性的科技”的女权主义者可能已经死于生产或者堕胎了。

然而男性的科技没能为男人自己创造平等的选择权。因此，一个男人

和女人上床时，如果这个女人说她采取了避孕措施，那么他就必须相信她真的采取了避孕措施。如果她撒了谎，有了孩子，他就得抚养孩子18年。如果一个男人用了避孕套但那个女人后来还是怀孕了，处于第二阶段的未婚女性有权选择通知或不通知男人；有权单方面决定流产或悄悄生下孩子后给别人收养；有权决定自己抚养孩子并让男人支付抚养费；甚至有权在这个男人完全不知道孩子的存在，就独自抚养孩子18年，然后起诉他，向他讨要孩子的抚养费。这些都是合法的。

每个女人都清楚，如果只让男性采取避孕措施的话，她觉得那不叫作生育控制，她觉得这无法控制。“相信我”，这句话从男人嘴里说出来很可笑，但是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就是铁律。避孕措施让女性有了选择权，也让女性期待男性能够相信她们。如今，进入女人身体的每个男人都相当于将自己的未来交到了那个女人手上。

简单地说，**男人的科技和法律让女性的生理功能不再决定她们的命运，而女性的生理功能却决定着男人的命运。**

有多项选择的女性和毫无选择的男性

现在，单身的成功女性和单身的成功男士相遇了，看起来他们是平等的。他们是否应该结婚生子呢？她总是会考虑以下三个选项：

选择1：全职工作

选择2：全职妈妈

选择3：工作和带孩子兼顾的方案

他的考虑会“稍有不同”：

选择1：全职工作

选择2：全职工作

选择3：全职工作

因为家庭原因而离开工作岗位6月甚至更久的妈妈们的比例是爸爸们的43倍。[8]多数情况下，妈妈离开工作岗位后，爸爸就不止担任全职工作，而是常常加班或者身兼两职。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种不平等——她有三个选择而他却没有选择——却是他的成功。当然，女人选择做妈妈可能会影响她的事业，但是她可以选择做妈妈还是继续打拼事业。相反，那些选择做爸爸的男人——未来的“先锋家庭奶爸”——很快就会广为人知，因为会有很多记者想采访他们，但是很少有女人想嫁给他们。

女人不仅大声说出了她们新的选择方案，还明确提出了这些新的选择方案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听到女人是如何“变戏法”的。当上爸爸之后，爸爸们更加辛勤工作，却不善于表达这种压力。所以我们听不到男人是如何“辛勤工作”的。遭到家人冷落之后，男人不会与他人讨论那种失落感。

孩子刚出生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男人是否愿意全职照顾孩子半年到一年？我曾向一群男人问这个问题，他们中有80%以上的人做了这样的选择：在妻子支持且家庭经济条件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全职照顾孩子。我想我面对的这些人，要么是一群说假话的人，要么就是一群自己掌握选择权的榜样。我从建筑承包商协会那里得到的数字比例稍微小了一点，[9]然后我开始理解男人们是如何不考虑自己的选择权的。

我们常说：“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女人得到外面工作，这是没得选的事情。”我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在外工作的女性做了一项选择：为减少女性家务负担的技术支付费用。

大部分有多项选择的女性有一个共同之处：她们都有一个成功的丈夫。但是离婚会让很多女人失去成功的丈夫。她们基本可以划为六种人：

1. 第一阶段的已婚女性。她从来不允许自己去工作，或者她认为“我丈夫

是不会同意的”。从心理学上来讲，她属于无选择的女性。

2. 婚姻不幸，拥有三种选项的女性。她仍在婚姻中但不幸福，常常会避开不得不工作的状况。

3. 受政府照顾的单身妈妈。政府扮演着替身丈夫的角色，只有在她能维持生计的情况下才她才有三种选项。

4. 第一阶段的职场单身女性。这类女性为了维持自己或家人的温饱而工作。如果她在前一段婚姻中有了孩子，那么通常她丈夫没有付子女的抚养费。

5. 第二阶段的职场单身女性。既没有男人支持她，她也不需要支持任何男人。如果她在前一段婚姻中有了孩子而且她丈夫支付子女的抚养费，那么她差不多就处于第二阶段了。

6. 拥有一切型女性。她们嫁给经济条件很好的男人，能让她们在三个选项中任意选择。拥有一切型女性婚姻幸福。于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阶级产生了。从一定程度上讲，拥有一切型女性属于“新贵族”阶级。实际上没有哪个男人与她处于平等的位置。

女权运动的一项政治天赋在于其直观感觉：只要强调扩张女性的权利，而不强调女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它就可以让六种女性全部臣服。如果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为年满18岁的女性争取权利去登记当兵，那么其会员一定会减少。如果女权主义强调女性要在有风险的性行为中承担责任，和男人外出晚餐时买单，为了家庭而选择自己不太喜欢的职业，或者与地位低的人结婚，那么女权主义的影响将使得男女更为平等，而在政治上则会不那么成功。

是什么使女人对男人满腔怒火?

女人对男人的怒气有一部分原因是她们拿成功的异性恋白人男性跟

自己对比，对比的对象不是身处窘境的黑人或者美国土著男性，也不是遭到排斥的同性恋男性抑或完全被无视的穷苦男人。这就是原因。

女性，被随意处置的性别

几百万女性因为离婚而跌出了“拥有一切型”阶级。但是离婚的女性大多已经人到中年，她们面对的男性会对两个20岁的年轻女性更感兴趣，而不是一个40岁的中年妇女。她们对男人心存怨言也情有可原。

在第一阶段，让男人沉迷于20岁少女的美色之中对女人来说是有好处的，这种沉迷可以让他心甘情愿地在有生之年支持她；离婚的禁忌也迫使他坚持自己对她的支持。离婚禁忌弱化以后她已经40岁了，他对青春美貌的沉迷不再对她有利了。她觉得自己像一次性用品一样。离婚改变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心理关系。

女人在年轻时越貌美，得到的明星待遇就越多——她们天生就是明星——她们后来就越是觉得自己像明日黄花。有一些东西从未拥有过胜过拥有之后又失去了。男人对她越来越无视，她越来越有被随意处置的感觉，因此，她对男人的怒气也越来越大。

同时，那些从来没能成为“拥有一切型”的女性也会感到自己很失败。两种女人都有被男人随意处置的感觉，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所以她们都对男人心生怒气。

离婚而且有孩子的女人的被随意处置感更强烈。她不只是她自己，她是成套的：一个女人加上她的孩子。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他和Carol约会回来之后非常兴奋。一个星期以后，他去了Carol家，见到了Carol的3个孩子。后来有一个周末，他们一起去滑雪，他在3个孩子身上多花了一千多美元。他也知道他可以不付这笔钱，但是“我不想显得自己太小气了，所以滑雪索道的票，他们住的房间还有餐费等我都帮他们付了……”

我的这个朋友需要支付他前妻的赡养费和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害怕自己成为两个家庭孩子的父亲，害怕自己成为两个家庭的顶梁柱。他害怕自己会成为一个身兼四职的男人。更确切地说，他害怕每一份工作都做不好。很快，他在这段关系中退缩了。Carol很伤心，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他觉得自己像个被随意处置的朋友，因为他无法再做摇钱树，而她觉得自己像个被随意处置的结婚对象。其实他们都是后离婚现象的受害者，我称之为“套装女人现象”（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女人加上3个孩子）。如果当时他们能明白两人都是受害者的话，也许他们现在还是朋友。

由于离婚，那些过去选择自己喜欢但是报酬较少的工作的中产女士不得不选择自己不太喜欢但是报酬较多的工作。女权主义声称女人都被派到了低酬、无价值的工作岗位，女人觉得自己掉了价。女权主义的影响让她们看不清自己周围有多少男人也做着各种低酬、无价值的工作：当地咖啡店的快餐厨师和洗碗工、在餐厅择菜的打工仔、门卫、洗车工、打杂工和加油工…… 不论男女，掌握的技术很少，就只能在不同的岗位做无价值的工作，拿很少的工资。女性被蒙蔽了双眼，所以她们无法看清全局，所以她们的怒气越来越多。

男人倾向于多做几份工作以便赚更多的钱，女人将其解读为男性优势，并不认为这是男性的屈从：她们没有把这一行为视为一种责任感——哪里赚钱就去哪里，而不是哪里能让他有满足感他就去哪里。对男人来说，报酬是首要因素，满足感是次要因素。离婚带给他的变化是，他还是得把报酬作为第一考虑因素，他要在经济上支持这个家，但是这个家却不在情感上支持他了。

同时，女权主义者着重强调了女性得到的报酬较少，但从来不强调女性得到报酬少的原因。原因有很多，例如，全职工作的男性比全职工作

的女性每周（在工作场所）多工作9个小时；[10]男人更愿意被调到较为艰苦的环境中去工作，[11]等等。将报酬差距称为“性别歧视”但不解释产生差距的原因，这让女性愤怒不已，而不是感受到自己是有力量的。如果她们了解了产生差距的原因，她们就有能力消除这种差距。

女性的伤心和愤怒制造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男人开口表达自己的感受不大安全，于是男性变得更具有被动攻击性。男性越来越觉得他们在关系中唯一获得权力的方式是不陷入关系。女性把这看作害怕承诺的表现，指责男性害怕亲密关系而且无意识地把男性比喻成恶魔：“老爸最知心”变成了“老爸爱骚扰”。女性变成“爱得太用力的女性”，男性变成了“骚扰太频繁的男性”。女性被打上了“女超人”的标签，男性被打上了“被宠坏”的标签。

家务政治

很快，大部分女性发现女人做着两份工作而男人只做一份——因为只有她的工作量增加了。实际上，她在家外的责任少，在家里的责任多：我们确实是在按她的工作地点来区分的。有一项全国调查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Virginia Slims回顾1908年的协作关系

她的任务

找好柴火。烧旺火炉。准备三餐。擦亮地板。清理地毯。打好井水。耕田种地。去除杂草。采收作物。食物装罐。储藏食物。擦拭餐具。准备点心。打扫窗户。给狗洗澡。把狗喂饱。负责采购。装饰房间。清扫走道。裁衣缝裤。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整理阁楼。晾晒被褥。精打细算。

他的任务

负责赚钱和确认钱的去向。

1991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报道称

女性每个星期都在家多工作17小时，而男性每个星期都在外多工作22小时（包括上下班的时间）。[12]如果我们将普通女性和普通男性在家和在外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对比会怎么样呢？女性总共是56小时，男性总共是61小时。二者采用的计算方式相同。为什么结果会这样呢？普通女性每周在外工作26小时，而普通男性是48小时。[13]

一些调查称，有工作的已婚妇女做着两份工而她们的丈夫却只做一份。虽然其中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见得是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简直就是一个谎言：这些都是“女人就是受害者”之类的调查得出来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们让女人心生怒气，离婚率也随之上升，结果离婚又更加深了女人的怒气……

女人感觉到自己在改变而男人却没有改变，于是她们的怒气与日俱增。有人认为是男性的自满造成了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

为什么男人没有改变?

离婚也会使女人的生活发生改变，因为离婚改变了女人的收入来源。但离婚并没有改变男人要注重事业才能赢得爱情的这种压力。几百万的离婚男人承担着五个方面的费用，却极少有女人承担这些费用：

- 子女抚养费
- 房屋贷款，虽然他已经不住了
- 房租
- 离婚后给女方的赡养费
- 约会的花销

男人还是承担着赚钱的压力，而且压力更大了。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只是旧有的压力增加了而已。有一项女权主义的研究发现离婚后男人受益而女人受伤，遗憾的是，这一研究没有看到男人要

承担5大费用，也忽略了女人在收入上的变化，所以它不只忽略了男人的负担，还让男人处于无人对他们心存感激的境地。[14]

政府是如何扮演替身丈夫角色的?

一对夫妻将要离婚时，女人最害怕的莫过于遭受经济上的损失，而男人最担心的莫过于情感的缺乏。第二阶段的离婚法律帮助Alice从经济依赖过渡到经济独立的状态，但没有离婚法律帮助Jack从情感依赖过渡到情感独立的状态。（所以Alice急于奔向法院离婚寻求经济支持，而Jack急于奔向另一段感情寻求情感支持。）

如果离婚后丈夫不再为前妻提供经济保障，那么政府就会扮演替身丈夫的角色。政府保障女人得到平等对待和优先雇用（反歧视行动）。政府实施了针对女人的“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设立了针对女人、婴儿和儿童的特殊项目（WIC）；让女人优先享有对子女的监护权，而且如果男方不支付子女的抚养费的话可以从男方的薪水中扣除；让女性在大学、军队、艺术领域以及小企业中都享受特殊待遇。这些做法断送了他将来从她那里得到服务的机会。

过去，Alice只有一种经济保障，而Jack也只有一种情感保障。现在，Alice在经济上有了多种选择（收入可以来自事业、前夫或者政府），而Jack在经济上还不如原来的：职场收入减去子女的抚养费、赡养费、支付给政府的更高赋税，政府拿这些税收用于扮演替身丈夫的角色。这一切让男人成为金钱的囚徒，无法发现内心真正的自己。

为什么第一阶段的社会事业机构是压迫性的?
第二阶段的社会事业机构怎样才能成为解放性的?

女人对男人的怒气一部分源于她们认为制度都是男人制定的，是用来

压迫女人的而且对男人有利。因为大部分的社会事业机构都是由男人领导的，所以如果它们没有满足女人的要求，就要怪到男人头上。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面临的挑战分为两部分：第一，要承认这些机构帮助女人比男人更早进入第二阶段；第二，要了解为什么这些机构在第一阶段机能良好并且过渡到第二阶段依然能正常运转。

功能协调的家庭如何变得功能失调

如果我们用第二阶段的婚姻标准来衡量第一阶段的婚姻，就会给后者打上婚姻失败的标签，同样的，我们也在用第二阶段的家庭标准来衡量第一阶段的家庭，然后给后者打上功能失调的标签。多达97%的原生家庭被认为已经功能失调。所以在第一阶段，“孩子不打不成器”这句话意味着如果你不打孩子，是在害孩子；但是在第二阶段，如果你打了孩子，才是在害孩子。为什么呢？

在第一阶段，打孩子是一种功能协调的现象——告诉孩子不听话就得挨打。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制定规矩的目的就是防止挨饿。但是在第二阶段，想要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就得多考虑他人的感受。棍棒教育让家长无法得知孩子的感受，所以这样的家庭就很容易功能失调。

在第一阶段，相互依赖是家庭的黏合剂，有了它，家庭的根基才能坚实。所以家人的相互依赖永远也不会显得过分。相互依赖在第一阶段是行得通的。但是当离婚逼得我们不得不独立生活时，相互依赖常常会变成过分依赖，然后引起功能失调。因此，在第一阶段功能协调的家庭到了第二阶段就功能失调了。

我不愿意将我们的原生家庭描述为功能失调的家庭，而更愿意称之为在第一阶段功能协调的家庭。这种说法承认了第一阶段的家庭为了满足我们的生存需要而做出的贡献，基于这个贡献，所以我们才能自由地确定在第二阶段什么是功能协调。这也能让人们享受追求自由的喜悦，而不是因

为婚姻失败而备受指责、心怀愧疚。

婚姻

女权主义者认为婚姻中的一些传统是男权的体现，比如婚礼上父亲将新娘交给新郎。但父亲这么做是在把保护女儿的责任交给新郎。（没有人将男人交给谁，因为没有人去保护男人。父母的工作是将儿子培养成一个保护者，而不是受保护者。）

我们的父母常常因为阻止儿子“做自己的事情”而受到批评。但是因为历史上出现了凡·高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更不用说一家十口），因而父母的工作就在于确保儿子不能成为艺术家，并教导女儿，如果被这种男人引诱就会大祸临头。父母们这样行使亲权，孩子们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教导。实际上，这不是亲权，这是亲权的延迟策略——在Tevye和Golde有能力寻求自我实现和深沉之爱后，Tevye才在女儿将嫁之时有能力询问第二阶段的问题。

因为幸福与否是次要的，酗酒、挫折和虐待随处可见。但是在第一阶段，离婚是行不通的：家里已经有8个孩子了，无力支撑两个家庭，也无法离家出走。所以我们宁愿忍受酗酒和虐待的问题也不愿意离婚，不愿意挨饿。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不给第一阶段功能协调的家庭打上功能失调的标签，如果我们能承认现在的孩子们应该去追求第二阶段的家庭价值观（因为他们父母所持的是第一阶段的家庭价值观），那么我们的后代就能很快学会相爱。如果对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不加以区分就妄自讨论家庭价值观的话，就会制造出强烈的反对声音而不是认同。

过渡期的宗教

在第一阶段，教会有很严格的律条和仪式要求人们为下一代做出牺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到了第二阶段，在面临生活选择时，质疑

是有必要的；对于生活中的不确定，律条和仪式也不再是什么严格的约束了。

第一阶段中，宗教不得不约束婚前性行为，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却没有婚姻的保障，就没有人保护女人和孩子。到了第二阶段，有了避孕措施，在性生活中可以更多地考虑满足感、相互对话和精神上的联结——这正是第二阶段婚姻关系的目标。所以第二阶段的宗教信仰不应该有过多的限制性，而应该协助双方进入对方的精神世界。

在第二阶段，教会能自如地教导人们性压抑是怎么变成精神压抑的。比如，教会可以告诉女人自我约束、人为地抑制性欲，会令男人隐藏自己真正的感受而说出女人想听的话。不能相互坦诚，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精神交流。为了从男人口中听到自己想听的话，女人开始利用性而不是享受性。她们常常把性与精神联结对比，并不去了解性关系是如何促成精神上的联结的。女人的性压抑能帮助女人有效地控制男人，却让男人不那么坦诚。很多女人开始选择能听她们话的男人而不是对她们说真话的男人。简单地说，第一阶段的宗教强调严格的规矩，让双方做好准备忍受角色伴侣这个事实；而第二阶段的宗教强调交流，让双方做好准备做彼此的灵魂伴侣。

第一阶段的教会会选择男人来做管理者，他们将男人看成一种象征——男人有责任解决问题和救赎大众。这一类教会吸引来的人通常都是第一阶段的女性信徒和第一阶段的男性领导者。第二阶段的教会男人女人都可以管理，其目的不是责怪过去由男人掌权，而是帮助两性转化，进入不同的未来。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性爱政治

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家都是在第一阶段的性爱伦理观中长大的，但是突然间大众就拿第二阶段的性爱伦理观来评判他们。约翰·肯尼迪总统

的外遇没有被曝光，但是泰德·肯尼迪和比尔·克林顿却被视为风流人物。在第一阶段，日本首相都包养艺妓，但是到了第二阶段，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与艺妓的丑闻一经曝光，他马上就被赶下台了。英国陆军大臣John Profumo原本是主要的首相候选人，但是他的婚外情受到了第二阶段的性爱伦理观的审判，最后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第一阶段是不允许离婚的，所以男人即使有了婚外情也不会威胁到女人的经济保障；到了第二阶段，有了婚外情就有可能导致离婚，所以男人的婚外情对女人的经济保障构成了威胁。让女人的经济保障受到威胁而且还成为行为模范，这样的政治领导人我们不想要。

那条看起来只对男人有利的双重性爱标准，对女性来说是不利的吗？不是的。这个双重标准包括两方面：（1）男人可以与人私通，女人不可以，而且（2）已婚妇女能够迫使丈夫抚养他的私生子。（相反，如果他拒绝照顾他的私生子他就会遭到排挤。）第二条双重标准我们从没有听人提起过。

但是，两条双重标准都保护着女人。怎么保护的呢？如果男人结婚后发现妻子与人私通，而且生下了孩子他不得不抚养，那么没几个男人想要结婚，因此也没有几个女人和孩子能得到保护。

尽管如此，第一阶段的社会遇到了一个问题：婚姻可以保障女人有一辈子的收入来源，但是不能保障男人有一辈子的性福。所以在第一阶段的社会中产生了一种婚姻协议，我称之为“婚姻三角”。

婚姻三角指的是丈夫、妻子和情人（或者根据文化的不同这个人有可能是艺妓、妓女、第二任妻子或者妾）。这个协议是这样的：“丈夫：你的首要责任是在经济上满足妻子和子女的需要。如果你不能再像当初你下定决心长相厮守时一样得到美满的性生活，不再年轻英俊，得不到妻子的

关注也失去了激情但你还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那么你也可以满足一下自己的一些需要，但是有两个条件。你必须坚持养家（即使你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你也不能离婚）；你必须在经济上供养你那位年轻貌美的女人（艺妓、情人、妓女），她们需要钱。”

在第一阶段，没有哪一个人群的亲密需要得到过满足——丈夫、妻子、情人或者孩子。当然，个别人的这种需求确实得到了满足，但第一阶段的婚姻中所要担心的并不是这个，而是稳定，而婚姻三角是一个“为了稳定做出的大妥协”。

在第二阶段的标准下，那些宣称自己品行端正却享受着婚外情的政客们显然是伪君子。但这并不符合在第一阶段文化中产生的道德准则的潜在精神：品行端正意味着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对大多数男人来讲，婚外情会破坏这种精神。然而，一个有能力兼顾婚内婚外的男人并没有受到排挤，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一个更好的保护者。当婚外情引发了离婚，而离婚导致上百万女人没有任何工作技能就被迫外出工作时，一切都改变了。有婚外情的政客很快就没了工作。

女人将这些新的标准称为更高尚的品德，女人似乎再次成了品德更高尚的人。尽管女人的品德并没有更高尚。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每一次婚外情中都既有男人又有女人。区别在哪里呢？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Gary Hart的外遇对象Donna Rice拍广告，出任电视剧里的角色，比尔·克林顿的情人Gennifer Flowers因为他们之间的故事而得到了约10万美金……男女双方都参与了婚外情，尽管男人的事业因此而摇摇欲坠，女人的事业因此而突飞猛进，男人却被视为恶人而女人被视为受害者。

第二阶段的政治

我们想到政治首领、政治贿赂和政治赞助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男人的权力、男人的腐败、男人的“好老弟”联盟、男人的沙文主义和男人

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男人统治权的显现。然而，在第一阶段，政治首领、政治贿赂和政治赞助都被大众接受，并不是因为它们对男人有利，而是因为它们对家庭有利——包括女人和孩子。只要政治领袖能创造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他的权力就不会易主。他的“政治机器”建立在下层社会的经济之上，让这些岗位养得起那些穷苦家庭。实际上让他们赢得这些家庭的尊重的，不是什么给予社会救助，而是提供工作岗位。

当一个男人成为领袖人物时，通常会让下层阶级——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或者黑人——进入主流经济群体。这个现象可以叫作“第一阶段的福利”或者“腐败”或者“岗位培训”，如何称呼，完全取决于个人所站的角度，但是这对整个家庭都有利，并非只有男人。其极端形式（如黑手党）不仅供养了家庭，而且往往“干掉”了更多的男性，而不是女性。

创造性别转换

简单地说，我们的基因遗传与我们的未来相冲突。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有史以来第一次生存能力和相爱能力能够和谐相融。爱对方、爱子女——这是第二阶段对爱的定义。对于女人来说，她面临的挑战是拥有足够的经济独立能力，这样就不需要为了得到经济保障而委屈自己的爱情。对于男人来说，他要面对的挑战是理解这一点：为什么在第一阶段为了保护家人所做的事现在却让自己与子女、妻子和生活失去了联结。比起第一阶段作为养育者的女人来说，第一阶段中的男人更疏于亲密。这就是为什么男人进入第二阶段时遇到的挑战比女人更为严峻。

要下结论说男人并没有权力，我们就必须得更确定过去的男性并不是一个禁锢女人的角色。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事实**：女人不能参与投票；女

性被视为财产和二等公民；女巫遭到迫害；《宪法》中没有写入女性；女人不能担任高层职位；女人不能外出工作等。我们必须认清“权力”“父权”“统治”和“性别主义”这些字眼究竟意味着男性的特权，还是意味着男性是可以被随意处置的。

注释：

1. Joseph Stein，《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由Sholom Aleichem的小说改编。音乐：Jerry Bock，歌词：Sheldon Harnick.。（New York：Crown，1964）

2. Herbert Hildebrandt和Edwin Miller和Dee Edington，《新晋升的管理者》（“The Newly Promoted Executive”）。1987年密歇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安阿伯分校专题论文。

3.《1963年同酬法案》是《美国法典》第二十九部的组成部分。同时，《1964年民权法案》中第七部也禁止工作中的性别歧视行为。

4. 见Jessie Bernard，《婚姻的未来》（*The Future of Marriage*）表20“45~54岁未婚白人男性的部分社会经济变量”。（New York：World Publishing，1972）Bernard引自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的《1960：婚姻的状态》表4、5、6。

5.女性的平均寿命在1920年为54.6岁，1990年为78.8岁，增长了44.3%。男性的平均寿命1920年为53.6岁，1990年为72.0岁，增长了34.3%。1920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生命统计月报》第38期第5部分，1980年9月增补期第4页。1990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生命统计月报》第39期第13部分，1991年9月期第17页。

6. 这一观点在女权主义者间广泛传播，比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Bonnie S. Anderson 和Judith P. Zinsser，《他们自己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ir Own*）第413页。（New York：Pernnial Library，1989）比如女权主义政治家、女议员Patricia Schroeder和女权主义领袖Gloria Steinem也持这样的观点。

7. 见Paul Brodeur，《美国式凶手》（*Zapping of America*）第177页。（New York：W.W.Norton）

8. 64%的职业女性会为了照顾家庭离职6个月甚至更久，这么做的男性有1.5%。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984年《当前人口报告》第136部分第23页“一生的工作经验及其对收入的影响”第6页表A“种族、西班牙裔及特定原因造成的工作中断：男性”与第7页表B“种族、西班牙裔及特定原因造成的工作中断：女性”。这

些是截止1992年的最新离职数据。见1992年7月22日对美国人口调查局Jack McNeil的采访。

9. 1992年5月1日在圣地亚哥的美国建筑承包商协会的会议中，我进行了投票调查。

10. Martha Hill，《时间、购物和健身的时间分配模式》（*Patterns of Time Use in Time, Goods and Well-Being*）表7.3，编辑 F. Thomas Juster 和 Frank P. Stafford。（Ann Arbo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所将兼职工作也计入工作时间，之后发现工作时间差距为9个小时。（联邦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中未计入兼职工作的时间，所以主职工作时间的差距是4个多小时。）未婚男性在工作场所的时间仍比未婚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时间多9个小时，但是这个数据是根据全职、兼职和自由职业者分组得出的。1991年5月13日对Martha Hill采访时得到了这些数据。

11. 我已完成了对这些变量的研究，结论将出现在我的下一本书中，是关于女人与男人对平等的渴望。

12. 见F. Thomas Juster 和 Frank P. Stafford《时间的分配：实证结果、行为模式和测量问题》（"The Allocation of Time: Empirical Findings, Behavioral Models, and Problems Measurement"），《经济学文献杂志》第29期第477页，1991年6月。

13. 同上。

14. 这项研究见Lenore J. Weitzman《离婚革命》（*The Divorce Revolution*）。（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Weitzman只调查了婚后第一年——女人赚得少、男人赚得多的时期——而不是离婚后第二年及以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女人的收入与离婚时的收入持平或更高。见Greg J. Duncan 和 Saul D. Hoffman《横向平等、不确定性和小康经济》（*Horizontal Equity,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Well-Being*）一书中"不稳定婚姻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rital Instability），图14.3和表14.A.8，编辑：Martin David & Timothy Smeeding。（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又见Susan Faludi，《强烈抵制：针对美国妇女的战争未宣而战》（*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第19至26页。（New York: Crown, 1991）

15. 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很普遍，爱尔兰电影《再见有情天》（*Playboys*, 1992年）中对此有很生动的演绎。

第三章

“权力”“父权”“统治”和“性别主义”意味着男性支配一切吗？

父权制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赋予男性特权的普遍性的政治结构。”

——《女权主义百科大全》[1]

1. 不论取了什么名字，奴隶依然是奴隶

如果力量就是对自己生命的控制力，那么大部分的神话、传奇以及圣经故事都是如何让男人和女人失去力量的故事。

奴隶式英雄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母亲希望能目睹赫拉天后美丽的雕像，却苦于没有马车或者牛车能载她行此远路。但是她有两个孝顺的儿子。两个儿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帮母亲实现这个愿望。于是他们把自己当成马，套上马车，拉着母亲在炎炎烈日下翻山越岭来到了遥远的阿尔戈斯，这里正是赫拉雕像的所在地。[2]

他们终于到达阿尔戈斯时，两个儿子非常高兴。为了颂扬他们的事迹，当地也为他们树立了雕像（保存至今）。[3]他们的母亲祈祷赫拉能够依靠她的神力赐予儿子最美好的礼物。赫拉答应了。于是她的两个儿子死了。

这个故事的传统解释是什么呢？对一个男人而言，最美好的事情就是

在自己的巅峰时期离别尘世。假设在这个神话中，是两个女儿当牛做马拉着父亲去了某处，我们还会不会认为她们的死亡能够证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死于巅峰时期是最美好的事情？

那两尊雕塑和到达后的喜悦可以看成给两个儿子的贿赂，目的是增加他们的生命价值。赫拉是奥林匹斯山众神的天后，是已婚女性的保护神。赫拉的雕像是一种象征。两个儿子所做的牺牲象征着男性被要求去满足母亲的需求和婚姻中的需求，而且如果他们在此期间牺牲了性命，也乐于将这一牺牲称为荣耀。所以赫拉克勒斯名字的意义就是“为了赫拉的荣光”。[5]

难道英雄都和仆人们一样吗？没错。英语中的英雄一词来自希腊语的“ser-ow”，英语中的“仆人”“奴隶”和“保护者”都是从这个词衍生而来的。[6]英雄基本上是一个视服务他人和保护他人为己任的奴隶。他们会保护周围的人群，尤其是女人和孩子。作为回报，英雄们会得到被保护人的尊敬和爱戴。正如我们感谢妈妈为我们做饭，我们给了妈妈一种“自我的贿赂”（ego bribe），让她们心甘情愿待在厨房，成为角色的奴隶。所以那两尊雕像和关于荣耀的故事都是男人“自我的贿赂”，这一贿赂让他们为了成为英雄而甘当奴隶。

但这些并不是对女性的保护角色的否认。女性以自己的方式保护他人，像赫拉一样；而男性以男性的方式保护他人，像英雄一样。

男性真的还不如财产？

没有人“认为”男性是财产或者动物，只是他们被当成了财产和动物使用。在15世纪，印加人没有马车帮助他们翻山越岭地送信。于是，男人吃下古柯叶（可卡因），这样就能跑得更快、更远……直到生命耗尽。[7]好人不长命。跟女人被视为财产的情况不同的是，男人没有得到保护——他们只是被利用、被随意支配。

在黑死病肆虐欧洲的时期（14世纪），搬运尸体的男人很容易染上黑死病。穷苦的男性农民为了得到报酬而主动搬运尸体。很多人因此而丢了性命，但是得到的钱可以养家糊口。[8]

表面上看来，似乎那些尸体搬运工“有钱了”，送信的印加人身体变得健壮“有力”。但是这两种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的生命正在被消耗，不过他们的家人可以生存下去。如果规则都是男人制定的，那么男人制定的规则是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这该如何解释呢？

为什么男性如此在意输赢？

年幼的时候，我曾经到过一个博物馆，看到了一颗被砍下的头颅，那个场景现在我都还记得。馆长告诉我说这颗头颅是在玛雅人的“死亡球赛”（可能是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足球赛）中获胜球队队长的头。其他时候，输了的那一支球队的队长——或整个球队——都要被杀掉。[9]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认为哪一方能更好地保护他们：如果他们认为身体健壮的获胜方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们，那么输了的人就要被杀掉用于祭祀；如果他们认为上帝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那么用获胜的人来祭祀就更能讨得上帝的欢心。

如果胜利本身很重要的话，那么获胜者绝对不应该被献祭。获胜者也要被献祭是教导社会，对于社会的安定来说，男人的生命和输赢都是次要的。从历史上来看，男人如此在意输赢原因在于他们在意是否能保护他人——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

内战：男人作为二等公民

在美国内战期间，有两种人能在征兵时逃过一劫：女性和上层阶级的男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女性的地位都相当于上层阶级的男性。不过

连上层阶级的男性也要自掏腰包才能保命。有了他们的慷慨解囊，穷困的男人们可以每人领到300美元[10]（相当于现在的5400美元[11]）。领到钱的穷人为了让家人生存下去，甘冒生命危险上战场。穷人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自我概念：如果他还是这么一穷二白，他就一文不值。即使当了炮灰，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上层阶级的男性能花钱逃过内战征兵？因为他有能力通过其他方式拯救社会：在工厂制造军火、生产食品，或者利用手上的财产和奴隶种植庄稼（如果他们去参战的话，可能农作物就没有收成；万一阵亡的话，就再也没有收成了）。上层阶级的男性并没有特权逃脱拯救者的角色，只是他们有特权以其他方式扮演这个角色。他们依然生来就负有拯救的责任，并没有“不拯救”这个选项。他们生来就没有权利选择让女人来保护他们。

在内战期间，政府通过了一项《兵役法》，[12]在本质上同意了男性奴隶贸易。超过60万的男人（623026名）死于内战，[13]相当于11场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试想如果越南战争接连发生了11场，而且只招女兵，就意味着有62万女兵——可能其中有你的姐妹、母亲还有女儿——裹在运尸袋里被送回家。

尽管如此，战争这种事情真的是“男人的事”吗？不尽然。女人“呵斥和抱怨”那些未参战的男人。[14]在美国南部，鲜有男人做广告请人替代自己服兵役，按照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关于内战的电视剧里的说法，是因为“女人不会允许男人这么做”。[15]很少有女人愿意嫁给“害怕”上战场的男人。

但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如果男人如此热衷于战争的话，为什么19世纪60年代男人们还要为此而暴动，抗议征兵？又是为什么很多北方男人冒着遭到孤立的风险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找人代其应征，以求逃过一劫呢？即

使到了今天，男人顺利逃过战争时，他们得到的仍然是嘘声和倒彩声。不信去问问Dan Quayle和比尔·克林顿。

当然，有些男孩子愿意上战场。如果家境贫困的女孩为了家人每年能多得到5000美元的收入而自愿遭到肢解，我们会说这些女孩子是圣人。如果换成男孩子，我们会说他们是“男子汉”。

和其他大部分战争一样，在内战中，男女双方都相信自己那一方为之奋斗的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解放黑人奴隶。从本质上来说，是白人男性奴隶为解放黑人奴隶而战。我们了解黑人奴隶制已经很久了。但我们尚未认识到男性奴隶制。

在这些方面，没有哪个男性能和女性具有平等的地位：不论哪个阶级，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期待一个女人能保护他不受伤害，保护他不挨饿受冻。而在第一阶段，挨饿和受伤害是最主要的威胁。从这些方面来看，男人是二等公民。男孩子在尚未达到承诺年龄——有投票权——之前就已经死亡。

如果女孩子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内战换来几块勋章，我们马上就会认为女人有自尊心缺乏的问题。但是男孩子们这么做了，而且20世纪90年代的一本女权主义畅销书，Gloria Steinem的《内部革命》（*Revolution from Within*）认为缺乏自尊是女人的问题。[16]其实缺乏自尊也是男人的问题，一个由男人的二等公民身份衍生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阶段的特权；如果我们只针对一个性别，那就应该叫第二阶段的性别歧视。

那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将这个奴隶式阶级称为战士和精英阶级[17]时，他们忘了一点：这些战士阵亡了，做不了精英了。

英雄主义的危险性

英雄主义有其危险性：教男孩子杀戮，然后期待他去杀人，而目的却是保护他人；示意他屠杀男性，但是不能杀害女人和孩子。战士的悲剧在

于他打倒的敌人越多，他就越来越像他的敌人；他屠杀的野兽越多，他也越来越像一只野兽。希腊神话中的人面马身的怪物象征着因此而产生的男性的精神分裂症。

切诺基族人的一个寓言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危险性。[18]

池塘之王

从前，有一个安静的小池塘，池塘里有很多动物：鱼、蛇还有青蛙。这些动物每天都快快乐乐地生活着。池塘里有一块木头。所有动物都将这块木头当成自己的避难所和餐桌，基本上这块木头就是池塘之王。有一天，一只优雅的苍鹭迈着长腿走了过来，并把它曼妙的身体靠在了木头边上。所有动物都将它的到来视为一种信号：要有大事发生了。于是它们开了个会。它们认为那块木头每天都无所事事地睡在池塘。所以，它们很骄傲地选举苍鹭来做池塘之王。过了一两个礼拜，苍鹭把池塘里的鱼、蛇和青蛙都吃了个精光。

当女性要求男性运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她们时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这种力量可能下次会被用来伤害她们。于是，让女性为之欢呼的运动员们参与了1/3的校园性侵行为。[19]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讲，人们认可国王的神圣权利时，国王可能会给他们更好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国王可能会更大限度地滥用职权。当个人赋予毒品、宗教、国王或男性以权力时，他们就面临着力量被剥夺的风险。一块什么都不做的木头可以令池塘里所有动物各自承担责任。企图选出一位英雄是交出自己的责任，这样就可以将过错归于英雄，归于父权制，归于政治家。但力量最终在这些动物手上，它们否决了那块木头——或自我的责任——而是选举了一个英雄……它们选择了那只苍鹭。就像天才走钢丝时总伴随着毁灭性，英勇地走钢丝的行为也伴随着对他人的毁灭和自我毁灭。

领导人不是常常为了获得权力而控制自己的行事方式吗？是的。如

果领导人说出了民众想听到的话，民众就会拥护他，民众以这种方式控制领导人。如果有人告诉雅利安人“因为犹太人压迫你们，所以你们不能做的，犹太人也不能做”，那么雅利安人就愿意选他当元首。后来，一位名叫阿道夫的年轻人告诉雅利安人他害怕承担个人责任。于是他很快当上了元首。只要报酬够高，妓女就会出现。

2. 奴隶制的社会化

作为男性资格的疤痕

女人在身上弄点伤以及女人的礼仪都关乎美貌（打耳洞、穿鼻环、裹足、穿塑身衣），而男人的伤痕则关乎保护女性。在一些文化中，拥有强壮的身体仍然最能保护女性。比如乌干达东北部的多多斯人，一个男人每杀一个男人，他都会得到奖励：一道仪式性的疤。人们认为身上的伤痕越多，他的能力就越强。[20]在美国内战以前的南方，人们认为男人在决斗中获胜的次数越多，他的能力就越强。单身女性谈起单身男性的胜利和单身男性谈论单身女性的美貌，情形是一样的。[21]

在17和18世纪的很多欧洲国家，佩剑的男士才有资格被称为“绅士”。一位绅士要用剑保护女性，要用自己的剑证明自己配得上女人，或者用剑保卫自己的荣誉。被称为“绅士”是当时的最高荣誉。

为什么佩剑的男人会被称为“绅士”呢？因为所佩之剑只能用来对付男人……而对待女人时，他们都变得温文尔雅。

思考一下其中的含义：当一个男人身佩杀人工具时，这个男人被称为“绅士”。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称一个女人为女士时要求她佩剑的话会怎样。再想想看，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女士杀了侮辱男人的女人，那么还会有多少女人活下来呢？

至今，一些地区还保留着这样的传统：男人杀死侮辱女性的男人，

比如西西里岛。这一传统在我们的言谈中仍留有遗迹，男人对私下议论女人仍然心存顾虑，而实际上女人在私下称男人为混蛋已经近乎惯例了。

男人身上的疤痕、被打掉的牙齿还有割礼都是一种“象征性创伤”，象征着男孩子们为了担任战士和保护者角色所需要承受的痛苦。[22]在某些地方，割礼十分普遍，往往是婚姻的先决条件。（犹太人的割礼仪式在男婴出生后的第8天进行，割礼最后时刻的祈祷文是这么说的：“他已加入圣约，因此他可结婚生子……”[23]）

如今，若男人在激烈运动中受致命伤并留下疤痕的话，倘若他还年轻，这道疤痕将使他收获爱情；如果他已青春不再，仍然可以收获爱情，只要他的疤痕能换来实实在在的金钱。从高中辍学的Mick Tyson能得到Robin Givens这样从劳伦斯学院毕业的美女的“青睐”，只要他的伤痕能换来金钱。

疤痕式订婚戒指

订婚戒指相当于现代版的仪式疤痕：疤痕象征着那个男人为了保护女人的人身安全甘愿承担身体受伤的风险；订婚戒指象征着这个男人为了给女人提供经济保障甘愿承担经济风险。二者都象征着一个男人愿意保护一个女人。钻石越大，疤痕也越大，男人能给的保护也越多。

军官和绅士：现代版决斗

今天，一个男人用杀戮和保护他人的方式获取金钱时，我们依然称他为“军官和绅士”。当时我在电影院看《军官和绅士》（*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那位军官是位经过严格训练的杀手，但是当Richard Gere 抱起 Deborah Winger时，他成了一名绅士，这时影院里爆发出女人们热烈的掌声。当一个男人将杀人赚取的钱财用来保护女人时，我们仍然将这个训练有素的杀人者称为绅士。

为上帝而亡

信徒如精兵

他曾使死人得圣洁，

我愿舍身为自由。

——共和国战歌

一个为了救赎而死的男人是受人爱戴的。对于男性基督教徒来说，耶稣就是爱。因为耶稣救赎大众。但是耶稣牺牲了自己才能救赎他人。对很多男孩来讲，军衔的诱惑、对上帝的信仰以及音乐的力量都在召唤他们，召唤他们如歌词描述的那样去生活：“前进，信徒精兵。”

每一种宗教都给男人施加压力让他成为救赎者或保护者。印度教的男人都见过毗湿奴神、湿婆和克利须那神的男性形象；佛家子弟都见过释迦牟尼的形象；基督教徒都看到过基督的形象；伊斯兰教徒也都看过真主阿拉的形象……神父、祭司和牧师几乎都是男性……也几乎都是保护者。

宗教中透露给男孩子们的信息是：除了救赎，真的别无选择。在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耶稣苦苦哀求上帝，希望上帝将代表他救赎者角色的苦杯拿走。主耶稣受尽折磨，鲜血淋漓。上帝不会允许他失去苦杯，上帝什么都没有说。终于，基督在将死之时感到遭到了背叛。（“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就基督在扮演救赎者角色时是否有选择，神学家们进行过讨论：他真的可以拒绝吗？理论上来说，可以。但是上帝的许可象征着许可“万事皆有意义”，“万事皆有意义”就是说：“你有你的使命：救赎。”当然，你可以拒绝，但是……

如今，男人们回到了他们的客西马尼园，问着同样的问题，寻求勇气来找到答案，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角斗士和处女

在古罗马时期，宗教节日的精彩之处在于格斗比赛。从本质上来讲，这些比赛都是男人的大屠杀，（希望得到自由身的）奴隶和（希望成为英雄的）武士与贵族都参与进来。[24]这些大屠杀都为女神们所操控：大母神、谷神、花神。[25]比赛开始之前会有庄严的宗教游行，就像我们在足球赛开赛前会奏国歌一样。男人是唯一会在比赛中丧命的人群，而维斯太贞女（Vestal Virgins），[1]在比赛期间稳坐上座。[26]处女对于格斗士而言，犹如今天足球队的啦啦队队员：对男性暴力表示支持的女性。二者都在达到我们所称的“承诺年龄”之前就已经社会化，可以扮演自己的角色了。

为什么女神要让男人遭受暴力？因为对男人施以暴力更深层的目的在于避免女人遭受暴力。当强盗来袭，不论男女，都希望有人保护他们，希望入侵者看到他们是如此强大因而选择对其他村庄进行掠夺。

我们是否还在培养男性的“被随意支配性”

如今，大家对针对女人的暴力深恶痛绝。不过我们认为男人间的暴力是娱乐节目。想想足球、拳击、摔跤，抑或冰球、牛仔竞技还有赛车，这些运动都为男人间的暴力裹上了一层糖衣。最开始时，为了给暴力裹上这层糖衣，“我们的球队”或者“我们的社会”会为最佳保护者提供奖励，以贿赂他们去牺牲自己。即使到了今天，运动中针对男人的暴力仍旧由公共教育系统提供资金支持。国家对体育场馆提供补贴，以便运动会可以在这里举行。针对男人的暴力不仅被称为娱乐，还被称作教育。我们所有人都在大力支持它，时时刻刻。

---

① 古罗马献身给维斯太女灶神并在维斯太神庙中守望圣火的处女。——编者注

从校队的名称就可看见对暴力的颂扬，有的取自暴力社会的名称（维京人队、阿芝台克人队和特洛伊人队），也有的取自猛兽的名称（老虎队、熊队、黑豹队）。连我们的汽车也叫作捷豹、切诺基、美洲豹、怒吼女神（Fury）和隐形（Stealth）。想象一下你开着福特的小仙子汽车，或者道奇的小雏菊汽车，又或者是普利茅斯的紫罗兰汽车去接女儿……或者想象一下一个成年男人支持的球队名字不叫巨人队也不叫亚特兰大勇士队，而是叫作小巧队或者亚特兰大多愁善感队，会是怎样的情形。

一支专业的足球队命名为“维京人队”并非巧合。过去，维京人常常进行比赛，看谁能将男性牺牲者从头到腹股沟完美地肢解。我们为维京人叫好，我们为这个过程感到荣耀，这一过程教会了男人为了获得欣赏彼此杀戮。我们让奴隶甘为奴隶。

想想看，如果在这一部分内容开始时我就说：“如今，大家为女人遭到的暴力而欢欣鼓舞。”大家会认为我希望女人丧命。所以当我们为男人间的暴力鼓掌时是在希望男人丧命。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大家深知，我们越能让男人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我们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护。“我们队赢了”在潜意识里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受到了保护”。我们为男人间的暴力鼓掌，却憎恶针对女人的暴力，因为对男人施暴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保护女人。

3. 为什么男人如此暴力而女人却充满爱心？

男人是否天生暴力？

男人在有些社会环境当中会变得不再暴力，这样的社会中：（1）有充足的食物；（2）有充足的水；（3）他们了解自己不会受到攻击。例如，塔希提男人、古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男人、马来西亚的瑟买人，在以上三个

条件都满足的历史时期，这三种人都不暴力。[27]

当男人不需要杀人时，女人不太选择会杀人的男人，而且男人的杀人行为也会较少。（选择会杀戮的男人并不是女人的错，而杀人也不是男人的错——双方都是为了生存。）

美丽的公主极少嫁给拒绝服兵役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没有哪个社会会将他们最高的奖赏赐予一个不会杀人的男人。倘若男人天性暴力，那么就没有必要构建一个需要鼓励男人采取暴力的社会结构了。

能杀人者往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可能会被杀。在大众眼中，男人的资格是由脆弱伪装成的坚强构成的。男人既暴力又脆弱，但是他们既不是天生暴力也不是生来就脆弱。杀人不再成为男人进入婚姻的先决条件，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母系制是否会较为太平？

现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母系社会更好，因为这种制度下的男人和女人有更好的协作关系，而且这种社会更为太平。[28]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比如塔希提）产生那种协作模式并非因为母系制或父系制，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威胁而且能够自给自足。

一些历史学家给这些社会打上母系制的标签，是因为其首要的神灵是女神，而不是男性神灵。但是当保护他人成为首要的需要时，男性神灵就会成为首要的神灵。能够提供保护的神灵是男性，因为通过杀人来保护他人是男性担任的角色。令人心痛的一点是，给这些社会打上母系制的标签，将男性的牺牲看成男性在实施统治，将维持太平和保持合作看成女性在尽责任，而不是把这些看成食物充沛、用水充足和防御良好的结果。

女性是否天性不及男性好战？

从历史上来看，有权势的女人使男人命丧黄泉时，利用的基本理论和男人的相似，连频率和数量都相似。例如，“血腥玛丽”酒的名字取自玛丽·都铎（女王玛丽一世），她下令将约300名宗教异端人士烧死在火刑柱上；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王位以后，曾惨无人道地对爱尔兰——那时被称之为“圣徒与学者之岛”——进行烧杀抢掠；有一位罗马国王死后，他的遗孀派出8万军队作战，结果全部阵亡。[29]如果说哥伦布是一位开拓者，我们也必须记住：是伊莎贝拉女王给他提供了赞助。

近几年来，所谓的铁娘子——英迪拉·甘地、Golda Meir[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将男人送上战场致其丧命的概率和普通的男性领导人并无差别。比如，撒切尔夫人在马岛战争中一样在浪费男人的性命。

纵观历史，领导人不论是男是女，有一件事是从未改变的，那就是战争期间战死沙场的几乎全部是男性。即使领导人是女性，被牺牲的仍然是男人。男女之间的平等在于上层，而不在下层。

为什么男人创造了君权？

君权常常被看成男人的权力欲和征服欲的典型象征。讽刺的是，我们都生活在男人创造的帝国之中，可我们却责怪男人创造了君权。但是为什么男人要创造君权呢？

帝国对于国家的作用好比个人的保单：一份安全保障。比如，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时，帝国就成了一个缓冲带——有效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与此同时，如果他们的国家发生了饥荒，从皇帝手中获得食

① Golda Meir：以色列开国元老，公认的世界第一铁娘子。——编者注

物要比从敌人那里夺取食物来得容易。

为什么人们要去侵略那些对他们不构成威胁的国家？想想为什么欧洲国家会侵略美国的印第安土著，他们绝对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如果一个国家里某一个人群受到压迫，他们就会频频逃离国家去寻找新的领土、屠杀反抗不那么激烈的人们。杀人的是男人，被杀的也是男人，但是从中获益的不单是男人，也包括女人。

美国建国之前所经历的战争是另一个男人不如财产的重要例子。男人为财产而亡，而女人赖以生存的财产建立在她们丈夫的坟墓之上。

换句话说，大国之所以成了大国是因为男人们的死亡。因为男人的死，帝国可以被视为男人处于从属地位造就的；因为他人的活，帝国也可以被视为男人为生存而做出的贡献。

改变男性暴力需要多长时间?

要暴力观念根深蒂固的男性改变观念需要多长时间？在人们眼中，维京人（将受害人从头到腹股沟劈开的人）和其他人一样残酷无情。但是在维京人征服英国后，英国女性发现举斧杀人的男人如此迷人；很快，礼堂里响起了他们婚礼的钟声。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他们不再烧杀抢掠，而是结婚生子；不再摧毁外族人的田地，而是在自己的田里耕种。不到两代人的时间，维京人放下了上战场的斧头，扛起了田埂上的犁头。

就近来说，日本人花了不到两代人，甚至更少的时间把手中的剑变成了口袋里的股票。男人仍然是执行者，但暴力已不再是执行的手段。为什么呢？两种文化都对生存的必要条件有了新的认识，而男人则应时代而变。男人身上没有变的不是暴力倾向，而是保护他人的意愿。在可以通过杀敌达到保护的目的时，他们就去杀敌；到华尔街“赚大钱”可以达到保护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去华尔街。激励男人的潜在因素既不是斧也不是

犁，而是一种适应，目的是得到爱、得到认可。

女性是文明上的平衡？

人们常说，对于天性好战的男人而言，女人是一种文明上的平衡。男人为了女人而去应对杀人的问题，所以可以说男人使得女人文明。当生存成为首要问题时，男人为了保护女性的天性而举起屠刀，男人就是这样被“养成”的。[30]这是男人对文明的平衡做出的贡献。后来，钱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赚钱养家就成了男人的天职。不论是在战争中杀人还是到华尔街“赚大钱”，都是男人保护女人天性的方式。

女人说，她想要善解人意的男人，但是爱上了足球队员、外科医生或者摇滚明星，男人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他的重心最不平衡时——他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时，成为一个英雄时，他会得到最多的爱。如果她们爱上了敏感的护士、无私的艺术家或者善解人意的出租车司机，那么她们真的为了男人的文明化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此时她们爱的人正是她们口中说会爱的人。

在那些“赚大钱”是男人最大闪光点的社会中，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男人身上：男人为了赚取爱而远离爱。

4. 为了赚取爱而远离爱：男人的悲剧

自尊心与男子气概

在斯巴达，男孩子们7岁时就要移居军营。[31]他们被迫参与一些“游戏”，比如“从祭坛偷奶酪”。为了拿到奶酪，他们必须参加淘汰赛，还要遭受严酷的鞭打。在鞭打时，有些人因为脑震荡和开放性伤口大量出血，很快就死了。[32]

偷奶酪是个很好的比喻：长期的瘟疫和饥荒迫使军队守护着民众少得

可怜的食物。偷盗需要拿出牺牲生命的勇气。

为什么男孩子们要在7岁时离开父母呢？一个男孩对亲密关系、生命和爱看得越淡，他就越愿意被人随意支配。我们给予他尊重，以此来贿赂他这么做。实际上，这种尊重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们满足了这些条件，我们就称之为“爱”。其中自相矛盾的是：这一过程本意是让他们得到爱，却让他们远离了爱。

训练男人的“被随意支配性”自出生之时起就开始了，围绕着生殖器展开。关于男性割礼的研究发现，一个社会越是需要猎人和战士，这个社会的男婴接受的割礼就越残酷。[33]

而女人嫁给这些男人之后才会发现问题：敢死训练中没有“婚姻中的亲密关系”这一课。

那么那些父亲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忒修斯的传说

在雅典国王埃勾斯即将成为人父时，他说，在忒修斯成为最强壮的勇士之前我不想见他。[34]为什么呢？国王埃勾斯担心娇生惯养的王子无法保护自己的子民。所以埃勾斯剥夺了自己看望忒修斯的权利，直到忒修斯搬起了别人无法移动的巨石，然后又冒着生命危险手刃了那头威胁要摧毁雅典人民的人身牛头怪物。

忒修斯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屠杀怪物，其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它展示了权力的目的所在——国王得屈从于他所服务的子民们的生活。一个好父亲应该让儿子做好被随意支配的准备。

在第一阶段，好父亲意味着准备好让儿子感觉不到爱，直到他有能力保护和拯救他人。为了展示这一点，他不会表现出对儿子的爱，直到有一天儿子可以出师代替他的救世主角色。

按照我的说法，那么是不是国王埃勾斯对儿子漠不关心就是合理的？不见得，忒修斯杀死了怪物之后，他忘记举起表示自己还活着的白旗。埃勾斯误以为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他悲痛欲绝并因此自杀了。[3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

让我们听听Harry Chapin的歌《摇篮里的猫》（*Cat's in the Cradle*），感受一下现代版的男性的悲剧。儿子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爸爸回答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等爸爸不再忙于养家糊口之后，他如此渴望与儿子朝夕相处，他希望儿子能陪陪他。不幸的是，只有儿子自己找到了工作之后爸爸的压力才能减小。所以儿子回答说：“我的新工作并不容易做，而且孩子们还得了流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爸爸的责任使爸爸远离了爱，而妈妈的责任使妈妈得到了爱。得不到真挚的爱，爸爸们也就得不到真正的权力。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儿子曾如此渴望父爱，他发誓“有一天我会像爸爸一样……”

死亡诗社

如果不能理解在第一阶段父亲的责任是培养儿子接自己的班（或者说“杀死自己”），父子关系就会被严重伤害。如果我们回头看看电影《死亡诗社》（*Death Poets Society*），会明白为什么里面的儿子如此憎恶他处于第一阶段的父亲，却如此热爱他处于第二阶段的老师（Robin Willians饰），因为他有三件事情不明白：第一，他父亲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才换来他探索第二阶段价值观的自由；第二，对于他日后追求第二阶段的生活，他父亲对他潜移默化的训练，给予了他何种优势和保障；第三，父亲对他的训练不仅是爱他的方式，也是他父亲在用自己所了解的最好的方式去教他如何寻找爱情。

当然，那位父亲并不明白，在儿子追求他为其创造的那种自由时，他自己在泼冷水。但是儿子总是不能对父亲平心静气——也包括对他自

己——直到他明白父亲最大的愿望是教会他如何给予爱和接受爱。

所以说，男性的悲剧就在于：通过养家糊口示爱，使得我们不能通过亲密关系示爱。所以，我们对儿子的爱却使我们不能爱他。

5. 男性对女性美貌的屈从

女人的生活才是生活，男人是生活的仆人。

——跳部落舞时为何女人在中间而男人围着她们？

Joseph Campbell这么解释。[36]

美貌的力量：圣经故事中的拉结与雅各

雅各和他的舅舅拉班一起生活。拉班有两个女儿：相貌平平的利亚和貌美如花的拉结。你猜，雅各爱上了谁？但是雅各准备迎娶表妹拉结时，他舅舅说想娶她就得为他工作7年。

雅各的7年之约完成之后，终于到了举行婚礼的时刻。但是当新娘摘下面纱时，雅各发现舅舅欺骗了他：新娘被换成了姿色平庸的表妹利亚。舅舅告诉他，要想娶美丽的拉结，雅各还得再工作7年。他还是必须娶这位相貌普通的利亚吗？没错。而且她仍是他的第一任、最风光的妻子。所以，雅各为他的舅舅服务了14年时间，只为养活拉结和利亚。

然而拉结未能生得一男半女，所以她让雅各去找她的侍女，她会对侍女所生的子女视如己出。[37]后来利亚又让雅各和自己的侍女生了两个儿子。到了这一阶段，雅各要养活四个女人、十二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38]

为什么重婚、与侍女发生关系和近亲通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每一次，上帝的祝福都带来了受到保护的子孙后代。道德不是问题，永生才是最重要的。近亲通婚的结果就是，例如，舅舅拉班家族的血脉非但没有断，而且生下的十二个儿子后来发展了十二个犹太人部落。[39]

上帝究竟是怎样让雅各做到养活四个女人和十三个孩子的呢？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们女性美貌的重要性。拉结的美貌像一块磁铁一样引导着雅各与其他三个可能没有机会延续自己血脉的女人——一个貌不出众的女人和两个地位低下的女人——生儿育女。两位侍女与地位较高的可靠男性发生关系后，所生的子女可能会得到保护。

上帝并没有保佑拉结和雅各马上生儿育女，因为这样的话，雅各就会失去与两个侍女生孩子的动力，而且拉结的美貌可能会使一个有能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大家庭的男人不再和其他女人生育子女。

美貌是上帝赐予拉结——或者说赐予这个物种——的礼物，也是拉结用来服务于上帝的，或者说服务于这个物种的东西。当一个人服务于上帝时，他或她也是在服务人类。上帝祝福他们时，那是上帝（或者这个社会）在用自己的方式指示人类如何繁衍：生儿育女。这就是《律条》中613条戒律（戒条）中将“生育繁衍”放在第一条的原因。[40]我为本章做功课时，开始明白为什么生物学和《圣经》都遵循着第一条戒律：“生育繁衍”。[41]

现代版拉结与雅各：美女与野兽

《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就像《圣经》中拉结与雅各的故事。不论是拉结还是美女，她们的美貌都吸引了男人——有能力让全家温饱不愁的男人。在世俗眼光中，这个男人是一个野兽，但是对那个女人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白马王子。

在雅各迎娶拉结或者野兽成为她的白马王子之前，他们都心甘情愿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奉献给美女的家庭，而当时并没有人能保证他们一定能够抱得美人归，也不敢保证双方能够和平相处，保证他们完成这些事项时她们依然美丽动人。

那么到了今天是否还有这种现象呢？还有。男人帮女人付餐费和酒费、买电影票、买花，还有给女人即使不能结婚也概不退还的订婚戒指。不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如今，女人都在学习如何获取保障，而男人都学着如何承担风险。

这并不是女人的错。在第一阶段，她需要保障：有了有效的保障她的孩子们才能生存下去。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为了生存，她需要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在第一阶段，野兽给美女提供的保障使他变成了白马王子；到了第二阶段，白马王子是不用依靠提供保障来诱惑女人的男人。他只要足够稳当就能成为内在的王子，而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寻找那个内在的王子，因为他不再是一个接受贿赂的王子。

为什么一个女人的年轻貌美这么重要?

美貌是健康和有生育能力的象征，所以，过去的人们认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应该臀部宽大（易生养）、身材匀称（表示无残疾）、头发浓密而且牙齿整齐（表示身体健康）。而且她得年轻，刚到生育年龄。

社会需要男人对女性的美貌产生生理依赖，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需要让女人对男人的收入产生依赖：依赖产生了婚姻的动机。一个沉迷于女人的青春、美貌和性的男人会在短时间内“无法自制”，他会做出想要养活她下半辈子这样的冲动决定。我们可以把女性的美貌看成大自然的营销手段：为了让女性的血脉得以延续的营销手段。[42]这就是女性的美貌会成为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毒药的原因。

美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有一种美是不变的。回头看看过去，女性的美貌和性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们比男性的美貌和性更受重视，尤其是在第一阶段的文化中。我们发现，女人们已经有意识或者下意识地了解到，她们的美貌和性值得一个男人付出其劳动、金钱和生命，不，是很多男人的生

命。美貌的力量和性的力量是女性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并非每个女人都想放弃这些力量。

6. 不道德，还是永生？

性开放和婚前性行为受到谴责，是因为这些行为伤风败俗还是破坏了永生？《圣经》中有一些令人惊讶的答案……

宗教关注的是不道德还是永生？

女儿们　　强奸

醉酒　　父亲

声称得到上帝的应允

上面的“大字标题”连Willam Randolph Hearst和Rupert Murdoch都会感到面红耳赤，但为什么罗得和他的女儿们却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圣经》中是这么说的：“有一天大女儿告诉小女儿：‘父亲年纪大了，我们身边再无其他男人……我们去把父亲灌醉和他睡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家族延续下去了。’”[43]于是，连续两个晚上，两个女儿将她们的父亲灌醉，等到他睡着之后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他发生了关系（“他既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上床，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下床”[44]）。后来她们都怀孕了。

那么罗得和他的女儿是否因乱伦或者强奸而受到惩罚了呢？（如果一个父亲在自己女儿睡着时和她发生性关系，这种行为被视为“强奸”。）没有。他们得到了祝福，上帝的祝福。她们两人的儿子甚至成了两个种族的始祖。他们不仅没有因为乱伦而感到羞耻，还给大儿子以乱伦取名摩押（摩押为希伯来语，意思是“与父亲所生”[45]），而且摩押的子孙后代即摩押人都不以为耻。为什么呢？因为醉酒，因为强奸，因为乱伦才能保住他

们家族的血脉。[①]

为什么婚前性行为、性开放和同性恋遭到谴责?

婚前性行为和性开放受到谴责是因为因此而出生的孩子得不到保护。手淫、同性性行为和鸡奸（如肛交、口交和兽交）受到谴责是因为这些性行为都无法生育子女。

反而，婚外情、一夫多妻、与女佣发生关系甚至乱伦也可以得到认可，只要他们能保护因此而出生的子女；如果他们不能提供保护，那么还是会遭到谴责。永生的法则穿着不道德的外衣。可能这才是所谓的“永生法则”。

在第一阶段，允许同性恋现象和允许手淫现象涉及同一个问题：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即可享受性快感。想想看吧，一次同性性行为可能意味着两个小时的性快感。异性性行为可能也能体验到两个小时的性快感，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呢？18年的责任重担。简单地说，异性性行为是一种风险交易！

在第一阶段，社会用同性恋恐惧来禁止男人和女人以外的什么人发生性关系。恐同症反映了一种无意识的集体性恐惧：对个人而言同性性行为比异性性行为更轻松。这就像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说，那些找到价格更低的石油供应商的国家是软弱的。社会用这种方式让男人为性付出大价钱，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同性性关系不仅意味着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性关系，还意味着没有代价的情感关系和相互陪伴、免费的爱情。做这一切都无须为生育后代买单。

---

① 一些学者认为两个女儿无疑是千古罪人，他们认为两个女儿可以寻找其他男人延续家族血脉。似乎连这部分学者也愿意忽略“伤风败俗”的问题，只要能保证延续家族血脉就行。见大英帝国已故首席拉比Dr.J.H.Hertz编写的《五经与哈达拉》（*The Pentateuch and Haftorahs*）第二版第69页批注31（London，Son cino Press，1979）。

同性性行为是防止生儿育女最好的办法，所以这种行为威胁着人类的繁衍和生存，是被判处死刑的首要原因。如果此人没有被判处死刑，则会被流放。所以基督教在《旧约全书》中要求对男性同性恋处以死刑。很多罗马帝王、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审判者、英国君主以及美国殖民者也这么做了。于是，对同性恋的恐惧产生了。

人们对同性恋的恐惧——害怕它诱使人们对异性性行为失去兴趣——遗留至今。比起其他无法生儿育女的性行为，我们更害怕同性性行为。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人手淫并不会说出来，而在背地里说：“他手淫。”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和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我们会说：“他是个同性恋。”对同性恋的禁忌使人们认为，对性表达来说，自己是次要的。

在第一阶段，这种恐惧对保证人类的生存是有效的，但到了第二阶段，它成了爱情中的障碍。恐同症对于第二阶段的人类生存也构成了障碍：它教人们将他人视作客体——核技术也是这么发展而来的——这是杀人的先决条件，所以它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对同性恋的认可程度、对同性恋的歧视程度以及人们对周围的人的爱护程度都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

一夫多妻制不是证明了女人是男人的财产吗？

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社会都主张女人的身体只为男人而存在，为他们的快感和传宗接代而存在。

——《女人的世界史》（*The Women's History of the World*）[46]

学院女权主义常常将情妇、妾和一夫多妻制（即一个男人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①]的存在等同于男人拥有统治权。但是，一旦我们认清“永

① 多配偶制常常被误解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多个妻子，但是实际上它允许男性和女性都拥有一个以上的配偶；只有一夫多妻制才表示一个男人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

生法则”之后，我们就会更了解为什么上帝会保佑大卫和他的众多妻妾。作为国王，大卫既有足够的财富也有足够的力量养活不止一个女人，那么凭什么别的女人应该失去这种权利呢？一夫多妻制并不意味着任何男人都可以三妻四妾，穷困潦倒的男人可能讨不到老婆，女人可以选择有钱的男人。没有人会同情一个因为贫困而没有人爱的男人。

其实，一夫多妻是一种制度，允许有钱男人三妻四妾，也避免女人陷于贫困男人之手。一夫多妻制是一种贫困女人的社会主义：有钱的男人肩负着照顾贫困女性的重任。在一些摩门教女性眼里，一夫多妻制的作用如同政府对一些现代女性所做的：替身丈夫。

一夫多妻制是男人制定的宗教制度，救贫困女性于水火，而付出代价的是贫困的男人。但一夫多妻制并不是针对男人的阴谋。它是第一阶段中生存需要的产物。它并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亲密需要而存在的。

一夫多妻制与基督教：基督与他的修女们

修女们实际上“嫁给了”基督，基督教以这种形式认可一夫多妻制，后来以宣读誓词和交换婚戒来表示双方的结合。从修女们的角度来看，基督和修女之间的这种一夫多妻制婚姻是完美的，因为基督保护着千千万万的女性，而修女们宣誓独身。如果一夫多妻制的目的在于满足男人的性欲，那么基督的妻子们就不应该选择独身。一夫多妻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由最好的男性救赎者给予女性保护。

而基督并非凡人：保护他人，但没有性需求；有能力养家糊口，或者说家财万贯，而这正是饥荒发生时所需要的；愿意因我们的罪恶而牺牲自己、救赎大众。神父是他的人类显化形式：保护他人且无性需求、无条件倾听女人的心声。如果一个普通的男人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听女人说话，那他就没办法让家人填饱肚子；如果他选择独身，那这种物种就无法继续延

续。婚前，男人的性能量可以在任何一天、任何地方被激发；婚后，性能量只流入了一个通道：一夫一妻。

然而，教堂中的“男权”将男权发挥到极致：保护女人并帮助男人保护女人。这就是到教堂做礼拜的女人数量多于男人的原因之一。这也是越是传统的教堂就越希望男人承担救赎角色的原因。这样来看，“男权主义”对女人的好处更多。

为什么离婚被视为不道德的而且是违法的?

通常，如果女人有饭吃、有水喝、有房住，离开男人独立生活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那么离婚是合法也是道德的。[47]这种现象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南非喀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西非的约鲁巴人、坦桑尼亚的哈扎人以及尼泊尔的塔芒族人身上。即使在把所有能嫁的女人都嫁出去，而且不允许民众离婚的社会中，亦是如此。有经济保障的女性通常会忽视婚姻，从埃及艳后到中国北魏的元氏、16世纪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以及18世纪的俄国凯瑟琳女皇都是如此。[48]

法律和宗教律条都是男人制定的，但是几乎总是给女人最多的保护，甚至男人希望离婚时这种情况亦未改变。将离婚禁忌称为“上帝的旨意”（“上帝使之结合，无人应使其离散”）是社会保护女人的方式。神圣的婚姻是“上天赐予”女性的权力，至少在女人需要免于饥饿时是这样的。

看出来了吗？如果男人和女人都想得到离婚的自由权，那么在社会化进程中，在男人学习自立的年龄，女人也必须学习自立。

塔希提岛、中东和美国的性

塔希提式的自由性爱

如果食物和水源充足又没有外来入侵者，女人不需要在找到保护者之

后才能释放性能量，那么这时的性关系会是怎么样的呢？从塔希提岛上有人类以来，这个物产丰富的岛满足了上面每一个条件。在塔希提岛，父母们很早就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就像他们的长辈们教他们的那样。[49]到了青少年时期，父母们会鼓励孩子们与他们遇见并喜欢的人发生关系并享受性爱，甚至群交也没关系。孩子的情人越多，父母们越是感到欣慰。[50]因为孩子们比较容易照料，婚前生子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塔希提人的宗教观念中没有任何律条认为性爱是罪恶的。性爱被认为是快感、技巧和运动的结合。

在Cook发现这些岛屿之后不到一个世纪，西方人把他们的道德观念和压抑的性爱观念强加给当地人。西方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认为性是不道德的，但是他们推翻了塔希提人的传统观念。Ian Campbell在《失落的天堂》（*Lost Paradise*）中写道："那些生活没有目标的人，都死了。尚未经过三代人，塔希提岛人的数量从14万猝降到了不足5000人。"[51]

OPEC式供应不足的性

我们常认为要求妇女头戴面纱的国家剥夺了女人的权力。在伊斯兰国家，让妇女闭门不出的深闺制度将女性的美貌掩藏起来，只有极少数人——任何时候都能好好养家的人——才能看到她们的真容。因此，除非一个男人承诺保护和养活一个女人及其子女（比如结婚），否则男人连看女人的机会都没有。而且即使男人照做了，他也不能和她同席用餐、一起礼拜、一起远行等。她的爱、她对孩子的培养、她的情感、她的喜悦甚至她的一颦一笑都是有条件的供给，他得用行动证明自己愿意养她、保护她、为了她牺牲自己。这使得几乎所有女人都受到了保护，不仅是漂亮女人。

在中东，女性的性和美貌对男人的重要性如同美国人眼中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越短缺，价格就越高。女人为了自由或者小小的账单而"付出"的性越多，女人就越不值钱……所以大众深深地憎恶卖淫、违反深闺制度（摘去面纱）和色情文学，尤其是女人。也正因为如此，父母总是告

诉女儿：“不要自轻自贱。”

我们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如果女人在男人摘下面纱、露出笑容前做出承诺要养活男人一辈子，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这种制度给予了女性特权？

直到今天，谈起某人牺牲色相时，我们都不是指男人，所以只有女人希望会因此得到回报。为了让女人褪去衣衫，男人每年要花上几十亿美元，而男人褪尽衣衫就会蹲大牢。她褪去衣衫时上了杂志，而他褪去衣衫时成了露阴癖；她得到的是报酬，他得到的是牢狱之灾。她的性权力意味着获得报酬。他学着赚更多的钱、付更多的账单，所以当有人告诉他，他要赚更多钱是因为他有更多的权力时，他不禁会有些惊讶。

美国交互式性爱

在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拥有经济自由将促使女性经济充裕，所有他们提倡性自由。有人发现离婚后要承担经济责任之后，女权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和女性杂志都转而反对性自由。女性杂志《柯梦波丹》（*Cosmopolitan*）甚至在疱疹流行前就曾以“性：让男人去争取”[52]做过大字标题。有一项详细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没有疱疹和艾滋病，也会有别的原因导致性革命的衰退。[53]

在女性敞开衣襟之前需要得到经济保障，需要男人先请女人吃饭、饮酒的传统可能不知不觉地强化了这一需求。越传统的女人，需要一起吃饭、饮酒的次数就越多，就越难坦诚相见，直到她得到了承诺——本质上来讲，是养她一生一世的承诺。

7. 男人是否压迫了女人？

男人是否视女人为财产？

“男人的生命被财产控制”，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将女人放在一个被尊敬的地位上——她同样是财产。我们听到男人像对待财产一样对待女

人，却很少听到有人希望男人在财产遭受损失之前去世。从根本上来说，男人的生命屈从于财产。甚至在19世纪的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如果妻子犯罪，丈夫要接受审判；如果她被判有罪，他就要进监狱。[54]同样，如果一个家庭负了债，只有他会因债务而进监狱。

纵观历史，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很多方面都被视为财产。玛雅男孩拿自己与岳父结定契约；在《圣经》里，雅各把自己押给舅舅拉班；在美国，乔尼把自己押给叔叔山姆……几乎在所有必须保卫家园的社会里，在男孩们长大成人、能了解死而光荣的意义之前，他们就为了保卫家园而阵亡。

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以契约佣工的方式顺利移民。90%以上的契约佣工是男人。这些男人要处于这种奴隶式的状态至少7年。[55]其中有些人单身，他们希望能赚到够讨老婆的钱。其他人的老婆都远在欧洲。想想看，还有什么比一个男人在尚未吃到她做的饭菜、穿上她洗干净的衣服、享受与她共度的时光的情况下，就让自己成为奴隶更能证明爱呢？很多男人不只是母亲节才会这么做，他们每天都这么做，做7年甚至一辈子。只有男人——这个“没有浪漫细胞的性别”——单方面为了女人这样付出。但是……

为了和他们的家庭团聚，很多有契约在身的男人最后将契约延长到14年甚至一辈子。这些男人变成了男性奴隶。

在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男人需要经济保障的现象很普遍，所以他们将自己卖给勋爵。奴仆宣誓时要举行一个仪式，勋爵会问奴仆他是否愿意成为“他的人”，然后双方互相亲吻表示宣誓完成。于是，奴仆要为主人做一件女人几乎不会为她们的男人做的事：将为主人而死视作他的光荣。[56]

如果男人没有权力，那为什么通常财产都是由男人来继承呢？因为男人有责任提供财产。拥有财产，是获得男人资格的条件之一，而生儿育女

是获得女人资格的条件。男人有财产权，必须看护财产。在社会压力下，大部分男人把自己所拥有的所有财产都给了妻子；而离婚禁令保护着女人，只要男人有财产，女人就不会失去财产。

所以说，女人被视为财产而且比男人更受到重视，所以，她“令人尊敬”。

为什么会有母亲杀死女婴而非男婴?

父母们——尤其是单身母亲——有时会杀死女婴，却不会杀死男婴。为什么呢？当饥荒来临时，家里更需要男孩子犁田种地生产粮食，而女孩子生了孩子会需要更多的食物。如果发生了战争需要男孩子，有时社会就会将女孩扼杀在摇篮里，将男孩扼杀在战场上。那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女孩呢？如果战争切断了男人对女人的经济支持，那么在女人得到经济支持之前有些女婴就“夭折”了。

这并不是女性和男性对抗的问题，而是在特定时期更需要女性还是更需要男性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这就需要在社会化进程中使男女双方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建立只对男人开放的俱乐部难道不是对女性的压迫吗?

不论男女，在其性责任领域都有不对对方开放的俱乐部。

女性俱乐部

所有已知的社会都是由男人统治的，他们控制着女人的生育能力而且从中受益。

——《女权主义百科大全》[57]

在大部分社会中，生孩子只是女人的事情，男人完全被排除在外。[58]甚至陌生女人也可以参与其中，但是作为孩子的父亲却无法参与。

男女两性在自己的支配领域，或者说在他们的责任领域，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他们的责任领域就是其事业：女人有女性事业俱乐部；男人有男性事业俱乐部。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说男性俱乐部是男性团结、男性统治和男性沙文主义的“证据”。那么女性俱乐部呢？我们说那是女性的生育天性和男人不愿参与培养孩子的证明。

第一个被允许进入女性俱乐部的男人是……

第一个被允许进入女性分娩俱乐部的并不是那些准爸爸，而是医生。直到19世纪，在男性医生将麻醉术用于分娩镇痛，并发展出臀位分娩技术，以减少难产死亡率之后，他们才被允许进入产房。给予妻子爱和支持的丈夫们仍然不能进入产房。很明显，对男人来说，是医生而不是丈夫进入产房说明，相比丈夫的爱和心理支持而言，女人更想要一个拯救者。宁愿让陌生的女性而不是丈夫进入产房，这更让人怀疑男人是被爱着的，是一个父亲。

如果丈夫们有权力，他们怎么可能被拒之门外？如果女人是男人的财产，那么为什么男人不能接近自己的“财产”？如果男性机构给了他们特权，又是为什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医院（“男性机构”）才允许丈夫进入产房？如果父权制是男人用来控制女性生殖过程的阴谋，那么“女性分娩俱乐部”将男性排除在外，这种精心策划阴谋的方式还真是奇怪。

男人想要被允许进入产房吗？一方面，只要女人说“男人，来吧”，马上就会有无数的父亲欣然加入，很多人会发现，这是他们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另一方面，如果男人在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问题之前就想进入产房，那么他们就不会想得到允许。为什么不会呢？劳动分工导致角色分工和兴趣分工。所以说男性俱乐部和女性俱乐部并不是因为哪一个性别的阴谋才存在的，而是因为角色分工。

当传统的责任领域或支配领域受到威胁时，男女双方都会抗拒改变，

甚至在这样做能挽救他们的生命的情况下，也不肯改变。

如今，女人常被认为是生命的创造者，而男人被认为是生命的毁灭者。我觉得说“男女双方都在促成生命”才是准确的、慈悲的，女人冒着生命危险创造生命，而男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生命。

烧死女巫不是证明了我们更看重男人吗？

一提到将女巫处以火刑这件事，我们总是会想到萨勒姆女巫审判案，想到是男人烧死了女人。实际上，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两个女孩的癫痫性惊厥病发，然而人们将她们的惊厥归罪于萨勒姆的几个女人身上，认为她们使用了“巫术”。[59]萨拉姆女巫审判案的发生是因为那个社会毫不犹豫地相信那两个女孩，并试图拯救她们。

当一个社会将一个女人判定为女巫时，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审判一个女人：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是“非女人”，是超自然的。审判的目的是调查她是否“真的”是“非女人”。如果她从未结过婚，如果她是接生婆，参与过难产接生，或自己有残疾子女，如果她是异教徒，或在治疗过程中致人死亡，总之没有做过任何对人类生存有贡献的事，那么她就更容易被认为是“非女人”。[60]如果她公开支持人们做这些事，那么她被认定为“非女人”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

10%~20%的巫师[61]都是男性（男性通常被称为“巫师”[62]）。和男性同性恋一样，不愿意奔赴战场的教友派男性信徒被处以火刑。[63]所谓的“火把”实际上是人们点燃的一把柴火而已，而被绑在火刑柱上的人也算不上真正的异端分子。[64]通常，这种“异端分子”是同性恋者。[65]女巫（不生育的女人）和同性恋者（不生育的男人）都会被处以火刑。

为什么艺术家和作家常常遭到谴责？一部分原因在于艺术和文字会让人们对这一切产生怀疑。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家、雕塑家和作家常常可以

自由创作却不养家。而且，由于很多同性恋者根本无须养家，而他们可能成为作家或艺术家，所以同性恋者会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作为艺术家或者同性恋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一个男同性恋者身处某一机构，拥有保护民众的能力，比如他是神父、牧师或者拉比，或者他能用其他方式来弘扬宗教的伟大——比如米开朗琪罗绘制了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壁画，[66]那么他还有希望被大众接受。同样，在苏联尚未解体时，艺术家必须歌颂国家的伟大。只要他们能为共同体的保护功能添砖加瓦，甚至连萨满、巫医、祭司都能被接受。

8. 所以说，这是个男性至上的世界？

我管理雅典人，我妻子管理我。

——Themistocles（公元前528~前462年）[67]

父权制VS.母权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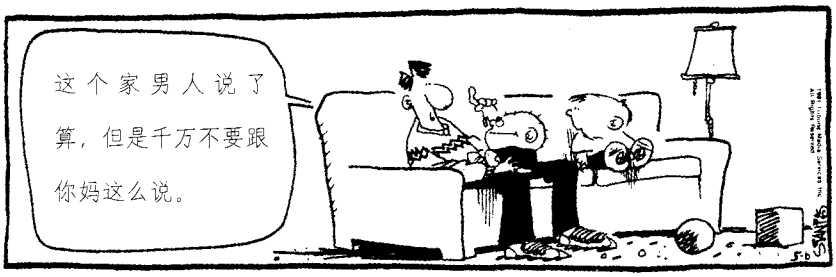
政府结构VS.家庭结构

长官，如果那个男人是个单身汉，你可以砍他的头，但是如果他结婚了，那就不行。因为男人结了婚，他的头就是一个女人的，所以砍他的头就等于砍女人的头，我不能砍女人的头。

——《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

我们说到身处父权制社会时，就会想到由男人掌权的政府或者权力组织。我们忘记了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家庭至少拥有和政府一样强大的力量，而当家做主的都是女人。我们也忘记了这也是一种权力组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每个女人都在女人掌权的家庭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只有很小一部分男人在男人掌权的政府和宗教组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尽管对男人来说，家更像一张抵押契据而不是自己的城堡，但男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嘴上总是说自己掌权。此时，其他人就会意识到其实他们处于从属地位。



如果到某机构和妻子登记（也就是缔结婚姻）是一个男性特权的标志，那么为什么“丈夫”（husband）这个词衍生自德语的“房子”（house），源自古诺尔斯语中的“限制”（bound）或者“束缚”（bondage）？[68]为什么“丈夫”这个词还是从“为生育而存在的男人”“耕田的人”“低等动物配偶中的雄性”这种意义衍生而来的呢？[69]相反，如果婚姻像很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么不堪，为什么在神话和传奇故事中，或者在现代爱情小说和肥皂剧中，女人的幻想总是围绕着婚姻呢？

斯巴达男孩被剥夺了与家人朝夕相处的权利，他们被剥权，而不是拥有特权。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去参加战争才能赢取女孩芳心的男孩子们，也被剥夺了权利，甚至被剥夺了生命。训练男孩们相互残杀，如果是为了生存就被认为是道德的；如果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就是不道德的。从这方面来讲，“父权制”剥夺了男人的权利和生命，而不是给予他们特权。

尽管如此，不论从哪种意义上来看，我们都未曾经历过单一的父权制或者母权制，每个社会都是父权制和母权制的综合体。男性支配并不存在，存在的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支配，支配领域的分工反映了角色的分工。男性或者女性都主宰着自己的责任领域和自己承担生命风险的领域，男性

和女性都既是主宰者也是从属者。

和男性一样，女性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可得到奖励：女性的特权，比如免于杀人或者被杀。不论男女，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就会获得“身份”奖励；如果没有扮演好这个角色，就不会被重视；如果胆敢反抗，只有死路一条。男人将自己的角色扮演到极致时，就会被称为领导人，这是男子汉的悖论。实际上他们不是领导人，而是仆人——一个拥有领导头衔的仆人。

所有这些都不能再被称为父权制或男性主宰，或者被称为母权制或女性主宰。实际上，二者都不是，又二者都是。

父权制和母权制是如何定义的?

那么，该如何定义父权制呢？或许最好是看男性在文化中主宰、负责哪一领域，又在哪一领域居于从属地位，以及这一制度如何因为满足双方生存的需要而被加强的。

该如何定义母权制呢？要看女性在文化中主宰、负责哪一领域，又在哪一领域居于从属地位，以及这一制度如何因为满足双方生存的需要而被加强的。

但是现在，在对父权制的定义中，男人总是和邪恶联系在一起，不论何时使用这个词都难逃这个含义。我的建议是：取消对这个词的使用。在描述一个社会时，应说明：为了让社会成员生存下去，两性是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的。这样我们就能揭示社会的多样性，而不是扣上阴谋论的帽子。

女权主义的一个漏洞在于，它将优势地位和性别歧视假定为单行线。在这种意义上，女权主义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运动：它仍相信男人应该负责一切，应该知道一切，而女人不负责，也不知道。且不说这并非事实，而

且这种说法在暗示女人天生低人一等或者天生愚蠢。这对女权主义运动来说很讽刺。可能同样重要的是，男人应为女人的奴役负责的这种观念的反面就是她的白马王子会来拯救她。实际上，为了下一代的延续，男女双方都会受到压制。

9. 基因遗传VS. 基因发展

“遗传学因为那些残留下来的祸根遭到指责，也因为人类的一直延续而得到褒奖。”[70]

我们的基因遗传和基因发展之间存在冲突。过去，选择能杀人的男性可以说是“适者生存”。将来，有了核技术，选择会杀人的男性可能会毁了所有人。过去，生存、婚姻和家庭都需要会杀人的男人。将来，生存、婚姻和家庭需要的是会沟通的男人。一个物种生存所需要的技能与相爱所需要的技能兼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然而，违反数百万年来形成的自然法则是否明智呢？如果是明智的，那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呢？如果是可行的，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呢？

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我们认为强调自然法则会更有帮助。如果一个婴儿天生有缺陷，即使我们说：“你的缺陷是天生的，所以我们会教你强化它！”根本无济于事。然而，对于男人的好斗和女人的被动性，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教男性女性如何强化他们的缺陷。

如果能从生物学上证明，女人比男人被动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想要的未来中，这是否有助于发展？”如果答案为“否”，那么生物差异越大，就需要做出越大的改变。如果可以证实女性的被动性是与生俱来的，这就增加了对女性进行决断力训练的必要性。如

果男性生性好斗，这也增加了对男性进行决断力训练的必要性（而不是斗争训练）。

为何过去能促进发展但将来不一定可行？唯一能做出解释的是生物学。我们最应提出的问题不是“将来会怎样，而我们又该如何调整”，而是“我们希望将来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调整”。

希望在哪里?

如果连黑猩猩——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也是雄性比雌性更好斗，那我们还有希望在人类自我毁灭之前改变自己吗？有的。我们的希望就在于，人类有适应环境的天性。

不论男女，都既有潜力做杀人者，也能做保护者，有潜力做养育者和沟通者。[71]当维京人杀人者和保护者的身份不再得到认可时，他们能迅速调整并成为养育者和沟通者。这种改变并非不可能，因为，为了保护而杀人，这种做法正是他们为了得到认可而做出的改变。

相反，每个女性都有好斗的潜质：在大家争先恐后去见摇滚明星时，女性表现出的好斗性比男性更甚。与好斗性或被动性相比，我们的生存适应能力在更深的层面运作：既可以享受比佛利山的生活，也能忍受集中营的痛苦……今天抬头做特使，明天低头做人质……

我们要如何调整?

我们选择与某种类型的男人或女人生儿育女时，出生的每个孩子都是我们为自己想要的男人或女人类型投的票。我们所选的男人或女人类型是人类所投出的最重要的一票。投票一开始，我们为某些男人或女人欢呼喝彩，与之暗送秋波，接下来开始选择婚嫁对象……最后我们决定与之生儿育女，投票这才结束（接下来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次要的）。

我们怎样才能让男性发自内心地变成养育者和沟通者呢？啦啦队队长为那些倾听她们的男人加油，她们并不会为弹奏“乐队歌曲”（smashface）人加油……男人抗议的是，他们被选择是因为有能力取胜，而不是有能力养育后代。

在男人提出抗议之前，女人仍然会选择进化版“杀人者”——有能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将对手“杀个片甲不留”的男人。在发现责任与早死——死于心脏病、癌症、自杀，导致死亡的十五大因素——的联系之前，男人是不会提出抗议的。简而言之，当男人发现自己继续扮演第一阶段角色会使他们被随意支配，才会提出抗议。于是，调整的方法产生了……

注释：

1. Lisa Tuttle，《女权主义百科大全》（*Encyclopedia of Feminism*）第242页。（New York：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1986）

2. 见Edith Hamilton《神话》（*Mythology*）第242页。（New York：Little，Brown，1940）这些传说来自男性为了祭奠月神而做出牺牲的宗教仪式。见Robert Graves《希腊神话》（*The Greek Myths*）第一期第285页。（New York：George：Braziller，1959）

3. 这两个儿子是Cleobis和Biton。

4. 赫拉嫁给了天神宙斯。见Thomas Bullfinch，《布尔芬的神话》（*Bullfinch's Mythology*）第6页。（New York：Avenal Books，1987）又见Edith Hamilton，《神话》第28页。

5. 1992年2月16日与Robert Bly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吃早餐时他提到的。

6. 英语单词英雄“hero”一词来源于希腊语“ser-ow”，意思是“保护者”（protector）。而“protector”来自拉丁语的“servare”。同一词根的字系里包括“servire”，即“奴隶”（slave），英语单词“服务”（serve）就是从这个词衍生而来的。见Julius Pokorny，《印欧词源词典》（*Indogermanisches Etymologisches Worterbuch*）。（Bern：Francke，1959）或见《美国传统英语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第1538页。（New York：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Co. & Houghton Mifflin，1969）

7.《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Macropaedia*）第18期第

15版第650页。（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80）

8.见Majorie Rowling，《中世纪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Medieval Times*）第168页。（New York：Dorsett Press，1968）

9.见Daniel Ediger，《牺牲的好处》（*The Well of Sacrifice*）第22页。（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1）

10.见Joseph R. Conlin，《昔日美国》（*The American Past*）第367页。（New 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84）

11.一盎司金子在1860年价值20美元，如今价值约360美元。

12.见Albert Burton Moore《南部邦联的征兵与冲突》（*Conscrip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Confederacy*）。（New York：Hillary House Publishers，1963）

13.据估计，至少有471427人受伤，1094453人死亡。见E.B.Long，《内战的每一天》（*The Civil War：Day by Day*）第710~711页。（New York：Doubleday，1971）

14.见Moore上述作品中第32页。

15.见Ken Burns，《内战》（*The Civil War*），Florentine Films公司出品的一部纪录片，于1990年至1991年间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

16.Gloria Steinem在其畅销书《内部革命》（*Revolution from Within*）中指出，自尊心低下与其说是男人的问题，更应该说是女人的问题。（New York：Little，Brown，1991）

17.见Klaus Theweleit的《男性幻想》（*Male Fantasies*）第1期。（Minneapolis，Min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又见1987年5月《Ms.》杂志上刊登的Barbara Ehrenrich的《伊朗门：Oliver North的真正意图》（“Iranscam：The Real Meaning of Oliver North”）。

18.这是东部切诺基人的一个寓言。池塘之王也可以看成池塘的中心，受其他动物敬仰，因为它为所有动物提供庇护和食物。感谢俄克拉荷马奥大学的Dr. Glenn Solomon告诉了我这个寓言的出处。

19.美国亚利桑那大学Dr. Mary P. Koss为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进行的一项研究。1990年6月3日《纽约时报》第30页Gerald Eskenazi的《当运动攻击性变成性骚扰》（“When Athletic Aggression Turns into Sexual Assault”）中曾引用。

20.见Colin Turnbull的《大山里的人》（*Mountain People*）第105页。（New York：Simon&Schuster，1972）

21.Colin，同上，第244~245页。

22.见Joseph Campbell，《神话的力量》（*The Power of Myth*）第8页。（New

York：Doubleday，1988）

23.见Rosemary Romberg，《割礼：痛苦的困境》（*Circumcision: The Painful Dilemma*）第43页。（South Hadley，Mass.：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1985）

24.见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III：恺撒与基督》（*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III: Caesar and Christ*）第385~386页。（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39）

25.同上，第381页。

26.同上，第388页。

27.见David D. Gilmore，《成长中的男人》（*Manhood in the Making*）第206页《塔希提人》（“Tahitians”）和第209~210页《瑟买人》（“Semai”）。（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古希腊克里特岛在未遭到攻击，也未实现政治统一的时期里（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太平的。在小的地理范围内，政治统一是为了和平的需要，否则会遭到周围其他部落的攻击。跑得够快也可以“避免受到攻击”。例如森林游牧民族的生活都很太平，如20世纪60年代末在苏里南东南地区发现的阿库里奥人（Akuriyo）和20世纪50年代在巴西南部发现的赫塔人（Heta）。关于古希腊克里特人和森林游牧民族的信息是在1992年11月10日对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家进行采访时得到的。

28.见Riane Eisler，《圣杯与剑》（*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第16页。（Cambridge，Mass.：Harper & Row，1987）

29.这个罗马国王是Prasutagus，他的遗孀在第一世纪罗马入侵爱希尼时曾出兵。见Antonia Fraser的《博阿迪西亚的战车：女王战士》（*Boadicea's Chariot: The Warrior Queen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8）更多实例见Jean Bethke Elshtain的《女人与战争》（*Women and War*）。（NewYork：Basic Books，1987）

30.如果生育和保护孩子如此重要的话，为什么有一些社会中，比如斯巴达人，孩子没有任何权利？如病弱的孩子被独自留在山野间自生自灭。而在其他社会中，比如犹太人，几乎所有的法律和传统都是围绕孩子的各个方面建立起来的。斯巴达人认为只有弃弱择强才能变得强大，而犹太人则认为孩子是“弥赛亚的化身”，是“再生力”，是对过去所犯的错误的补救，因为“上帝会一直在孩子身上给人类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见大英帝国已故首席拉比Dr. J. H. Hertz编写的《五经与哈达拉》（*The Pentateuch and Haftorahs*）第二版第54页。（London：Soncino Press，1979）

31.见J.T. Hooker，《古斯巴达人》（*The Ancient Spartans*）第137页。（London：J.M. Dent，1980）见L.F. Fitzhardinge，《斯巴达人》（*The Spartans*）

第9页和第162页。（London: Thames & Hudson, 1980）斯巴达人有“组织、军队，还有一系列社会机构。他们的教育系统控制着每个男性7岁到60岁间的生活。”（Fitzhardinge，第9页）这种强制性的教育被称为“斯巴达教育”。（Fitzhardinge，第162页）

32. 这里的祭坛是指阿特密奥西亚（Artemis Orthia）节日祭坛。见Plutarch的《莱克格斯18》（*Lycurgus 18*），又见Arnold Hugh Martin Jones《斯巴达人》（*Sparta*）第35页。（Oxford: Blackwell & Mott, 1967）

33. 见James D. DeMeo博士发表于《生命力》杂志（*Journal of Orgonomy*）1990年第24期第233~239页的《女性割礼习俗的地理分布》（“The Geography of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s”）。

34. 见Anne G. Ward及其他作者，《忒修斯的要求》（*The Quest for Theseus*）第7~9页。（New York: Praeger, 1970）

35. 见Bullfinch上述作品第152~153页。

36. 见Campbell、Joseph和Bill Moyers，《神话的力量》。（New York: Doubleday, 1988）

37. 见新国际版《圣经·创世纪》30:3。（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Bible Publishers, 1987）

38. 同上，30:28~29。

39. 古代犹太人并不禁止近亲结婚，但是现代法律禁止。

40.《五经与哈达拉》第5页：“这是第一条针对男人的戒律（戒条）。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的责任在拉比法典中的重要性犹如《律条》中613戒律（戒条）的第一条。”

41. 同上。

42. 感谢Lionel Tiger给了我关于基因是大自然的营销手段这一想法。

43.《圣经·创世纪》19:31。

44. 同上19:33。

45. 摩押这个名字“和‘me-ab’一样，是‘来自父亲’的意思”，见《五经与哈达拉》第69页。

46. 见Rosalind Miles，《女人的世界史》（*The Women's History of the World*）第94页。（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1990）

47. 见Helen E. Fisher发表于1987年10月《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第22页的“四年之痒：离婚模式是否反映了我们的进化遗传？”（The Four-Year Itch: Do Divorce Patterns Reflect Our Evolutionary Heritages?）

48.见Joseph haslip，《恺撒大帝传记》（*Catherine the Great: A Biography*）。（New York: Putnam，1977）又见 Michael Grant，《克里欧佩特拉》（*Cleopatra*）。（New York: Simon &Schuster，1972）

49.见David Howarth，《塔希提》（*Tahiti*）第32~33页。（New York: Viking Press，1983）

50.同上。

51.见Ian Campbell，《迷失的天堂》（*Lost Paradise*）第36页。（London: Century Hutchinson，1987年）

52.1984年9月《时尚》杂志封面《保持神秘……用古老的方式去爱……让男人赢得爱》（“Preserve the Mystery…Make Love the Old-Fashioned Way. Make Him Earn It”）。

53.我在《男人何以如此》（New York: Berkley，1988年）第8章《为什么性革命来去匆匆？》（“Why did the Sexual Revolution Come and Go So Quickly?”）中提到过这个结论。

54.关于男人为妻子的罪行而入狱的部分，见R.J. Walker，《密西西比最高法院判案报告》第73页第157节中提到的1824年密西西比州Calvin Bradley诉州政府156号案件。（St. Paul，Minn.: West Publishing，1910）关于男人因家庭债务入狱的部分，见Nicole Hahn Rafter，《不完全的公正：1800~1935年期间州监狱里的女人》（*Partial Justice: Women in State Prisons*，1800~1935）第10页。（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5）

55.见Bernard Bailyn，《渡海西行的人：革命前夕美利坚人口定居中的一次人口迁徙》（*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第177页。（New York: Knopf，1986年）这项研究是针对最常见的契约佣工群体——英国人的。

56.见Rowling上述作品第33页。

57.见Tuttle上述作品第242页。

58.见Karen L. Michaelson和其他作者，《从人类学角度看美国分娩术》（*Childbirth in America: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第2页。（South Hadley，Mas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1988）

59.见《大美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第24期第146页。（Danbury，Conn.: Grolier，1989）

60.见Sally Smith Booth，《美国早期的女巫》（*The Witches of Early America*）第87~107页。（New York: Hastings House，1975）

61.同上。

62.见Philip W. Sergeant，《女巫与男巫》（*The Witches and Warlocks*）第12页。（London：Hutchinson & Co.，1974）

63.见Arno Karlen，《异性性行为与同性性行为》（*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第128页。（NY：W.W. Norton，1971）

64.见《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第663~664页。（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65.见Karen上述作品第128页。

66.见A.L. Rowse，《历史中的同性恋》（*Homosexuals in History*）。（New York：Dorset Press，1983）

67.见《哥伦比亚引文词典》第113页。（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68."bheu-"（英语单词中丈夫"husband"的词根）出现在Pokorny上述作品第126页。又见上述《美国传统词典》第643页（单词定义）和第1509页（词根定义）。

69.见《牛津英语词典缩印版》第1352页。（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70. Jim Kohl，未出版手稿《人之性：过去、现在与未来》（*Human Sexual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71.这种说法与达尔文理论的修正版一致，这一理论是由生物选择理论家发展出来的。见Jacque Ruffle，《人口方案》（*The Population Alternative*）中Theodosius Dobzhansky，Ernst Mayr，G.G. Simpson与G.L. Stebbins的相关讨论。（New York：Pantheon，1986）

The Mgth of Male Power

第二部分

被随意支配的性别

第四章

高危职业："我的身体，但我不能做主"

"男人不是人，他们是人形机器。"[1]

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女人从事的工作薪水低廉、前途无望、环境恶劣，比如工厂工人。然而，《职业评等年鉴》（*The Jobs related Almanac*）[2]中根据薪资待遇、工作压力、工作环境、工作前途、职业安全和身体要求等综合因素对250种工作的优劣进行了排名，其中25种最差的工作中有24种从业者几乎全是男性。[①]其中包括卡车司机、钣金工人、屋顶工、锅炉制造工、伐木工、木工、建筑工人或建筑工头、建筑机械操作工、足球运动员、焊接工、装配工和钢架工。这些"最差工作"有一个共同点：95%~100%的从业者为男性。[3]

每天，因工伤死亡的男人数量几乎达到了越战期间的平均每日死亡人数。[4]从根本上来说，有3种征召是只针对男人的：所有战争时期的征兵均为男性；每一个男性都被征召为免费保镖；男性被征召进入所有危险的岗位或"高危职业"。即使男人在法律上没有被征召，在心理上也感到自己被征召了。

---

① 在25种工作中，只有一种工作有一半从业者是女性：职业舞者，和职业足球运动员一样之所以排到了排行榜的后面，无疑是因为职业安全性差、职业前景黯淡、受伤概率高而且工作压力大。

女人用子宫孕育生命，而男人往往用“经济摇篮”抚养子女。很多男人为了给家庭提供“经济摇篮”而选择高危职业。而在高危职业中不成文的座右铭就是：“我的身体，但我不能做主。”

高危职业：男人面临的最大“玻璃地下室”

词条：因工死亡的人数中男人占94%。[5]

词条：美国的工人死亡率比日本高出3~4倍。[6]如果美国工人的死亡率下降到日本的水平的话，每年大约有6000位男性和400位女性能幸免于难。[7]

词条：在美国，鱼类产品检查员和游戏检查员，与职业安全检查员的比率是6:1。[8]

词条：目前美国尚未有任何MBA项目将职业安全纳入其课程。[9]

词条：在美国，每个工作小时内都有一名建筑工人丧命。[10]

词条：工作风险越大，男人在从业者中所占比例就越高。举例如下：[11]

高危职业	
消防员	男性占99%
伐木工	男性占98%
重型货车运输	男性占98%
建筑工	男性占98%
煤矿工	男性占97%
安全职业	
秘书	女性占99%
接待员	女性占97%

男性得到的报酬较高，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工作危险性更高。高出来的那部分报酬或许可以称为“高危职业津贴”。而且在同一种高危职业中，越危险的工作，就越容易被分配给男性。[12]

对于那些无形中的障碍，无论男女都曾经历过，而且无论男女都对此负有责任。“玻璃天花板”被用来形容阻碍女性得到高报酬的无形障碍，

那么"玻璃地下室"可以被用来表示让男性从事高危职业的那些无形障碍。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玻璃地下室"的成员。但是因为这些男人对女人来说并不是首要人选，所以我们对他们视而不见。（女人会说："我碰到个医生……"但是不会有人说："我碰到了一个清洁工……"）

随处可见的男人：非首选男人

讲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吧。

我刚完成本章的研究工作时，想让大脑放松放松。我想着早上"跑跑腿"可能会有帮助。

如果你已经读完前面几章，你可能心里有所质疑。你也看得出来，那些小故事无非都是与道德有关的问题。不过你想得没错，我现在就要去看看我研究的那些人了。

就在我准备好出门的时候，我听见门外有垃圾车的声音。通常呢，这就是"拜托，今天又是星期一"的信号。这次它也让我想起一些事情……清洁工的死亡率是警察的2.5倍。而且在圣地亚哥市（我居住的城市），仅在去年一年就有70%的清洁工因工受伤。[13]现在，我看着门前的清洁工收走我家的垃圾，我不禁将70%这个数字与他联系在一起；将过高的患病概率（背部损伤、疝气、直肠癌、肝硬化或者被过路车辆撞伤）与他联系在一起。我看到了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东西……我先是看到其中一个男人腰上系着支撑带；然后，我们相互看了看对方，有了眼神接触；接下来，我问了他的名字，以前我是从来不会问他们的名字的；后来，我还上了其中一辆车搭了一段路。

在Terry Hennesey的责任路段上（真人真事），有一个牙科诊所。[14]最近，就在他把垃圾压扁的时候，有几个装着人血的塑料袋被压爆了，血溅到了他的脸上。过了几个星期，他发现了一颗二战时期遗留的手榴弹，拉

环还在里面（当然，如果没有拉环的话，也很难找到手榴弹），还有二十几颗9毫米的中空弹。几个月之后，他又捡到了低放射性垃圾。他的同事们说着各自的故事：蓄电池酸液溅到他们的身上、脸上；有人曾为了把剩下的氯排出来而用力挤压氯罐，结果罐子撞在一个男人背上着火了；有人把滚烫的炉灰倒进垃圾桶，结果垃圾车后车厢着火了；有人曾经碰到过一罐氰化液……

为什么我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危险的事情？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男人从来不说出来——相反，他们拿倒霉蛋开玩笑，互相叫着绰号，“氰化人”“放射人”，等等。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对另外一些人的受伤情况更为关切，比如足球运动员，因为他们的缺席会影响我们的自尊心：球员缺席会导致“我们的球队”输掉比赛。如果我们的清洁工去世了，会有人接替他的位子，他们就像清洁卡车上的一个零件。

垃圾收集岗位上有96%的从业者是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一技之长的男人，他们每小时赚9~15美金用来养家糊口。[15]过去我觉得把收垃圾的人称为“垃圾收集男”[①]是一种性别歧视，而从未想过这些人感受到的那种压力才是一种真正的性别歧视。或者说把危险物品丢进垃圾堆里才是真正的性别歧视。

有那么一次，我看到的清洁工与以往有所不同。我意识到我在用不同的眼光看这个清洁工，怎么说呢，“孕妇清洁工”。我每次看到孕妇时，都会不自觉地微笑，对她的喜悦、她的冒险精神和她的贡献表示欣赏。但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对着哪个清洁工微笑过，从未表示过对他们的贡献的欣赏，虽然他们养育孕妇生下的孩子、承受不同的压力。我也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缺少喜悦感而产生过共鸣……我从来没有期待过他们会很喜悦。实际上他们一直是隐形的，就像很多高危职业中的众多男性。

① 英语单词的清洁工“garbage man”里面含有男人“man”这个词。——译者注

和其他的新开篇一样，新的信息会出现在之前顺带提到的内容中——比如这封致Ann Landers的信：

亲爱的Ann：

我受够了别人老是说清洁工是低能儿才会去做的轻松活。我嫁给了一个清洁工，他的生活是这样的：

他早上4：30就出门工作了，一个星期要工作6天……有一天，温度已经到了零下10℃。我丈夫在这种天寒地冻的天气中工作了10个小时……他的路段上一共有2500多户人家……如果每家每户门前他都多花那么几分钟的话，那他一天要多工作2~3个小时……他的报酬是按户算的，一户17.5美分。[16]

当然，写这封信的是他的妻子。清洁工本人还是保持沉默……

有一次，我在去恩西尼塔斯市好运超市的路上，从自动取款机上取了点现金。就在这时，有一位金融武装押运人员从另外一台自动取款机上取现金，结果他成了那个礼拜第二位不幸头部中弹的武装押运人员。[17]每次我要兑现支票的时候，总是有武装押运人员在一旁帮忙。这些押运人员把在美国经济中流通的每一分现金运送到各处。有一位押运人员，他是一位在越南参加了3场战役的老兵，他的押运区域是洛杉矶南区，那里有很多帮派出没。他说："你一打开车门，就变成了'砧板上的鲜肉'。"[18]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份工作呢？David Troy Nelson是这么说的："我是单身爸爸，有两个读幼儿园的孩子。"他愿意成为"砧板上的鲜肉"，这样他的两个孩子才能吃得到砧板上的鲜肉。

这让我想起了肉类和蔬菜。比起那些对鸡肉进行分类整理——比如挑选鸡胸肉——的工人所遭受的苦难，我过去更为关注对鸡肉施加的罪行。莫雷尔肉类加工厂有2000名工人，一年内有800位变成了残疾人。[19]他们中间有些人砍肉剁肉的速率是每小时1000下。每年都有40%的人成为残疾

人，这使得每个工人的双手更像定时炸弹。莫雷尔肉类加工厂的57个高风险岗位中，男性员工占90%。[20]其中有几十个人受了重伤，他们做完手术后不能马上返回岗位，必须要休养1~2个月。

我买菜时会挑卖相最好的蔬菜，我理所当然地觉得卖相好的菜上面的杀虫剂和其他有毒物质能够洗掉。现在，我想到了一些人，这些人用喷药飞机和喷药器喷洒药物时，药物会随风散落到他们的脸上，所以他们会一直吸入杀虫剂。

我过去总是以为，种田毫无疑问是一种安全的职业，因为男性和女性种田的时候会“相互支持”。然而我错了。除了采矿，农业是所有产业中死亡率最高的。[21]在务农时死亡的年轻男性的数量是年轻女性的24倍。[22]男性因此而缺胳膊少腿或少几根手指的概率也比女性更高。在实际工作中，男性和女性并没有“相互支持”。务农时，男人在死亡率更高的地方，而女人在安全性更高的地方。在我采购微波食品时，我对那些准备这些食品的人心怀感激，正是因为他们犁田翻地、喷洒农药，冒着缺胳膊少腿的风险，我才有机会吃上一顿只要加热就能吃的饭。

我从好运超市出来后来到了恩西尼塔斯大道，一路上我数了数，不到6个街区就有30个流动工人，他们都用真切的眼神看着每一个过路人，每个人都希望有人能雇他到别人的田里去干上一天的活。我看见有个人开着车路过，他打量了一下周围等待的工人，然后选了其中两位离开了。我住在靠近圣地亚哥的恩西尼塔斯市有10年了，我见过上千的流动工人站在街角等待工作的机会。这些人全部都是男性。一整天都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晚上不能回到温暖的家，得在寒冷的野外过夜。在圣地亚哥，这样的男人随处可见：

务农7~10年之后，农活留给这些男人的是永久性的驼背和满是伤疤的双手。他们每天要在田间喷洒2~3次农药，久而久之这些农药会渗入他们的

皮肤，尤其是手上的开放性伤口中。这些有毒物质会损伤他们的大脑或者引发癌症。于是，这些人来到美国，在年复一年地在田间工作之后，面临的将是脑损伤或者早逝（一般是40岁之前）。

其中大部分男人都会将薪水汇给远在墨西哥的老婆和孩子，他们每年只能见一两次面。见面之后他们得再次冒着因非法进入美国边境而入狱的风险去工作。这可能算得上一种流动工人征召吧，又一次全是男性的征召。

这种"为了养家糊口而做出牺牲"的做法是男人的抚育方式。不论哪个阶级，成了家的男人都要提供摇篮——整个家庭的经济摇篮。他们贡献出自己的身体，但是那种可被任意支配的心理让他们无法亮出"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公示牌。没有任何一项运动指出这些男人受到了压迫：女人不为他们洗衣做饭，却要花他赚的钱；为老婆赚钱买房，而自己却睡在地上。田间劳动者变得激进时会看到阶级歧视，却看不到性别歧视。当然，我们并没有说墨西哥男人是家长制的——好像其社会法则是靠损害女人来运行的。

我要去一家旺斯超市买西柚汁，这时正好有一辆很大的卡车要倒进一个狭窄的停车位里面，我在旁边等它停好。我注意到那位卡车司机在喝咖啡，这时我想起卡车司机有时会因排班需要而睡在车轮旁边（所以他们的死亡率是所有职业中最高的[23]），这个场景有些似曾相识。在这个过程中，进入停车场的不止一辆卡车，我看到了一个男人在卡车里。我脑中浮现出一个在早上4点喝第8杯咖啡，体力已经达到极限的卡车司机。而我不必饿到极限后再大吃特吃。

我曾经以为卡车司机就只是开卡车的人而已，我想到过卡车造成的伤亡事故，却未曾想过卡车司机的伤亡。而对这位卡车司机，在片刻的等待中我对他有了片刻的欣赏。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几个月后仍未消失。我在电影院看《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电影里，众人将卡车司机的卡车点燃，此时观众席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和观众们有着同样的感受，然而很遗憾，我对卡车司机的感受他们却感觉不到。

回家之前，我情不自禁到我的豪华住宅前稍作逗留。它坐落在海边的悬崖上，已经开工了。我看见有工人在木板上钉钉子，于是我想象着卡车司机开着他们的半挂车在城市繁忙的道路上行驶，伐木工扛着这些木头在薄薄的冰面上走（所以伐木搬运也是高危职业中最危险的岗位之一）。我认为“伐木搬运”是一种隐语，意为“将死之人”和“寡妇制造者”，因为树木和树枝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致男人于死地，让女人变成寡妇。我发现为了我的豪宅，不仅建筑工人身处险境，卡车司机和伐木工也承担着风险。

一阵冷风吹来，催促我离开，这时我看见二楼有一位工人因为没有抓牢横梁差一点掉进大海。此时，我突然想起，大概10年前，我有一位朋友被起重机吊臂撞翻。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健康，但是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妻子的生活也不再和从前一样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州雇用足够的安全调查员防患于未然，而是等到死亡事故发生之后才到现场调查。

逗留的时间超出了计划，于是我踩下了油门。就在那一瞬间，我听到了汽笛声。我觉得有那么几秒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是一辆消防车时我放下心来。我发现它不是冲着我家的方向去的，才松了一口气。我想起拉斯维加斯米高梅大酒店的大火，在那场大火中，有76个人既没有被大火吞噬，也没有被浓烟包围，而是在几乎无菌的房间里永远地倒下了。[24]我第一次意识到，比起火和烟，烟雾中的有毒物质对消防员产生的威胁更大，威胁不会立即造成，却会日积月累。为何？

罪魁祸首是塑料。自二战以来，各种类型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PVC，它们已经成为电话、家具、地毯、墙纸、垃圾桶、水管和电视机的一部分。这些产品燃烧时会产生致癌的化学副产品，包括氯气、氯化氢和光气（一战时期一度被用于化学战争，可见其致命程度）。消防员进入房间时，他可能看不到烟也看不到火，但是无形的烟雾仿佛一颗有害气体制成的炸弹住进了他的体内。有毒物质的排放成了有毒的化学武器。后果是什么呢？

死于癌症的消防员的数量比普通人多了400%以上。[25]消防员死于癌症的平均年龄是52岁。[26]因工受伤（如背部损伤）和职业病（如心脏病）迫使1/3的消防员不得不提前退休。[27]1/20的消防员会接触到传染性疾病（其中1/4为艾滋病）。[28]

志愿服务常常被打上女性标签。然而，在所有城市的消防员中有80%是志愿者，有将近100万人，其中99%的志愿者是男性。[29]这些志愿者们站在死神面前挽救那些陌生人的生命，而自己却可能早逝。据我所知，加入这种志愿队伍的人群中男女数量并不对等。

为什么消防员不更多地使用呼吸装置呢？呼吸装置会增加约15~45公斤甚至68公斤的负重，然而消防员要扛消防梯、消防斧、水龙带和消防战斗服。处理火灾需要有组织地进行灭火，需要良好的沟通；戴上面具的话消防员就不能相互喊话了。

消防员们很清楚，每次他们忙着保护自己时，就会有其他人死掉。火焰蔓延的速度可能达到每秒15米，1980年拉斯维加斯米高梅酒店发生火灾时，火势就是如此凶猛。在几分钟之内，就有85人丧生。佩戴氧气筒大约需要1分钟。在这1分钟里，火势可能窜出300多米。简单地说，很多消防员们宁愿舍己救人。

为什么志愿消防员要冒此生命危险呢？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得到人

们的感激之情。但是有些消防员并不觉得人们感激他们，比如说有些屋主讨厌消防员穿着靴子把地毯弄得到处都是泥。

我把车开到自家的车道上时，发现附近有一辆搬家车停在新搬来的邻居家附近。就在他们将一件很大的沙发搬出门道时，有几个搬运工身子滑到沙发下面去调整沙发的角度，在走过转角楼梯时他们还需努力保持平衡。这一幕正好被我看到。我听到一位父亲嘱咐儿子："注意你抬腿的姿势，不然到时候你的后背会跟我似的。"

我看看家里的一切，想起家里的冰箱和文件柜被搬进来的情形，不由得心里升起一种感激之情。我感谢那些让我的生活变得如此便利的男人，尽管他们在大众的眼中仍然是无形的。

本章的初稿完成后，我拿给一位煤炭行业的朋友看，他看了之后对我说："你没有提到所有行业中最危险的——采矿业。"我回答他说，我并没有在我周围的日常生活中看到有什么证据证明它有多危险。他纠正我说："你没看见你周围有矿井，但是你周围到处都可以看到证据。"[30]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首先，"他说道，"采矿业并不仅仅指煤矿开采，也包括金属矿开采，还有采油和采气。现在你拿起剃须镜看看你的牙齿，那些填充物里面含有金、银、汞还有复合材料（石油产品）。你的眼镜不但有金属配件，还有塑料配件，这种塑料配件是用石油和煤制成的。还有，你绝对要用到灯，它是通过玻璃灯泡发光的，而灯泡中含有钨、汞和磷。电灯可以发光是因为电，电是发电机里面的铜线和铝线输送出来的，而发电机本身也由铜制成，其动力来源是铀、煤或者石油产生的蒸汽，再加上钨金汽轮机高速旋转才能发电。"听到他这么说，我很吃惊。

"现在，假设你穿上衣服，"他边笑边说道，"你的衣服一般都会含有铁，是从铁矿、石灰石和煤里面提取出来的。至于你的电脑，会用到塑

料、玻璃、磷，还有必须经过开采的几十种金属。你发给我的原稿现在是用钢（从铁矿、石灰石和煤中提取的）制成的长尾夹装订的。等你的书到了读者手上，他们阅读的文字都印在含有硫黄酸的纸上，硫黄酸是从石油和金属硫化物矿物中提炼出来的副产品。如果纸张中不含酸的话，可能会含有碳酸钙（石灰石），用来中和酸。甚至连黏合书本的胶水也有石油的成分。如果书的封面是光面，那纸张中应该会添加黏土。"

为何采矿业是如此危险呢？每个星期都有煤矿塌方事故造成采矿工人脑震荡或者死亡；矿井中悬挂的电线可能将采矿工人电死，运转中的机器可能使他们残疾。如果哪一间办公室的天花板掉下来砸死了秘书，或者电线从墙上掉到了桌子上导致员工触电，又或者运行中的机器严重伤害了某人，还会有多少女性愿意在那里工作（不论有多少报酬）？雇主被起诉之前还能自在多久？

这天晚上想到的已经够多了。我打开电视机想要放松放松。我不自觉地在新闻和连续剧之前选了前者。新闻节目在播出"反毒品战争"，第二天早上，我又忍不住查了查相关的资料。

从1921年至1992年，美国毒品管制局（DEA）牺牲的每一位探员都是男人。[31]这么一来，"反毒品战争"中参战的是一支性别隔离的军队：女人在安全的后方而男人冲在前线。

过去，DEA探员往往从入职到退休前都不曾扣动扳机。[32]而现在，一所DEA学院的培训主任是这么说的："现在的DEA探员毕业以后可能在执行任务的第一周就得拔枪。"[33]如今，DEA探员是所有联邦执法机构中被袭击的概率最高的。[34]

以前我从未想过"反毒品战争"实际上也是另一场只有男性上前线的战争。

救人于危难的职业

凭你的第一直觉将下列句子填写完整：

● 他们听到警报声之后，一群_____很快就赶到火灾现场救出了一些女人。

● 两个_____袭击了两位在中央公园慢跑的女性。

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营救女人的是“救火员”（firemen）或者“消防员”（fire fighter）。现在如果有电视台播报员不用“消防员”而用“救火员”这个词就会被认为有性别歧视。但是如果有女人遭到了袭击，播报员就会说：“两个男人袭击了一个女人。”男人救了女人时，我们强调的是他们的职能（消防员、医生）。男人伤害了女人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性别（男性），而不是男人的行为（暴力）。这种做法使我们在潜意识中产生了对男性的愤怒，相应地，也让我们更加觉得他们被任意支配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称女性护士为“协助型职业”，称男性警察为“条子”，而不是“拯救型职业”。虽然我们把男人的体力和男人对女人的暴力联系在一起，但没有把它和男人对女人的救助联系在一起——男人不只是警察和消防员，也是女人的私人保镖，在心爱的女人遭到强奸、抢劫或谋杀时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她受到伤害。

男人的拯救本能随处可见，即使在有些地方，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男人的破坏习性。当年，切尔诺贝利反应器的白热核心眼看就要坠入放射性水池中，如果坠入池中就会引起蒸汽爆炸，会大大增加放射性污染的区域，使附近其他上百户家庭受到患癌早逝的威胁。就在这时，3个男人自愿潜入放射性水池中打开阀门进行排水，这才避免了蒸汽爆炸的发生。尽管电站主管已经告诉工人们，他们有权不进入遭到污染的水域，但是其中一个人回答道：“我是当班人员中唯一知道阀门位置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

能够不下去？"

因此，切尔诺贝利事件说明男人不是只有破坏的习性，他们也有拯救的本能。

高危职业的双重标准

当采矿、建筑和其他高危职业出现在女权主义的出版物中时，它们都被描绘成男人权力体系的实例，被描绘成"男性俱乐部"。然而，当《Ms.》杂志提到女性采矿工时，它强调了由于采矿业的报酬最高所以女人"被迫"下矿井工作，而且这份工作是她养家糊口的唯一途径。[35]

《Ms.》从来不会承认，那些高危职业的男性俱乐部报酬很高，原因在于它们的危险性，只有男性从事这些职业，男人为了供养他们心爱的家人而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赚取额外的报酬。这份杂志不会承认，几乎没有女人为了供养丈夫而下矿井工作。或者说，如果他们提到的那个女人有丈夫的话，去矿井工作的就应该是他而不是她。这种双重标准——男人从事高危职业时就是特权而女人从事时就成了压迫——已经让两代男人感受不到应得到的感激之情。

女人得到的工作都是最差的吗?

之前我们也看到了，25种最差工作中有24种的从业者几乎全部是男性，[36]而且很多男人也从事报酬低的工作（打杂工、门卫、洗碗工、加油工等），很多报酬最低的工作中女性占据着主要角色。为什么最差的工作不是报酬最低的工作？因为很多工作之所以报酬低，是因为这些工作更安全、做起来更容易，工作时间更灵活，或者具有其他令人满意的特点，所有这些特点使得这些工作更受欢迎，因此报酬也较低。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选择了这些令人满意的选项，就应该知道这些工作的报酬较低。女性

选择工作时，至少在以下8个特征中要满足7个。或许可以称这些特征为“女性择业公式”。

女性择业公式

目前，在个别压力大、技能要求高、报酬丰厚的职业中，有15~30%是女性从业者，比如法律界和医药界。但是，女性从业者数量占90%以上的职业往往满足了以下8个条件中的7项。一旦一个职业满足了以下7个条件，那么这就是一份让人称心如意的工作——它是如此称心，合格的应聘者数量远大于雇主需要的数量，所以并不需要高薪聘请。

- 能够在一天结束之后在精神上也“结账离开”（百货公司店员 vs. 律师）
- 人身安全（接待员vs.消防员）
- 工作地点在室内（秘书vs.清洁工）
- 承担的风险低（档案管理文员 vs.风险投资人）
- 满意的或灵活的工作时间（护士vs.医生）
- 不必离开城市（公司秘书vs.公司董事）
- 培训效率高（职业保姆vs.煤矿工）
- 与他人接触而且环境舒适（餐馆招待vs.长途卡车司机）

注意，这个择业公式在90%以上从业者皆为女性的职业中适用，比如接待员、秘书、职业保姆、护士和百货商店的店员或销售员。

暴露型职业

除了暴露在死神面前，暴露在各种环境下是男性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常见风险。由于臭氧层空洞的存在，每天暴露在阳光下无异于暴露在癌症面前。现代消防员所面临的新型危险是无形的，和他们一样，建筑工人们面临的新型危险也是无形的。马路工人或者清洁工也一样，而且，不仅有紫外线照射着他们的皮肤，还有汽车尾气从他们的鼻子侵入。这些因素使得

暴露型职业也登上了高危职业的排行榜。

工作环境越是风吹日晒，从业者是男性的概率就越高：修渠，这是以前带链锁的囚犯干的活，后来有人抗议认为这是在剥削囚犯的劳动力。[37]那次抗议并没有人认为是在剥削男性的劳动力。在雨中帮顾客加油的加油工大部分是男性（但是在室内工作的收银员则有男有女）。不论是盖屋顶还是焊电焊，只要是暴露型职业，都是男性职业。

甘愿让自己暴露在死神面前，这种意愿掩藏了男性和女性在内心深处对工作的不同态度。高危职业中那种无权受到保护的感受就是一种隐喻。担忧人身安全意味着羞辱，于是那些想得到保护的人被刷了下来，被选中的则是一群保护者。相对于阻止死亡，羞辱和担忧是不足为道的。

这并不表示担忧和羞辱对个人而言是好事。相反，想要保护他人，这种态度对自身安全来说是一种灾难。正因为如此，纽约市的警察自杀身亡的数量比因公殉职的数量更多。[38]

不论是在离家不远的煤矿干活还是在"那边"修渠，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得到利用。男性出卖身体是天赐的，而舍弃这种天赐是奢侈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高危职业不成文的座右铭是"我的身体，但是我不能做主"。

简而言之，说女人被分派到最差的工作岗位是一种迷思。那些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又没有多少风险的工作自然报酬较低，执行难度不高的岗位报酬也较低——不论从业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最差的工作几乎全部都是"男性的工作"，这类工作的男性从业者更多，原因在于，平均来算的话，他们的家里有更多的肚子等着他们去填饱。

我们如何让男人成为"被随意支配的性别"？

"让男人去送死"是一种省钱的机制。安全是需要成本的。承包商以

低廉的竞价揽得标的时候，他们需要给男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完成工作。用一个安全专员的话说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一赶再赶的时候，你就会给大家施加压力，走捷径，然后就会出错，然后就会有人死掉。"[39]不是这样的，是"然后就会有男人死掉"。芸芸众生中，有多少人在这样的办公大楼里——有男人为了建造它丧命或断肢——舒适地工作？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就是严格执行安全标准。为什么要强调执行？因为安全标准是对的，但执行力不够。对那些不想因支付安全成本而加重负担——这样会影响其竞争力——的公司，政府必须强制其执行安全标准。还有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式是我们正在做的：我们允许那些以男人的生命为代价来走捷径的公司侥幸逃脱。

政府：工作场所的替身丈夫

我刚看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保护美国西北部地区的猫头鹰的。我很想知道参议院有多少人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在这件事上。美国参议院没有一个人常年专职研究工人的安全问题。我绝对乐意回到肯萨斯的家里，把所有那些讨厌的猫头鹰都打包寄给华盛顿和俄勒冈的那些人。

——美国工作场所人身安全研究所Joseph Kinney

政府一证实男性因工死亡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女性之后，就缩减了保护男性的项目资金而增加了保护女性的项目资金。

美国政府缩减了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41]（OSHA）的预算，在男性和女性身上使用相同的安全标准。于是，本来可以帮助更多男人的预算转而用于创立专为保护职业女性的特别项目。政府通过了《怀孕歧视法案》，[42]于是，虽然怀孕并非是因为工作原因而做出的选择，然而怀孕后的女性有资格与因工致残的残疾人享有同样的补偿。事实上还不止如此……

有部分女性提出，暴露在视频显示器前会导致自然流产，她们马上就得到了政府的回应：政府拨款对4000多名女性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使用视频显示器的女性自然流产率低于不使用此类设备的女性。[43]还有部分女性指出，她们受到了性骚扰，于是政府加大了对男性的起诉力度，来对女性进行极端的保护。与此同时，建筑工地的脚手架摇摇晃晃，煤矿矿井的顶板也摇摇欲坠，却没有人去检查，没有人保护这些男性。简单地说，男人没有得到避免英年早逝的保护，而女人还未遭到明显的骚扰，就得到了保护。

过度保护女性导致对女性的歧视

除非确定从事某一职业不会威胁到人身安全，否则选择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不会太多。所以说，除非对男性的职业安全给予足够的关注，将高危职业变成安全职业，否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歧视女性。但是在我们过度保护女性，而且只有女性的时候，实际上这也导致了对女性的歧视。

法律越是过度保护女性，我也越来越多地听到雇主私下表示害怕聘用女性。如果一家大型企业中用人指标中反对性别歧视，他们会发现自己雇用的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而不会选择雇用女人，因为她可能会提起性骚扰诉讼，而状告的对象可能是批评她或解雇她的任何人。

雇主害怕企业的名誉遭到损害，害怕聘请律师，害怕解雇她需要支付10万美金的赔偿，害怕女人因为暴露在显示器前提起诉讼，害怕因她怀孕而无法继续工作但申请残障保险金……而企业的男性主管一方面害怕批评女性，另外一方面又害怕跟女性开玩笑……此时，雇主就开始在潜意识里歧视这个造成这些负担的性别，或开始裁员而后聘请自由职业者，或早早退休，或申请破产。

美国法律规定企业实行男女同酬，但是双方受到的保护不同，所以美国的企业面临着一种新的美国式困境。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是出于雇主自

身利益的考虑，但女性获得相同报酬的同时，提出性骚扰诉讼的概率比男性要高上几百倍，这对雇主并无益处。过度保护女性而对男性保护不足，很快会使女性在应聘工作时遭受区别对待。

过度保护女性而对男性保护不足，源于我们使男性在心理上准备好一辈子保护他人。这种做法形成了一种男性可以被随意支配的氛围，也让男人和三件事情（三W）联系在一起：女人、工作、战争……

注释：

1. 我觉得这个出处应该就是鄙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开始在这个领域演讲时，常常说这句话。虽然我查过一些相关的书籍而且认定是我自己说的这句话，但是我不会拿生命作担保！）

2. Les Krantz，《职业评等年鉴》。（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9）

3. 美国劳工统计局劳工部（USBLS），《就业与收入，1988年年平均值》1989年1月刊第187页表22“各职业、性别、种族和西班牙裔公民的就业率”。

4. 这个数据对比是根据越战期间死亡人数58000人——或者说每年死亡7250个男人——对比工作场合每年死亡6600个男人得来的。来源于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1989年的数据（最新数据截止1992年）。

5. 这个数据是关于工伤死亡的，不包括与工作有关或无关的疾病死亡人数。数据来源：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西弗吉尼亚摩根敦）在线数据库“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基本信息”，数据截至1992年7月。

6. 美国工人的致死率是每100万个工时0.105个人，日本的数据为0.030个人。见瑞士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1988年劳动统计年册》。

7. 据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估算，美国每年的因工死亡人数达到7000~11000人。如果美国的因工致死率和日本一样，每年因工死亡的人数只有2565人。因工死亡的人中有94%是男人，所以每年有约6049个男人和386个女人本可以活下来。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的数据来自《1992年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基本信息》第6页表1~8“如果美国与其他工业国家的职业事故发生率相同，有多少人能活下来”。（Chicago：National Safe Workplace Institute，1992）

8. 根据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OSHA）的数据，各州和联邦政府共有2000名职业安全检查员；根据华盛顿的野生动物管理研究所的数据，各州和联邦政府共有12000名鱼类和野生动物检查员。数据来源同上，第17页表3~5。

仅联邦政府而言，600万个工作场所OSHA只安排了1100位检查员。见美国广播公司的《美国职业：危险岗位》（*Working in America: Hazardous Duty*），播出时间为1989年4月20日，策划人：A.V. Westin。

9. 见Westin同上作品。

10. 同上。

11. USBLS，《就业与收入：1991年1月》第185页表22。在每个危险职业中，较为安全、非生产性质的岗位上女性所占比例较高。有时媒体报道中显示，所有行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较高，但是他们的数据中往往包含了秘书和行政人员，所以数据会有所不同。

12. 在采矿业中，例如有11.6%的女性处于较为安全的非生产型岗位（秘书、行政人员），只有2.8%的女性在不太安全的生产型岗位（比如采矿）。见1992年1月《煤》杂志（*Coal Chronicle*）第22页。

13. 清洁工数据来自1989年4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的H.G. Rez《危险藏匿于清洁工的日常工作中》（"Hidden Dangers Are a Daily Part of Job for Trash Collectors"）。

14. 同上。

15. USBLS，《就业与收入》第187页表22"各职业、性别、种族和西班牙裔公民的就业率"。

16. Ann Landers，《洛杉矶时报》，1989年5月5日。

17. 见Bob Sipchen，《危险岗位》（"Hazardous Duty"），刊登于1989年3月7日的《洛杉矶时报》。

18. 同上。

19. 1987年5月至1988年5月。相关事件和数据见1988年11月24日《圣地亚哥联合报》（*San Diego Union*）关于莫雷尔公司的职业安全与健康诉讼案报道。又见美国卫生部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危险评估与技术援助》（*Hazard Evaluation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又见《约翰·莫雷尔公司评估》（*Evaluation of John Morrell and Co.*）。

20. 在一次访谈中，NIOSH的Dan Haybes表示有近90%的高危职业从业者是男性。在近期多以女性的职业危害为对象的研究中，如NIOSH1991年对商店和超市的研究中（超市中女性数量较多），没有职业被划分为"高危职业"。

21. 1991年，有1400人因工身亡，比例为44：100000。此数据未公布，数据来自1992年6月26日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局的Alan Hoskin的访谈。

22. Jill A.Swanson，《在农活中意外受伤的儿童》（"Accidental Farm Injuries

in Children”），《美国儿童疾病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Diseases of Children*）1987年11月刊第141期第1277页。

23. USBLS，《就业与收入，1988年年平均值》，同前文。

24. Maria Cone 和 Chuck Cook，《致命烟雾：一份特殊报告》（“Deadly Smoke：A Special Report”），《橘郡纪事报》（*Orange Country Register*），1983年11月刊。

25. 美国国家健康统计局，《洛杉矶、多伦多与波士顿消防员死亡率与事故率研究》（*Mortality and Incidence Studies of Firefighters in Los Angeles, Toronto, and Boston*），1983年。有意思的是，虽然问题有点严重，但是近期没有相关研究（截止1992年）。

26. 国际消防战斗员协会（IAFF）1987年的死亡与受伤率调查。（Washington D.C.：AIFF，1987）

27. 国际消防战斗员协会（IAFF）1990年的死亡与受伤率调查。（Wash-ington D.C.：AIFF，1990）

28. 同上。

29. 1992年2月11日，美国消防管理局官员John Oddison在访谈中称有9.64万名志愿消防员和2.4万名职业消防员。

30. 我的朋友Steve Collins博士是一位地质学家，所有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煤和石油的例子都来自他的数据。

31. 来自1992年6月30日美国华盛顿缉毒局公众信息部Con Dougherty的访谈。自1921年以来有39位探员被杀害，均为男性。受伤数据只更新到1989年。1985年至1989年间男女在过去5年里的受伤分布情况如下：

年份	男人	女人
1985	145	1
1986	184	0
1987	435	8
1988	414	14
1989	193	7

32. Paul Dean，《生与死的黑暗面》（“A Shadow World of Life and Death”），《洛杉矶时报》1988年2月23日。

33. 同上。

34. 同上。

35. 见Jacqueline Bernard，《（女）矿工会议》[（*A Meeting of the*（*Women*）

Miners］，《Ms.》1979年11月刊第33页。又见《Ms.》1981年6月第55页。

36. 见《职业评等年鉴》。

37. 1932年Paul Muni拍摄的电影《逃亡》（*I'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提到了其中一些抗议。

38. 1991年11月25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五花八门》（"All Things Considered"）节目。

39. 1987年《洛基山新闻报》引用了OSHA地方主任Gordon Terroux的话。

40. Bob Baker，《因工身亡——关乎生死的工作》（*Death on the Job—a Lifework*），《洛杉矶时报》1989年4月28日。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位于芝加哥。

41. Baker上述作品。Gerard Scannell接手OSHA之后才开始重视职业安全问题，原本有一些条文包含虽然违规但不会罚款的内容，但自此之后OSHA开始对这些行为进行罚款并对一些机构（如建筑办公室）进行改革。

42.Tarmar Lewin，《怀孕和职业风险引出"模糊的"法律界限》（"Pregnancy and Work Risks Posing 'Fuzzy' Legal Arena"），《纽约时报》1988年8月2日。

43. T.M.Schnorr，B.A. Grajewski，R.W.Nornung，M.J.Thun，G.M.Egeland，W.E. Murray，D.L. Conover 和 W.E. Halperin，《视频播放终端与自然流产风险》（"Video Display Terminals and the Rick of Spontaneous Abortion"），《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91年3月14日第727~733页。

第五章

战争英雄还是战争奴隶?

每一个社会都是建立在男人的死亡之上的。

——Oliver Wendell Holmes

词条：美国男人中几乎每3个男人中就有1个退伍军人。[1]

词条：在一战期间，一场战争（索姆河战役）就有上百万男兵死伤。[2]

要想了解男人就得了解男人与三W（女人、工作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只有年满18岁的男孩才被要求登记服兵役，以备将来的战争之需。在和平时期，男女都可以参军，但是只有男性军人被要求在战争时期参战。倘若有大规模的战争爆发，那么只有我们的儿子才需要在接到通知48小时之内到训练营报到。在男人得到投票权之前，他们有义务去保护这项权利；女人得到投票权之后，却没有义务保护这项权利。

1. 双重标准的心理学和政治学

心理上的征召

在依法应征之前，男孩已经在心灵中被征召了，这一心理征召在应征之后会继续存在。我们为男婴进行无麻醉割礼却不为女婴举行割礼；通常男孩比女孩哭更久我们才会抱起他[3]（借此暗示儿子们：抱怨是解决不了问

亲爱的爸爸：

你曾告诉我说，真正的勇气是克服恐惧、迎难而上，你还记得吗？

今天早上我想了很多。爸爸，你知道的，这里是军队，你教给我的一切都有其意义所在。

军队可以教会你很多东西，因为军队给你的教育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

在军队，你将学习到有价值的技能，你将学习如何进行团队协作。

同时你也会学到自信、果断、自律，培养自己的个性。

另外，你甚至有机会通过《蒙哥马利退伍军人权利法》和陆军学院基金组织学到更多东西。如果你能达到相应的条件和要求，你可以赚到25200美金用来支付你的大学学费。欲了解详情，请拨打1-800-USA-ARMY。

有了大学毕业证和参军的经历，你就有了其他大部分年轻人没有的东西：生活上的优势。

军队，成就你之大器

题的）；男孩们参与暴力型运动，而女孩则不会……就是在这些时刻，我们开始无意识地教男孩们学会忍受痛苦。综合起来，这些应当被称为心理征召。它自孩童时代开始，并贯穿整个成人时期。

候选资格的双重标准

当年撒切尔夫人强硬捍卫主权，并派出数百个男人——但没派出一个女人——在马岛战争中浴血奋战，这时她得到了男男女女的热烈拥护。在即将开始的选举中，撒切尔夫人原本被认为会惨败，因这一决定她扭转了局面，人们预测她会迎来选举大胜。新闻中没有出现“让男人送死的女人仍未下台”或者“强硬捍卫主权却以自己的性别为由逃避参战，撒切尔夫人被称为‘伪君子’”这样的大字标题。撒切尔夫人派男人为她尽杀戮之责，她没有被扣上懦夫的帽子，却被谓以“强者”之名。她服务于国家的资格也未被削弱，反而得以增强。

相反，Dan Quayle[1]加入了国民警卫队，只是因为没参加越战，结果沦为笑柄；克林顿反对越南战争，认为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结果他在大选中票数至少下滑了20%。如果没有失去这20%的选票，他可以在预选中打败任何对手。我们可以说Quayle和克林顿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对，可是为什么从未有人问起Geraldine Ferraro[2]的参战记录，然后批评她逃避征兵的方式？她是如何逃过征兵的呢？通过性别主义利用女性的特权。

一个男人，曾加入后备役军官训练团，后来他受到了良心的折磨；他得到过罗氏奖学金，但是在大众眼里他是一个逃兵。一个女人，利用传统性别主义的优势逃过征兵，她是个性别歧视者，但是在大众眼里她

① Dan Quayle，美国第44届副总统（布什时期）。——编者注

② Geraldine Ferraro：美国国会议员，素有国会女王之称，是第一位获得美国两大党提名角逐副总统的女性。——编者注

是一位先锋人物。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谴责男性政治家挑起战争，然后又谴责他们不愿参与战争？

纵观世界，我们最基本的法则是：生为男儿，只有为国服务（比如作为总统或副总统）的意愿是不够的。男人，只有男人，必须要有为国捐躯的意愿，除非可以以其他方式服务于国家。

如上所述，英迪拉·甘地、Golda Meir和撒切尔夫人将男人送赴疆场的概率和男性领导人并无不同，所以说，即使领导人是女人，战场上牺牲的仍然是男人。男女之间的平等在于上层，而不在下层。

战争不会因为领导人是女性而休止。如果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死亡的男性数量远远大于女性，因而违反国际法，只征召黑人男性、犹太人，或只征召女性、同性恋，那么战争才会休止。在全世界范围内，男性的生命不再比女性更容易被随意支配的时候，战争才会休止。

为被支配的性别而战VS.为被保护的性别而战

……我觉得女性的生命太宝贵了，不应该用于参战。

——美国前国防部部长（里根时期）Caspar Weinberger[4]

让女人参战，令她们被捕或被枪杀是不恰当的，这就好像不能随意按导弹发射井里的按钮一样。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Sandra Day O'Connor[5]

一直都是男人战死沙场。但她是我的女儿。

——美国空军一级军士长Frank Mitchell[6]

如果海上发生了火灾，你必须马上关上船舱舱门才能挽救那艘船，如果里面是个男人的话你可能做得到。但如果里面是个女人的话……

——美国海军军士长Larry Kenavan[7]

军队的战斗阵地现在分为较为危险的前线和危险性较低的后方。[8]在战

争时期，只强制男人上前线冲锋陷阵，限制女性自愿进入战场前线，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女性的歧视。但男性必须上前线，这也是对男性的歧视。

军队常被称为穷人的大学，这些危险的岗位条件相当艰苦。《纽约时报》刊登过几则“招募”广告，军队欲从平民中招募加农炮手、装甲坦克手和步兵。贫困的男人希望得到这一类的职业培训：计算机专业、办公室工作、食品加工、教育、护理、社会服务、飞行控制或者喷气式飞机技师。当男人被强制调遣到危险的作战岗位时，也失去了良机，不能为未来的丰衣足食筹划。

此外，加农炮手和步兵的岗位强化了杀人心态，这是他们适应平民生活时遇到的最大的心理障碍和最大的难题。“对女人的限制”强化了男人在军队生活中的被随意支配性，也强化了男人在平民生活中的被随意支配性。

作战：优选女人与无选男人

我预言会有越来越多的女人被允许自愿参战。然而，当战争真正爆发时，女人的选择更多，男人却必须参战，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优选女人”（Pro-Choice Woman）和“无选男人”（No-Choice Man）的模式。这就意味着在战争时期：

女军人有以下选项可供选择：

1. 参战

2. 不参战

供男军人选择的选项“稍有不同”：

1. 参战

2. 参战

女人在战争中选择性的增加被视为男女平等权方面的进步，但实际上并不是。男女平等的真正进步应该是对男女军人采用相同的参战要求。平

等意味着平等地拥有选择权，以及平等地承担责任。

如何在不损害军事实力的情况下实现平等

如果在作战训练中，对男性和女性军人执行平等的训练标准，那么这种标准必须降低；如果不变，那么大概有80%的女性无法达到标准。这正是军队担心的问题。幸好还有办法在战争中保证人人机会平等，同时还能保持战斗力。

作战激励计划：供与求

这个计划是怎样的呢？对难以征召到合适人选的岗位加薪，对容易征召到合适人选的岗位减薪。例如，如果鲜有新兵愿意当步兵，那么增加这个岗位的工资和福利，直到招满合格的新兵；如果大家都想去做飞行员而且合格人数众多，那么飞行员的工资就要降低。结果就是愿意追求真正的男女平等——应征最没人愿意去的岗位——的那部分女性会得到较高的工资。此时男女双方都没有受到歧视，也没有因为谁有任何特殊性导致标准降低。因此，女性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因为这个结果是她们“挣”来的，而不会招人愤恨——因为她们占据着最安全、最令人向往的作战岗位（飞行员），却拿着相同水平的薪酬。

波斯湾战争时期男女军人的差异

在美国入侵巴拿马期间，《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第一个带领士兵参战的女人。[9]虽然报道称，这位女军人以为自己是去无人看守的养狗场，[10]但是女议员Schroeder利用这次事件得出了3个结论，这些结论在波斯湾战争期间被强化：

1. 女人和男人承担着同等风险；

2. 女人不得参战是为了防止女人获得平等的机会晋升军官；

3. 女人不得参战是为了防止女人享有同等薪酬。

但事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 同等风险。如果女人承担了同等的风险，那么巴拿马战争期间就不会出现23个男人和0个女人阵亡（女人受伤人数也为0）这种结果；[11]波斯湾演习和战争期间造成的死亡人数也不会是375个男人和15个女人。[12]将两次战争加起来，男女死亡比例是27：1；但是27个男人中间只有9名军人，所以说任何参战的男性所面临的死亡风险都是参战女性的3倍。

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男人身上——死亡的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比例不到4%，而且参战后死亡风险只有1/4，那么女议员Schroeder还会不会说“男人承担着同等的风险”？如果存在男女平等，就不会刻意让男人受伤，而女人只是碰巧才遭受伤害。

2. 同等的晋升机会。在军队中，女兵占总人数的11.7%，而女性军官的比例是12%。[14]女性在军队中晋升的概率更高而服役的时间却更少（1980年西点军校有了第一位女毕业生）。

3. 同酬。在波斯湾战争期间，不论男兵还是女兵，他们的薪饷都是每个月110美元的战地津贴。[15]他们承担的风险并不平等，但是得到的薪饷是相同的。

简单地说，男性的晋升机会较少，因此，他们服役时间更长，得到的报酬却较少，而面临的死亡风险是女性的3倍，然而我们看到的新闻都在说歧视女性，而不是歧视男性。男人承担了30%的家务，我们却批评男人没有承担家务；参战的女人拿着和参战的男人完全相同的战地津贴，承担的风险只有男人的25%，我们却称她为战士并赞扬她“共担危险”。

我的身体是我的事？

词条：如果胎儿有“生存权”，但是18年之后有“牺牲的义务”，这会是

哪一个性别呢？

让我们所有年满18岁的儿子登记征兵，这样在国家需要更多的士兵时就能派上用场，这就好比让我们所有年满18岁的女儿登记备孕，在国家需要更多的孩子时她们就可以生孩子。两者都是性别歧视。

目前，美国的数据库里有1500万达到征兵条件的男性。[16]这些男性真正被征召的概率有多大呢？我们只知道第一封应征命令会在24~72小时之内出现在一些人的信箱里。[17]你儿子的命运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变。美国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单位要在4个星期之内招募10万新男兵。[18]各单位在每周末进行训练，练习建立指挥部和野外办事处，并到征兵局进行复习进修。倘若战争爆发，他们随时待命。[1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兵役登记局官方因“机会平等”的兵役登记制度而引以为傲，自以为不再对阶级、种族、学生身份或就业情况存有偏见。只让男性冒着潜在的死亡危险登记在册，而这件事可以被称为机会平等，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

兵役登记与高危职业带来的心理效应相似。对女人来说，“我的身体，我们做主”；对男人来说，“我的身体，事关政府”。女人“有权选择”；被应征入伍者可以选择“被地雷炸、被炮轰、被枪打、被手榴弹击中、被炸飞……”你可能会粉身碎骨，碎到无法再组成完整的一个人；你可能出去前肺还好好的，回来后只听到自己呼吸带着气泡的声音；你可能会死于疟疾晚期，此时疟疾已经造成你轻微的耳鸣。[20]

“G.I.”（government issue）仍然意味着“军用品”；有一天，G.I.将成为“M.I.”（men's issue）——男人的问题。

他的军队VS.她的军队

作战训练会撕下你原有的自我意象，这样你才能重塑自我，适应军队。

——越战退伍军人Bruce Guckin[21]

在军队，每个男人在接到命令后就要奔赴疆场，而女人可以选择参与战斗或者在战争中得到保护，于是我们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作战训练要求男人看轻自己的生命，而技术培训可以在平民生活中使用，是与珍视生命的理念兼容的。

骚扰和受辱是为看轻生命做准备——这就是为什么男人要相互骚扰、相互凌辱：他们要磨平对方的个性，只有标准化的配件才能让战争机器实现其最佳性能。因此骚扰和凌辱是“男人的军队”中作战训练的先决条件，但是在“女人的军队”中，骚扰和凌辱会遭到抗议——这与珍视生命的理念有所冲突。

如果男人的军队和女人的军队分开，这种差异就不是太大的问题。然而，如果男人被告知女人与他们是平等的，但他们用同样的方式骚扰和欺凌女人时，那么他们的前程将毁于一旦（家庭也将四分五裂），这只能让男人更坚信女人想“分得一杯羹”。

海军妊娠综合征

军队里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连讨论也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是……在成功逃避沙漠风暴行动这一任务之后，有很大一部分女兵选择性地堕胎……利用胎儿来逃避自己的工作职责，而后杀掉它，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科威特战争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医[22]

“重视自我”这种心态同样会滋生“海军妊娠综合征”：女人从技术培训中受益之后，就在船被调遣出发之前，她怀孕了，顺理成章可以上岸休假而不用被指派任务；或者船刚出发，她马上就怀孕了，因而可以不用履行工作职责，而其他船员不得不接手她的工作。这都是“重视自我”的做法，但是在军队中——如果在阿克狄亚号（USS Acadia）这样的船上，船被分派任务之前，船上有40%的女人怀孕了，会怎么样[23]——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就是置男人的生命于不顾。为什么呢？

海军进行的是团队训练。团队中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训练，在各种情境下与其他人相互配合，一个人是生是死就在一瞬间。如果团队中突然有人不在其位，这个空缺是无法马上填补的，因为他们在团队中的价值，恰恰在于他们与特定个人的相互配合。实际上，哪怕只有一个女人离开了这个团队，整个“团队”也已经不存在了。后果会怎样呢？想象一下，伊拉克的两枚导弹击中了斯塔克号护卫舰，造成了一个15英尺（约4.5米）的大洞，而“Conklin”中尉[①]怀孕了……

导弹的攻击导致护卫舰上燃起大火并迅速蔓延，护卫舰随时可能被炸毁，舰上的200个男人有可能被炸得粉碎。[24]27岁的Conkcin中尉（真人真事）被严重烧伤，双脚、双手、双臂都受伤了。但是他明白，只要他从燃烧的废墟中爬到船员室，关上消防管道阀门就有可能避免舰体爆炸。

当时，通往船员室的路一片漆黑，温度达到了200℃左右（纸在232℃时会燃烧）。Conklin中尉爬过去了，唯一保护他的是一件浸过盐水的T恤；他闭上眼睛前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眼睛不会灼伤，虽然眼睑会被灼伤；他顺着管道系统摸索探路，每次他触摸到滚烫的管道，手指和手掌上的皮肤就会被烫伤、剥落——他描述说，当时他就像走在一个滚烫的比萨炉里，把手放在火红的烤盘上；他坚持着，一直到关上消防管道阀门才停下来，然而他又发现护卫舰面临沉没的危险，而且爆炸的危险也尚未消除，于是他又继续踏上了护舰之旅。

就在Conkcin做着这些的时候，Seaman Mark Caouette的一条腿被炸掉了，流血不止，同船的船员努力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他拒绝了。他要去关另外一个消防管道阀门。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被烧焦，就趴在消防管道阀门上。与此同时，电子设备工程师Wayne Weaver将6~12个人拖到了安全地带。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可以看到他还抱着另外一个人的尸体企

① 此处假设 Conklin 中尉是女性。——编者注

图救他。

他们的年龄都在19~36岁之间，37个人，挽救了163个男人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一个团队就意味着彼此信任，能够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他人。而并不是从训练中得到好处之后，在被分派任务之前设法到陆上休假。

在过去的20年里，男人对女人上船工作，或者成为志愿消防员相当戒备，这被看成一种对女性的歧视。一位男军官是这么跟我解释的："我们不会等到紧急情况出现了才去发现谁会舍己救人，谁会落荒而逃。有新队员加入时，我们会设计一些情境，仿佛有人有生命危险。我们想要看清楚新人是想救他人还是只顾他自己。但是我们这样对待女人时，她们都会说这是'歧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女人。不过，如果一个女人涂了指甲油的话……我尚未看到涂了指甲油的女人不想自己获救。"

"海军妊娠综合征"只是问题的表象，这个问题在所有军种中——从美国通信兵部队[25]到美国陆军[26]——都存在。研究发现，男性感到女性常常靠性方面的"好处"来获得较为容易的任务，在不应该获得升迁时也能升迁。让他们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女人得到了相同的报酬。

研究发现，只有21%的女军人看重自己的职业，而男性军人则有51%，[27]因此人们质疑女性是否认真对待从军这件事。男人认为，女性军人使用护肤品、扎头发、化妆，甚至在模拟作战中也化妆，这些行为都反映出她们并没有把参军作战太当回事。[28]

军官学校并没有对男女学生采用相同的标准。比如在西点军校，检阅女性病号的次数是男性的4倍。[29]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必须免除女兵的步兵野外训练和所有的跨越障碍训练。[30]结果呢？在海湾战争中，女兵无法更换卡车轮胎，无法将车辆从沙地中推出来，无法移动沉重的燃料罐，无法挪动受伤的士兵，常常期望男人能施以援手。[31]更重要的是，尽管如此，倘若有男性军人抗议这种歧视现象的话，他的职业生涯会受到严重

损害。[32]讽刺的是，男人对这种歧视的抱怨反倒让他们更容易被指责为他在歧视他人。

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一支是一有需要就投入战斗的“他的军队”心态，另一支是渴望作战的“她的军队”；男人的军队是看轻自己生命价值的军队，女人的军队是珍视自己生命价值的军队。这更让人感到女人夸大了她们对平等的要求。这种现象将军队一分为二。

杀人或被杀

如果你儿子年满18岁时拒绝登记服兵役，那么他就不能从事从美国邮局到FBI的任何联邦政府的工作。[33]他将面临高达25万美元的罚款和5年的牢狱之灾。[34]一旦进了监狱，你儿子鲜嫩迷人的肉体加上不愿参战的坏名声，将成为同性强奸的最佳人选，这也意味着他可能会染上艾滋病。简单地说就是他可能被杀死。为什么呢？因为他贪生怕死。

只要求男性登记服兵役和参战相当于可以对男人进行合法强奸吗？没错。但是，我们在把对男人的大屠杀——类似美国内战电影《光荣战役》（*Glorg*）中的情形——与合法强奸相比时禁不住会认为有点夸大其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男人的死称为“光荣”了。

多选女人和无选男人

在很多州，年满18岁但未进行兵役登记的男生不得进入州立学校学习。[35]想进入私立学校也得不到贷款。

未登记兵役的女人可以：

1. 到州立学校读书；

2. 通过联邦政府的补贴进入私立学校读书；

3. 结婚、工作；单身、工作；生儿育女……

而那些未登记兵役的男人可以：

1. 蹲大牢

2. 蹲大牢

3. 蹲大牢

我们对女人实行不同的标准，可以让女人免于面对道德困境，让她们觉得女人比男人更清白无辜，更有道德。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更显而易见，没有人要求女人离开正常的工作岗位，花两年时间去制造武器装备。

简言之，义务兵役（Selective Service）的问题就在于它是选择性（selective）的。

两大违宪法规

在美国，为什么只要求男性登记服兵役和参战这项法规是违宪的？因为它违反了美国人最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存权。

因为性别而剥夺我们父辈和子辈的生存权，这是对宪法十四修正案承诺的平权保护最严重的违背。这项条款几乎是所有公民权利法案的基础。[36]

一个国家的男性沙文主义越强烈，就越保护女性

一个国家的沙文主义越强烈，它就越会保护女性。因而给女性施加的限制就越多。意大利和西班牙禁止女性参军，将女人完全保护起来免于服兵役。丹麦给了女性更多的选择（可以参军也可以参战），但是仍然保护女性免于兵役。[37]就像美国，给了女性更多选择但她们不必承担义务。所以说，这些国家既是男性沙文主义的，也是女性沙文主义的，都尚未解放。一个国家的解放意味着它将男人从保护女人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将女人社会化到能够平等地保护男人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解放程度。

以色列和苏联军队中的男女军人平等吗？

词条：以色列国防军中的女子兵团被称为“CHEN”，在希伯来语中是

“诱惑者”的意思。[38]

我们常认为，在苏联和以色列军队中，男兵和女兵承担着相同的义务。非也。苏联军队中女性比例不到1%，没有女性上战场。[39]在以色列，男兵女兵都要应征入伍，但是只要求男性参与战斗任务。对女性来说，参与战斗任务只是一个选项，时至今天这一选项几乎无人问津。

和美国女性一样，苏联和以色列的女性可以选择那些服完兵役后能获得工作机会的岗位：机师、厨师、教师和技师。[40]然后，苏联和以色列女人用纳税人的钱接受岗位培训，这些培训对她们回归平民生活很有帮助，但苏联和以色列的男人接受的培训却用来杀人或被杀。大难不死的男人回归平民生活后，破坏性训练——而不是建设性训练——的阴影依然存在。于是我们责备男人具有破坏性。

不过，以色列的男性和女性军人服役期限不是一样的吗？理论上基本是这样的：以色列男性服役3年，以色列女性服役2年。[41]然而，实际上以色列男性平均服役期限是13年，到54岁方才退役；而女性服役期不到2年。[42]为什么？首先是因为只有50%的女性被征召（男性则是90%）。[43]其次，在以色列，不能强制已经做了母亲的女性服役超过2年；而父亲们则不然。[44]第三，即使在和平时期，以色列仍然规定男人——不论是否已做了父亲——在服役3年之后，每年要服役2个月，直到54岁。[45]对于已成为母亲的女人则没有要求，而没有子女的女性只要随时待命即可。[46]第四，在战争时期，只有男人需要服役直到他不被需要为止。

2. 终极“玻璃地下室”

“精英阶级”还是“将死阶级”

我的策略？先生，我是军人。我没有策略。

——法国上将Henri Giraud

我们认为军队高层是男权的堡垒。美国和法国一样，发动战争的策略是由立法机构决定的，何时作战何时谈判，其策略是由总统决定的，而立法机构和总统都是由选民决定的。上将只是受雇于人的司机而已，他的工作就是我们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个体士兵接受的训练不是支配而是服从。只有证明了自己有服从命令的能力之后，他才能下达命令。实际上，在训练他服从时，他就接受了被支配能力的培训。他的被支配能力产生于服从能力。

我们认为日本男性是支配型男性的典范。然而在二战期间，日本男性接受的是武士道训练。武士道即服从之道：日本武士甘愿为了天皇和先祖而死；他们接受的训练告诉他们非赢即死，别无选择。日本神风突击队队员不过是武士道的自然产物。武士道就是奴隶之道。

我们常常大谈男人的争强好胜，但对男人的无私行为视而不见。在军队中，一个男人为了国家以及他并不认识的人民的自由牺牲自己。这是非常无私的。但是军队也是个争强好胜的地方。男人或争着服从，或抢着无私。在男人的生命中，竞争通向的往往是无私。

“杀死男孩”基金会

在两伊战争中，伊朗使用“人海战术”，将年龄低至6岁的幼童送上前线，后来伊拉克也这么做。这些幼童在战场上投掷手榴弹，也使用枪支，最终，伊拉克被迫还击、屠杀幼童。然而，很多伊拉克士兵表示自己对杀死6~8岁幼童的那一刻“无法释怀”。在数年里，这些士兵遭受了精神崩溃、噩梦频频、冷汗浃背的痛苦，而且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心头。[48]当然送伊朗幼童上战场的目的——损耗伊拉克军队的士气——达到了。

在伊朗，这种利用幼童的方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据报道称，倘若有一个城市遭到攻击，家家户户都会鼓励自己年幼的儿子上战场，宁愿战死

后升天堂也不愿在空袭中白白死去。他们用天堂做“贿赂”，于是幼童们纷纷“自愿”上战场。这种孩子过早社会化的结果是，出现被人憎恶的萨达姆·侯赛因们和被保护的女人们。

男孩们买战争的账不仅因为受到了升天堂的诱惑，也因为他们忽略了战争如同地狱般可怕的那一面。比如，一位苏联士兵在阿富汗，将一位婴儿从他死去的母亲的怀中抱出，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在他怀里消逝……又或者，另外一个苏联士兵看见一位阿富汗的叛军切开他同伴的腰部，将皮肤掀起来盖到他的头上，像一件背心似的……没有人提醒他们这些记忆是不会消逝的。[49]

在我们开始更在意人们的死亡时，我们应该提醒他们，而不是收买他们。我们在香烟广告上打上警示语，但征兵广告上却没有。对于那些幼童们来说，如果我们在70年代晚期纳了税，意味着我们购买了军火，这些军火是卖给伊朗的；人海战术的出现也有我们的责任；“杀死男孩”基金会的出现也有我们的责任。

男青年是如何学会面对危险的?

在下面的图片中，一排中国男青年头顶砖块，一个人抡起大锤砸了过去。他们在学习如何不怕死。想象一下《时代》杂志上如果刊登女孩子们头顶砖块，等待被大锤砸，他们会不提到性别歧视吗?

实际上这种头顶开砖的训练中包含两个花招。首先，砖块会承受大锤相当一部分的击打力。[50]其次，从此这些人会以为头顶的危险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恐怖，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这是军队让男人降低恐惧感的方式之一，向男人“科学地证明”连“胆小鬼”也能经受得起大锤的打击。

3. 让男人被随意支配的心理

词条：美国国防部花了200万美元，让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研究如何让脑部

受损的士兵重返战场（而不是帮助他们回归平民生活）。美国医师医药责任协会抗议此举，但是等一下……他们并非抗议让脑部受损的男人重返战场，而是抗议为了研究如何让这些男人得到充分利用，而对猫造成了脑损伤。标题如下："医生强烈谴责在研究项目中对猫进行枪击"。[51]

Fig. 11.1
Marine recruits learning to live once-virgin urges to path.

52

我们为什么对男人的生命如此漠不关心?

我们看到，在历史上，男人牺牲性命换来了我们的生存。所以社会无意识地教导大众不要太在意男人的生命。《纽约时报》1991年3月5日一条新闻的标题是："巴格达释放了10人，其中有6名美国人，包括1名女性"。它无意识地表明它更在意女性的生存。

如果我们不在乎男人的生命，为什么已婚已育的男人就能延期应征呢？在男人能够帮助女人和孩子活下来时，我们就会在意男人的生命。

无辜的女人，有罪的男人

不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被动地接受了类似"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这样的措辞。当外国人质被扣押而只有女人和儿童被释放时，没有人抗议这种性别歧视的行为。《洛杉矶时报》一则新闻的标题是："侯赛因声称外国妇女与儿童可离开伊拉克"。

想象一下，如果法律规定我们的女儿要冒着被子弹穿头的危险进入丛林，会是什么情形。如果你看到新闻报道沉痛地表示"无辜的男人和儿童"被枪杀，你难道不想大喊："等等，我女儿也很无辜！"然后，你会知道新闻报道是在"谴责受害者"。

一个国家爆发战争时，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同样无辜、同样有罪。美国攻打伊拉克时，有76%的女人和87%的男人表示支持。[52]

谁有罪？谁引发了战争？战争是由害怕无法活下去的原始恐惧引发的。这种恐惧男女皆有。它是如此原始，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夸大他人的邪恶意图，认为他们可能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为什么？因为低估所受到的威胁，哪怕只有一次，就可能让所有人彻底毁灭；而很多次错误的高估只是让男人毁灭而已。我们对无法活下去的恐惧如此原始，扭曲了爱国主义，更推崇男人的被随意支配性。是时候停止因这种男女共有的恐惧而谴责男

人了。

在保守党和自由党都被动接受“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这类措辞时，很少有人能明白这种措辞是如何让女人固守其位的：女人越是接受这种无辜的角色，她就越需要保护者，她的无辜就越被强化，她越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更多的保护。这实际上是非常有力量的位置，但它是有代价的：她越需要保护，她就越要寻找保护她但不尊重她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为什么呢？

为什么男人爱女人胜过爱自己，却更尊重自己？

在尊重孩子们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我们是如何保护孩子的？一个人有能力保护他人才能赢得尊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应对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他在应对这些阴暗面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纯真。一个懂得保护他人的男人遇到一个单纯的女人时，他会“坠入爱河”，因为她的单纯令他联结上自己，在应付纷繁复杂的世界时丢失的那个自己。虽然看上去他爱上的是她，但实际上他爱上的是他失去的纯真。他爱那个纯真的自己，因为透过这个纯真，他可以直接看到灵魂，就像在没有起雾的平原放眼看群山一样。

一个女人越单纯，或者说越传统，她就越希望找到一个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运筹帷幄的男人。正是他应付复杂世界的能力让她保持那份单纯（保护者保护的其实是她的单纯）。但是在应付生活的阴暗面时，他远离了灵魂，于是尽管她越来越依赖他，对他的爱却越来越少。

相反，他在精神上越来越依赖她，虽然他没那么尊重她，却更爱她了。他尊重自己处理复杂事务的那部分，却厌恶自己不得不妥协的那部分。

女人被视为无辜群体时，她们受到男人近乎虔诚的爱戴。这并非巧合。宗教的吸引力正如“单纯”的女性，部分原因在于它能让我们碰触自

己更纯真的心灵——或者说灵性；它能让我们暂时从生活的错综复杂中解脱出来。

但是女人难道不会与尊重她们的男人相爱吗？我们把它叫作爱情。然而她并不是真的“坠入爱河”，她是“坠入尊重之河”。足球队服或军装能让你产生爱还是尊重，男人稍作反省，就会觉得这是不确定的。于是电影《军官与绅士》（*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中的危机出现了，当那位准飞行员决定做自己而选择放弃做飞行员时，那个“爱”他的女人突然间不爱他了。在这部电影中，令女人着迷的是那位带女人走的军官，而不是他那位反省自身、决定放弃做军官的朋友。观众无视那个看重自己内心的男人，而为那个牺牲自己的男人喝彩。这种选择取决于自省的结果。大部分男人都会做那个牺牲自己的男人。而且他们明白，要是有一部电影《退缩者与绅士》（*A Dropout and a Gentleman*），没有女人会喝彩。

只要男性杀人者—保护者的角色与其男性本身的角色是失衡的，男人将不会爱自己，女人也不会爱上男人。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男人和女人都得把对保护的需要和对保持单纯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发展出精神的整合性。精神的整合可以让我们内心平和，这样就不再依赖对现实世界的否定。

战争故事不正是男人热爱战争的证据吗？

我们认为战争故事都有吹嘘炫耀的成分，所以我们有了男人热爱战争的印象——战争是男性的“玩具”。这是黑暗的一面。光明的一面是他们的自我赞美，这是对他们当初预备好被随意支配，而后自我毁灭的一种补偿。

讲述战争故事是男性处理自我感受的一种方式。他们借此重新表达自己内心的恐惧。Bruce Gilkn从越南返回后，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老鼠偷喝我们的酒，我们醒着的时候这些老鼠根本不怕人，更别说睡

着的时候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有一次，老鼠爬过我的脸，它的尾巴在我脸上慢慢地拖动，感觉有一英里那么长。

——越战退伍军人Bruce Gilkn.[53]

Bruce喜欢老鼠爬过他的脸这个片段，这不免让人怀疑。不过，这段话是在接受心理治疗时说出来的。这就像在恋爱期间，两个人大吵了一架，结果这次吵架后来成了两个人最喜欢的片段。战争与战争故事的关系犹如《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与恋爱关系。这是我们重新表达内心恐惧的方式——将负面经验变成亲密关系的经验。这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战斗。

经历过越战和阿富汗战争后，士兵并不想听到他们的战争故事。讲出自己的战争故事可以让他们再次表达内心的恐惧并肯定自己，而实际上恐惧和自我怀疑淹没了他们。苏联士兵的去向是养老院，[54]而美国士兵的去向是毒品、监狱和自杀。

战争故事造成了两个尴尬的局面。一是战争故事对讲故事的人来说是有益的，不过对他们的儿子则不然。讲这些故事时无意中会向他们灌输一种思想，即要按照爸爸获得关注的方式来获得他人的关注，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事。二是这些故事会催眠讲故事的人，使他们忘记自己需要他人的帮助，来释放内心更深、更令人厌恶的恐惧。

如何解决呢？为所有参战或参与作战训练的人提供强制性心理咨询。要培训那些父亲们去帮助儿子（或女儿）理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目的让自己的孩子不再打仗；问问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帮助他们寻找战争以外的东西。

4. 让男人被随意支配的政治学

词条：美国《阅兵》（*Parade*）杂志宣称，1914年至1945年期间有4000万

苏联男人被杀害。[55]杂志的头版头条是《不公平待遇》（“Short End of the Stick”）。因为男人被杀？错。被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是妇女，原因是男人不在，所以只能由妇女去工厂做事，去清扫大街。

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对退伍军人的关注促使他们得到了相应的福利。但是在20世纪70~80年代，我们对退伍军人的关注少了，结果退伍军人遭到了忽视……

创伤后应急障碍后遗症

我在越南时已经死了，只是当时我不知道。

——橙剂受害者Paul Reutershan[56]

词条： 越战结束后，自杀的越战退伍军人人数比在越战中牺牲的人数还要多。[57]

词条： 据保守估计，有20%的越战退伍军人和60%的参战退伍军人有精神障碍。[58]

词条： 总统在检查中发现，有40万越战退伍军人要么在监狱服刑，要么在假释期，要么在缓刑期，要么在等待审判。[59]

词条： 单单在洛杉矶，就有大概2万名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在大街上流浪。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为他们提供的床位只有不到300张。[60]

想了解一名男性生来就要承担的心理责任，可能要先了解60%的退伍军人所患的疾病。[61]内战后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神经性循环衰弱的疾病，病人出现心悸、胸痛和眩晕症状。一战后出现的是“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62]越战后出现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什么样的?

对很多人来说，创伤后应激障碍是这样的：

我从越南回来之后没几年就开始头痛……然后没多久，有一天夜里，我妻子loretta在过道发现了我，我穿着军装手握刺刀……我又花了12年的时间才发现，我从越南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再完整。

……有时候甚至在大白天，死人的脸就会迎面而来。

成千上万的越战老兵都有我这种情况。问题是很多老兵就是说不出哪里不对。简直跟在地狱似的，我差点死了，后来才发现要想活下去，唯一办法就是说出来。[63]

往事重现是什么样的？

我在开阔的路上开车，商用飞机从头顶飞过，结果它变成了越南的F-4战机，正从跑道上起飞……我面前的山会变成要被轰炸的危险地带……这种念头不断地切换……我回家了；我在越南……不能看黑漆漆的地面上的白色虚线——那是晚上使用的曳光弹。

如果你能把上一段话以100倍的语速读上1000遍，你就知道往事重现是什么样子了。[64]

我有个朋友写道："我的前岳父轰炸过一支训练有素的纳粹军队，常常在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总是一身冷汗，持续了很多年，后来自杀了。"[65]就像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所说的："害怕杀人胜过害怕被杀，这是二战期间出现'战争疲劳症'最主要的原因。"[66]

为什么比起其他战争，越战造成的残障军人、受应激障碍困扰的老兵更多？是因为人变得更敏感了吗？不是。越战造成的残疾军人数量是二战的3倍。[67]为什么呢？很讽刺的是，越战时期的医疗疏散效率提高了，那些被炸掉腿的人最终得以保命。在二战期间，这些人可能都会死去。

所以说，和其他战争不同，越南战争的死亡率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战争伤痛。反而是那些身体与精神健康数据道出了更多的**事实**：5万人失明、6万人自杀（这是有据可循的）、不计其数的人"死于车祸"、3.3万

人瘫痪。[68]

我们已经在理论层面认识到，越战老兵遭受的真正创伤是人们对他们缺乏感激之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把这种感激之情转化成对他们的帮助：帮助他们从无家可归、失业、滥用药物、橙剂中毒、延迟性应激综合征、监禁、杀人、自杀、截肢和化学物中毒的困境中走出来。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指出，研究发现，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越战老兵数量比强奸和抢劫受害者的数量还多，[69]但是这一发现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也没有人采取什么行动。比如说，在整个纽约市只有4家社会服务机构为退伍军人服务。[70]相比之下，服务于女性的这类机构有50多家，几乎都是公共性的——要么是政府直接出资，要么是政府通过免税间接出资创建的。

为什么美国政府拒绝公开有关战俘的文件?

词条：1992年6月，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叶利钦在一次采访中承认，越南战争、二战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已被转移到苏联劳改营，有些人可能还活着。[71]

两天之内，新闻媒体出面澄清，称叶利钦这么说可能是“口误”。实际上，他讲述的内容已经形成文字被提交到美国参议院战俘及失踪人员事务委员会。[72]而且长久以来，美国政府收到了11700多份报告，这些报告称2000多名美国军人在越战期间执行任务时失踪，其中民间人士报告声称发现了约1400人。[73]在朝鲜战争期间，有8000多人在执行任务时失踪，还有559人莫名其妙地被当成了战俘。[74]美国国务卿John Foster Dulles早在1954年就发现，有大量报告提到苏联扣留了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75]

他们对此是否有所掩饰呢？是媒体在遮遮掩掩吗？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看上去确实有所掩饰，但不仅媒体在掩饰。就在几个月前，美国陆

军上校Millard A. Peck表示自己相信政府对此事并无隐瞒，之后他负责调查此事，[76]结果发现政府确实有所隐瞒。他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的官员不是去追查每一条线索，而是“挑剔数据的来源……在揭开真相方面，存在着思维定势”。[77]他心灰意冷，辞了职，抗议自己的部门被当作‘废料排放场’，所有的脏东西都被埋藏在这里，公众无法进入进行深入了解”。[78]

Peck上校清楚自己所承担的风险。他马上就申请了退伍，“以免被调配到偏远又没有什么权力的犄角旮旯里”。[79]

为什么要有所隐瞒？因为对战俘和战争中的失踪人员“结案”就可以令美国人在战后回归平静的生活。二战、朝鲜战争和越战之后，美国政府宣称所有战俘和执行任务时失踪的士兵已全部死亡。政府拒绝公开战俘和失踪士兵的有关文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做法背后的愿望，但是这一事实反映出的是，我们更愿意让自己过上平静的生活，而不是关心那些捍卫了我们的自由与和平的人的死活。

现在想想，如果失踪的士兵和战俘中有1万人是我们的母亲、女儿和姐妹，我们会不会直觉性地知道，在每一条线索被追查之前，这个国家是不可能恢复健康的？如果这个问题在二战期间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就不会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遮遮掩掩了。

我们对男性的生命如此漠不关心，伤害的不仅是男人。孩子们长大后只能靠母亲床头柜上的照片来回忆父亲，而女人也不知道，是将丈夫从心里抹去，还是应该等待下一个电话。

橙剂政治

美国在越南境内喷洒的橙剂多达1100万加仑（约5万升），橙剂是一种含有二噁英的化学落叶剂。实验室试验证实，动物受二噁英影响会出现

先天缺陷、癌症、不孕不育、流产，以及肝脏、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受损。[80]

当时美国海军上将Elmo Zumwalt决定使用橙剂。战争期间其他任何决策都不会像这一决策在这个民族的神经上割下如此深的伤痕。促使当权者做出这一决策的是男权的冷漠无情吗？让我们来看看。

Zumwalt本来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后来他被任命主管越南境内的海军力量。有几百名青年男兵被派往越南，但是越南士兵埋伏在茂密的森林中伏击了他们，他们被裹在运尸袋里送回家乡。Zumwalt认为，橙剂可以摧毁森林，减少因遭到伏击而死亡的人数。[81]此时，他还无从得知橙剂的副作用。至少在当时，Zumwalt认为这个决定能够挽救更多的性命——尽管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Zumwalt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的儿子——Elmo接触了橙剂后很快患上了癌症。后来Elmo的孩子也患有多种先天性缺陷。Elmo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他买了保险垂死挣扎了3年，因为他只有继续活3年才能让保险受益于家人。[82]然后他安排妻弟在3年后拔掉那根维持他生命的管子。他想要妻子得到保险金又不想让她遭受亲自为他拔去管子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安排了另外一个男人去承受这种巨大的痛苦。

他有没有责怪他父亲？没有。他说："因为他当时决定使用橙剂，才有成千上万人活到了今天，包括我。"[83]

提起高层军官，我们总是会想到权力，我们几乎不会想到Zumwalt们内心所受的煎熬，他们针对一项自己反对的事业做出决定，而这一决定令子孙们受伤致残。

纵观整个历史，我们一直安排男人承受着痛苦去做"牺牲一人拯救众人"的决定。向那些儿子为国捐躯的父母们解释时，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权力。但是，就像上帝要亚伯拉罕牺牲他唯一的儿子来证明他对上帝的

爱，Zumwalt也经历了同样的无能为力：牺牲儿子来证明自己是爱国的。

作为男人，不是应该有勇气大声说出不同意见吗？Elmo确实这么做了，但他有些迷茫。和所有军人一样，他知道自己的义务是为他人服务，而不是掌握权力。他可以成为英雄，但只能在一个框架之下——服务的框架。[84]

目前，海军上将Zumwalt担任国防部越战事务的特别顾问，专门负责橙剂问题。看完所有关于橙剂的研究报告之后，Zumwalt列出了越战老兵所患的27种应该获得赔偿的疾病。这些疾病很可能是橙剂造成的。[85]然而，只有1/3获得了批准。为什么？

Zumwalt解释说，化学公司害怕承认二噁英对人体的致癌性，因为目前二噁英不仅用于橙剂，而且还用在一些商用产品中，他们害怕遭到民事索赔。然而有惊人的证据证实，除了化学公司，还有更强大的力量抵制这么做。

1987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启动了一项研究项目，研究橙剂与各种疾病的关联性，但是这项研究突然被取消了，据报道，这是白宫的策略，目的是推脱连带责任。老兵们指责各方为了推卸责任而否认其中的关联性，这场斗争已经持续了将近10年。究竟谁对谁错？来看看下面的故事。

10年僵局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打破。美国通过了一项对受橙剂影响的越战老兵进行赔偿的提案。[86]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白宫的投票结果是412：0。[87]为何？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威胁称要对美军使用化学或生物制剂。突然间，美国想要将橙剂和癌症联系起来，以此开创一个先例，来保证萨达姆·侯赛因为赔偿买单。所以，通过这项提案的目的是促进新的研究并保证赔偿金的赔付。[88]这个推论并不是什么秘密。

总之，当美国企业或者美国政府发现自己有可能为此买单时，那么他们不择手段地否认橙剂和癌症之间的关联。而如果赔偿的人变成萨达

姆·侯赛因时，那么他们就不择手段地将二者关联系在一起，开创一个先例，以保证赔偿金的赔付。针对我们对待男性生命的态度，我想也不会再有尖锐沉痛的声明了。这种赤裸裸的转变足以让愤世嫉俗的人脸红。

这要怪谁呢？分析到最后，要怪的就是美国，就是我们。女人要求使用化学药剂（比如反应停[①]）结果受到伤害时，我们会营造一种政治氛围来保证女人们胜诉。男人别无选择，只能暴露于化学制剂中时，我们在赔偿时亦犹豫不定。

妇女运动给军人打上了“战斗精英”的标签。[89]然而，与其说战斗精英是精英阶级，不如说是奴隶阶级，是“将死阶级”。

Zumwalt将自己的生平写成了书，他说：“我和其他所有越战老兵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在为那场战争服务期间，都保持了沉默。”[90]

类似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让男人不再被孤立，从而让他们远离因此而造成的毒瘾、离婚、抑郁和自杀，这些都是错误的选择方案。即使到了今天，军人精英也没有为自己做点什么。

5. 创造杀人者阶级的后果

为什么男人如此冷酷无情?

John Beverly患上创伤后应急障碍后从越南回国，工作加剧了他的痛苦。别人打开牛奶罐、打碎啤酒瓶甚至燃放烟花，就为了看他的反应。他变得十分焦虑，根本无法工作。[91]

为什么有些男人会这么做呢？男人彼此嘲笑，本能地将对方训练成一名保护者。怎么会这样呢？没有谁希望保护者被别人的嘲笑吓跑，所以，

① 反应停原来是孕妇用药，发现会导致胎儿四肢畸形后停用了。——译者注

在几个世纪以来，年轻男士都肩负着一个任务，即发现彼此的弱点予以打击。一旦他们发现别人的弱点，就会嘲笑他、“打击”他、不停地找茬，直到他沉下去或者学会游泳。如果他沉了下去，那么他“不能证明自己是男子汉”。“不能证明自己是男子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无法保护妇女儿童，因为他有软肋需要自我保护。女人发现男人是软蛋便不会嫁给他。

我们希望男人成为我们的保护者，结果我们遭遇了“警察暴力”、军人思维和黑手党——这些都与男人有关。在我们想要男人成为“嫩肉粉”——能让其他东西可爱又温柔——时，我们怎么会质疑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温柔一点呢？

男人在战争期间扮演保护者角色时，他们妻子的角色往往会变得更平衡，而男人的角色则往往变得更失衡。比如，在二战中出现“铆钉工Rosie”。“Rosie”象征女性的力量，而“铆钉工”象征着男性的力量。让女人从事这些工作给了很多女人平衡自己男性面向和女性面向的机会，然而她们的丈夫被迫强化了其男性面向。于是，战争为女人创造了心理平衡，却让男人心理失衡。

战争可能会造成一个人截肢，但是对很多老兵而言，他们宁愿忍受截肢带来的短暂痛苦，也不愿让心理创伤长期损害自己与妻儿的亲密关系。我们之所以会看到类似《厌恶女人的男人和爱上他们的女人》（*Men Who Hate Women and the Women Who Love Them*）这样的书，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纳税让男人恨女人，而这些男人有收入所以女人爱上他们。我们付钱给风笛手，他们就会吹我们想听的曲子。

和平战士

男人似乎不只是战争勇士，也是和平战士。几乎所有为了和平而舍生忘

死、抛头颅洒热血或者被关入大牢的人都是男人。有一些人如曼德拉、马丁·路德·金、甘地、Dag Hammarskjold名垂千古，但大部分人已被遗忘。还记得Norm Morrison吗？

对越战抗议多年后，Norm往身上浇了汽油，走到了五角大楼下点燃了自己。这一事件燃起了反战的怒火，将公众的视野聚焦于“内心的敌人”：五角大楼。[92]但是Norm Morrison被世人遗忘了。就像Brian Wilson一样，他曾多次卧铁轨阻止海军的军需供应列车，这些列车装载着轰炸中美洲所用的军火。后来，有一列列车从他身上疾驰而过。

Norm Morrison是保卫了和平还是破坏了用于保卫和平的军事力量？军队是在保卫和平还是在创造一种偏好战争的军事思维？除了当战争勇士与和平战士，哪一种做法才能让一个国家更幸福，是日本近年来经济和家族力量的壮大，还是瑞士一贯的中立态度？这些辩论都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常常责怪男人是战争勇士，却忘了他们也是和平战士。没有人为了和平而发“紫心勋章”（Purple Hearts）[①]给Brian Wilson们或者Norm Morrison们。

压抑的平民士兵

退伍军人纪念日忽略了一种士兵：“平民士兵”。中情局（CIA）特工、联邦（FBI）特工和缉毒署（DEA）特工都是美国的平民士兵。这些“士兵”获得了供养家人的资源，其代价是按照法律签署协议，不得与家人自由交流。

协议要求不得讨论他的忧虑、恐惧或者他遇到的伦理困境——与妻子或挚友也不行。因此，每当夜幕降临后，他都得面对压抑的创伤后压力。他无法讲出自己的战争故事，无法重构自己的恐惧，于是这种掩盖长成了癌症，而他变成一个一身荣光却提前进了棺材的活死人。

① 紫心勋章是美国授予战争中的受伤军人的。——编者注

压抑的情绪是否真的会转化为癌症？一项可靠的研究发现，压抑自己情绪的人患癌概率比吸烟的人高6倍。[93]对压抑的平民士兵来说，杀死他们的不是“未知”，而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些他无法从大脑中释放出来的东西将变成大脑中的肿瘤。美国前中情局局长William Casey 曾被人指责掩盖了“伊朗门”（Iran-Contra）事件，他将情绪留给了自己，死于脑瘤。同时，Bud McFarlane因为类似的原因受到谴责，起初他企图自杀，在他陈词作证后恢复了健康。

平民士兵不能与妻子分享自己的感受，但因此而获得的收入却可以与妻子分享。他得压抑自己但她可以表达，她常常表达的是对他的压抑的指责。他习惯性的压抑“变成了”她的养老金。于是第一阶段的男人产生出第二阶段的寡妇。

6. 转变时期军人的困境

第一阶段的军人解放了女性

95%的女人在生活中都是作为受害者，或者失败者出现的，又或者在为生存而挣扎……女人没上过越南战场、没炸毁过什么东西。她们不是Rambo。[1]

——《纽约时报杂志》Jodie Foster[94]

Muhammad Ali认为越南战争是罪恶的，因此拒绝服兵役，这使他在事业的巅峰期遭遇了牢狱之灾。他的拳击执照也被吊销了4年，在当时看来，他可能永远都不能重新获得执照。而这个时候，Jodie Foster安逸地待在家里，靠卖弄性感而名利双收。如果根据性别歧视方面的法律，将Jodie Foster投入监牢，让她在24~27岁期间服刑会怎样？或者她只能让身体遭

① Rambo：指有英雄气概的男人，源出于电影《第一滴血》里的主人公的名字。——编者注

到重击以此来赚取几百万美元，但可能脑部受损，以及患上帕金森氏综合征，又会怎样？第一阶段的父亲们解放了第一代大学生，他们自认为比父母有文化。和这些大学生一样，第一阶段的男人解放了Jodie Foster们，而她们却认为自己比那些将她们从龌龊的战争中解放出来的男人道德高尚。

Jodie Foster们忽视男人们所做的牺牲，谴责受害者，然后宣称自己是受害者。在这样的年代——女人们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房间”，而现实中她们的兄弟们拥有的却是“自己的裹尸袋”——成长起来的女人尤其会这样。很多男人听到Jodie Foster们的话都觉得不舒服。男人们在打仗，战争撕裂了他们的灵魂，女人们却在职业生涯中走在他们前面。当他们结束战争回家时，却听见有个女人宣称自己是性别歧视唯一的受害者，因为她在工作中被要求去泡咖啡，而法律没有规定她必须这么做。这一切对男人来说都太突然了。

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女人被称为“解放了的”妇女或者“女超人”，而美国男人，参加了越南战争的叫“幼童杀手”，参加了抗议兵役的叫“叛国者”，两者都没参加的是“冷血者”，甚至有人朝截瘫的老兵吐口水。

这种现象并不只是美国才有。在苏联，平安在家过日子的是“被解放的妇女”和“过度劳动的妇女”，而上百万在阿富汗浴血奋战的苏联男兵回国后，人们没有称他们“英雄”而是“蠢货”。我们听说过苏联的家庭主妇们排队购物，却没听说远在酷热难耐的阿富汗沙漠里征战的丈夫们被毒蝎子叮咬或患上疟疾、黄疸、伤寒、肝炎和痢疾的痛苦。[95]他们回国后，苏联政府只会认定他们战斗不力。这种否定和侮辱导致他们酗酒、住院治疗和自杀。而我们听说的却只有过度劳动的苏联妇女。

20世纪90年代的成年人是这样一代人：男人因为背负的义务而受到谴责，谴责他们的是有足够的特权逃避这种义务的女人；这一代的女人被认

可，男人则不被认可。

另外一种媒体现象使得这种“肯定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交换位置？

随着海湾战争的爆发，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报道，称女人参战而男人与女人“交换了位置”。几乎所有报道的重点都在男人发现女人的工作是多么困难上。[96]然而，和男军人结婚且已生儿育女的女人极少从事全职工作；和女军人结婚且已经生儿育女的男人几乎都有全职工作。[97]举个例子，一个5年里只在家里待了17个月的上士现在要完全照顾4个孩子：年龄分别是2岁、4岁、6岁和13岁。

媒体只承认女军人的新角色会导致上士心怀愧疚：“我害怕妻子受到伤害。如果我一个人赚的钱能养活全家的话，她也不会去那里了。”[98]虽然他已经完全担负起照顾4个孩子的责任还要做家务，但他还是因为没能一个人赚钱养活一家6口而感到内疚。

转变中的军人

不论是阿富汗、越南还是中国的军人，让生活如此痛苦的是他们既要面对外在冲突中原有的期待，又要面对自我反省带来的内在冲突。回到家乡后，他们得到的不是感激而是孤立。关心我们的儿子就意味着为老兵建立起一个支持网，帮助他们克服这种异乎寻常的恐惧。

老兵们回到家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到了两张脸。他们质疑自己究竟是不是那个杀死无辜妇女、儿童和男人的雇用杀手，有时他还会无意中杀死同伴，就像Ron Kovic的电影《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里的情节一样。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恐惧。不论是被世人视为叛国者，还是参战但从未被肯定过，他们都很难开口说出自己的恐惧和自己所做过的噩梦。我们也要为女退伍军人做相同的

事情，不要忘了，他们都是退伍军人，参与过战争的人都面临着最严重的创伤后压力。

7. 未来的解决方案

如何让男人摆脱战争奴隶的困境?

从Rambo到现实

直到今天，他的双腿仍在战斗中下落不明。

——Leroy V.Quintana[99]

政治变化往往是从某些动作开始的，这些动作不仅会提升大众的意识，而且会冲击他们的意识。例如，如果Rambo玩具是暴力的象征，那么“现实中的玩具”就可能反映出暴力的现实世界。

“现实中的玩具”可能会有很多个模型……带轮椅的截瘫模型，很多不同种族使用的、可以更换的小型假肢，附有尸体袋的尸体模型，棺材和骨灰盒——其质量水平取决于贫富水平。战俘模型附带竹笼、刑具，橙剂模型里有畸形的孩子，而战斗失踪人员模型则在运送途中失去了踪迹……

所有创伤后压力模型都配有紧身衣、药片和1/5瓶的杰克丹尼酒（原料为焦糖水）。创伤后汤姆模型（Posttraumatic Tom Model）则会有一个植入型噪音传感器。每当门重重地关上时，往事就会在汤姆面前重现。他把怒火发泄到一个破旧的芭比娃娃身上。这个畅销的芭比娃娃身上有一个配件：电话。电话上有“911”快捷键，汤姆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发作时，可以用它拨通“911”报警。

真正令人震惊的是，用玩具来阻止暴力似乎比用玩具来促进暴力更暴力。

“以男人换油”之战

二战常被看作一场美国的翻身仗。如果科威特以胡萝卜而非石油闻名

于世的话，海湾战争永远都不会爆发。在海湾战争中，为国捐躯的96%是男人。这是最近一次用男人换钱的交易，是一场“以男人换油”的战争。除非我们提出抗议，否则它是不会停止的。

如何在和平时期雇用“战争男人”？

如果说战争时期需要军人自愿捐躯，那么和平时期需要他们有谋生的技能。战争时期需要个人的牺牲，因而新兵训练营成了新兵洗脑营。而和平时期需要个性的重生，所以重新融入社会项目必须帮助退伍军人，让他们的个性从冬眠中醒来。

在战争时期，多疑和偏执是有用的；回归社会后，多疑和偏执就会让人失常。重新融入社会项目必须培养他们对他人的信任。

在战争时期，实际上军人是不允许哭泣和求助的，因为照顾他会减缓他所在队伍的速度；在和平时期，退伍军人必须了解哭泣带来的不是懦弱，而是力量——哭泣有助于排除毒素，增强他的免疫系统；他的孩子们哭泣也可以增强其免疫系统；哭泣能让他的家人感到他们是一家人，而不是互不相干。在和平时期，退伍军人可以学习在自助的同时运用他的新团队——家庭——的力量。

在战争时期，家庭治疗和婚姻咨询与民族存亡问题相比微不足道；在和平时期，那些因为战争而破碎的家庭需要复合。到底为什么呢？举个例子说吧……

军人重归家庭后有一个问题不为人知。他了解到自己毫无权利，而他的妻子知道自己无所不能 。就是说，他的妻子可以发号施令，只有在她认为孩子们的意见有道理时才会听取。海军上将Zumwalt坐镇指挥一场他反对的战争，因为即使是海军上将，也要听从上级的命令。而他的上级要听命于决策人，决策人则受选民的选票和最新民意测验的监督。军人陷

入了一个困境，不断在从属者和表面的统治者两种身份之间徘徊。而他的妻子像母亲一样，虽然只被冠以“家庭主妇”的名头，却是他的总指挥、决策人、唯一能拍板的选举人，以及唯一的民意测验人。

同时，那些有助于他成为军人的训练却不能使他成为合格的家长。军人首先学习的是绝对服从命令，然后学习让下属绝对服从自己的命令，同时继续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如果一个父亲训练他的孩子绝对服从，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在战争时期有优秀的表现，但是在和平时期则会表现欠佳。简单地说，家庭治疗和婚姻咨询对于避免家庭战争、创造家庭中的相亲相爱是有必要的。

战士的职责是牺牲自己的权利去捍卫他人的权利；牺牲自己质疑权威的能力，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别人质疑权威的权利。战争结束后，将自我牺牲者的核心精神保留下来很诱人。然而，一个关心男人的社会会让每个退伍军人的内在个性得到重生。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会无意识地将自己的安危看得比一名战士的性命还重要。

教会退伍军人打开心门而不是打开酒瓶，让他们适应家庭生活而不是监狱生活，让他们成为父亲而不是制造父亲缺失的家庭，这样我们才会更安全。一个关心退伍军人的国家会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其在职业道路上摆脱战争的影响；国家可以对退伍军人重新进行和平时期的培训，让每个退伍军人都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是否应该帮助拒绝成为刽子手的男人?

如果我们告诉男人如果他们不去打仗，我们就不会“尊重他们”（然后我们很好奇为什么男人打仗是为了赢得尊重），那么战争就结束不了。如果女性被征召从军，我想，抗议的女性会得到大众的肯定，这种抗议会被视为出于女性热爱和平的本性。与此不同的是，我有一位朋友拒绝上越

南战场，于是他被判定为有意识拒服兵役，但又非宗教人士，接下来他花了4年时间在法庭上与FBI对抗，工作也丢了……简直活在人间地狱里。他头发大把大把地掉，眼神里充满怒气还饱受胃溃疡的折磨。他的生活被毁了，我们这些旁观者目睹了这些，都知道没有人能真正躲开战场，或躲过创伤后压力。

没有任何组织能帮助我的朋友，帮助那些为了避免被杀害而前往加拿大的人们，帮助比尔·克林顿，他们都在良心和勇气之间纠结不已。也没有任何组织把那些受征兵广告引诱而参军的18岁青少年当成受害者。当他认清现实时，他的选择只剩下继续服役，或者入狱并带着无故离队的标签度过余生。他想找一份正经工作，却因为有不光彩的过去而被辞退。

总统特赦了女性叛国者，比如“东京玫瑰”（Tokyo Rose），[1]却不能特赦那些拒绝为越战服役的男人，要不是他们，或许越战会进一步扩张，下一代男人也将面对良心的拷问。或许最明智的拒服兵役者应该得到“最明智奖章”，因为他们看到这种拯救他人的方式会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健康和亲密关系。

军队中的平等真的在政治上有可能性吗？

当民权运动领袖要求肯尼迪总统优先考虑民权问题时，他回答说：“它得有政治上的可能性。”虽然强制男性登记服兵役和参战是最违反宪法的政策，但它也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如果政治氛围不支持，仅仅违背了宪法并不会令事情发生改变。

就平等责任而言，未来的政治氛围会是怎样的呢？一半晴，一半阴。晴：已有75%的男人和69%的女人表示征兵应包括男女双方。[100]阴：达到

① Tokyo Rose：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美军给东京电台英语女广播员取的绰号。——编者注

应征年龄的57%的女性称，如果被征召，她们不愿服役，而男性只有24%。[101]对于“女性参战”，只有12%的男性和9%的女性表示支持。[102]总之，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支持真正、完全的平等。对此，女性的支持率低于男性，而在每届总统大选中，女性选民比男性选民数量多大约700万。

如果我们不能像对待反犹主义那样对待对男性的歧视，那么这些现象就不会改变。我们把集体杀害犹太人的行为称为“大屠杀”，但把集体杀害男人的行为称为“战争”。犹太人遭到屠杀时，我们感到恐惧；男人遭到屠杀时，战斗是光荣的。希特勒称犹太人的死亡集中营为“劳动营”，我们称男性服兵役为“男性的权利”。一些人闻到附近烤炉里有肉烧焦的味道，但仍然相信这里是“劳动营”，后来他们被认定和烧锅炉的人一样有罪。那么，那些投票支持只强制男性服兵役，且相信这是男性的权利的人，是否和制定政策的人一样有罪呢？是的，立法者是选民选出来的。

总之，态度决定政治而政治先于平等。希望已经出现了。问问父母们是否更愿意让儿子而不是女儿被随意支配……请求儿子们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和女朋友的生命一样重要……帮助达到兵役年龄的女性理解，其中不是只有责任与权利的关系，还有责任与尊重的关系……帮助达到兵役年龄的女性想清楚，她们是否愿意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感到自己是男孩所以必须做好杀人的准备……帮助每个人明白，现在是时候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先锋。

政治变革需要重构这些基础性的道理：如果男女都投票赞成开战，无论杀戮的对象是谁，那么男女都得参战；如果我们一直认为女人是无辜的，让男人成为杀人者，那么永远无法解决“无辜的女人和有罪的男人”的困境；只要我们给了男人不平等的暴力责任，那么男人就会一直是暴力犯罪者。

在等待这种范式转化发生时，在27个男人还在为1个女人牺牲时，我们

每个人能做点什么呢？我们可以表达感激之情。Kay Schwartz和她儿子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在战争结束后的第10周年，我儿子用电脑做了一个横幅，我们把它挂在车库前面。横幅上写着："越战——10年——我们记得。致为国捐躯的人——谢谢你们。致返回家园的人——欢迎回家。"我坐在门廊前，喝着咖啡，这时有个年轻人走过来发电话簿。他走到车库前，看着横幅。然后他走到门廊前放下电话簿，站在那里，泪流满面。

他说："女士，我喜欢你的条幅。"

我也哭了起来："很抱歉，晚了10年。"

我们两个都在哭，然后他说："女士，永远都不会太晚。"

——美国伊利诺斯州Kay Schwartz[104]

注释：

1. 见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1》，第111版，第348页，表571"幸存的越战老兵——各州及其他地区：1980~1988年"；第342页，表555"现役及预备役军人及部队：1989～1991年"。美国男性人口数量为9284万，29%以上的男性为越战老兵。另外全美有213万名全职现役军人，其中88.3%为男性（1880790名男性）。男性越战老兵和男性现役军人数量总数为29159790，占全美18岁以上男性的31.4%。

2. 索姆河战役发生于1916年6月24日至11月18日。仅7月1日一天，英军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了57450人，其中20000人死亡。整个战争中，英军伤亡人数为420000人，法国伤亡人数195000，德国伤亡人数650000。见John Laffin：《布拉西之战：3500年来的冲突、战役和战争大全》（*Brassey's Battles*：3,500 *Years of Conflicts, Campaigns and Wars from A-Z*）第399页。（London：A. Wheaton & Co.，1986）

3. Susan Goldberg & Michael Lewis，《周岁婴儿的玩乐行为：两性的早期差异》（"Play Behaviors of Year-Old Infant：Early Sex Differences"），《儿童发展杂志》（*Child Development*）1969年3月第40期第29页。

4. 此言论是在1986年国防部军内妇女咨询委员会成立之前发表的。1992年5月26日采访Weinberger的行政助理Kay Leisz时确认了这一表述。

5. 美国国会、参议院、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O'Connor的任命书》

（“Nomination of Sandra Day O’Connor”）。

6. Scott Harris，《每个军人家庭中都有一个死亡的女人》（“In Service Family，a Woman Dies”），《洛杉矶时报》1991年3月1日。Adrienne Lynette Mitchell的父亲在她在波斯湾战争中阵亡之后如是说。

7. Richard Halloran，《女军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人》（“Military Women：Increasingly Indispensible”），《纽约时报》1988年3月13日。

8. 陆军与海军已将他们的作战岗位划分为危险和危险较小的岗位，女性只能在危险较小的岗位工作。例如，在陆军部队中，P-1岗需要主动攻击，是最容易造成伤亡的岗位；P-2岗人员则会被安排在综合作战区，不需要主动攻击，所以他们受到攻击的机会小很多。

空军是目前最安全的部队。实际上就易受攻击程度而言，所有空军岗位都相当于P-2岗，所以女性可以参与空军的所有战斗岗位。1992年7月14日与17日，在采访武装部队女军人工作分配总统委员会主席Maggie Waleland和总统委员会同事Jeff Smith上校时得到以上信息，Jeff Smih被视为这些问题的专家。

9. Michael Gordon，《女人领导巴拿马战役中的美国军，军队史上第一次》（“Woman Leads GIs in Combat in Panama，in a‘First’for Army”），《纽约时报》1990年1月4日。

10. 同上。

11. 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军事设施小组委员会主席，女议员Schroeder知道女性可以在宪兵队服役，也就是说，按照规定女性要执行支持性职能（比如指挥交通）。虽然也有可能遭到枪击，但是她们被指派的岗位已经尽量远离危险区域了。

男女被杀害比例数据来自美国国防公共事业部助理室的Harold Heilsnis。

12. 1992年7月17日采访了美国国防部公共事业部官员Janna Simms。

13. 1991年12月19日美国国防部公共事业部记事表“沙漠盾牌/沙漠风暴行动”。536人全部在波斯湾战争中阵亡，包括15位女军人（4位在行动中阵亡，11位死于意外）和521位男军人（142位在行动中阵亡，379位死于意外）。

14. 1991年1月30日美国国防部公共事业部记事表“女军人”。

15. 1991年1月30日美国国防部公共事业部记事表“女性支持沙漠盾牌行动的问与答”。

16. Bob Secter，《征兵：有战争，就有办法》（“The Draft：If There’s a War，There’s a Way”），《洛杉矶时报》1991年1月3日。

17. 美国兵役注册机构伊利诺斯州地区指挥部副署长兼美国空军少校Ronald Meilstrup做此估计。

18. Secter，同上。

19. Bob Secter，《征兵：有战争，就有办法》。

20. Michael Herr，《深入报道》（*Dispatches*）第134页。（New York: First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1）

21. Bruce Gilkin，《到鬼门关走一趟：越战老兵的战后创伤压力》["To Hell and (Almost) Back: A Vietnam Veteran's Struggle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男人健康》（*Men's Health*），1988年夏季刊，第44页。

22.《致编辑的一封信》("Letters to the Editor")，《转变》（*Transition*），1991年5/6月刊，第2页。在整封信里，精神科医生解释了他/她为何不愿透露姓名，因为讨论这些事情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正确的。

23. 美国海军上尉Roberta Spillane，《女海军：我们是否能生存下去》("Women in Ships: Can We Survive?")，美国海军学院《进程》（*Proceedings*）杂志1987年7月刊第44页。关于阿卡迪亚的原话是："西海岸的一艘供应船表示，在任务派遣前的体检期间有40%以上的女性因怀孕而无法定级——而且不得招人替代她们的位置。"

24. 引自David Fairbank White的《拯救斯塔克的男人》("The Men who Saved the Stark")，《游行》（*Parade*）杂志1989年2月12日。

25. 来自1978年卫斯理女子学院Michael Rustad的一项研究，《军人企业中的卡其领女人》("Khaki-Collared Women in Company C")（卡其领指的是美国海军制服。——译注），未发表。其中关注了美国通信兵部队中两性并存的问题，引自Virginia Adams的《军队中的花木兰——两性并存的障碍》("Jane Crew in the Army—Obstacles to Sexual Integration")，《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1980年10月刊。

26.《女军人评估》（*Evaluation of Women in the Army*）（1977年）是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森的美国陆军行政中心所做的一项研究。根据心理学家James Sampson的研究设计，部队人事部将问卷发放到7751位军人手中，调查结果确认他们中间普遍存在消极态度。引自《今日心理学》，同上。

27. 引自《今日心理学》，同上。

28.《今日心理学》，同上。

29. 女学员平均请病假6.8次，而男学员是1.7次。Brian Mitchell，《薄弱环节：美国军队的女权主义化》（*Weak Link: Femi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第69页。（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89）

30. 海军的新兵训练营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帕里斯岛。见Melinda Beck，"部

队中的女人”（Women in the Armed Forces），《新闻周刊》（*Newsweek*）1986年2月18日第36页。

31. Stanley K. Ridgley，《神话般的女军人》（The Mythical Military Woman），《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新闻观察者报》（*The Raleign, N.C. News & Observer*）1991年7月28日。Stanley Ridgley和他的妻子均为美国陆军军官。

32. 同上。

33.《美国兵役注册法案》。见1987年9月兵役注册表SSS Form 1“隐私法声明”的内容。

34. 同上。

35. 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斯州、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佐治亚州都规定男性注册兵役后才能在公立学校就读。引自1987年学院新闻服务机构Jim Schwartz的话。

36. 最高法院规定，只要男人接受了战斗训练和准备，只征男兵就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女性可以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战斗，而男性却有参与战斗的义务，这一现象是否符合宪法精神从未遭遇过挑战。法官对大众解释道：“征兵登记的目的是做好准备为战斗部队征兵。由于女性不参与战斗，国会认为她们不需要参与征兵，因此决定不对她们进行登记。”该案件为Rostker v. Goldberg案，1981年6月2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报告》第543期，判决记录发言官为Henry C. Lind。（Washington, D.C.: USGPO, 1983）

法令规定海军不得命令女性直接参与战斗，而且服役规定禁止陆军和海军部队让她们参与直接战斗的训练。

37. 见Julian Isherwood，《武装部队月刊》（*Armed Forces Journal*）1988年7月刊。

38.《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Spokesman*）见Adams，同上。

39. 特约撰稿人Marlene Cimons，《战斗中的女人：巴拿马战争引发口水战》（“Women in Combat: Panama Stirs Debate”），《洛杉矶时报》1990年1月11日。

40. Halloran，同上；Adams，同上。

41.《欧罗巴世界年鉴》（*Europa World Year Book*），第1期第1475页。（London: Europa Publishers, 1992）

42. Helen Shapin，《伊斯兰：国家调查》（*Islam: A Country Study*）第290页。（Washington, D.C.: USGPO, 1990）

43. John Keegan，《世界军队》（*World Armies*）第二版第308页。（Detroit: Gale Research Co.，1983）

44. Shapin，同上。

45. Shapin，同上。

46. Shapin，同上。

47. Philip Knightley，《第一个牺牲品》（*The First Casualty*）第357页。（New York: 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5）

48. 来自1987年6月14日采访的一位伊拉克士兵，他要求匿名。

49.《火苗》（*Ogonyyok*，俄罗斯的一家流行刊物）的新闻记者Artyom Borovik报道的故事，引自Bill Keller，《俄罗斯分裂战争——梦回阿富汗》（"Russia's Divisive War--Home from Afghanistan"），《纽约时报杂志》1988年2月14日。

50. Steven Collins博士用一项典型的物理试验为我解释了这一点。

51. 美联社，《医生强烈谴责在研究项目中对猫进行枪击》（"Doctors Assail Project in Which Cats Are Shot"），《洛杉矶时报》1989年8月19日。

52. Ronald Brownstein，《美国大力拥护布什总统的决定》（"Americans Back Bush Decision Overwhelmingly"），《洛杉矶时报》1991年1月19日。

53. 越战退伍军人Bruce Gilkin，"到鬼门关走一趟：越战老兵的战后创伤压力"，《男人健康》1988年夏季刊第43~44页。

54. Keller，同上。

55. Lloyd Shearer，《不公平待遇》，《游行》杂志1990年6月10日第20页。

56. 引自上将Elmo Zumwalt和他的儿子中尉Elmo Zumwalt及John Pekkanen，《我的父亲，我的儿子》（*My Father，My Son*）第162页。（New York: Macmillan，1986）Reutersan曾是一位直升机驾驶员，后成立了国际橙剂受害者组织（1978年）。他28岁时发现自己身患晚期胃癌。

57. Joel Osler Brende 和 Erwin Randolph Parson，《越战老兵：康复之路》（*Vietnam Veterans: The Road to Recovery*）。（New York: Plenum Press，1985）

58. Arthur Egendorf，Charles Kadushin，Robert S. Laufer，Georgie Rothbart 和 Lee Sloan，《越战遗产：越战退伍军人和同类人群的重新适应性比较》（*Legacies of Vietnam: Comparative Readjustment of Vietnam Veterans*）。（Washington，D.C.: USGPO，1981）

59. 美国第96届国会第一次会期，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总统评估备忘录《越战时期退伍军人》（Washington，D.C.: House Committee Print no.

38，1979），1978年10月10日发布。报告中列出，越战退伍军人中有29000名在州监狱或者联邦监狱里服刑，37500名处在假释期，250000名处在缓刑期，还有87000名在等待审判。

60. Louis Sahagun，《退伍军人医院谴责对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照顾不足》（"VA Hospital Assailed on Care for Homeless Vets"），《洛杉矶时报》1989年3月26日。

61. Brende & Parson，同上，p.xvi。

62. Mike Lafavore，《战士之心》（"Solidier's Heart"），《男人健康》1988年夏季刊第45页。Mike Lafavore为《男人健康》的执行主编。

63. Gilkin，同上。

64. Gilkin，同上，p.45。

65. 引自Jim Novak。

66. 该军事历史学家为S.L.A. Marshall。引自Jean ELshtain的《女人与战争》。（New York：Harper & Row/Basic Books，1987）

67. John Helmer，《把战争带回家：越战中和战后的美国士兵》（*Bringing the War Home：the American Soldier in Vietnam & After*）第225~226页。（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4）

68. Brende & Parson，同上，p.75。

69. John E. Helzer、Lee N. Robins 和 Larry McEvoy，《普通人群中的创伤后应急障碍：流行病学责任区调查》（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Findings of the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Survey），《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7年11月第317期，第26部分1631页。

70. 于1990年2月7日在纽约布朗克斯采访了该项研究的负责人Mike Dister。

71.来自1992年6月15日NBC新闻的采访节目。

72. Barbara Crossette，《叶利钦称战斗中的失踪人员被关押在劳改营》（"Gulag Held MIAs，Yeltsin Suggests"），《纽约时报》1992年6月16日。

73. 这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对战俘/战斗中失踪人员相关问题所做的中期报告。国防部，《战俘和战斗中失踪人员记事簿》，1991年7月刊第3页，该报告指出，战斗中失踪人员和下落不明人员有2273人。以上信息来自Karen Tumulty的《国防部官员辞职，称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有猫腻》（"Pentagon Official Resins，Alleges Cover-Up on MIAs"），《洛杉矶时报》1991年3月21日。

74. Martin Hirshfield，《洛杉矶时报》1991年6月22日。

75. 见Jill Stewart，《美国战俘家庭称部分朝鲜战争战俘或尚在人间》（"U.

S. Families Claim Some Korea POWs May be Alive”），《洛杉矶时报》1990年7月8日。

76. Karen Tumulty，《前国防部官员称战俘或仍关押在东南亚》（“POWs May Still Be Held in Southeast Asia，Ex-Pentagon Official Says”），《洛杉矶时报》1991年3月31日。

77. Karen Tumulty，《国防部官员辞职，称战斗中失踪人员问题有猫腻》，《洛杉矶时报》1991年3月21日。

78.同上。

79.同上。

80.Nora Zamichow，《世界新闻集锦》（“News from All Over”），《Ms.》1986年8月刊。

81. Zumwalts，同上。

82. Zumwalts，同上。

83. Zumwalts，同上。

84. Zumwalts，同上。

85. Laura Palmer，《退伍军人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有不朽之名》（“Vets Lose Not Only Lives，But Immortality as Well”），《洛杉矶时报》1990年11月11日。

86. 该法律为38USC316。见美国蒙哥马利众议院（D-Miss）第102届国会第一次会期，报告编号：HR556，“1991年橙剂法案”（Agent Orange Act of 1991）。

87. 见美国蒙哥马利众议院（D-Miss）第10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报告编号：HR556，《1991年橙剂法案》。

88. 美国国家科学院受命对越战中使用的橙剂，或者其他造成退伍军人患癌症或其他病症的有毒化学品进行综合审查。

89. Barbara Ehrenrich，《伊朗门：Oliver North的真正意图》（“Iranscam：The Real Meaning of Oliver North”），《Ms.》1987年3月刊第26页。

90.Zumwalts，同上，第126~127页。

91.《退伍军人永远得不到平静》（“No Peace for A Veteran”），《时代》1989年7月3日。

92. Pierre Blais，《火热的煤》（“Hot Coals”），《科罗拉多日报》（*Colorado Daily*）1987年9月11~13日。

93.《性格类型导致患癌死亡的概率是吸烟的6倍》，Ronald Grossarth-Maticek，一位在海德堡工作的南斯拉夫心理学家，资深编辑Joshua Fischman在《辩

论的特征》（“Characters of Controversy”）中这么说，《今日心理学》1988年12月刊第27页。

94. Joanthan Van Meter，《电影里的孩子》（“Child of the Movies”），《纽约时报》1991年1月6日第19页。

95. Keller，同上。

96. Nora Zamichow，《交易场》（“Trading Places”），《洛杉矶时报》1991年1月13日。

97. 同上。如《洛杉矶时报》的文章里刻画的每一个男人，或者律师或者高级职员，都会在继续自己职业生涯的同时照顾孩子。

98. 同上。

99. 出自Leroy Quintana的诗《汉考克》（“Hancock”），摘自《审问》（*Interrogations*）第95页。（Chevy Chase，Md.：Vietnam Generation & Burning Cities Press，1990）

100. NBC新闻和《华尔街日报》的民意调查，1990年12月8日至11日。全国共有1002名群众参与调查。

101. 同上。

102. 盖洛普民意调查，1980年1月31日至2月1日，发表于1980年2月18日《新闻周刊》中的《战争与两性：新闻周刊民意调查》（“Battle and the Sexes：A Newsweek Poll”）。

103. 纽约市选民研究与调查机构向《华盛顿邮报》的Rich Morrin提供了该信息，1992年11月17日他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这一信息。

104. 见Bob Greene的《归家：从越南战场上返回的士兵》（*Homecoming：When the Soldiers Return from Vietna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9）

第六章
男人，自杀的性别

词条： 丧妻鳏夫的自杀率是丧夫寡妇的10倍左右。[1]

词条： 失业男性的自杀率是在业男性的2倍，而就业与否对女性的自杀率没有影响。[2]

词条：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男人的自杀率是女人的650%。[3]

词条： 最近，青春期男孩的自杀率增长速度是青春期女孩的3倍。[4]

词条： 在20年前，青年男性（25~34岁之间）的自杀率是青年女性的2倍；如今，已经升至4倍（男性的自杀率增长了26%，而女性的自杀率下降了33%）。[5]

这些词条引发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最近青春期男孩的自杀率比女孩的增长速度快这么多？为什么对男人来说失恋的打击如此巨大？如果失业的打击会导致男人自杀，是否能与强奸对女人的打击相比？女性的抑郁是否相当于男性的自杀？为什么企图自杀的女性比例更高但男性成功自杀的比例却高出4倍？[6]为什么“自杀阶级”也是“成功阶级”？男人自杀率更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关心不足——“自杀阶级”是不是“不被关爱的阶级”？

我们先从青春期男孩说起。为什么青春男孩在他们的性别角色变得越来越明显时自杀率增长了25000%，而女孩却没有？[7]

青春期男孩自杀率增长之谜

词条：一个（西太平洋岛屿的）特鲁克男孩出现恋情问题时，他们很可能不会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收回感情的方式。特鲁克男性的自杀率是美国男性的25倍。[8]

青春期前的男孩和女孩都能够表达情感，他们的自杀率也相差无几，比女孩略低。美国青少年和特鲁克男孩一样，在青春期感到压力很大，因而收回自己的感情。而且，也正是在青春期，男孩的自杀率突然猛增至女孩自杀率的4倍。[9]

对男女两性来说，青春期都让其性别角色的焦虑更加尖锐，就像用削笔器削铅笔：他们害怕遭到拒绝因而产生了一种如削尖的铅笔尖一样脆弱的情感状态。普通女孩子的情感尤其脆弱……脆弱到她感到自己是隐形的。对于较受瞩目的女孩子来说，她最后会发现自己依赖一种会渐渐消逝的力量，男孩们争着想要引起她的注意，仿佛她是一个明星，她成了天生的明星——天生的明星对权力有依赖。男孩和女孩都过得艰难，我认为在这段时期男孩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使自杀的可能性增大了。

男孩对女孩的身体更为着迷，这使得男孩觉得自己配不上女孩。为了补偿男女之间的不般配，男孩会为女孩做事，追求女孩，为女孩付账。在他们追求女孩和为她们做事的方式不恰当时——或者他们感到永远都得不到自己迷恋的东西时——就会产生焦虑，这种焦虑的极端形式就是自杀。做事（perform）、追求（pursue）和付款（pay），即“三P”非常容易引发焦虑，因为男孩将它们看成成人版的做事、追求和付款的象征。（所以，如果他在年轻时做不到，那么……）

男孩们发现，那些能得到天生的明星“青睐”的男孩在以下方面很突出：

- **做事**。成为一名领导者（运动员、学生团体的头儿），有“潜力”

或者有车。

● **追求**。她可以选择去追求，他心怀期待。在他尚不够了解自己的时候，他却“应该”了解女性的暗示，虽然女孩也不了解自己。他害怕误读那些他读不懂的东西，这让他压力重重。他体内的荷尔蒙已经做好了让他享受性爱的准备，他不想被拒绝。他应该在明白性是怎么回事之前就是性爱大师。他知道自己想要和女孩发生性关系，他不确定她们是不是想要和他发生性关系（而且他最感兴趣的女孩最抗拒他）。如今如果他对女孩发出的信号会错了意，就有可能进监狱，但反过来对女孩而言则不然。这个现象也会令他产生焦虑。

● **付款**。她越美貌，他要付的钱就越多——所以他需要赚得更多。

男孩们发现他们必须做到“三P”才能配得上女孩们的爱。女孩也有自己的焦虑，但总体而言，她不需要做很多事，而且她有更多吸引爱情的资源。她的身体和头脑都是天赐的礼物。于是，一个受欢迎的女孩更像一个天生的明星，而一个受欢迎的男孩更像一个白手起家的明星。他越迷恋天生的明星，就越有成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明星的必要。

被要求做事却没有做事的资源

男孩们如此焦虑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被要求做事却没有做事的资源。结果，他不但要承担很多风险，而且会面临很多失败。这一切是如此明显。几乎每个男孩都感觉自己像“屡战屡败俱乐部”里默默无闻的成员。

其次，最大的赢家——足球运动员——是通过自我伤害的方式获得爱情的。对于一些男孩而言，通过自我伤害的方式来获得爱情会引发焦虑。但是失去爱情会引发更多的焦虑。结果，他在被自己伤害的焦虑和被女孩拒绝的焦虑之间进退维谷。

在某一段时期内，那些脑子灵身体差的书呆子男孩们看到他最看不起的

男孩得到了“爱情”，而这些女孩正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他的个性就是在这些年里形成的。而另一方面，那些身体好脑子差的男孩们则担心，他英雄般光辉的日子会在他离开中学的那一天结束。

不论是短期的赢家还是短期的失败者都无意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听不到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焦虑会使胃部紧张，而酒精可以麻醉它，开车可以将之抛诸脑后。青少年不知不觉开车撞死人的概率比普通司机高出15倍，[10]在男性的社会化过程中，杀死敌人的保护者变成了随意杀人的保护者。这就相当于在胡乱释放杀人凶手。在选举中，我们给Michael Dukakis[①]投了反对票，因为他释放了Willy Horton，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制造Willy horton。我们甚至为他们欢呼喝彩，然后我们还和Willy Loman[②]们结婚。

当一个男孩看到，除了为她们做事别无选择时，当在他确立身份期间，发现所有仪式都强调自己的不足时，当他被禁止和同病相怜的人说出自己的恐惧时，他的孤立和自我质疑就会促使他自杀。于是，男孩的自杀率本来比女孩低，现在变成了女孩的4倍。[11]

为什么男孩的自杀率在升高?

女孩们准备进入的世界越来越宽容，允许她们做自己想做的事——家庭主妇、母亲、秘书、行政人员。女孩可以在外做事，也可以在家带孩

---

① Michael Dukakis：（1933~）：美国政治家，美国民主党成员。在1975~1979年和1983~1989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曾在马萨诸塞州实施“罪犯周末休假计划”，重刑犯Willy Horton休假期间没有回来，反而犯下了侵犯、武装抢劫和强奸罪。1987年，Dukakis竞选美国总统时，因“Willy案”败给了对手老布什。——编者注

② Willy Loman：美国作家Arthur Miller《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Loman有30年推销经验，盲目高估自己的能力，相信美国的富裕神话，幻想通过商品推销获得名望，因而养成了吹嘘、谎话连篇的习惯。——编者注

子，或者二者兼顾，如何选择取决于她们的性格。而男孩不论性格如何都得在外做事。过去，生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凿圆枘方，勉为其难，而现在对一部分男孩来说，生活依然如此。这一点对同性恋男孩来说尤为真切，世人仍不能容忍他们的“阴柔”，而同性恋女孩则不同，世人对她们的“阳刚”显示出更多的包容。可能这就是同性恋男孩的自杀率比同性恋女孩高出3倍的原因。[12]

过去，在爱情方面男女都有着狭隘的期待：她，吸引、拒绝；他，追求、坚持。现在，她也可以选择追求；他仍然肩负追求的责任却没有新的选择（如果他希望得到爱情的话）。过去，男男女女都对性和怀孕感到焦虑。现在药片将她的焦虑降到最低，但避孕套增加了他的焦虑。现在，满脸长痘的青春期男孩仍然必须面对被拒绝的风险，同时还要克服自己对患疱疹和艾滋病的担忧，并向她一再保证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还必须承担性爱中的风险，不过，如果他太早冒险，则有可能进监狱，如果太迟付诸冒险行动，则会被称为窝囊废。

如今，女孩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避孕药；男孩的选项里不包括了解她是否吃药了。过去，怀孕意味着男女双方都会有麻烦，但女方麻烦更大。如今，怀孕对一个女孩来说意味着可以选择赶快人流（不论男孩有何感想），或者起诉男孩支付孩子18年的抚养费（不论男孩有何感想）。总之，现在她的感受事关重大，他的则无关紧要。每次她发生性关系，她都有选择；每次他发生性关系，他都冒着她决定让他余生做囚徒的风险。

在整个工业化的世界中，由于男孩尚未找到方法从这种做事方式中解脱，所以他们青春期玩的游戏仍然是在为将来做的事做准备。男孩仍然相互激将，从行进中的火车和快速驶过的汽车前跳过，从树上跳下或者盗窃，[13]他们几乎仪式性地重新上演这样一种传统：证明自己生来就要为了保

护他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做法带来的影响——使男人勇于做事不顾及生命——仍然挥之不去。下面的电视广告就是对这一现实的讽刺：

有一个女孩发出了信号。两个男孩各自驾车驶向悬崖，谁先从车里跳出来就会被称为“鸡仔”。有个男孩的车门卡住了，他驾车冲出了悬崖，撞上了岩石最后掉进了大海。只有他的牛仔外套和牛仔裤浮出了水面。一行字幕出现在电视屏幕上：“Union Bay——永恒的时尚”。[14]

如果是一个女孩的身体撞上了岩石，掉进了大海……广告经理决不会打算用一个女孩的死亡去销售“永恒的时尚”。用女性的随意支配性来庆祝时尚的持续性，会被视为“将女性当成被随意支配的性别”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爱无能性别”失恋之后会颓废?

最受人敬仰的女权主义治疗专家，诸如Carol Gilligan和Jean Baker Miller，认为一段恋情的结束对女人的影响大于对男人的影响。[15]然而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为什么丧偶男性的自杀率是丧偶女性的10倍？[16]我有位女性朋友猜测认为“肯定是因为寡妇大都已经退休了，不必整天埋首工作”。于是我去验证这种猜测是否正确。我发现即使是30岁的男性，丧偶的比未丧偶的自杀率仍高出11倍。[17]在而立之年，男人埋头工作，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经济上都对女性具有吸引力，男人失去挚爱的女人后变得如此颓废，即使外面有很多寻找爱情的机会也不能让他恢复元气。男人可以在工作中埋头苦干，也可以痴迷于另外一个女人，但是他们的痛苦却无法掩埋。总之，痛失所爱会毁掉男人。

男性军人：最粗糙、最坚强的娘娘腔

词条：在20世纪80年代，自杀的男性军人数量比死于黎巴嫩、格林纳达、

巴拿马战争的总人数还要多。[18]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比例约为1:8。[19]

提起军人时，我们总是更关注他们的权力和性别，而不是他们的感受和爱情生活。但是，男性军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未得到升迁或者在性生活中遭拒，而是在爱情中遭到拒绝。[20]第二大原因是什么呢？缺少朋友。[21]第三大原因呢？缺少来自家庭的尊重（例如，即使在目睹了他们的毕业典礼之后，家人仍然不尊重他）。[22]其中的共同点是什么呢？缺少爱和家人的尊重。

为什么“爱无能的性别”在失恋后会如此颓废？为什么男人是这种“又糙又坚强的娘娘腔”？答案在这里。

想象一下你刹那之间失去了所有人际关系，而每次跟他人谈论时不能超过3分钟。这就是一个男人离婚或丧偶之后的感受：妻子往往是他“所有的人际关系”——他所有的亲密关系。对于离婚，他觉得自己和同事——通常是他“最好的朋友”——有一个3分钟的“讨论窗口”。

女权主义治疗专家告诉治疗机构，女人在爱情关系中更投入，所以爱情关系结束时女人更受伤，这就好比在说，男人更注重经济问题，所以离婚后男人应该拿到更多财产。这种说法拿女性更善于社交来说事，为女性谋求另外一个好处——伪装为“受害者”。结果呢？我们关心伤心的女人、孤立伤心的男人，增强了令男人自杀的氛围。就像我一个女性朋友所说的：“我祖父去世的时候，祖母马上加入了一个叫格里利的寡妇俱乐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格里利鳏夫俱乐部。”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过为丧偶的男性建立支持系统，更别说资助他们了。

女人拒绝自杀是因为自杀太自私？

词条：Jimmy Stewart扮演的电影角色为了让妻子得到5000美元的保险金打算自杀。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美妙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

（我很想知道如果他有一个可怕的人生他会怎么做！）

词条：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西部偏北地区的农业危机导致部分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并破产，男性农民的自杀率增至原来的3倍。[23]

我在研讨会上讨论男人的自杀率时，常常会有女人问："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吗？你抛弃了需要你、爱你的人。"确实是这样的——但这对女人来说更是如此。原因如下。一个女人离婚时，在时间上她对孩子有90%的监护权。她和自己所爱的人朝夕相处而且能感受到有人需要她。我倾听过上千名男男女女的诉说，他们有亲戚或者朋友自杀了，我发现内心感到被爱、被需要的人极少自杀。而女人更不可能抛弃那些爱她、需要她的人，所以她自杀的概率更小。

相反，男人在失业或者失去毕生积蓄，因而感到沮丧时比较容易自杀，因为男人觉得杀死自己就是在"杀死负担"。所以对他来说，自杀并非自私而是爱——让他所爱的人不再为负担所累（至少当时他是这么想的）。然而，如果他认为他可以重新赚到更多钱的话——不再是一个负担——他会继续活下去。或者，如果有人真的说服他，即使他失业也不会是负担，那么他会活下去。

为什么女人的自杀未遂率比男人高？

为什么女人自杀未遂的概率比男人的高3倍？我们常常听说这是因为她想得到关注，但我们并不了解她的意图：她想要优先被爱，而不是总是优先考虑爱别人。她厌倦了将爱定义为她支持他人，而不是他人支持她。她可以通过自杀"未遂"来实现这个目的，其实也算不上是真的自杀未遂，只是一个警告信号而已，就像黄色的交通指示灯并不是未亮的红灯，而是一个警告信号。

很多男人非常需要发出这种警告信号，但是他们的信条是，在感到自己深陷泥潭时不能请求别人拉他们一把，这个信条让他们察觉不到自己有

这种需要。他们也明白，承认失败可能会导致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失败，因为当同事和朋友们看到他们的失败时，他们得到的引荐和升迁机会就会更少。这使得男人极少愿意敞开心扉向他人求助。他们在孤独中忍耐。如果成功了，一切尚好；如果没有成功，那好，没有人会爱他们了，他们会一文不值；不，他们比一文不值更惨——他们成了负担。

我相信男人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们感到：（1）没有人爱他们或者需要他们（所以这并不是自私），或者更糟糕的是（2）他们成了所爱之人的负担。

为什么“自杀阶级”是“成功阶级”？

91%的“自杀阶级”是白人，[24]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至少是中产阶级。他们是“成功阶级”，或者至少过去是——直到他们失业或者失去积蓄。但是为什么要自杀，我不是说了感觉不到被爱、被需要才是催化剂吗？因为成功的男人变得最为依赖用成功去吸引爱情。当这个男人失去成功，他往往就会害怕失去爱情。真是这样吗？通常这关乎两方面的事实和一方面的害怕。一方面他的妻子可能会认为他不适合去做超市的收银员，另一方面或许他用来吸引爱情的成功使他更像一个成功专家而不是爱情专家，但是他也许低估了他妻子或者女朋友的真爱。尽管如此，这个事实和害怕对他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于是男人、爱情、成功和自杀之间有了关联。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男人和生活不再有关联。

男人的失业在心理上如同女人被强奸？

你是怎么称呼德克萨斯的加油员的？……噢，是服务员！

——《今夜秀》主持人Jay Leno

词条：从前，有个女人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青蛙。这只青蛙说它被下了咒语……它其实是德克萨斯的加油员。

“如果你吻了我，咒语就会解开，”青蛙这么说，“然后我会爱上你，会照顾你一生一世。”但是这个女人什么也没做。

“为什么？”会说话的青蛙问道。

“你开玩笑吧！”这个女人大笑着说，“有了会说话的青蛙，能得到的远不止这些！”

词条：电视版超人George Reeves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其他的表演工作。他45岁了。他的未婚妻看见他上了楼，之后听见他拉开了一个抽屉。她跟朋友们说：“他要自杀。”几秒钟之后，一声枪响。超人死了。超人一直在失业。[25]

很多女人说强奸令她们感到屈辱、被侵犯、无助、气愤、愧疚、自责、沮丧、自尊心下降而且想要自杀。她们的脆弱让她们感到无力，仿佛这个世界是一头大象而她们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同样，被炒鱿鱼或者经历“三种失业”——就业不足、失业和失业恐惧[26]的男人往往也感到屈辱、被侵犯、无助、气愤、愧疚、自责、沮丧、自尊心下降而且想要自杀。他们的脆弱让他们感到无力，仿佛这个世界是一头大象而他们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蚁。

失业剥夺了男人从女人那里得到的爱和尊重，强奸行为侵犯了女人被男人喜爱和欣赏的身体。没有男人认为他们选择了失业，就像没有女人认为她们选择被强奸一样。

当然，女人也会失业，而被强奸的也会有男人。但是失业的男人沦为被嘲笑的对象，失业的女人却不会（没有关于女加油员的笑话）。失业了但有魅力、有做家庭主妇潜力的女人会有很多男人追求；失业但有魅力、有做家庭主男潜力的男人却没有很多女人追求。

撇开失业男人和被强奸女人之间的共同点不说，没有人敢开玩笑说被强奸了的女人不值钱。男人被以资产净值估价时，就混淆了资产价值与自我价值。工作无望意味着爱情无望，也意味着生活无望……意味着自杀。待到失业救助热线和强奸救助热线一样普遍时、嘲笑失业男人的现象和嘲笑被强奸女人的现象一样不普遍时，我们就可以更多地帮助男人。

为什么被迫提前退休会导致男人自杀和消沉?

一个男人被迫提前退休，通常是“因为有了年轻人”而被抛弃。对一个男人而言，被迫提前退休就像“因为有了年轻女人”女性被抛弃一样。当它与被迫失业一起发生时，男人的感受和被强奸了的女人感受是一样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退休或者被炒鱿鱼的男人很快就故去了。

为什么很多男人退休时对“空巢”的情形——他们的孩子离家了——比女人显得更加不安？女人从照顾孩子的工作中退休后，可以试着开始自己的职业；而男人从一份职业中退休时，他的孩子们已经离开了家。他们常常会很勉强地回来看看。我们会与 “忘记要孩子”[27]的新型成年女性产生共鸣，却不会与（因为有责任养家而）常常“忘记有孩子”的男人产生共鸣。然而没有男权运动说出男人因为成为孩子的钱包却感到被剥夺了孩子的爱的那种“无能为力”之感。

我们是否对男性的自杀一知半解?

我认识的一位老师问她的学生：“如果你想要自杀，你会怎么做？”大部分女生回答：“服用过量药物或毒品。”但是有一半的男生说他们会喝醉，然后把车开下悬崖或者撞向电线杆。

女生选择的方式——过量药物或毒品——在统计学上被称作“自杀未遂”或者“自杀”（如玛丽莲·梦露）。男生选择的方式则被记录为醉驾事故。如果我们了解男人在醉驾事故发生之前的崩溃状态，是否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真实的男性自杀未遂的数据？如果我们这么做，可能得将醉酒“事故”中死亡人数的一半都加到男性的自杀人数上来，这会让我们对真正要自杀的男性的数量有更准确的估计。

老年男人的自杀率也被低估了。老年男人的自杀率正好是老年女人自杀率的14.5倍，[28]护士注意到他们似乎没有吃药。但是这类死亡并没有记录到自杀数据中。

男人什么时候会不吃药？在身边没有女人的时候。男人活不下去是因为没人伺候吗？不是。是因为男人没有人爱，就活不下去了。

或许最能掩盖男人自杀的是这个现实——如果保单生效不足两年但配偶一方自杀，那么保险公司就不会赔付。[29]所以每年都有千千万万的自杀事件被当作事故掩盖了起来。实际一点讲，由于老年男人的自杀率很高，当我们的父亲或者祖父自杀时，或许我们连一知半解也没有。

男人自杀，女人受伤

不论哪一个性别受到了伤害，他们所爱的人也会跟着受伤。我有个朋友走进家门看见父亲上吊自杀了。她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哪一天能摆脱此事产生的影响。同样，我的研讨会中有很多女性告诉我，她们害怕如果自己离开了酗酒的丈夫，他们可能会自杀。最近的研究证实这种担心确实不无道理。[30]这种境况困住了很多女人。

如何解决？到了我们能帮助男人参与男性组织和其他支持系统的那一天，会有无数女人因为抛弃丈夫而感到惭愧。如果自杀是一个女性问题，医院会设立专项的女性自杀救助机构而且还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吗？每个教堂和社区组织会设立女性自杀救助组织吗？会召开联邦政府资助的企

业研讨会，对失业或被炒鱿鱼的女性进行帮助吗？这些都不会发生在男人身上，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对男人和女人的无力抱以相同的同情心。

女性的抑郁相当于男性的自杀？

传言：女人更容易抑郁。

事实：女人并不是更容易抑郁，她们更容易说出自己的抑郁。新的研究发现，门诊医生未能发现2/3的男人和一半女人的抑郁。女人更容易被诊断为抑郁，但后来发现有些人并不抑郁。[31]只有我们对男性和女性都积极问询时，才能发现男性和女性受到抑郁困扰的数量是相当的。[32]

传言：女性的抑郁相当于男性的自杀。

观点：女性的抑郁并非相当于男性的自杀。说出自己的抑郁能增强女性的力量，但是自杀不能增强男性的力量。说出自己的抑郁能让女性获得帮助，但是自杀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说出自己的抑郁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但是自杀是唯一无法治疗的症状。

女人更容易说出自己的抑郁是因为她们看医生更多，因此从她们身上找出的问题更多（比如厌食症、贪食症、劳累过度、抑郁症和被配偶虐待），而且女人有能让她们更安心地说出自己的抑郁问题的支持系统。将自己的抑郁表达出来好过抑制抑郁。表达是防止“感冒”式抑郁发展成“肺炎”式自杀最有效的方式。

是什么让女人感到说出自己的抑郁是安全的？女人有朋友倾听她们，有妇女中心倾听她们，妇女收容所不但可以倾听她们还会保护她们。比如说，有妇女干预专线可以听美国12%的妻子诉说她们遭到配偶虐待或者女儿遭到父亲性侵犯的故事。但是有谁听美国12%的丈夫诉说他们遭到配偶虐待[33]或者儿子遭到父母亲性侵犯的故事呢？

“她”的问题被女性书籍、女权主义心理专家命名，再由各种女性

杂志传播出去。女性有专门解决妇科问题的医生，但是难以找到和妇产科医生对应的、解决男性问题的医生。就这样，在需要将某些问题表达出来时，“女人负责说，所有人都负责听”。

抑郁难道不更应该是女性问题吗？

被说出来的抑郁往往都和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有关。[34]但是这种对男人的依赖是成功的，足以让女人有时间去考虑生存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女人说出自己抑郁时，我们就会想到她们是中产阶级女性而不是上班族女性。上班族女性由于担心生存问题而不会说出自己的抑郁。确诊的抑郁症在不用担心生计问题的人群中呈上升趋势。一个人处于第二阶段的程度越深，就越是有条件关注抑郁问题。

相反，在工作场合越成功的男人，他的抑郁就越会被压制住，而不是表现出来。然而被压制的内容会在另一个地方表现出来——通过酗酒或者自杀。

如何解决？一起承担经济负担的女性会感到精力更集中、受到更多挑战，生活中较少出现散漫无章和压抑的情况；工作场合中有其他认可她的来源：这是一种重要的抗抑郁良药。

谁来帮助男人表达抑郁？

男人是否应该承担起表达自己抑郁的责任？不尽然。男人仍然更愿意购买教男人如何解决问题、克服障碍或者压抑情绪的冒险书籍、财经刊物和运动杂志。社会中没有男人收容所、“大男人主义”心理专家、男人求助专线或者男人中心。最大的“男人中心”是圣昆廷。[①]

心理专家们在帮助男人吗？倘若男人找到了他们，那就是这样的。但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第一次发现近30年出生的人更愿意说出抑郁问题时，

① 圣昆廷：指美国著名的圣昆廷监狱。——编者注

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人更注重心理健康才更愿意说出抑郁问题。[35]他们将说出自己的抑郁问题视为力量的象征。然而，后来他们发现女人说出的抑郁案例更多，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研究这个问题，工作组组长马上宣布，妇女的抑郁问题更多，无疑是因为她们受到近期社会变迁的影响更大。在这个时候，抑郁更关乎女人，说出自己的抑郁从被视为进步的证据，变成妇女受害的证据。[36]而且这么做的是美国精神病学会！

同样，据Dan Kiley（以治疗彼得潘症候群闻名）估计，有1000万~2000万女性虽然跟男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依然感到孤独。[37]为什么只有女性感到孤独？他是这么解释的："绝大部分患病者均为女性（男性一般不会表现出孤独）。"

实际上，那些忍受病痛但不能表达出来的人才是重病患者。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只将女性视为受害者的心理治疗是不好的吗？是的。但是它在政治上是好的。为什么？这样会让她们感到自己很特别。但是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呢？在于她们成了受害者。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两个性别都要关注，或者聚焦于问题本身——男性和女性双方都有的问题。但是这就要求我们告诉女人，正如我们以前也这样告诉男人："你的丈夫和你在一起也感到孤独，可能因为他也处于一段功能不协调的关系当中。"我们平等地要求一个女人看清楚她自己可能也对不协调的关系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尊重女性的一个标识。

这种视女性为受害者的做法促使各种自我提升的书籍告诉女性读者，她们为了他人的幸福和福利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公平地说，男女都在这么做，只是方式不同。例如在女人哭泣时，男人为解决她们的问题承担着太多的责任。

这种女性的丈夫往往会被描述为“爱批评、要求多、沉默寡言”。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沉默寡言的话，他怎么会爱批评又要求多呢？好吧，是有可能，但是如果他的批评意见被听取而不是被贴上某种标签的话，真正的沟通才能开始。

男人和我们沟通时，我们需要做的是倾听，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善沟通就否认他们的沟通，然后因为他们不沟通就否认他们的痛苦。到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男人才会向心理治疗师或其他人开口说出自己的抑郁。他们就不会成为粗糙坚强的娘娘腔：自杀阶级。

注释：

1. Jack C. Smith、James A. Mercy 和 Judith M. Conn，“婚姻状况与自杀风险”（Marital Status and the Risk of Suicide），《美国公共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1988年1月刊，第78期第79页图3。

2.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国家卫生院Eugene Rogat等人的《人口统计学、社会和经济因素影响下130万人的死亡率：1979~1985年后调查》（*A Mortality Study of 1.3 Million Persons by Demographic, Social & Economic Factors: 1979-1985 Follow-Up Survey*）第335页。（Washington D.C.: USGPO, 1992）

3.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统计：自殖民时期至1970年》（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纪念版）（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 1970）。女性自杀率从2/100000增长到4/100000，增长了2/100000；男性自杀率从12/100000 增长到26/100000，增长了14/100000。

4. 在1950年至1980年期间，15~24岁男性的自杀率增长速度是同年龄段女性的自杀率的3倍多。男性自杀率增长了211%，女性的增长了65%。见Mark L. Rosenberg、Jack C. Smith、Lucy E. Davidson 和 Judith M. Conn的“自杀人群年轻化：流行病学分析与公共健康观点”（The Emergency of Youth Suicide: A Epidemiologic Analysis and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美国公共卫生杂志》（*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Health*）1987年第8期第424页。

5.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以下简称为USDH & HS/NCHS）生命统计部，1970年、1980年和1988年的未公开资料。以下是最新数据：

自杀率（单位：1/100000）

（年龄：25~34岁）		
年份	男性	女性
1970	19.8	8.6
1988	25.0	5.7

6. 男性自杀率为19.9/100000；女性为4.8/100000，数据包括所有种族。数据来自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生命统计部死亡率统计办公室的最新统计数据（1989年），《生命统计月报》（*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1992年1月7日增补，第40期第8部分。

7. 在5岁之前，男孩的自杀率略低于女孩。25000%这个数据是从下表中的0.1%和25.8%得出的，数据来自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数据库《美国生命统计》（*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二期A部分死亡人数，第51页，表1~9，“致死72大原因的死亡率：按年龄组、种族和性别划分，美国，1988年”。（Washington，D.C.：USGPO，1991）

自杀率：按年龄和性别（单位：1/100000）
（1988~截止1991年的最新数据）

年龄	男性	女性
5~9岁	0.1	0.0
10~14岁	2.1	0.8
15~19岁	18.0	4.4
20~24岁	25.8	4.1

8. Julian Weiss，《天堂也有麻烦》（“Trouble in Paradise”），《今日心理学》1984年8月刊。西太平洋大约100个热带岛屿和环状珊瑚岛上都生活着特鲁克人。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人类学家Geoff White和Donald Rubenstein及他们的合作者历史学家Francis Hezel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中发现126个自杀者中有96位都有这种情形。在15~24岁年龄组，特鲁克男性自杀率是美国男性的25倍。

9. 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数据库《美国生命统计》A部分第二期死亡人数。（Washington，D.C.：USGPO，1991）

10. Robert Fresco，《纽约每日新闻报》1982年10月9日。

11. 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同上。

12. Shira Maguen，“青少年自杀：政府的掩饰和消失的美国儿童”（Teen Suicide：The Government Coverup and America's Lost Children），《提倡者》（*The Advocate*）1991年9月24日第47页。在美国，在青少年时期，男司性恋的自杀率是男

异性恋的8~9倍，同一时期的女同性恋的自杀率是女异性恋的2~3倍。如上所述，青少年时期的男异性恋的自杀率比同年龄段的女异性恋高出很多。

13. Joel Brinkley，“以色列男孩间兴起‘胆小鬼’致命游戏”（Lethal Game of 'Chicken' Emerges for Israeli Boys），《纽约时报》1989年4月3日。

14. 该广告是1988年播出的。在电视台播出不久后最终被禁止继续播放，不过抗议并不多。

15. Carol Gilligan，《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Jean Baker Miller，《女性新心理学》（*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1986年第二版第83页。（Boston: Beacon Press, 1976）麻省总医院丧亲儿童研究项目的共同研究主任Phyllis Silverman在《今日心理学》中解释说，Gilligan和Miller的成果都证实了失恋对女性影响更大，引自Diane Cole，《悲伤的功课：他的和她的》（*Grief's Lessons: His and Hers*），《今日心理学》1988年12月第60页。

16. Jack C. Smith，James A. Mercy 和 Judith M. Conn，同上。

17. 同上，第78页。

18. 美国西南地区海军军医司令部公共事务部主任Pat Kelly，引自Ed Jahn的《海军调查自杀事件》（*Marines Investigate Suicides*），《圣地亚哥联合报》（*San Diego Union*）1988年12月3日。

19.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麦克莱伦空军基地监察长办公室顾问Meyer Moldevan估计，在役人员、他们的直系亲属以及退休军人中有9000起自杀未遂。引自Jahn上述文章。

20. 这是美国西南地区海军军医司令部公共事务部主任Pat Kelly的评价。引自Jahn上述文章。对于所涉原因的判断是在和朋友们讨论自杀信和使他们崩溃的原因时得出的。

21. 美国西南地区海军军医司令部公共事务部主任Pat Kelly，引自Jahn上述文章。

22. 同上。

23. 在美国，男人的自杀率为19.9/100000。1982年，中西部北部农民的自杀率为58/100000。19.9/100000这个数字来自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生命统计部死亡率统计办公室的《生命统计月报》1992年1月7日增补，第40期第8部分。58/100000是1982年从一项研究结果中得到的，该项研究于1991年10月14日由美国威斯康星州沃索国家农业医药中心发布。

24. 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生命统计部死亡率统计办公室的《生命统

计月报》1989年9月26日，第38期，第5部分，第25页表10，“致死72大原因的死亡率：按年龄组、种族和性别划分，美国，1988年”。

25. 美联社，《银幕超人George Reeves在家自杀身亡》（“George Reeves，TV Superman，Commits Suicide at Coast Home”），《纽约时报》1959年6月17日。

26. Tom Williamson，《男人的无力感》（*Male Helplesssness*），Francis Baumli博士的《男人解放男人》（*Men Freeing Men*）第129~130页。（Jersey City，N.J.：New Atlantis Press，1985）

27. 美国加州英格尔伍德林荫大道西6547号飞鱼贺卡上表达的情感。

28. 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数据库《生命统计月报》A部分死亡人数第二期。明细如下：

自杀率：按年龄和性别（单位：1/100000）

年龄	所有种族/男性+女性	男性	女性
85岁以上	22.1	66.9	4.6

29. 州政府规定保险公司在客户购买保险第一个两年之后支付，不得在头两年之内支付（如果在两年之内的话，必须将保险费还给客户）。信息来源：1992年7月9日采访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经理Tim Kime。

30. Dr. Richard C. Fowler，Dr. Charles L. Rich 和 Dr. Deborah Young，《圣地亚哥自杀事件研究》（“San Diego Suicide Study”），《普通精神病学文献》（*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又见Allan Parachini，《青春、毒品、自杀：数字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Youth，Drugs，Suicide：Statistics Tell a New Story”），《洛杉矶时报》1988年6月1日。

31. Marilyn K. Potts等人的“抑郁症鉴定中的性别差异：临床诊断与标准化评估的比较”（Gender Difference in Depression Detection：A Comparison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Standardized Assessment），《心理评测》（*Psychological Assessment*）1991年12月刊，第三期第4部分，第609~615页。

32. David C. Clark博士与Peter B. Zeldow博士，《四年医校生涯中抑郁情绪的变迁》（*Vicissitudes of Depressed Mood During Four Years of Medical School*），《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88年11月4日，第260期第17部分，第2521~2528页。

33. Murray Straus 和 Richard Gelles，《两项全国调查反映出1975年至1985年的社会变迁和家庭暴力变化》（“Societal Changes and Changes in Family Violence from 1975 to 1985 as Revealed by Two National Surveys”），《婚姻与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86年第48期。

34. Maggie Scarf，《更忧郁的那个性别》（"The More-Sorrowful Sex"），《今日心理学》1979年4月刊第45页。

35. Janny Scott，《研究发现年轻人中抑郁盛行》（"Studies Find Depression Epidemic in Young Adults"），《洛杉矶时报》1988年10月9日。

36. 同上。

37. Dan Kiley，《一起生活，感到孤独》（*Living Together*，*Feeling Alone*）。（New York：Rrentice Hacc，1989）

第七章
为何女人更长寿?

是生理原因吗?

词条：在今天的孟加拉国，男人比女人更长寿。在今天的纽约哈莱姆地区，女人比男人更长寿。纠正一下。在哈莱姆地区，女人比男人长寿很多。[1]如果生理性是唯一的变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

我们了解到非白人人种能活到85岁的人数是白人的80%时，[2]我们知道这是因为非白人人种相对弱势。但是……

词条：男人活到85岁的概率只有女人的一半。[3]

词条：男人25岁的时候，他的“生存”焦虑达到顶峰。以下是挺过这一年的人的比例：

挺过这一年的人的比例

（25岁）[4]	
女性（白人）	1754∶1
女性（黑人）	943∶1
男性（白人）	561∶1
男性（黑人）	311∶1

词条：在15大死因中，有12条死因中黑人比白人死得更早。在所有15大死因中男人都比女人死得更早。[5]

工业化因素

词条：一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高，男女两性的平均寿命就越长。但是工业化使女性的平均寿命是男性的近2倍。[6]

在未工业化的社会中（例如19世纪的意大利和爱尔兰），男女寿命差距一般只有1~2年。[7]小罗伯特·肯尼迪细查过自己的血统，他发现在世纪之交时爱尔兰农村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短。[8]死于肺结核、白喉、肺炎、麻疹、心脏病、烧伤和烫伤的农村女人数量比男人多。[9]当女人进入城市以后，比如19世纪初的英格兰女性，她们的死亡率下降了1/3。[10]发生了什么事？

15大死因中男女死亡的比率[11]

排序	死因	男女比例
1	心脏病	1.9：1
2	癌症	1.5：1
3	脑血管疾病	1.2：1
4	意外事故及其副作用	2.7：1
5	阻塞性肺病	2.0：1
6	肺炎与流感	1.8：1
7	糖尿病	1.1：1
8	自杀	3.9：1
9	慢性肝病	2.3：1
10	动脉硬化	1.3：1
11	肾炎	1.5：1
12	杀人罪	2.0：1
13	血液感染	1.4：1
14	出生后夭折	1.3：1
15	艾滋病	9.1：1

*原始数据里面使用的专业疾病名称见尾注。

女人和男人的平均寿命相差无几时，似乎因为女人不仅会死于生产（比想象中的数量少），也会死于传染病、寄生虫病、恶劣的卫生条件

和水质、恶劣的医疗条件以及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在工业化社会中，早逝更多的是由压力引发的疾病导致的，因为压力过多会损害免疫系统。压力成为造成死亡的重要因素之后，男人的寿命才开始比女人的短如此之多。

工业化中的双重标准

工业化进程将男人从田间和家庭中转移到工厂里，几百万男人就此远离了爱他们的人。而工业化进程让女人与家庭紧密联系，正如前文所说，她们的孩子数量更少、相处时间更多、管教孩子更方便、对是否要生孩子有更多控制权、死于生产的概率更小而且死于任何疾病的概率都更小。所有这些因素使1990年的女性寿命比1920年的延长了50%。[12]那些我们称之为男性力量的东西实际上让女性产生了力量。它实实在在给了女人寿命。所有女性都赶上了从工业化革命开往满足感革命的第一趟公交车。

男性的新角色——远离家庭去工作——足以让男女双方都面临毒瘾、自杀和意外事故。有一首歌的歌名可以概括其造成的结果：《好人不长命》（*Only the Good Die Young*）。这些不长命的人身上有哪些共同点呢？想想看Jim Morrison，Jim Croce，Jimi Hendrix，John Belushi，Janis Joplin，Buddy Holly，Charlie Parker，Patsy Cline，Elvis，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兄弟。他们在工作方面都很优秀，而且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远离了他们的中心、远离了爱他们的人。最终他们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工业化让男性角色离开家去工作。事实上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远离家庭去工作时都很脆弱，这让我们考虑两性角色对生理的影响有了点头绪。

如今女人不也离开家去工作吗？没错，但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有

2/3的职业女性至少在一年内不出去工作。[13]丈夫们从养活一个人突然变成养活3个人。总之，因为家庭原因离开工作岗位半年甚至更久的女性是男性的43倍。[14]这种选择可以让女性根据自己的个性调整自己的角色，然而男性的岗位任期——专职工作——却不能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个性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如果他想为家人提供好的生活条件，他就要身着西装，而不是身着适合他的服装。

为什么在1975年至1990年之间男女寿命差距稍微缩小了（从8年缩小到7年）？一方面因为男人的健康习惯对身体更有益，而女人的则对身体更有害。于是，更多女人死于一种中国人称为“富贵病”的病症——乳腺癌。女人也离开家庭去工作，她们的这个部位也会因为压力而患病。

另一方面，为什么这个差距没有继续缩小呢？因为即使是全职职业女性的丈夫，他们每个星期也要多在外工作9个小时，并且每个星期在上下班路上也要多花两个小时。[15]女性同样承担着工作重担，但是她仍然可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进行平衡。如果她的丈夫事业比较成功，她就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还可以按照她的生活阶段对此进行平衡。选择性更多、生活更为平衡、与家人更紧密的联系也使得她能够多活7年。

工业化进程扩宽了女性的选择范围，也加深了男性的模式化。她身兼多职，她和一切都可以建立联结；他专心专职，他远离了爱。这两方面都比过去更为深刻，但是她的联结造就了生活，他的远离造就了死亡。

于是，在华尔街“大发横财”使他成为最新版的杀人者兼保护者：他仍然要死，她仍然会被保护。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能够更好地保护他和她，但是保护她的程度远远超过保护他自己。

基因因素

如果男性天生具有更优异的免疫系统，那么这应该是我们更关心女性健康的基本理论基础："女性很脆弱，女性需要保护。"然而，女性的双X染色体使她们生来就有一种基因上的后备系统。[1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的一条X染色体丝上有一个有缺陷基因，那么她的另一条X染色体丝上的匹配基因很可能是没有缺陷的。[17]男人则没有这种后备系统。

所以女人具有这个先天优势，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全面的优势。鸟类、蝴蝶和飞蛾都是雄性天生配备了这种后备系统，但雄性仍然死得更早。[18]而在人类身上，男性1岁以后的早逝几乎都是由各种压力引起的疾病导致的，以及与男性角色有关的压力造成的——从自杀到心脏病、从癌症到谋杀。

对此更有力的证据是，男性因社会角色引发的脆弱和生理方面的脆弱是分不开的。比如，当男性条件反射式地去营救女性时，他们不仅身体被刺伤、被枪击或者被揍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营救行为本身会产生"应急激素"。又比如，男人会分泌睾丸激素，但是睾丸激素会弱化他们的免疫系统；[19]他们会分泌肾上腺素，但是肾上腺素也会造成血液凝结，容易造成心力衰竭。

就像有些国家为了"以防万一"而造导弹，但是后来发现这些花费削弱了他们在其他方面能力的提升。男人也是这样，为了成为女人随叫随到的免费保镖而付出了生理代价。

为什么男性角色如此耗费生命

在（1~4岁的）幼童中，男童的死亡率只比女童的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一旦他们成年——15~24岁，死亡率就增至女性的3倍以上。[21]那么，我们

可以认为，男性角色对男性生命力的消耗是女性角色对女性生命力的消耗的3倍。[21]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男孩为了配得上女孩的爱而需要做事、付钱和追求她们，这些会引起他们的焦虑，有时会导致自杀。这也催生了一系列的应对机制，所以尽管男孩显得更为成功，但这些应对机制使他们做好准备更悄无声息地去死。以下是两个例子：

男式挑刺法

如果你的儿子已经过了青春期（或者你自己），你应该知道青少年的“死党”是相互“泼冷水”的那个人。为什么“相互泼冷水”成了男性青春期的互动形式？为什么这种“男式挑刺法”这么有伤害性？

这种相互泼冷水的做法是男孩在预演成年期接受批评的能力。接受批评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其中的好处是可以让男性在将来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中不会将批评意见看成是针对自己的。坏处就是“间接税”。

间接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最近的报道称，我们谈论别人的缺点会引起心脏搏动异常。小异常？不是。异常程度相当于骑固定自行车骑到筋疲力尽或者胸痛。[23]很可能这种批评使男人在50岁前遭受心脏病袭击的概率是女人的4倍。[23]总之，我们的儿子可能是在做心脏病训练。

男人靠相互贬损对方建立联结，而女人靠相互支持对方建立联结。男人付出的代价就是感到被孤立和孤独。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孤独是一台心脏病的强力预报器。[24]那么心脏病也就成了这种泼冷水做法产生的“间接税”。男式挑刺法变成了男式心脏病。

男式滋养法

在我组织的几乎所有男性团体里，男人都会讨论工作中面对的问题——尤其是老板和同事不欣赏他们或者批评他们时的感受。如果我们问起一个男人，他是否与他的妻子或者女性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时，他通常会说有，但只是随便提了提而已。为什么？他说他不想让她担心。

不让妻子担心他的工作是很多男性提供滋养的形式——保护他爱的女人，让她有安全感。所以他制造出一种安全的假象，这个假象阻止他为了最深处的不安全感而求助。

这一困境所产生的压力默默地损害着男人的免疫系统。他可能会从“替身妻子”（第二个女人、第二份工作、第二杯酒或者第二针）那里寻找满足感……这就是男人酗酒问题是女人的3倍的原因。[25]如果他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就会找到他：癌症、心脏病……

温柔地杀死他

这些应对机制——或者说防卫机制——以比过去温柔很多的方式杀死男人。在男人为了养家而献出毕生精力、结果他的收入却成为妻子离开他的原因时，死在煤矿的男人少了，心如死灰的男人多了。当他看着孩子们走出家门反抗他时，他的精气神很快就耗尽了，就像樱桃节上白兰地的火焰一样迅速燃烧耗光。

做事的需求大于做事的资源时，男人就成了那个被随意支配的性别：

被随意支配的性别

	男性	女性	男性所占比例
无家可归人员[26]	165000 ~ 231000	32000 ~ 45000	83%
死于艾滋病的人[27]	69929	7421	90%
华盛顿越战将士纪念碑上的名字[28]	58183	8	99.99%
在东南亚失踪的美国战斗人员[29]	2267	0	100%
囚犯[30]	758294	46230	94%

注：没有资源却被要求做事的最大受害者，是黑人少年和他们的父辈。

黑人男性：未被温柔以待的被忽略者

在1990年寿命比1980年还要短的唯一人群是黑人男性。[31]为什么？首

先，黑人男性经历了第一阶段委身做奴求生存，到了第二阶段却要做技术大师的巨大差距。于是，现在黑人男性比黑人女性少活9年。[32]尽管如此，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关于黑人女性遭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困境。

在监狱系统里的黑人男性比在大学系统里的还要多。[33]多达1/4的黑人男性在看守所、监狱，或处于缓刑期或者假释期。[34]这比大学里的黑人男性数量多出近50%。[35]这个数据与黑人女性的数据相差甚远。否则的话，想象一下会有多少为黑人女性提供的职业培训、教育和康复计划出现。黑人男性面对的不是双重困境而是三重困境：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忽视。

由于不同的原因，白人和黑人都不愿意谈起这一现象：黑人男性做庄园奴隶时，大部分人更依赖于自己强壮的身体，而大多数黑人女性则不然——然而如今科技的发展使身体强壮与否越来越无关紧要了。同样，白人女性和男性奴隶工作时，他们的家人都会受益。黑人女性和男性奴隶工作时，受益的却是其他人。因此，对于白人来说，努力工作意味着生存，而对于黑人奴隶来说，努力工作意味着其他人的生存——付出代价的却是他们自己。由于我们过去不愿意讨论这一事实，结果阻碍了推行“肯定性行动计划”去鼓励黑人，比如鼓励黑人父亲与黑人儿子生活在一起（而不是给黑人母亲经济支持，让黑人父亲远离他的儿子）。

有时黑人男性被称为濒危物种，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濒危物种通常能够得到的保护。在那些猫头鹰已然成为濒危物种的地区，我们并没有想过将雄性猫头鹰和小猫头鹰分开。然而美国政府推出了一个巨大的项目，这个项目直接造成了贫困男性——尤其是黑人和穷人与他们的孩子分开。这个项目叫作“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如果父亲在家，那么这个家庭就得不到补助。这个项目使父亲远离了让他们有生活动力的最重要的两件事：爱和被需要的感觉。

医学研究不是忽视女性吗？

由于有人认为性别歧视导致大众重点关注男性健康而不是女性健康，后来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都重点关注女性健康，以牺牲男性的健康为代价。政府最近设立了一个女性健康研究所，却没有男性健康研究所。[36]政府还设立了少数族裔健康办公室，并将女人划为少数族裔，[37]却没有把男人划为少数族裔而建立相应的少数族裔健康办公室。由于有人认为女性遭到了忽视，所以私立医院和医疗公司创立了女性保健中心，但几乎没有男性保健中心。[38]让我们看看那些传言和事实吧。

大传言：女性的健康问题得到的资金支持和关注不及给予男性的。

支持性传言1：“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用于研究女性健康的预算不到20%。”[39]

事实：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在两性健康方面的支出是旗鼓相当的。用于研究女性健康的预算不到20%，这是因为有85%的预算用于研究无性别差异的健康问题（或者基础科学）；10%用于女性健康的研究；5%用于男性健康的研究。（数据来自美国国立卫生院女性健康研究所的分析数据。[40]）

支持性传言2：几乎所有医疗研究领域都对男性健康展开了更多的研究，这是由性别歧视造成的。

事实：一项针对3000多份刊物的研究发现，关于女性健康和男性健康的文章数量比例为23：1。[41]

事实/观点：从大的方面来看，新产品和可能有危险的药物常常用犯人做实验是真的。这是因为我们对犯人漠不关心，而他们常用男性犯人做实验是

因为我们对男人漠不关心。同样，磺胺药物、迷幻药和其他实验性研究常以军人为实验对象。那么军队的男人们是否得到了任何回报？是的。从此只有男人必须服役。总之，我们在小白鼠身上做的实验多于在人类身上做的实验，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在监狱里的男人、军队的男人，以及其他男人身上做的研究都比在女人身上做的多。

支持性传言3： 如果有一种疾病令男性和患有乳腺癌的女性一样很快死去，男人也会得到资金支持以便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 女人死于乳腺癌的概率是男人死于前列腺癌的14%，[42]但是用于乳腺癌研究的资金支持是用于研究前列腺癌的660%。[43]死亡人数与研究资金的比例是47:1，女性得到的资金支持更多。

事实： 在过去5年中，前列腺癌的死亡率几乎增长达到乳腺癌死亡率的2倍。[44]

事实： 美国黑人男性的前列腺癌发生率是世界上最高的。[45]

支持性传言4： 实际上女性的所有健康问题——从卵巢癌到更年期问题——都遭到了忽视，包括研究方面和治疗方面。

事实： 过去的研究中忽视了女性的健康问题，例如卵巢癌和更年期问题，但是现在新成立的NIH女性健康研究所已经对此进行了补救。以下是在研究中遭到忽视的17个男性健康问题，现在依然没有任何人对此进行适当的补救：

- 男用节育药物
- 自杀

- 创伤后压力综合征
- 可能会带来创伤的包皮环切
- 男性的中年危机
- 阅读障碍
- 男性暴力的诱因
- 刑事累犯
- 无家可归
- 滥用类固醇
- 色盲
- 睾丸癌
- 30岁之后的听力下降
- 阳痿
- 非特异性尿道炎
- 附睾炎（是一种与输精管有关的疾病）
- 克氏综合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ALD）和其他只遗传给男性的疾病

事实：男性更容易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女性患精神疾病后得到治疗的概率是男人的近2倍。[46]

是的，我们需要对女性的健康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就像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基础研究并对男性的健康问题进行更多研究一样。但是，这些具体研究不应受到性别政治太多的影响，不至于忽视基础研究（DNA、细胞、移植等）——这些研究可以帮助男女更长寿。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从为医疗研究人员而不是导弹研究人员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开始。

支持性传言5：目前女性和男性死于心脏病的概率相当，但是由于性别歧视，研究项目中只研究男性。

首先，心脏病的致死率……

事实：相对其他疾病而言，心脏病已成为女性的第一大杀手。但是男性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仍然比女性高很多：在年龄低于65岁的人群中，男女因心脏病致死的比例为3：1。[47]甚至在年龄低于85岁的人群中，男性的死亡率仍然略高。[48]

换个说法，死于心脏病的女人中几乎有3/4是75岁及以上的。[49]这时候同年龄组的男人已经死了3年了。[50]

其次，那次满城皆知的医疗性性别歧视事件——关于阿司匹林对心脏病的影响研究中只以男人为研究对象……

事实：是的，确实有一项关于阿司匹林对心脏病的研究只研究了男医生。[51]而且同时还有一项研究是专门针对女护士的（也是关于阿司匹林对心脏病的影响）。[52]但是媒体只把对男性的研究夸大为性别歧视。然而针对女性的研究周期更长，而且研究人数中的男女比例为1：4。[53]

针对男人为何死于心脏病进行更多的研究是否有实际的意义？有。比如说，把患心脏病的男性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集体治疗，而另一组不接受；接受过治疗的男性冠状动脉阻塞情况好转，但是没有接受治疗的男性这一情况加重。[54]如果心脏病是由压力引发并能通过控制压力来缓解的话，我们就有必要更了解引发心脏病的压力类型和缓解心脏病的治疗类型。依此找出的答案能够帮助所有人。

无论怎样，单一性别的研究——不论目的在于防止心脏病还是防止配

偶虐待——都应该是稀有的。为单一性别研究提供资助的法则应该被要求提供证据，证明不需要对另外一个性别进行这一研究，而不是接受不需要对其进行此项研究的假设。

支持性传言6：因为性别歧视存在，有心脏病症状的男性更容易得到最先进的检查和最有效的手术治疗：冠状动脉架桥术和血管成形手术。

事实：冠状动脉架桥术致女性死亡的概率是致男性死亡的2倍多。[55]为什么？一方面，因为女性的冠状动脉较小，因此手术后更容易闭合。[56]另外一方面，因为患有心脏病的女性有近3/4的人年龄在75岁以上，而且很多人也患有乳腺癌或者其他并发症，所以实施手术很容易死亡。[57]结果，女性拒绝做冠状动脉架桥术和血管成形手术比60岁男人拒绝这些手术的概率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女性较少被要求做费用不菲但一定程度上又有必要的诊断性检查。

知会同意的政策意味着最终的决定权不在医生而在患者手上——而且患者考虑到自己的境况会减少相应的检查和手术。将女性患者的决定称为性别歧视，就是认为她挽救自己的生命的决定是愚蠢的。

事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需要控制的其他并发因素（例如行动不便、高血压和肥胖）的出现，男性和女性在心脏病治疗方面并无差别。[58]

总之，自1920年之后女性寿命延长了近50%，医疗研究的进步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医疗研究的进步才出现了女性避孕药（但没有男性节育药），减少了死于分娩的女性数量，而且也对致女性和男性死亡的疾病（肺结核、白喉和脊髓灰质炎）进行了研究。女性的寿命从原来比男性长1年变成比男性长7年，女权主义者却将其称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真是讽刺。如果是男性寿命更长的话，女权主义者会如何称

呼医疗界呢？或者，在15大死因中较为早逝的都是女性的话又会是怎样呢？

乳腺政治与前列腺政治

男性的前列腺炎也会致死，但是为什么乳腺癌得到的资金支持是前列腺癌的600%以上呢？我们是否真的很了解前列腺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

词条：在20世纪20年代，新的前列腺肥大手术取代了原来的手术方法。之后的60年里没有人研究过手术记录，以便确认新的手术方法是否和原来的一样有益。当一些研究完成后，人们才发现新的手术方法致使术后5年内的死亡率增加了45%。最终在研究完成7年后，相关数据于1989年才被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59]

有关前列腺癌的研究发现，做过输精管切除术的男人患前列腺癌的概率是没有做过此手术的男人的4倍。[60]研究人员在老鼠身上也已发现了类似的关联性。尽管有了这些发现，但是由于缺乏项目研究基金，科学家们无法探究前列腺癌是不是因为输精管切除术或其他与输精管切除术有关的因素（睾丸激素水平）引发的。

在15~34岁的男性中，睾丸癌同样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如果能在早期发现，就有87%的概率能存活下来。[61]但是我们只告诉女性要尽早发现癌症。

如果我们告诉男性定期进行直肠检查以防止前列腺癌，并定期进行睾丸自检的话——用我们告诉女性进行定期乳房自检的那种方式，那么我们可以挽救成千上万男性的生命，就像我们现在挽救了成千上万女性的生命一样。最高法院的法官Blackmun和Stevens就是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自己患上前列腺癌的。[62]他们及时发现了癌症并因此保住了性命。

避孕药研究的缺乏不就意味着不关心女性吗?

当欧洲已经有避孕药出售但美国还没有时，美国女性一片哗然，她们认为不愿出售避孕药是在漠视可能死于分娩或流产的女性。但是当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发放了含有激素的避孕药，之后又发现激素含量过高时，她们又攻击说，未对激素含量进行必要的测试使其降到最低水平也是对女性关怀不够。[63]

总之，女人的生命处境危险时，我们就会跌跌撞撞，绊倒自己，进退维谷。男人的生命处境危险时，可用数据甚至已经埋藏了半个多世纪也没有一个人去研究它们。

男医生对待男性病症更认真吗?

有人认为男医生在治疗男性患者时更认真，《美国医学会杂志》（*Amerian Medial Association*）刊登了Lawrence Schneiderman的此项研究。[64]但是在我采访Schneiderman医生时，他解释说实际上他做了两项研究：一项研究发现男性患者得到稍微更为严肃的治疗；另一项则发现没有差别。第一项研究不仅引起了权威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注意，更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65]第二项研究则发表在一本没有多少权威性的小型杂志上而且被媒体忽视了。[66]在第一项研究中，女性患者看医生的频率是男性患者的150%；在第二项研究中，男性和女性患者看医生的频率相同。

医生对男性患者的治疗态度更为严肃真的是性别歧视吗？如果男性死在医院里的概率更大，[67]在15大死因中是较为早逝的一方，在其病症发展到晚期之前都较少求助，那这就不是性别歧视。第二项研究表明，男人遇到更严重的问题时却得到了相同的治疗。这才是对男性的性别歧视。

以上结果并不是在否认很多医生对治疗效果而不是对患者更为敏感。

每天面对死亡，麻木便成了医生的阴暗面。所以毫无疑问，患者感受到的是医生的傲慢而不是关怀。傲慢是给予保护后带来的阴暗面。女性患者遭遇的傲慢态度比男性患者更多吗？也许吧。女人比男人得到更多的保护，而傲慢是保护的阴暗面……

将来的解决办法

虽然有一项政府研究发现，男性的健康状况远不及女性，但全国上下该研究报告的标题都写着“少数族裔面临更大的卫生保健缺口”。[68]他们并未称：“男性面临更大的卫生保健缺口”。为什么？因为我们将牺牲男人的生命与拯救其他人的生命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导致我们无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动机：我们不关心男人活了多久。如果这个现状改变了，政府就会启动搜寻战俘的行动，而不是阻碍搜寻行动。但是在我们断开这种关联性之前，一切都会照旧。

如果我们给予男性足够的关心，并设立男性健康办公室，现状真的就会改变吗？是的。男性健康办公室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前所未闻的男性问题。还记得初中和高中里有语言障碍问题和胸部肥大的少年吗？在我的学校里，孩子们叫他们“结巴”和“三胖子”。但是，如果他患有克氏综合征，那么他就会有染色体异常问题（他有47条染色体，而不是正常人的46条），而这种染色体异常只对男性产生影响（概率为1/400），会致使男孩发育不良。如果一个男孩患有克氏综合征，可能他的父母不知道，他的老师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需要那些爱他的人知道如何去爱他，而不是告诉他少吃点饭、话说清楚一点。他需要一群支持他、爱他的人，而不是一群叫他“结巴”的人。我确定他一生中都会带着心理创伤，而我们每个人本来都可以帮助他避开这些问题。男性健康办公室可以帮助我们去帮助他。

好的教育计划可以防止每年死于前列腺癌的男人超过每年死于越战的人。[69]而好的研究会帮助我们了解，在老鼠身上输精管切除术和前列腺癌之间有多大得关联，在男人身上又有多大的关联。[70]

虽然6岁以后睾丸才下降至阴囊的男性患睾丸癌的概率是其他人的近10倍，但迄今为止我只遇到过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睾丸在他多大年纪时下降到阴囊。极少有男人，了解这一点。而且极少有父母有足够的知识让儿子们了解这一点。[72]男性健康办公室可以提供这类教育，但是有几个问题有必要问一问，比如说："为什么女人能在电视上秀胸部，而画男人的阴茎和睾丸的铅笔画却不能展示出来？"

男性健康办公室可以率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自杀危机热线，为自杀率是同龄女性的1350%的老年男性建立支持系统，并就青春期的男性压力和青春期男性自杀之间的关联问题为中学辅导员制定教育计划。

男性健康办公室可以对男性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醉驾而被捕的男性数量是女性的7倍，[71]而因为酗酒问题就医的男性数量只有女性的3倍。[72]

我们常把越来越严重的女性的抽烟、酗酒问题解读为女性压力水平的升高。然而酗酒和死于肺癌的男性数量是女性的3倍，我们却很少把这一现象视为男性压力水平的持续升高。总的来说，我们以各种新的途径去了解（和帮助）女性，这一点很好，却无法用同样的思维去更好地了解（和帮助）男人。

我们还有选择。我们可以继续让儿子们适应社会，让他们去救火、让他们在和自己的感受做斗争时感到吃惊。或者，我们可以反对男孩这样适应社会，并且反对女孩这样适应社会而爱上追求她们、为她们付款和做事的男孩；停止贿赂男童，以便用足球训练的方式来摧残他们，并将之称为教育；制定相关计划，防止男人成为囚犯和无家可归者。如果女性过去的

寿命比男性短1年但如今比男性短7年，过去在15大死因中死亡率和男性持平但突然间女性成为15大死因的首要受害者，这种时候我们会如何对待女性？我们现在就应该这样对待男性。

注释：

1. 在孟加拉国，55%的男性和50%的女性能活到65岁。在美国哈莱姆地区，40%的男性和65%的女性能活到65岁。见医学博士Colin McCord和医学博士Harold P. Freeman，《哈莱姆地区的超额死亡率》（“Excess Mortality in Harlem”），《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90年1月18日，第322期第173～177页。

2. 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健康杂志》（*Wellness Letter*）1991年10月刊第1页。该杂志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公共卫生学院联合发行的。文中写道：“1989年出生的1000名白人女孩中约有409名可能会活到85岁，但是能活到这个年龄的男孩只有她们的一半——1000人中有224人。非白人种族中，活到85岁的概率更小：每1000名女孩中有348人，每1000名男孩中有174人。”

3. 女孩出生后有40%可以活到85岁，有21%的男孩可以活到85岁。同上。

4. Tom和Nancy Biracree《美国人年鉴》（*Almanac of the American People*）。

5. 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生命统计月报》1989年9月26日增补，第38期第5部分。《1987年死亡率统计报告》第6页表D“15大死因中死亡的比率，按性别和种族：美国，1987年”。

6.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987年美国统计摘要》第820页，表1439“城市人口、成长、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平均寿命——部分国家”；第824页，表1445“以时价和不变价（1982年）美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75~1983年”。

7. 《1967年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第730页。（New York：United National Publishing Service，1968）同时引自Sheila Ryan Johansson，《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性别与死亡：1840~1910年各年龄段死亡率调查》（“Sex and Death In Victorian England：An Examination of Age-Specific Death Rates，1840～1910”），收录于Martha Vicinus编辑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角色变化越来越大》（*A Widening Sphere：Changing Roles of Victorian Women*）第163页、第166页。（Bloomington，ind.：Univeristy of Indiana Press，1977）

8. Robert Kennedy，《爱尔兰岛男女的社会地位和相对死亡率》（“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Sexes and Their Relative Mortality Rates in Ireland”），见William

Petersen编辑的《人口学读物》（*Readings in Population*）第121~135页。（New York: Macmillan, 1972）

9. Johansson，同上，第163页、第166页。

10. Thomas A. Welton，《移民对死亡率的影响》（*The Effect of Migration upon Death Rates*），《伦敦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75年第38期（数据摘要和解释见第23~27页）。

11. 同上。官方文件中使用的专业词汇与我在文中使用的词汇有所不同，如下：

（1）心脏病

（2）恶性肿瘤（包括淋巴肿瘤和造血组织肿瘤）

（3）脑血管疾病

（4）意外事故及其副作用

（5）慢性阻塞性肺病及相关疾病

（6）肺炎和流感

（7）糖尿病

（8）自杀

（9）慢性肝病和肝硬化

（10）动脉粥样硬化

（11）肾炎、肾病综合征、肾变病

（12）他杀和依法处死

（13）败血病

（14）围产期病症

（15）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12. 1920年，女性的平均寿命为54.6岁。1990年，女性的平均寿命为78.8岁。期间增长了44.3%。1920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为53.6岁。1990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2.0岁。期间增长了34.3%。数据来自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生命统计月报》。

13. Laurie B. Lande，《新妈妈返回职场》（"First-Time Mothers Return to the Workforce"），《劳动评论月刊》（*Monthly Labor Review*）1990年10月刊，第113期，第10部分第38~39页。

14. 64%的职场女性会离开职场6个月以上去照顾家人，1.5%的男人会这么做。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现有人口报告》中"长期工作经验及其对收入的影响"第6页，表A"工作中断记录，按种族、西班牙裔和具体特征：男性"，第7页，表

B “工作中断记录，按种族、西班牙裔和具体特征：女性”。职场中请假或者离职的最新数据截至1992年。1992年7月22日，美国人口普查局房地产和经济统计局的Jack McNeil接受了采访。

15. 见Martha Hill，《时间、购物和健身的时间分配模式》（*Patterns of Time Use in Time, Goods and Well-Being*）表 7.3，编辑 F. Thomas Juster 和 Frank P. Stafford。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工作小时数数据中包含了兼职工作的数据，发现差距达到9小时以上。（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中没有包括兼职工作的数据，所有差距只有4个小时。）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在职场的工作时间也超出9个小时，但这一数据包括了全职、兼职和无业人员的数据。1991年5月31日采访Martha Hill得到的信息。（Ann Arbo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

男人每周在上下班路途上花4个小时，女人为2个小时。见 John Robbinson，《行在路上的美国人》（“Americans on the Road”），《美国人口统计数据》（*American Demographics*）1989年9月刊第10页。

16. Kenneth Wetcher、Art Barker和P. Rex McCaughtry，《拯救男性：为什么男人被虐待、被误诊、被误解？》（*Save the Males: Why Men are Mistreated, Misdiagnosed and Misunderstood?*）。（Summit, N.J.: The Psychiatric Institutes of America Press, 1991）

17. 同上。

18. Edward Dolnick，《女超人》（“Super Women”），《健康杂志》《*In Health*》1991年7月刊，第45页。

19. Wetcher、Barker 和 McCaughtry，同上。

20. USDH & HS/NCHS公共健康服务中心《新生儿、婚姻、离婚和死亡年报：1990年》（“Annual Summary of Births, Marriages, Divorces and Deaths: 1990”）第13页表4。男女比例为3.1∶1。

21. 同上。同样，15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极少死于心脏病，然而他们的死亡率相当。但是，只要过了青春期，男孩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女孩的2倍。上面这一数据见USDH & HS/NCHS的《美国生命统计数据》第一部分《总死亡率》，第44页，表1-10，“72大死因的死亡率，按年龄组、种族和性别：美国，1987”。（Washington, D.C.: USGPO, 1991）

22. 医学博士Alan Rozanski，《冠心病患者的精神压力和诱发的无症状心肌缺血》（“Mental Stress and Silent Ischemia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8年4月21日，第318期第1005~1012页。

23. USDH & HS/NCHS的《美国生命统计数据》，第一部分《总死亡率》，第44页表1-10，“72大死因的死亡率，按年龄组、种族和性别：美国，1987”。（Washington，D.C.：USGPO，1991）

24. Robert Suro，《心脏与思想》（“Hearts and Minds”），《纽约时报》1991年12月29日。又见医学博士Dean Ornish的《Dean博士的防止心脏病计划》（*Dr. Dean Ornish's Program of Preventing Heart Disease*）。（New York：Random House，1990）

25. 未出版数据，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全国出院调查，《短期住院的所有诊断数量，按年龄和性别：1987年》（*Number of All Listed Diagnosis from Short-Stay Hospitals，by Age，and Sex：1987*）。引自美国全国卫生统计中心调查部的Jill Braden，于1990年3月15日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由于与酒精相关的综合征而出院的住院病人
总人数：842000人

男性	15~44	45~64	65+
631000	349000	200000	79000
女性	15~44	45~64	65+
211000	121000	65000	23000

26. 这是住房和发展理事会（HUB）的最新估计（其他方面估计无家可归的男人数量高达240万人），引自Don Johnson的《男尸的孤独》（*The Loneliness of the Male Body*），《妇女健康》（*American Health*）1989年1月/2月刊，第63~64页。又见Martha Burt和Barbara Cohen的《美国流浪汉：数量、特征和援助计划》（*America's Homeless：Numbers，Characteristics and Programs that Serve Them*）。（Washington，D.C.：urban Institute Press，1985）

27.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991年美国统计摘要》第83页，表120“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致死人数”。

男人	69929	（90.4%）
女人	7421	（9.6%）

28. 1992年2月18日采访Jerry Graf时得到的信息，他来自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退伍军人纪念部。

29. 1992年1月29日采访国防部Jerry Taylor时得到的信息。

30. 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年中囚犯录：1991年》1991年6月30日，第6页。

31. Marc Lacey，《解决黑人的病症》（"Solving the Ills of Blank Men"），《洛杉矶时报》1992年8月1日。

32. USDH & HS/NCHS的《美国生命统计数据》。白人女性的寿命为78.9年，黑人女性为73.6年，白人男性为72.2年，黑人男性为65.2年。

33. 在大学读书的黑人男性有436000人，包括所有年龄；受到刑事司法控制的年轻黑人男性有609690人。另外，白人男性在大学读书的人数是受刑事司法控制人数的4倍。见Marc Mauer，《刑事司法系统下的年轻黑人男性》（*Young Black Men i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第3页。（Washiting，D.C.：The Sentencing Project，1990）

34. 1990年9月10日采访Marc Mauer（上述作品作者）得到的信息。

35. Mauer，同上。

36. 女性健康研究所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家卫生研究所的一部分。

37. 少数族裔健康办公室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家卫生研究所的一部分。

38. Lynette Lamb，《这里有没有（妇科）医生？》［Is There a Doctor（for Women's Health）in the house?］，《优涅读者》（*Utne Reader*）1992年3月/4月刊第26~28页。

39. 医学博士Marianne J. Legato 和 Carol Colman，《女人心：女人和冠心病之真相》（*The Female Heart：The Truth about Women an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第13页。（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1）

40. 1992年7月14日采访了医学博士Vivian W. Pinn，她是国家卫生研究所女性健康研究所主任。这些数据计划于1992年下半年递交国会。

41. 对《医学文摘》文章的搜索研究发生于1989年。当时是按照主题进行的搜索，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可能一篇文章是关于前列腺癌的，但是标题中并没有提到"男人"，所以用关键词搜索文章标题会找不到这篇文章。见Steven L. Collins，《与男女两性相关的针对性研究比例》（*Proportion of Gender-Specific Research Relevant to Men and Women*），未发表手稿，1990年7月21日第4页。

42.《癌症现状与数据：1991》（*Cancer Facts and Figures：1991*）所有年龄段由于前列腺癌死亡的男性死亡率为24.1/100000；所有年龄段由于乳腺癌死亡的女性死亡率为27.4/100000，相差13.7%。从绝对数字来看，1991年死于前列腺癌的男人数量为32000人，死于乳腺癌的女人数量为44500人。因乳腺癌死亡的女人数量比因前列腺癌死亡的男人多39%，女人获得的资金支持多出660%。我没有使用绝对数进行比较，因为最重要的是一个特定女人或者男人的脆弱性。（Atlanta，Ga.：

American Cancer Society，1991）

43. 1991年，用于乳腺癌研究的资金为9200万美元；用于前列腺癌研究的资金为1400万美元。1992年的数据是，乳腺癌，1.32亿美元；前列腺癌，2000万美元。数据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财政部报告分析与评估小组内部资料，未发表。1992年2月25日采访了预算分析师William DiGioia。

44. 1986年，有27262名男人死于前列腺癌；1991年，有32000名，增长了17.4%，1986年，有40539名女人死于乳腺癌；1991年，有44500名，增长了9.8%。1986年的数据来自USDH & HS/NCHS的《美国生命统计数据》，表“1986年美国男人的5大癌症死亡率，按年龄”和“1986年美国女人的5大癌症死亡率，按年龄”。1991年的数据来自《癌症现状与数据：1991》，同上，第8~9页。（Washington，D.C.：USGPO，1989）

45. USDH & HS，《患癌率与风险》（“Cancer Rates and Risks”）1985年4月刊，第10页。

46. 36%的男人和30%的女人患有精神疾病。22%患精神疾病的女性得到治疗，但只有12%患精神疾病的男性得到治疗。见Sam Shapiro等人的《卫生服务与精神卫生服务的利用》（“Utilization of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普通精神病学文献》（*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1984年10月刊，第41期，第954页表2，第976页表5。

47. 截至1992年，最新的数据来自USDH & HS/NCHS的《美国生命统计数据》，第一部分《总死亡率》第44页表1-10，“72大死因的死亡率，按年龄、种族和性别：美国，1987”。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把所有心脏病都归为“重大心血管疾病”类。如下表：

重大心血管疾病　　（单位：万）

		死亡人数/年
25~34岁	男	14.4
	女	7.6
35~44岁	男	81.8
	女	24.1
45~54岁	男	227.4
	女	88.0
55~64岁	男	872.9
	女	303.0

（续表）

		死亡人数/年
65~74岁	男	1528.1
	女	863.4
75~84岁	男	4084.2
	女	2790.1
85岁以上	男	10135.4
	女	9135

另外一个心脏问题的重要分类为“心脏疾病”，各个年龄阶段男女死亡率相差无几。

48. 到了85岁以上，男人的死亡率为10135.4/100000，女人的死亡率为9135.0/100000，见上表。以上数据截至1992年。

49. 见医学博士Lawrence E. Lamn的《男人、女人和心脏病：阿司匹林是否能够防止女性心脏病发？》（“Men, Women and Heart Attack: Can Aspirin Prevent Heart Attack in Women?”），《卫生报》（*The Health Letter*）1992年1月刊，第39期，第2页。Lamn博士是北美辛迪加公司的医疗专栏作家，曾任贝勒医学院医学教授和美国空军航空航天医学院的临床科学院主任。

50. 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2岁。

51. 一项以22071名男医生为对象的研究结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9年7月29日。

52. 此项研究涉及87678名注册女护士，研究结果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1991年7月刊。

53. 这项研究针对男性持续了5年，针对女性持续了6年。针对男性的研究涉及22071名男性，针对女性的研究涉及87678名女性。男性研究结果见《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同上；女性研究结果，同上。

54. Dean Ornish在太平洋长老会医学中心完成了这个工作。见Pamela King，《假装是自己》（“The Pretended Self”），《今日心理学》1989年3月刊，第60页。

55. 新英格兰的医院对医院的死亡率进行了研究，男性为3.2%，女性为7.3%。见《美国医学会杂志》1991年8月14日。

56. 同上。

57. 同上。

58. Vivek Varma博士，《患心肌梗塞的女人是否得到了与男人不同的待

遇？》（“Are Women Treated Differently than Men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1992年4月刊。1992年7月23日采访了Varma博士并确认了其中的内容。

59. 新英格兰、丹麦和加拿大的数据都显示死亡风险系数增长。见N.P. Roos，《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前列腺打开并切除后的死亡率和康复率》（*Mortality and Recuperation after Open and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 for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9年4月刊，第1120~1124页。

手术和制药方面的新发展改善了男性的性能力，提高了他们的平均寿命。唯一的男性前列腺癌的权益组织是癌症终末期治疗病患权益组织（PAACT）。

60.《美国流行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990年12月刊。又引自《输精管切除术和前列腺癌：有关系？》（“Vasectomy and Prostate Cancer：A Link？”），《纽约时报》1991年1月1日。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博士Lynn Rosenberg及其他5位同事发现，患前列腺癌的男人中有10%做过输精管切除术，只有2.4%的男性做过输精管切除术但是没有患癌。

61. 1992年8月17日通过癌症热线800-ACS-2345向美国癌症学会进行了确认。见美国癌症学会的出版物《只为男人》（*For Men Only*）。

62. 法官Stevens是在1992年接受例行筛查测试时发现的，当时他71岁；而法官Blackmun是在1987年接受例行筛查测试时发现的，当时他78岁。

63. 1992年8月4日采访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口服避孕药部门的Enid Galliers时得到证实。

64. Lawrence Schneiderman，《美国医学会杂志》1979年3月18日。

65. 1991年12月9日采访了Lawrence Schneiderman博士。

66. Lawrence Schneiderman，《家庭实践杂志》1986年。

67. 女性占看病人数的61%，男性占住院病人人数的60%。这些数据不包括退伍军人医院的数据，当然，那里100%的病人都是男人。见USDH & HS/NCHS《全国非卧床病人医疗护理调查》1992年。

68. 这一现象即使在宗教出版物中也是如此，例如，见Lori Durso，《少数族裔面临更大的卫生保健缺口》（“Minorities Face Large Health Care Gap”），《天主教电讯报》（*Catholic Telegraph*），1989年1月13日。Lori Durso是《成年新闻报》（*Maturity News Service*）的记者。

69. 在8年越战期间，每年都有约7200位男孩死亡，比如，在1991年，有32000位男性死于前列腺癌。因为如果前列腺癌发现得早是可以治愈的，所以如果有了好的教育计划，或许就有7200多人能治愈。

70.《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同上。

71. 来自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美国统一犯罪报告：1988》。

全国因酒后驾驶或醉酒驾驶被捕人数

男人	女人
1139227	154289
88.1%	11.9%

72. 未出版数据，USDH & HS/NCHS疾病控制中心全国出院调查，同上。

第八章
疯狂之路

一个在地铁站台上站了很多年的男人有一次对我说："我每天都在那里，心已经一点点地死了，但是我知道这么做是为了家人。"

——《神话的力量》（*The Power of Myth*）的作者之一Bill Moyers[1]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我自己想做的。

——《巴比特》（*Babbitt*）的作者Sinclair Lewis

是什么使已婚男性管理者有别于已婚女性管理者？已婚男性管理者职位越高，他的妻子在外工作的概率就越低。［87%的高层管理者（总裁或以上）的妻子都在家工作，而不是在外工作。[2]］相反，几乎所有女性管理者的丈夫都全职在外工作。因此，已婚男性管理者的妻子是经济负担。而已婚女性管理者的丈夫提供经济保护。已婚男性管理者从妻子那里得到更多的家庭支持，但是他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程度上将职业视为一种责任；已婚女性管理者得到的家庭支持少，但是她更大程度上可以将职业视为一种机遇。

我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遇到一个男人，他这么说："我被解雇之后，按揭贷款变成了按揭噩梦。我妻子生病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就犹豫了那么一下而已——但还是找了最好也是收费最高的医生，我觉得很内疚。而且，因为我们要搬家，孩子们要离开他们最好的朋友，我真的很伤心。就

在我目睹他们哭着道别之后没几天，我就犯心脏病了。”

我们听到女性管理者说“我需要的是一个老婆”时，大家都会说：“没错！”没有人会说：“你挑起你丈夫的经济重担之后，你就有一个‘老婆’。”或者“找个男人做家庭主男，你就有了‘老婆’。”在我的研讨会上，我遇到过数千个男人愿意以照顾子女、下厨做饭、整理家务和安排社交生活为代价，来交换他们所爱的女人赚回的收入。我很少遇到女性管理者自愿在经济上支持这样的男人。而且我也没看到有广告栏里写着：“成功女性寻找帅气家庭主男。”

那么具体来说，家对男性管理者来说意味着“经济负担”，而对女性管理者来说是“经济保护”，这使得男性更容易掉进“律师陷阱”“奴隶式医生陷阱”和“纸战士焚化炉”……

律师陷阱

词条：如果让律师们重新选择的话，41%的人会选择其他职业。[3]

词条：律师染上酗酒问题的概率是普通人的近2倍。[4]

很多律师是抱着成为Perry Mason的幻想进入这一行的，结果他们成了一个个纸做的Mason。他们希望能和他人一道工作，结果他们却与他人隔绝。他们渴望成为律政先锋，结果他们成了律政“妓者”。

不论男律师还是女律师，为企业效力时他们都感觉自己是“妓者”。有一位辞去企业律师工作去做山路向导的女性是这么说的：“律师接受的训练让他们不能将感情带入客户想要他们扮演的角色中去，作为律师来讲这很好，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很折磨人的。”[5]

男女律师们成为律政先锋的理想破灭了，“妓者”般的感受向他们袭来，而且读完律师学校后他们面临大约8万美元的债务。我就听到我一个年轻的男性律师朋友说过：“我一直想要做公共法律服务，但是这一领域收入太低了。除非做公司法方面的事务，否则我永远无法结婚

生子。”

我的男性朋友们最容易屈服于高薪的贿赂，不会因为他们讨厌自己所做的事而辞职。当作公司法方面的事务不适合他们的个性时，他们会改变自己的个性而不会改变自己的职业。所以他们在律师陷阱面前更加脆弱：为了获得高薪，他不得不每周为客户工作60~80个小时。但由于一些员工会议和行政任务是无法向客户开票算钱的，所以律师一周真正的工作时间变成75~90个小时。[6]所以说，律师职业是个陷阱。

这个陷阱也会引发腐败。比如说，Anita Hill在为一家私有企业工作时，她被怀疑伪造打卡记录而且为没有做过的事向客户收费。为什么？她的一位前同事觉得“她无法满足公司对年轻同事的要求”。[7]她离开这家公司转而为政府效力，后来又去了一所大学——她无需养家、养孩子。

在寻找高回报和他人尊重的道路上，很多律师得到的反而是胸痛、高血压、关节炎和失眠——而他们还不到40岁。男人更愿意接受高回报和受他人尊重的贿赂而甘愿做“妓者”，正因为如此，我们听到“律师笑话”时想到的是男人。

奴隶式医生

词条：儿科和产科的一年级住院医师平均每周工作90个小时，1/10的外科住院医师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22个小时。[8]

词条：纽约“随时待命”的住院医师平均每晚的睡眠时间为2.4个小时。[9]

如果有位年轻女性在纽约的某家医院去世了，而且被认为是医生太累出了差错导致的，那么指定的州立委员会会介入调查，以确认医生长时间工作是否会令患者处于危险境地。[10]这件事带来了什么后果？纽约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建议限制医生工作时间的州：“不得上班2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0个小时。”[11]虽然《纽约时报》就委员会的工作发表了两篇长篇大论，但都没有提到医生长时间工作会损害医生自己的生命、破坏他们的

婚姻、剥夺他们和孩子们相聚的时间，或者说让他们变成奴隶。

中非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明人们普遍认为，要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医生就要承担失去生命的风险。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有一个“半人”：他只有一条腿、一条胳膊，他只有半边身体，如果你从另外一侧看过来，你看不见他。如果他遇到了你，他可能会向你提出挑战。你不必非要接受。但如果你接受了、输了，那你就会死去。但如果你接受了、赢了，他会教你如何使用种类繁多的药物，然后你就会成为一名好医生。[12]

几年前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教书时，我看见充满活力、青春阳光的一年级医学生来到“全世界最好的”医学院。几年之后，大多数男生都会是一副疲惫不堪、神情冷漠而且心事重重的模样。他们成了“半个男人”，而大多数女生成了“大半个女人”。为什么会有此差别？

首先，除了一些个例，我教的大都是大一的学生，大部分女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就已经知道，她们选择的领域要么是（1）最不需要在额外时间工作的，要么是（2）更多地与活人打交道，而不是死亡。在全国范围内，由于这种择业倾向，女医生会选择如儿童精神病学或者成人精神病学等领域，避开所有外科专业和所有心血管、肺病专业。[13]总而言之，女生避开了那些令她们不断目睹死亡或让她们成为他人时间表的囚徒的领域，从而避免成为“半个女人”。男人应该向这些女生学习。

男生则更有可能为长期的、理想的岗位——让他们作为医生能支配自己的生活的岗位——而相互竞争。由于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很多男人会妥协，转而选择与死亡打交道的专业。然后每周工作100个小时，而赚到的钱只有他们的家人才有时间花。在得到作为医生对自己的生活控制权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作为普通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不幸的是，他赚钱的过程通常意味着他在生活中疏离妻子。有时这种

状况会导致法律意义上的离婚，但是很多都导致了心理上的离婚。正因为如此，《医生的妻子》（*Medical/Mrs.*）杂志报道过一份调查结果，结果发现，医生的妻子们对丈夫怀有的敌意令人咋舌。[14]但是她们并没有和医生们离婚。为什么？妻子们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她们想要从婚姻中得到保障。显然她们的丈夫选择了妻子们想要得到的保障，而忽略了妻子对提供保障的人的敌意。于是，男人往往成了情感依靠这种幻想的“妓者”，至少他们的妻子得到了实在的经济保障。

“纸战士”[15]

词条：日本人将因过度劳动而死称为过劳死。在过去20年里，日本高层管理人员的猝死人数增加了1400%。[16]

日本政府在一项调查中发现，管理人员平均每个星期工作70个小时：每个工作日12个小时，每星期工作6天。[17]管理人员没有任何假期的情况也不少见。[18]

在日本期间，我发现工作日只是工作时间的一部分。通常每天上下班路上花费的时间会超过1个小时——每周除了工作的70个小时外，还要再加上10个小时。在交通高峰期或稍后的时间内搭乘火车上下班的人，有95%以上是男人。与客户的饭局在一定程度上是愉快的，但绝大多数仍然让人有压力，因为好印象可以促成一单生意，坏印象则会毁掉一单生意。

日本管理者是如何做好准备服从企业利益的呢？标准的日本管理训练计划被称为“地狱集中营”。[19]管理者会被要求做一些诸如倒立和大声倒背15页演讲稿之类的事情。通过一系列关卡之后，管理者才能毕业。在“通关”的每一个步骤中他都会遇到一系列的羞辱。

为什么管理训练看上去和服从训练如此相似？这真的是大男人在玩小男孩的游戏吗？美国是否有相似的东西存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目的。租一盘《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l*

Jacket）的录像带看看吧，这部影片描述了美国军人的生活，尤其是新兵训练营。中士对这些男人进行羞辱、踢打，并将他们置于生命危险之中。为什么？“你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机器。”一个杀人机器。这是降低自己生命价值的前提条件：一个看重自己生命价值的男人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新兵训练营就是美国的地狱集中营。

从本能方面来讲，相比日本管理者而言，美国军人更容易与这种服从产生联结。然而地狱集中营和新兵训练营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通过贬低男人作为人类的价值，来使他们变成“机器”，从而使男性个体或服从于企业或服从于军队。

让我们觉得新兵训练营的男人和男性高层管理之间有所区别的，是后者有特别待遇、地位和收入。它们都是诱惑他们放弃个体性的贿赂品。企业或者军队越相信一个人能够从一而终地、明智地服务于它时，就会为这个人提供越好的特别待遇、越高的地位和越多的收入。很多男人将此解读为个人能力优秀，但实际上，他是作为一台机器有优秀的执行能力。

讽刺的是，他被赋予荣耀源于他作为个人对集体的服从。军装、企业制服、学院制服都显示着他的服从。不论是晋升还是紫心勋章，都表示个人优秀的服从能力得到了认可——个人对更大机器优秀的服从力。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他可以做出有效的决策，可以担负全责，可以当好领导人，但是他能当好领导人是因为他了解当领导的规则，而他领导的那些人了解服从的规则。然而，正是让他的个性更倾向于服从的那些东西保证了这个框架的牢固性。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爬上高层的男人往往都是“高层的普通人”。

玩小男孩的游戏是为让他们做好准备将自己的角色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羞辱、欺凌和激将别人冒险——甚至去冒生命危险——都是在让

一个少年做好贬低自己生命价值的准备，让他将自己的角色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首先是他在运动（篮球和冰球运动员比足球运动员更容易受伤）中的角色，然后是在军队、企业、研究所等机构中的角色。他们是哥们吗？只有经费不足的足球队才会这样。男性的青春期就是一个普通的男性新兵训练营。

那么，究竟是大男人在玩小男孩的游戏还是……小男孩在玩大男人的游戏？

拯救“纸战士”

“纸战士”被囚禁在他人的认可当中。除非他的婚姻或者事业失败了，否则他是很难改变的。在事业崩塌的那一刻，他被重新扔进了劳务市场，这就要求他需要更加努力地证明他自己行（毕竟他刚失败过）。在婚姻破灭的那一刻，他被重新扔进了“鲜肉市场”，如果他是顶级企业律师而不是幼儿园教师，那么他就会更值钱。他的自我确认期很短。他很怕收到需要继续“发奋图强”的暗示。

但是我们确实在给他们暗示！找找看哪个男人房间里有沙发（我这辈子只见过一次有一个男人房间里有一把椅子）。找找看哪个国家领导人会承认自己睡午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听闻里根总统睡午觉之后没有赞成他这么做，而是奚落他。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南希·里根在回忆录中解释说他并没有睡午觉，他只是下了长途飞机回到家之后想睡觉，然后在沙发上舒展一下筋骨而已。她说：“我根本不明白这种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因为媒体每天都会收到他的行程表，他们知道他不是回来睡午觉的。”[20]

里根得了这个名声部分是因为在公开会议上“打盹”。但是南希解释说：“1982年，有一次罗尼在和罗马教皇召开公开会议时，他确实打盹了……他前一晚几乎没有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飞抵罗马，到了之

后我们就直接到罗马教廷会见罗马教皇了。”[21]

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并没有让全国人民奚落家庭主妇睡午觉。为什么就不能鼓励“管理层睡午觉”和“员工睡午觉”呢？让“一分钟经理人”（One-Minute Manager）打5分钟的盹，或者在健身房旁边设置一间冥想室。一些日本企业为员工设置了玻璃密封舱，周围一片黑暗，还有舒缓的音乐。“时间一到，就会有冷气喷到员工脸上，然后他就可以回去工作了。”[22]

尽管如此，最终能将“纸战士”从疯狂之路上拯救出来的只有他们自己。女人可以通过改变他们获得认可的系统来帮助他们——“下嫁”和“高攀”的概率要相当。但是实际一点来说，如果男人开不了口去要求的话，女人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男人对提供经济摇篮“说不”会怎样？

词条：在美国男性中，黑人、印第安人和男同性恋的日子最难过。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用为女人提供经济保障。

不能保护女人的男人：黑人男性和印第安男人

印第安男人无法充分保护自己的食物、水源和土地不受白人侵占。尽管有各种传说和神话称，印第安男人接受了自我牺牲的训练，但是当传说和手中的弓箭比不过科技、枪支和子弹时，他的家人只能在战败后的保留地内活动。印第安男人既不能靠杀水牛来保护家人，也不能靠到华尔街“大发横财”来保护他们，他们成了可以被随意支配的人。没有人爱他，于是他就爱上了酒。

同样，黑人男性带着他们的奴隶传统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却没有接受适当的训练，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家人，所以他们也遭到了女性的拒绝。只有那些有做事能力的男性黑人——通常是依靠身体，例如那些运动明

星——才能拥有成千上万的女性拥护者。没有做事能力的那些黑人男性则被小说和电影［例如《紫色姐妹花》（*The Colir purple*）和《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嘲弄。

由于让男人做好保护他人的准备并非适当，所以很多非洲裔美国男性常常选择走歪门邪道、采取权宜之计，以及靠碰运气来“获得成功”——通过毒品交易、赌博和购买彩票。在没有获得用来保护家人的财富时，他们会和印第安男人一样，认为自己配不上女人的爱，然后带着最后一丝对爱情的希冀放手一搏。如果失败了，他们就会服药自杀。

不会保护女人的男人：同性恋男性

比起黑人男性和印第安男人，同性恋男性遭到的排斥更深。无法给女人充分庇护的黑人男性和印第安男人至少还有保护女人的意愿——他们只是做得不够好而已。然而同性恋男性甚至不会去照顾女人，所以我们说他们不愿保护女人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排斥他们——比如不让他们活下去。他们被称为异端分子，就像巫婆一样。“柴把”这个词的意思是放在火里烧的柴火。同性恋被作为异端分子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时候，也被称为“柴把”。[23]

为什么呢？好好想想吧。在同性性行为中，两个小时的性快感就是两个小时的性快感。但在异性性行为中，两个小时的性快感意味着一辈子的责任。异性恋是风险交易！恐同症背后的恐惧是害怕没有人抚养下一代。但每个人都会很快活，于是“快活”成了一种不成熟的标志，很多“享乐”的形式也成了违法的。于是，在人们不用再担心生存问题时，很多文化会容忍同性恋行为（比如二战后的美国中产阶级，还有得到帝国保护后的希腊人和罗马人）。

对那些不愿生育和保护女人的男人，我们是否真的在漠视他们的生命？最初我们并不关注艾滋病，直到发现这种病症明显可以在异性性行为

中传播时才开始关注，我们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不能保护女性的男人：无家可归的男人

词条：旧金山96%无家可归的人都是男人。[24]在其他城市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中间值是85%。[25]

词条：自愿睡大街的流浪汉数量是自愿睡大街的流浪儿童、青少年和成年女人数量总和的3倍。[26]

自愿睡大街的流浪者（个人）	
儿童或青少年（19岁或以下）	6%
成年女性	20%
成年男性	74%

提到流浪者时，我们常常想到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们。实际上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16%的流浪者是以家庭为单位出现的。[27]而且即使算上流浪家庭，流浪者中单身男性的数量仍然比儿童、单身女性、已婚女性或者已婚男性的数量总和还要多。[28]

我们也很容易认为流浪家庭受的苦是最多的，但是关于流浪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得到的待遇是最好的，他们最容易得到庇护、食物和重新上岗的机会。目前为止，过得最苦的是单身的个体流浪者。[29]

我送食物和衣物给流浪者时，我非常惊讶睡大街的流浪者中男人和男孩的数量如此之多。我仍记得，有一个男人在脏兮兮的床垫上搂着4个孩子瑟瑟发抖。他的大衣盖在2个最年幼的孩子身上。记得我还住在纽约时，我看到有个男人和耗子抢垃圾桶，他用冻得通红的手从一堆尿不湿和卫生巾里面挑选出蔫了的生菜。

几乎所有关于流浪者的报告都有这么一句（摘自一份关于加州流浪者的官方报告）："女性是流浪者中的一小部分（约占加州流浪者数量的10%），然而她们面临着特殊的问题。"[30]这也没错。但是没有哪一部分提

到男性面临的问题。

流浪汉不单没有家，他们也没有人爱，而且实际上只要他们在流浪，就没有找到爱情的希望。他们中间有些人有过家、有过孩子，也有过妻子，但是当他们失去保护能力时，就失去了所有他们所爱的人。在大街上，他们加入了一个几乎全是男人的俱乐部。

为什么我们拒绝帮助流浪汉？一方面，我们并不了解我们让男人养家的压力常常迫使他们从事一些临时工作（销售员、外来工岗位、卡车司机、修路工和铁路工……），而这使他们离无家可归只有一步之遥。而另一方面，我们对失败的男人有着不同的反应……

男人和女人不能保护他人时，我们的反应真的不同吗？

还记得几乎所有流浪者都是男性的那个时代吧？那时我们称他们为“乞丐”。后来他们中间出现了女人。我们称这些女人为“流浪妇女”。女人的数量占其中的15%时，我们统称他们为“流浪者”，而且我们突然关心起他们来了。这种区别——“乞丐”和“流浪妇女”的称呼——象征着我们对失败的男人和失败的女人的不同态度。

词条：当一个男性船长Joseph Hazelwood无法控制他的船导致泄漏的原油使野生动物消亡时，Exxon Valdes油船和Hazelwood从此声名狼藉。Hazelwood船长接受了审判和罚款之后被关进监狱。他成了Johnny Carson和Jay leno取笑的对象。他喝过酒的事实被放大。实际上他们的行程突然发生了变化，迫使疲惫的船长和船员们再次下海，他们因此前程尽毁，但是这些事实被忽视了。

词条：一位女性空中交通管制员因工作失误造成了一次34人（不是野生动物）死亡的空难，之后，她的同事将她藏到酒店以免她被曝光。他们花了数天的时间安慰她。她没有变成被众人取笑的对象，而是接受了幽默疗法，费用由纳税人支付。[31]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没有起诉她，反而帮她请了

顾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没有公布她的名字。[32]时至今日，她的名字还是无从得知。

不论是《洛杉矶时报》还是《纽约时报》，媒体的新闻标题都把重点放在她的悲痛上面，而不是死难者家属的悲痛上面。比如《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新闻标题是："管制员痛不欲生，空难后的眼泪——灾难：事故发生后同事对她劝慰数小时并将其藏起来数天，以免曝光"。

到了今天，我也没有看到哪一篇文章关注的是Hazelwood船长的悲痛。我很支持政府为女性提供幽默疗法，但是我也想象得出，如果政府教Hazelwood船长在Exxon valdes海难后大笑的话，公众会有怎样的反应。一个男人无法保护他人时，我们会迫害他；一个女人无法保护他人时，我们会保护这个女人。总之，我们在乎女性的悲痛。

炒男人鱿鱼的老板是强奸犯吗?

如果男人被炒鱿鱼或者被迫失业就和男人被强奸一样的话，那么那些炒人鱿鱼的老板无意识地成了某种类型的强奸犯。这种老板往往是男人，成百上千的男人为了保住大多数人的饭碗而炒了个别人的鱿鱼。他们感觉自己既是强奸犯又是救世主。因为没有人理解管理者内心的矛盾，所以管理者感到被孤立了，他们感到孤独，甚至失去了一部分自我。这是一个酗酒陷阱。

他饮酒往往会导致他人抨击他的酗酒问题。通常朋友们会试图听他讲，但由于他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不理解的事情，所以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茫然无助。

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求助于教育来加深理解。但是大部分管理者发现，学术界也认为炒员工鱿鱼的管理者是某种类型的强奸犯，尽管学者们的愤懑伪装成思想出现。于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痛恨对工

人阶级的强奸行为——算得上一种学术伪装方式，里面是对炒人鱿鱼的管理者的愤恨。

有解决的办法吗？首先，要理解炒人鱿鱼的管理者往往只是显示了救世主角色的阴暗面而已——他们是为了保持企业的竞争力使其生存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大部分人的工作。其次，制定雇员转业计划，协助雇员接受再教育。第三，开发全行业的经理人转业计划，让经理们了解，对于一个运转不良的公司来说，自己的价值犹如外科医生对患者的价值一样大。

健康之路

爱情斗士 Vs. 金钱斗士

要让男人从疯狂之路最快地迈向健康之路，[33]需要男女双方都有在家和工作之间寻找平衡的自由。男人必须指望妻子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做父亲，就像现在他们在经济上支持她们做母亲一样。女人必须让男人确认她们要嫁的是爱情斗士而不是金钱斗士。这就意味着男人必须足够强壮，要对那些用经济条件考量男人的女人讲出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一个女人说："我刚遇到一位很棒的律师……"这种时候男人必须有勇气问："你说过几次'我刚遇到一位很棒的父亲'？"或者："如果我说'我刚遇到一位很棒的大胸女人'，你会做何感想？"

随着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增长，一些工作场合发生了变化，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很多。比如，当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大部分都是男性时，研究生需要进修5~12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心理治疗专业，社会工作硕士（MSW）及婚姻、家庭和儿童顾问（MFCC）只需要接受2~3年的培训。在10年内，保险公司放宽了招聘的限制条件，并覆盖了只需要2年就能拿到学位再加1年培训的社会工作硕士。如果这个情况反

过来，我们就会听到有人说："男人进入该领域时他们突然放宽了限制条件——这是典型的由男性主导的体制。"

然而女性的参与使心理治疗和其他领域都变得更为灵活多变。随着女性进入医疗界，各州第一次开始限制医生的工作时间。在心理治疗行业，心理治疗师现在每周可以只工作5个小时。一旦有女性开始从事某些职业——男性治疗师，原本也不被允许进入该领域，比如按摩疗法、性治疗、戒瘾治疗和女权主义治疗——男性很快也能从事这些工作了。不论是顾客还是治疗师，都能从中受益。在心理治疗行业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精神病医生的自杀率比较高，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压力较小的诊疗心理学家中有46%的人也承认，如果能重新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其他行业。[34]女性的加入、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培训时间的减少使"职业之路"与"健康之路"能相互协调。

随着女性进入工作场所，我们保护女性的意向会不会促使保护男性的规则应运而生？是这样，也不是这样。说"是"，指医生每周工作时间少于80个小时的新规定也会影响到男人。说"不是"，指工作被划分为男性在阿拉斯加这种地方从事时间不便利的危险工作，而女性在圣达菲和圣巴巴拉这种地方从事时间便利且更安全的工作。在专业行业中，如果男性从事如外科医生之类的工作，而且工作时间无规律，女性从事如精神病医生这种职业，而且工作时间有规律，那么我们只会强化对女性的保护和对男性的随意支配性。

注释：

1.Joseph Cambell 和 Bill Moyers，《神话的力量》。（New York：Doubleday，1988）

2. Herbert Hildebrandt 和 Edwin Miller，《新晋升的管理者》（*The Newly Promoted Executive*），1984年密歇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安阿伯分校专题论文。这是这个问题上我能查到的最新资料。

3.《美国银行家协会期刊》（*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1984年2月刊。又见 Paul Ciotti，《不幸福的律师》（"Unhappy Lawyers"），《洛杉矶时报》1988年8月25日。

4. 据估计，律师的酗酒率为15%~20%，几乎是普通人的2倍。引自Ciotti，同上。

5. Mary Kay Barbieri，45岁，引自《不做西雅图大佬：两位精英律师带非洲驼长途旅行找到快乐》（"Leaving Behind the Sharks of Seattle: Two Legal Eagles Find Happiness Hiking with Llamas"），《人物》1988年10月31日，第111页。

6. Lujuana Treadwell，美国加州伯克利伯特霍尔法学院就业辅导主任，见Ciotti的报道，同上。

7. 该公司为华盛顿Wald，Harkrader & Ross律师事务所。见David Brock，《真正的Anita Hill》（"The Real Anita Hill"），《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Spectator*）1992年3月刊，第21~22页。

8. James Barron，《保证医生睡够吧》（"Making Sure Doctors Get Enough Sleep"），《纽约时报》1988年3月22日。

9. 同上。

10. 同上。

11. Suzanne Daley，《纽约医院实习生的工作时长将缩减》（"Hospital Intern's Long Hours to Be Reduced in New York"），《纽约时报》1988年6月9日。

12. 节选自David Clement Scott，《英属中非土著语百科词典》（*A Cyclopaedic Dictionary of the Mang'anja Language Spoken in British Central Africa*）第97页。（Edinburgh，1892）

13. 美国医学协会调查与数据来源部，《联邦与非联邦医生，按专业与相关证书》，《美国医生的特征与分布》1988年，表B-13和B-14。

14. 见Colette Dowling，《灰姑娘情结》（*The Cinderella Complex*）第41页。（New York：Pocket Books，1981）

15. 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组织与管理学院教授Mike Driver使用的术语，见Ciotti的报道，同上。

16. Kiyoyasu Arikawa博士发现，高层管理人员猝死事件从1969年的10人突然增长到1987年的150人，而最近，猝死人数在40~60岁的人中间最常发生，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活到80岁左右。引自Elaine Kurtenbach，《日本过劳死问题加剧》（"Death from Overwork Growing Problem in Japan"），《聚焦星期天》（*The Sunday Camera*）1989年6月16日。

17. 1987年政府附属娱乐开发中心的调查。引自Kurtenbach，同上。

18.Leislie Helm，《日本的工作规则》（“The Rule of Work in Japan”），《洛杉矶时报》1991年3月17日。

19. Helm，同上。日本“地狱集中营”的情形于1991年早期在电视节目《60分钟》（60 *Minutes*）中播出过。

20. Nancy Reagan 和 William Novak，《南希•里根回忆录》（*My Turn: The Memoirs of Nancy Reagan*）。（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同时摘自《罗尼小传》（“Close-up on Ronnie”），《新闻周刊》1989年10月23日。

21. 同上。

22. Leislie Helm，同上。

23.《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第437~439 页，第663~664页。“faggot”（柴把）的定义：特指用于将异端分子活活烧死的……一把当作燃料用的、捆在一起的枝条、细枝或者小树枝。“Witch”（巫婆）的定义：被活活烧死的异端分子。Arno Karlen在《异性恋与同性恋》（*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中指出，普利茅斯殖民地有1/5~1/4的记录文件是关于惩罚同性恋的性侵事件。非清教徒殖民地（如纽约）有很多针对同性恋的惩罚，包括绑在火刑柱上烧死。（New York: W.W. Norton, 1971）

24.Richard H. Ropers，《新型城市流浪汉的增长》（“The Rise of New Urban Homeless”），《公共事务报道》（*Public Affairs Report*）1985年10~11月刊，第4页表1“部分城市流浪汉实例对比”。

25. 同上。

26. James Wright，《地址未知：美国流浪汉》，第59页。Wright解释道：“为了得到这些结果，我把所有已知流浪人员从诊所客户数据库中删除，然后再按照年龄和性别计算剩下的人。计算出来的样本人数是17633人。”（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5）

27.James Wright对17633位无家可归人士进行了研究。同上，第57页。

28. 见Wright，同上。

29. 同上，第58~59页。Wright解释称：“有家庭的成人也不容易患慢性疾病，他们比较容易在短期内（或者偶然地）流浪，他们对居住条件和就业前景的期望都比个体流浪汉要高。总之，他们未来的前景要光明得多。”

30. 美国加州住宅与社区发展部，《加州流浪人口的问题和特征研究》第7页，1985年4月。

31. 美联社，《媒体称同事安慰犯了毁灭性错误的空中交通管制员》（“Co-

Worker Comforted Controller after Fatal Error, Paper Says"），《纽约时报》1991年2月11日。

32. 同上。最终这位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名字（Robin Lee Wascher）被泄露了。

33. "疯狂之路"是哈佛商学院教授Leonard Schlesinger创造的词语。Carol Hymowitz的报道《走下快行道》（"Stepping off the Fast Track"），《华尔街日报》1989年6月13日。

34.E. Lowell Kelly, Lewis R. Goldberg, Donald W. Fiske 和 James M. Kilkowski，调查结果发表于《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引自《心理学家少了乐趣吗？》（"Do Psychologists Have Less Fun?"），《今日心理学》1978年11月刊。

第九章
暴力对象是谁?

词条：男女遭到谋杀的比例是3:1。[1]

词条：除了强奸，罪行越暴力，受害者就越有可能是男性。[2]

词条：男性是除强奸罪以外所有暴力罪行中最大的受害者。近年来暴力犯罪（除了强奸）的犯案率上升了36%。[3]女性是最大受害者的暴力犯罪只有强奸罪，它的犯案率下降了33%。[4]

词条：强奸案在所有暴力犯罪案中所占比例不到6%，最大受害者是男性的其他暴力罪行占了剩下的94%。[5]

词条：平均153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人被凶杀，28个黑人中就有1个被凶杀。[6]

词条：美国司法部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项调查，发现妻子刺死丈夫的案件中有41%的犯罪情节比丈夫刺死妻子的情节轻微。[7]

词条：妻子们声称她们殴打丈夫的次数比丈夫们殴打她们的次数要多。（这是美国“全国家庭暴力调查”对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得出的结果。[8]）

词条：黑人被杀害的概率是白人的6倍。[9]45%的黑人男性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这个数字是白人的3倍甚至更多。[10]

男人是暴力犯罪者吗?

我们无疑认为最后一个词条的内容反映出黑人的弱势，但是我们甚少认为，男人更容易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反映出男性的弱势。当我们听到

男性更容易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时，往往会说：“是男人在伤害其他男人。”当听到黑人更容易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时，如果有人说“是黑人在伤害其他黑人”，我们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不论犯罪者是谁，受害者就是受害者。

但是为什么大部分暴力犯罪者是男人呢？这是否反映了男性有力量？不见得。黑人的犯罪比例比白人更高，并不是因为他们更有力量。从美国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就可见端倪。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弗林特市面临着关闭大量通用汽车公司工厂的困境，这一困境迫使3万汽车厂工人离开此地，还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员。[11]据报道，至1985年，这个从前犯罪率较低的城市犯罪率急剧上升，不仅有自杀和酗酒，还有虐待配偶、强奸和谋杀。很快，弗林特市的暴力犯罪率超过了纽约市。而且1985年发生了285起强奸案，对一个人口仅有15万的城市来说，这个数字让人瞠目结舌。

这说明了什么？它暗示我们，跟自杀和酗酒一样，谋杀、强奸和虐待配偶不过是一时的、表面的力量爆发，目的是补偿隐藏多年的无力感。它是因为感到无能为力而产生的绝望，正是因为黑人和男性都感到无能为力，所以他们才会做出这些行为。

犯罪，尤其是与金钱有关的，反映出养家的期望和养家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差距。[12]于是，有工作且收入符合她们期望的女性几乎不会犯罪，而有工作但收入不符合其期望的女性犯罪率更高。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男性的犯罪率和女性的一样低的话，可以从平衡男女扶养对方的期望开始。

最隐匿的家庭暴力

词条：一个男人走进蒙特利尔大学的一间教室后杀死了一名女学生。这次

事件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被视为厌女症的实例。加拿大政府专门针对男性对女性的态度问题，花费数百万美元对男性进行再教育。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一位芝加哥女人（Laurie Dann）向5名小学男生开枪，在两次大学生联谊会上投毒，烧了青年男子犹太委员会，将2名男孩困在他们家中的地下室中并点了火，向她自己的儿子开枪，最后她被判谋杀了一位她声称为强奸犯的8岁小男孩。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索引中，没有一个新闻标题或者一篇文章摘要指出，被这个女人杀死或者伤害的只是这个小男孩。[14]政府并没有花数百万对女人进行再教育，以端正她们对男人的态度。

词条：Rodney King被判决后引发了暴动，警察杀死了10个人。10个人全部都是男人。[15]如果这10个人都是黑人、拉丁裔或者女人的话，还会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吗？

为什么男人是受害者时就成了隐形的了？一方面，因为社会期待抢劫商店的都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这种想法也是不可见的。偷盗的女性数量较少是因为女人道德更高尚吗？并非如此。首先，抢劫的女人成千上万——但警察并没有因此杀死一个女人。其次，很少有男人将偷来的电视带回家，如果他妻子不看电视的话。第三，Rodney King被判决后，黑人和拉丁裔人实施了抢劫，两个政党都发觉，发生这种事件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穷人感到生活无望而且缺少力量。但是大多数抢劫案的作案者是男人这一事实，却没有让人们得出男人也生活无望、也是弱势群体的结论。

掐死老师

密歇根州一所高中的一名17岁学生企图掐死一名男教师。[16]事件发生后，学校没有对老师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两个月之后，同一学校的一名14岁学生企图掐死一名女教师。学校马上撤出了所有女教师，员工数量从21人减少到了9人。困难来了。男教师仍然要留在学校，但现在他们带的班级数量是原来的2倍多。班级人数越多，发生暴力现象的概率就越大。保护女人

就会把男人推向危险的边缘——而且不经男人同意。

体罚就是对男孩的惩罚

目前在美国29个州内，学校的体罚仍然是合法的。[17]但是在大多数允许体罚的学区里，用直尺掌掴女生的教师害怕遇上用官司掌掴教师的家长。而且，打女生的男教师也可以不用惦记终身教职和退休金了。实际上体罚就是对男孩的体罚。很多学校抗议黑人男孩遭到的殴打比白人男孩多，但是没有学校抗议遭到殴打的只有男生。我们不抗议对男生的暴力，因为它是隐形的。

隐形的性侵犯

每当我们想到对儿童的性侵犯时，都会以为受到性侵犯的女童占90%。实际上，男童与女童受到性侵犯的比例是1：1.7。[18]通常我们认为实施性侵犯的都是男人。实际上对女童实施性侵犯的通常是男人，而对男童实施性侵犯的通常是女人——母亲、姐姐、女性保姆和年纪较大的女性亲戚。[19]如果单从防虐待儿童中心的调查结果来看，我们不会发现这一点。防虐待儿童中心的调查结果往往发现遭到侵害的女童数量更多，因为女孩遭到虐待时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只有在我们平等地调查男童和女童，对他们的童年提出同等的问题时，二者遭到的侵犯才都会浮出水面。

为什么我们会忽视需要帮助的男人——那些性侵害、配偶虐待、创伤后应激障碍、前列腺癌的男性受害者或者占流浪者的85%的男性流浪汉？从历史上来讲，作为受害者的女人会吸引男人，而作为受害者的男人会遭到女人拒绝。即使到了今天，女人的车胎瘪了之后，她会突然让陌生男人从高速路上下来帮助她。而如果是他的车胎瘪了，她极少停下来帮助男人，尽管她看到了他。

男人将不断进步，直到社会理解，男人被作为受害者的女人吸引是由男人较低的自我概念造成的。这是一种男人只有为女人做事之后才会有价

值的感觉——他要被大家看到是有条件的。

“针对女人的战争”？

……人们对女性的态度滋长了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剥夺了她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平等权……如果我的孙女不能和孙子享有平等的机会，真是不可想象……这种针对女人的战争必须停止了。

——1989年6月26日布什总统在美国女大学生协会的发言[20]

布什总统发言结束后，新闻标题是这么写的：“与女人的战争必须停止了”。[21]

想象一下克林顿总统在美国男大学生协会做以下发言的话会是什么情形（当然这个协会也不会再继续存在了）：

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

……人们对男孩的态度促成了暴力少年的产生，而后来他们又成长为暴力父亲和暴力丈夫。所以我和希拉里想要问问：“我们为什么要为儿子的暴力品行喝彩，然后待到他们成人后行使暴力时再将他们关进监狱？”

用我们的教育基金去教我们初中的儿子们玩“打破脸”，哦，抱歉，是橄榄球，这是不道德的。[22]如果告诉这个年龄段的男孩说，你受伤了我们会为你喝彩，这不是教育，这是虐待儿童。如果只告诉给男孩们听，这是性别歧视，会让我们的儿子失去选择权。但当我和希拉里看到喝彩鼓励了男孩们掩盖他们的恐惧、抑制他们的泪水时，我们意识到是时候克制给予他们喝彩了，这样他们才能表达自己的恐惧。

橄榄球奖金是“残疾奖金”。如果啦啦队队员和足球运动员一样容易椎间盘突出、肩膀脱臼、脊椎破裂和膝盖受伤，到老都不能改善的话，我们还会用纳税人的钱去支持啦啦队吗？连希拉里都不会这么想。

我们认为，教我们的儿子冒着患脑震荡的风险去提升自己的魅力是不道德的。我们会不会鼓励女生越过底线和其他学校的男生发生性关系，利

用自己的身体去提升自己的魅力？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肯定会大吼："有胆再做一次试试？"噢，简直……如果啦啦队队员喊出"有胆再温柔一点"的话，男人们就会更温柔。

我和希拉里意识到，橄榄球象征着我们的儿子们将来在工作中的死亡率是女儿们的16倍，象征着我们年仅18岁的儿子必须进行征兵登记。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在嘴里说着喜欢男女平等却让你的儿子成为被随意支配的人。

所以，今天我要介绍一下《平等权修正案》。我们都不能容忍生活在一个剥夺男人平等权的国家。

这场针对我们儿子的战争必须停止了。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持久的斗争。它会引发核战争，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它会引起日后的家庭暴力。

——克林顿总统于6月26日

在未来的美国男大学生协会会议上的发言

对男性的暴力人尽皆知时，我们是否依然会选择忽视?

词条：1989年，美国曼哈顿中央公园有一名女性在慢跑时被强奸，犯罪者手段非常残忍，[23]之后全国范围内爆发了"还我安宁夜"的示威游行。如何解决呢？Ellen Goodman的专栏标题是："想要女人安宁？试试消灭男人"。[24]

词条：1989年，美国曼哈顿中央公园有一名男性在慢跑时被人残忍地用棍子猛击头部，后来被送进医院就医，他向警察报告了该事件。[25]巧合的是，前一个月也是在中央公园里，他目击了另外两起男性遭到踢打、拳击或者殴打的类似事件。他也向警察报告了这两起事件。后来他打电话到警察局，想知道前两个月内有多少起类似的事件。他被告知根本没有这样的事件。

由于对男人的施害者身份满腹怒气，所以我们无视他们作为受害者的身份。那位慢跑的男人报告的伤害事件——全部是发生在男人身上的——

甚至未获得承认。如果一个女人向警察报告了3起不同的强奸案，但由于调查不足没有一件得到承认的话，难以想象会激起怎样的民愤。对女性的犯罪案件更容易被记录在案，所以针对女性的犯罪也更容易为大众所察觉。

对无辜妇女的暴力犯罪造成了大众对无辜男人的不信任。每个男人在邀请女人跟他回家时都承担着被拒绝的风险，这不仅因为他是负责问询意见的人，而且，她在媒体上看到或者听说的强奸案增加了她拒绝他的概率。他受到了质疑，即使他自己也曾遭到其他男人的伤害或者在保护女人时受过伤害。

我们如何称呼对男婴的暴力？

我看见他们把我儿子像老鹰展翅一样绑起来，然后把金属工具放在他的生殖器上。我一听到我儿子的大哭声，就知道这是有问题的。以前我从来没听到过哪个孩子哭成那样。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幕。[26]

当我们对女婴施以暴力时，我们称之为虐婴；而当我们对男婴使用暴力时，我们称之为割礼。割礼是美国最常见的手术。[27]但几乎所有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如挪威、法国、瑞典、英国、丹麦、日本和芬兰，都已经不再割掉男婴生殖器上的包皮。英国做包皮手术的比例从1950年的50%下降到今天的0.5%。[28]

在美国，常规的包皮手术是没有麻醉的。[29]然而，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如果医生在手术时对新生儿使用麻醉药以帮助他们免于疼痛的话，能大大增加他们的存活率。[30]麻醉药能缓解婴儿的压力并防止感染和血栓的发生。

做包皮手术的婴儿是否真的会感到疼痛？《美国医学会杂志》表示，婴儿在做包皮手术时哭得非常厉害，而且他们的“心率、呼吸频率、血氧

水平和血浆皮质醇的水平都有非常大的变化”。[31]

如果婴儿度过了这个创伤的初始阶段，那么会受到什么样的长期影响？没有研究过。我们也没有确切的数据表明做包皮手术可以防止癌症还是会引发癌症，可以防止感染还是会引发感染。结果，我们不得不依赖于间接数据，比如我们知道，新生儿的其他创伤，例如使用恒温箱隔离似乎确实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育和行为。[32]又或者，实际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男人不做包皮手术似乎不会引起感染、不卫生或者罹患癌症的问题。[33]但是信息不足却让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一点。而且，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男性包皮手术的长期影响的研究所需要的资金没有海湾战争中两分钟的花费多，但是这种忽视还是会继续下去。[34]

有一项研究发现，丈夫未做包皮手术的妇女比丈夫做过包皮手术的妇女更容易罹患宫颈癌。[35]这项研究结论被广泛宣传。[36]后来有两项研究反驳了这种观点，但是都几乎没有引起关注。[37]

做包皮手术最常见的原因是为健康和卫生着想。包皮手术减少了清洁的需要这是毋庸置疑的。未做过手术的生殖器外面更容易有阴垢，需要用温和的香皂和水清洗。然而阴垢是一种天然的润滑油，就像身体的油和头发上的油一样。在一些不给男婴做包皮手术的国家里，男孩子会学习如何清洗生殖器，就像学习洗头发、洗澡或者清洗指甲缝里的污垢一样。但没有人建议拔掉指甲以便不用洗指甲。

Edward Wallerstein可能是全美在包皮手术方面知识最渊博的泌尿科专家了，他解释说，几乎所有用于做包皮手术的理由都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要割掉女婴的阴蒂。[38]女性的阴蒂和男性的龟头相似，阴蒂下面也会产生阴垢。因此，污垢和细菌也会进入，如果不清洗也会散发气味、引起感染。但是我们不会为了防止皮脂分泌而割除女性的阴蒂。

一些非洲部落会进行阴蒂割礼，我们将其视为不尊重女性的野蛮行

径。但是在美国，同样的手术发生在男婴身上时我们称是为了健康。为了健康，犹太拉比一般会在男婴出生后的第8天根据传统安排包皮切除。但是如果男婴没有活到第8天，割礼会在他下葬之前进行——在他死后。显然，这就不是为了健康的原因。

倘若我们还在继续为女性施行阴蒂割礼，就不难将这种传统视为对女性性欲的压抑。美国对男性割礼这种传统没有研究，这反映出用这种传统来降低男孩对疼痛的反应程度，让他们做好准备不质疑自己身体的被随意支配，不仅是不质疑他们的包皮被随意切除。

对成年男人的暴力被称为……

词条：在一则可乐广告中，一个男人愿意为了“来瓶可乐”而承担被鲨鱼鳍划过睾丸的风险，这只鲨鱼的鳍犹如小电锯一般。

可口可乐公司明白，只有男人的生命才不如一瓶可乐值钱！

普通的美国青少年在高中毕业前——达到承诺年龄之前——会在电视上看到4万多人被杀。[39]在电视节目里被杀的这些人里面，有97%是男人。[40]然而女权主义者的口号是：“永远没有对女性实施暴力的理由。”

为什么男人遭到杀害的比例似乎有点夸张呢？一方面是因为在西部电影和战争片里遭到杀害的几乎100%是男人，我们不会将西部片视为“对男人的暴力“——我们视它们为“娱乐”。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往往整个节目里都在渲染一个女性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使我们对她遭受的暴力在情感上印象深刻。

当一个女人受到很多伤害时，就像西部片《不可饶恕》（*Unforgiven*）描述的那样，整个影片都聚焦于伤害她的人遭到的惩罚。在教育两个男人最好不要伤害女人的过程中，大约12个男人被杀害。（注意，我是说“有12个”，这些死去的男人得到的关注还不及一个受伤的女人。）在关于女人受

难的影片当中，女主角一般都会得到拯救，而很多男人都会为了救她而丢掉性命。一个男人使女人陷入困境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一个陷入困境的女人是不会被遗忘的。那些试图拯救她的男人才会被遗忘。所以，遭到杀害的97%的男人是隐形的。

美国电影充分展示了对女性的暴力?

我很想回答：“没有，美国电影充分展示了对男女两性的暴力。”但是这么说不正确。正确的答案是，电影里面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对女性的暴力，但是电影里面被杀死的大约95%是男人。[41]和电视里一样，不仅西部片和战争片里男人在肆意杀害其他男人，就连凶杀悬疑片和关于女人受难的影片亦是如此。想想看《盗亦有道》（*Goodfellas*）、《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街区男孩》（*Boyz's the Hood*）、《最后的巨人》（*Hoffa*）和其他黑手党电影或者帮派电影里面死的是谁就知道了。这6种类型的电影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我们总是付钱去看男人杀死男人的故事——甚至男孩杀死男孩的故事。

相反，电影行业不成文的经验法则是“无辜的女人出场3次之后就不会被杀”。这条法则是这么来的。（注意：你看了下面的内容之后，以后你几乎可以预测出所有虚构的女人受难类电影的结局。）

作为一条法则，除了以下情况，女人是不能死的：

- 恐怖电影（男人被杀不够恐怖，成不了恐怖片）。
- 她在里面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于是她作为女人享受保护的特权被剥夺了。就是说，她是外星人，例如在《异形》（*Alens*）和《银翼杀手》（*Bladerunner*）中；她身上具有男人所有的负面特征，比如在《异形》中；或者她是绝对的主角，非常疯狂而且是凶手，比如在《危情十日》（*Misery*）和《致命吸引力》（*Fatal Atraction*）中。
- 她威胁到另一个无辜女人的生命安全，比如《爱在战火蔓延时》

（*Shinning Through*）、《致命吸引力》和《全面回忆》（*Total Recall*）。

● 她出镜次数不超过3次（我们还没机会知道她——对我们来说她不是“真正的女人”）。

● 电影的下半部分都聚焦在为她的死而进行的复仇上，比如《猛龙怪客》（*Death Wish*）。实际上这成了一种道德准则，告诉我们死一个女人就得死一个男人。

相反，在女人受难类电影中，不仅让女主角受难的男人会死掉，其他无辜的男人也得死。比如，在《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s*）中，一个男人已经杀掉了一个女人，而且他很可能杀死另外一个女人，这一情节是我们在银幕前看他的理由，实际上他杀死了很多无辜的男人（监狱的看守），而不是女人。

这些无辜的监狱看守不只是遭到极其残忍的肢解，而且是被顺带杀死的。他们被肢解的情节只是一剂调味品，只是Jodie Foster这道主菜的调料而已。如果是无辜的女看守遭到了杀害，这件事就绝不可能只是一剂调味品。只有男人被杀时才会像盐一样隐匿无形。如果这个不成文的法则被打破了，无辜女人的被杀成为一剂调味品，我们可以预见，这部电影引发的公愤会使其变成一部政治不正确的影片，从而无法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总的来说，女人受难类电影往往只是一个借口，其实它们是杀害男人的影片。

如果一部小说违反了“无辜的女人出场3次后不会被杀害”这个经验法则会怎样？我们可以预见两件事情：（1）这部小说不会变成电影；（2）如果其中的暴力遭到抗议，那么抗议的内容只是针对女人遭受的暴力。例如，小说《美国狂魔》（*American Psycho*）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杀害男人、女人和小男孩的杀人凶手。片中死了8个男人和1个小男孩，包括被凶手杀死的3个男人和那个小男孩。[42]全国出现了数百份抗议声明和文章，重

点都在于女人遭受的暴力。我们可以预言这部小说不会变成美国大片，更不用说拿什么奥斯卡金像奖了。

实际上，女人受难类影片是男人为将公主救出龙潭虎穴并赢得她的爱情而死的升级版。它们是当代版的电影培训，教导女人选择最佳保护者，筛除其他人。然而，我们称女人为受害者、男人为得势者。

对男人的暴力好似妇女解放

《末路狂花》被广泛宣传为一部妇女解放片（比如，它是唯一在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第25届大会上受到赞扬的电影）。要是两个男人抛弃他们的妻子，一路上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女混蛋，然后杀死一个女人还把另外一个女人塞在烈日下沙漠里的树干里，那么这个故事在美国历史中永远不会被赞扬。男性连环杀手会在男性解放大会上受到谴责。当男性运动认为，男人杀害女人的行为是一种力量或者兄弟情义的象征时，我会认为这是法西斯主义并提出抗议。

当男人抗议时，得到的惯常回应是："真是有意思，男人杀人的时候就没有人抗议，但是现在女人杀人了，就有人抗议了？"当然，这种说法没有抓住抗议的重点。在帮派电影、警匪片、黑手党电影、西部片、凶杀悬疑片和战争片里，男人杀害的是男人；如果一个男人杀死了一个女人，他就会被其他男人杀死。男人不断地为了保护女人而死，女人几乎不会为了保护男人而死。相反，《末路狂花》中并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想要抓住这两个杀害男人的女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想杀害其他女人，亦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为了保护男人而死。

电影里的"中枪的男人有人性"学派

20世纪90年代，电影中对男人的杀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它不再被称为对男人的暴力，而是被称作男性的自助。

在电影《意外人生》（*Regarding Henry*）里，头部中弹的伤口"杀

死”了原本傲慢的律师，把他变成了一个善解人意的律师；在《医生》（*Doctor*）里，癌症“杀死”了原本傲慢的医生，把他变成了一个善解人意的医生；在《好莱坞医生》（*Doe Hollywood*）里，一场车祸“杀死”了原来的好莱坞医生，把他变成了多愁善感的医生；在《保卫你的生命》（*Defending your Life*）和《变》（*Switch*）中，死亡把冷漠无情的男经理人变成了善解人意的男经理人；在《罗宾汉》（*Robin Hood*）中，战争和被吊死的父亲“杀死”了原本恃宠而骄的贵族罗宾汉，把他变成了一个为穷人而战的英雄。

总结起来就是，两位医生、一位律师、一位经理和一个贵族象征着唯一值得留下的男人是快死的男人。如果大量的电影中暗示，一个黑人、女人或者犹太人快死之时，值得留下的东西终于出现了……

巅峰之死；一次性全民投票

与电影不同的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个男人的英雄光芒越闪亮，他离开人世或者被杀的概率就越大。1/4的美国总统死于办公室，很多人是被刺杀身亡的。在20世纪60~80年代间，几乎所有心胸宽大、有感召力的领袖都是被刺杀身亡或者神秘死亡的。不仅包括美国的肯尼迪兄弟、马丁·路德·金、Malcolm，还包括智利的Salvador Allende、比属刚果的Patrice Lumumba、瑞典的Olaf Palme、埃及的Anwar Sadat以及联合国的Dag Hammarskjold。当一些人察觉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不再保护自己的利益时，就“干掉”了他们。刺杀就相当于当代的弑君，很多男性政治领导人因此为国捐躯，就像军人一样。不过现在男性领导人入土之后，他们的妻子仍在世。

除了英迪拉·甘地，近代历史上没有遭到刺杀的女性领导人。相对妻子遭到刺杀后丈夫得到权势而言，女人更容易在丈夫遭到刺杀后得到

权势。Corazon Aquino在她的丈夫遭到刺杀后成了菲律宾总统；Violeta Chamorro在丈夫尼加拉瓜总统惨遭杀害之后被选举为总统；Benazir Bhutto在她父亲巴基斯坦总理遭到杀害后被选为总理。

为了停止对男人的暴力我们做了什么?

任何人只对女人施以暴力就是反女性，而女人只对男人施以暴力就是普通的暴力行为，这种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观点促成了一种制定某些法律的政治需要，这些法律进一步加强了对女性的保护。例如，我们发表了很多关于受虐妇女的研究，却忽略了有十几项研究中指出，受到虐待的男人数量与女人相当，[43]我们认为，为“受虐妇女综合征”而立法是合理的，却从来没想到过“受虐男人综合征”。很快，受虐妇女综合征成为被害妇女可能可以使用的12大辩护理由之一，但是被害的男人不能使用这个辩词。如今，媒体模拟对女人实施暴力甚至也可能被称为侵犯公民权，但在实际生活中，在足球和摔跤中针对男人的真正的暴力却被称为教育。

尽管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成为除强奸以外所有暴力罪行的受害者，但是美国参议院提出了《防止对妇女施暴法》——这项法案把针对妇女的暴力列为仇恨罪行和侵犯妇女公民权的行为，但是对男人的暴力却没有被列为仇恨罪行和侵犯男人公民权的行为。总之，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被立法了。只有在女人遭受的暴力伤害比男人多很多时，这类法案才应该写入宪法。而实际上男人受到的暴力伤害更多，所以不仅《防止对妇女施暴法》不应该写入宪法，而且应该制定《防止对男人施暴法》。

根据《防止对妇女施暴法》，有300万美元被用于保护妇女不受暴力罪行的伤害，但没有一分钱用于保护男人；还有75万美元的拨款用于建设妇女避难所，但没有男人的避难所。它的副标题已说明了问题所在：“为女人建设安全的街道、为女人建设安全的家”。重点不言而喻……

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政府法案在提交国会委员会之前，必须基于事实证据进行制定和修改。事实证据应该反映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女人——15个女人，没有男人——在法案提交司法部委员会之前提供了证据。[44]提交申请的男人都没有被批准作证。

我们怎么做才能遏止对男女两性的暴力行为？我们可以从降低对男人的期望——作为杀手兼保护者，从私人保镖到国家保镖——的期望开始。而且我们可以不再选举那些认为他们必须保护女性而忽略男性的人做立法者。立法者听不到我们没有说出的诉求，记住这一点这个过程才能开始。

注释：

1. 根据1991年的最新数据，74.6%的谋杀案受害者为男性（男性13632名，女性4611名）。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1988年美国罪案》第11页，表“1988年谋杀案受害者的年龄、性别和种族”。

2. 美国司法部司法项目办公室司法统计局《1987年美国刑事受害报告》表3“1987年个人犯罪”第16页。每1000人中，男性成为暴力犯罪对象的概率是女性的1.7倍。这项数据包括强奸罪，但是不包括谋杀罪，男性遭到谋杀的概率是女性的3倍。

3. 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1990年美国罪案》第15页和第51页。以下为暴力犯罪案件的数量，不包括强奸：

1981年	1990年
1267316	1718575

4. 强奸率从1973年的1.8/1000下降为1988年的1.2/1000。见美国司法部司法项目办公室司法统计局《美国刑事受害报告年报（1973~1988）》第15页。这个数据来自一项全国家庭抽样调查。与举报强奸报告的数量相比，这项数据的强奸率被认为更可信，因为在过去10年中，举报强奸的数量上升，原因在于公众对强奸的意识增强而且对强奸的定义范围扩大了（例如，无视对方说的“不”）。在这项调查里，1981年到1990年之间强奸事件的报案数量上升了9%，而1981年到1990年之间以男性为主要受害者的暴力犯罪的报案数量上升了36%。

5.《1990年美国罪案》。具体的数字为102555起强奸案和1757571起暴力犯罪案件（谋杀、抢劫、故意伤害）。

6. 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1981年美国罪案》。引自医学博士兼物资调运硕士Mark L. Rosenberg与James A. Mercy博士，《他杀：全国流行病学分析》（"Homicide: Epidemiologic Analysis at the National Level"），《纽约医学会会报》（*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1986年第62期，第389页。

7. 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全国犯罪严重程度调查》，这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犯罪学与刑法研究中心的Marvin E. Wolfgang、Robert M. Figlio、Paul E. Tracy 和 Simon I Singer进行的调查。（Washington, D.C.: USGPO, 1985）

8. Murray A. Straus 和 Richard J. Gelles，《两项全国调查反映出1975年至1985年的社会变迁和家庭暴力变化》（"Societal Changes and Changes in Family Violence from 1975 to 1985 as Revealed by Two National Surveys"），《婚姻与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86年8月刊，第465~479页。

9.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生命统计月报》1989年9月26日增补卷，第6页表D，"15大致死原因中年龄调整死亡率的比例，按性别和种族：美国，1987年"。

10.《1987年美国刑事受害报告》。

11. David Zeman，《父亲、受难者、骗子？》（"Father, Martyr, Fraud?"），《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1990年3月25日。

12. 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学Robert Gramling, Craig Forsyth 与 Jeff Fewell，《犯罪和经济活动：一项研究纪要》（"Crime and Econoic Activity: A Research Note"），《社会学谱》（*Sociological Spectrum*）1988年第8期，第187~195页。

13. Todd Sloane，《Laurie Dann：解析杀人犯》（"Laurie Dann: Anatomy of a Killer"），《温内特卡新闻报》（*Winnetka Talk*）1988年3月26日。

14.《芝加哥论坛报年度索引》（*Chicago Tribune Annual Index*），1988年第407~408页。

15. Paul Feldman等人，《直面死亡：官员在暴乱中杀死10个男人》（"Faces of Death: 10 Men Slain by Officers in Riots"），《洛杉矶时报》1992年3月24日。

16. Vivian S. Toy，《男生施暴迫使女教师离校》（"Violence by Boys Forces Removal of Women Teachers"），《底特律新闻报》1988年22月17日。

17. 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斯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是29个州里少数几个仍然允许教师和管理人员在管教学生时使用体罚的州。1991年2月28日，本人电话采访了反教育暴力家长教师联合会的Jordan Riak，该组织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丹维尔的全国性组织。

18. Kathleen Doheny，《性侵犯：当男人成为受害者时》（“Sexual Abuse: When Men Are the Victim”），《洛杉矶时报》1989年1月10日。男女比例为1∶1.7这个数据是根据对性侵的广泛定义推算出的。例如，一个男孩很少告诉别人自己被摸了臀部，因此，这部分不会计入性侵数据。性侵犯的定义已经被大大扩展，以至于很多教师害怕帮助小学生穿衣、脱衣、拥抱或者和他们玩摔跤。

19. 同上。

20. 美联社，《与女人的斗争必须停止了——布什》（“War on Women Must Stop—Bush”），《洛杉矶时报》1988年6月27日。

21. 同上。

22. 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全国州高中协会联盟1991~1992年的“指南手册”。

23.《社论：慢跑者与流氓》（“The Jogger and the Wolfpack”），《纽约时报》1989年4月26日。

24.Ellen Goodman，《要女人安全？试试消灭男人》（“Safety for Women? Try Removing Men”），《圣巴巴拉新闻报》（*Santa Barbara News Press*）1990年1月9日。

25. Gerald Galison，《致编辑的一封信》（“Letter-to-the-Editor”），《纽约时报》1989年3月7日。

26.《时事简讯》（*No Circ Newsletter*）1988年秋季刊。

27. Edward Wallerstein，《割礼：美国人的一个健康误区》（*Circumcision: An American Health Fallacy*）。Wallerstein是一位纽约的泌尿科医生。（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 1980）

28. 同上。

29. 同上。

30. 麻醉药会降低压力激素水平从而减轻压力。它能将对免疫系统的抑制最小化，从而间接防止感染。它也能减少新生儿肌肉内的酸堆积。见医学博士M.C. Rogers，《做正确的事——新生儿和儿童的疼痛缓解》（“Do the Right Thing — Pain Relief in Infants and Children”），《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91年1月2日第55页。

31. Howard J. Stang，M.R. Gunner，L. Snellman，L.M. Condon 和 R. Kestenbaum，《新生儿包皮环切的局部麻醉：疼痛和皮脂反应效果》（“Local Anesthesia for Neonatal Circumcision: Effects on Distress and Cortisol Response”），《美国医学会杂志》1988年3月10日，第1507~1511。Stang博士来自明尼苏达大学。

32. Edward Wallerstein，同上。

33. 同上。

34. 在全国范围内对割礼进行研究的花费不到100万美元。波斯湾战争的成本为一分钟50万美元，见《一日战争的成本》（“The Cost of a Day of War”），《洛杉矶时报》1991年2月9日。该新闻中的数据来自美国国会预算局和预测国际公司1990年的数据。

35. E.L. Wynder等人，《宫颈癌的环境因素研究》（“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Carcinoma of the Cervix”），《美国妇产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1954年4月刊，第96页。

36.《割礼与癌症》（“Circumcision and Cancer”），《时代》1954年4月5日，第96页。

37. M. Terris等人，《割礼与宫颈癌之间的关系》（“Relation of Circumcision to Cancer of the Cervix”），《美国妇产科学杂志》（1973年11月15日，第1056～1062页；A. Lilienfeld 和 Saxon Graham，《通过调查问卷确定包皮环切与宫颈癌流行病学研究关系的有效性》（“Validity of Determining Circumcision Status by Questionnaire as Related to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f Cancer of the Cervix”），《全国癌症协会期刊》（*Journal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1958年10月刊，第713~720页。

38. Edward Wallerstein，同上，第72页。

39. 普通儿童每年在电视上看到3024个人被杀。见Tom 和 Nancy Biracree，《美国人年鉴》第241页。（New York：Facts on File，1988）

40. 我自己观察白天和黄金时间段的电视和电影后计算得出了这个数据。这只是大概估算，因为在西部片和战争片中被杀的全部是男人，但是不一定每次都能确定人数，而且平常我只看电影。

41. 我大概看了1500~2000部电影之后计算出了大概数据。一般情况下，我先是单纯地看电影然后再在脑子里计算，所以这个数据不是很准确。

42. Bret Easton Ellis，《美国狂魔》（*American Psycho*）。杀害3个男人的情节分别在第131页、第165页和第217页，杀害小男孩的情节在第298页。（New York：Vintage Books，1991）感谢Robert Keith Smith观察到这一点。

43. 例如，这14项两性研究中有两项全国范围内的两性研究发表在Straus和Gelles的上述作品中。

44. 美国参议院，《美国参议院审判委员会之前的女性与暴力听证会》1990年6月20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1990年11月11日。15位女性基本上都来自以女权主义为导向的组织（全国妇女组织等）。Jon Ryan和其他男人未被允许作证。

第十章

像拯救鲸鱼一样拯救男人

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女人选择会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性命的男人。我们也看到了为什么如今选择杀人者身份的男性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停止将男人和女人划分为被随意支配的性别和被保护的性别，那么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的、最重要的直觉反应是什么呢？而且，我们这么做的倾向已经影响到了生态环境——它是如何让我们做好准备以实施两套法律系统，一套系统指控“行凶者”性别而另一套系统保护“受害者”性别？我们要面对的首先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要从正视自己开始。

几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朋友在树林里散步，一个男人突然跳出来站在我们面前。就在一瞬间，我的女性朋友往后跳而我往前跳。不管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的身材差距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化问题，都不重要。和大部分男人一样，我下意识地将那个不言而喻的规矩带入我和一个女人的关系中：“我的身体，但是我不能做主。”

我希望这种事情只在树林发生过。但是有一次，我和一位女士在家中时，我们被一种非常可疑的噪音吓到了，我要她和我一起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不再为此感到内疚。（第一次有一位女士自愿和我一起去，我对她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

大部分男人不仅是女人的免费保镖，而且他们还花钱去做女人的保

镖：他们花钱约会、花钱共度周末、花钱一起散步，他们实实在在是为了成为她的保镖而花钱的。这是男性间接爱护女性的很多方式之一。我们把这种爱护变成不可见的，因为我们称它为“力量”。

不是有很多女人也会保护自己和孩子吗？是的，没错。通常情况下，女人会保护自己而且会豁出性命保护孩子，但是女人极少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一个成年男人。我们都读过母亲抬起汽车救孩子的故事，但是看不到女人这样救男人的故事。

在第二阶段的社会中，我们要对抗解救女性的意愿，首先要面对的是解救小女孩的习性。

解救女童基金

词条：国际儿童组织为儿童募集资金时，宣传片中出现的18位儿童中有17位是女童。[1]他们在广告中告诉观众：“在你收养孩子时，就意味着她可以学写字，她可以有饭吃，她……”

在其他广告中，贫穷的定义是“饥饿和小女孩……”

为什么要重点强调受苦的小女孩？因为他们在募集资金。因为他们根据经验认为我们对拯救女孩更有兴趣。

忽视男性生理会损害全球生态环境？

在美国的三里岛，有80%的工人是男性，[2]由于操作人员睡眠不足而且疲惫不堪，所以他们未能判明冷却系统用水不足。[3]到了早上，冷却系统用水不足导致反应堆熔化。操作人员睡眠不足也是导致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发生爆炸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的因素。[4]如上所述，瓦尔迪兹号原油泄露时，虽然船长遭到了指责，但是调查人员后来承认，罪魁祸首是筋疲力尽的船员未按照原计划休息就被安排再次出海。[5]

如果工人们得到充分的休息，历史上一些非常严重的生态灾难就能避免。从因果关系上讲，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是因为世界对男人的生理状况不够在意。

准妈妈得到的保护难道不应比准爸爸更多吗?

我们想要给予已经怀孕但仍在工作的女性特殊保护，这似乎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目前遗传学家发现，在孕育孩子阶段男人暴露在化学毒素中同样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为什么？一个女人在生产之前所有卵子都是现成而且完整的。但是为了产生精子，细胞必须分裂。[6]而且，新的边缘会在细胞分裂时形成，这期间它们异常容易受到毒素的影响，这样的精子会造成孩子基因缺陷。

目前60%~80%的先天缺陷尚不清楚原因。科学家已经发现900种化学品中约30%会对人体发育产生毒害。既然我们认为暴露在有毒化学物质中的人群主要是男人，那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知道，关心孩子的安全就意味着关心男人的安全。Elmo Zumwalt的故事只是冰山的一角。

将工作场合视为成就感来源是一个误区

女权运动最大的误区之一是希望工作能带来“力量”和“自我成就感”。如果雇主将力量和自我成就感给了他人，那么他们也就不必付钱给他们了。对于那些能在工作岗位上找到自由感和成就感的雇员来说，是的，“他们有了更多力量”。但是普通男人都知道，雇主之所以付钱给他，是要在上班时间利用他的身体，这样他才能换来在下班之后自己身体的自由。能从雇主那里得到额外的好处是因为雇员为雇主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它们并不是可预期的，而是赚来的。至少普通男人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这种理解怎样才能转化为在日常生活中与男人的互动方式呢?

我们是否会改变在日常生活中对待男人的方式?

最近有一次在飞往休斯敦的飞机上，我遇到了一位波音公司的航天工作人员。按照我以往的习惯，我会问他——或者和他辩论——关于波音公司帮助制造隐形轰炸机的事，但是这次我问了他的工作情况。我发现，他工作中接触的化学品会导致记忆力衰退、乏力和肝炎。他告诉我，他不能说出这些化学品的名称——这些信息是保密的。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看医生，他说这些化学品信息是高度机密的，不能透露给医生。我又问道："难道你的生命不比保密重要吗？"他回答说："这不仅关系到我的生命……如果我丢了工作，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就要受苦。"我稍稍鼓励了他，随后他拿出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站在圣诞树前的照片给我看。

为什么男性的"妓者"角色未被关注?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男人不能像女人——尤其是贫困的女人——那样利用自己的身体做男妓。因为大部分男人无意识地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妓者的角色了。比如矿工、消防员、建筑工人、伐木工、军人、肉类包装工，这些人的"妓者"意味显而易见：他们为了金钱和家人出卖自己的身体。

中产阶级的男人是另一类型的"妓者"：他的孩子出生后，他的噩梦就开始了，他放弃了做一名小说家的梦想，开始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产品写广告文案，这成了他下半辈子每个工作日必须要做的事。越贫穷的男人就越有这种感觉。对男人来说，"妓者"不是只有女性在从事的职业。

对大多数男人而言，只有在家人的经济保障达到了他们想要的水平之后，才会允许自己自由自在地考虑内心深处的想法。然而，许许多多的男人发现，就在他达到了内心的目标之后，他的家人会希望住更豪华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能去私立大学读书。只有极少数的男人既能满足家人的愿望，又能考虑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如果他考虑自己的想法，就会害怕发现自己在供养他们的过程中已然成了一名“妓者”。这是男人的服从——“妻儿第一，丈夫第二”。

保守党和自由党如何加强了男人的被随意支配性?

不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加强了对女人的保护和对男人的随意支配性。保守党的辩词是——性别角色。如果受伤的是女人，自由党就将之称为性别歧视；如果受伤的是男人，他们就会谴责男人。例如，一些只有男人参与的男性俱乐部伤害了女人，自由党认为这是性别歧视；而只有男性参与的征兵注册伤害了男人，自由党谴责正是男人挑起了战争，所以只有男人被要求参战。如果得到帮助的是女人而受到伤害的只有男人，那么双方都会把生理因素当成决定因素。同样，几乎所有保护女性的法律都会得到自由党的支持。[①]如果法律保护女性但随意支配男性，那么两个派别都会成为保守党。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女人是受害者这一从未遭到质疑的假设。

女性作为受害者的力量

受害者角色的力量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犹如东京湾在战争中的地位。Lyndon Johnson可以假称共产党袭击了东京湾的美国船只，从而得以逃脱谴

① 自由党支持将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但不包括对男性的暴力行为）在法律中定义为“仇恨罪”；支持保护大部分女性不受性骚扰的危害，但不包括保护大部分男性不受到高危职业的危害；支持在帮助需要抚养孩子的母亲方面放宽要求，但不包括父亲；并且支持几乎所有只针对女性的保护法（第三部分的重点内容）。

责，因为他知道，“美国人是无辜的，而共产党是行凶者”这种假设会令国会不敢谴责他的正确性。在今天的美国，女人拥有东京湾的力量：女人是无辜的，这种假设给了她们谴责他人的权力，但不用像男人一样遭到诘问。政府不是质疑女性而是保护女性，这种做法的深入程度造就了作为替身丈夫的政府，这是本书内容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

注释：

1. 1991年的电视商业广告。

2. 80%的数据是宾夕法尼亚州通用公共事业公司（负责三里岛）Ralph Desantis的估计数据。

3. Merrill M. Mitler，Mary A. Carskadon，Charles A. Czeisler，William C. Dement，David F. Dinges 和 R. Curtis Graeber，《灾难、睡眠和公共政策：共识报告》（“Catastrophes，Sleep，and Public Policy：Consensus Report”），《睡眠》（*Sleep*）第11期，第100~109页。（New York：Raven Press，1988）

4. 同上。

5. 船员筋疲力尽但没有按照原计划休息一天，这一情况在1992年6月29日采访Leon Katcharian时得到了确认，他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官方报告的合著者。见Leon Katcharian等人的《1989年3月24日美国爱克森瓦拉兹油船在阿拉斯加瓦尔迪兹附近的威廉王子湾布莱礁触礁》第166~167页。（Washington D.C.：NTSB/MAR-90/04）

6.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敦健康科学中心遗传病理学家Marvin Legator博士。引自Sandra Blakeslee，《先天缺陷转为精子缺陷的研究》（“Research on Brith Defects Turns to Flaws in Sperm”），《纽约时报》医疗科学版面。

The Mgth of Male Power

第三部分

作为替身丈夫的政府

第十一章
综 述

如果两性中只有一方是赢家，其实双方都是输家。

——沃伦·法雷尔

在19世纪初的美国，倘若女人犯了罪，受罚的是她丈夫。[1]同样，英国法律规定，如果家庭身负债务，被债主送入监狱的也是男人。说到男女之间的问题，男人制定法律无意识地是在保护女人。法律往往是由男人制定的，但法律却不是为男人而制定的。

在这个宣称女性独立的时代，一项接一项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它们如此注重对女性的保护，以至于倘若男性的宪法权利与对女性的保护相互冲突，那么他的大部分权利将在对她的大部分保护土崩瓦解之前先土崩瓦解。

这件事正在合法地发生着。然而，正在合法发生的事几乎总是反映出更深的心理层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很多女人离婚后失去了救世主似的丈夫，就会寻找替身救世主；而男人离婚后失去了爱的来源之后，就会竞相寻找拯救女人的新途径，以期得到女人的爱。

寻求救世主与竞争成为拯救者，这一现象体现在制服上。新时代女性身边的男人先是父亲，然后是丈夫，最后是精神领袖，于是，男人都争当她们的精神领袖。传统女性生命中的男人先是父亲，然后是丈夫，最后是“圣父”，于是，男人都争相做她们的“父亲”（神父、牧师和拉比）。

而女权主义者生命中的男人先是父亲，然后是丈夫，最后是“选择性”：是选择自我拯救还是转向最大的救世主——作为替身丈夫的政府，于是，男人争相把政府变成替身丈夫。

离婚导致男性机构（即立法机构）在其他男人（即丈夫）无法保护个体女人时对女人进行集体保护。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男人所缴纳的税收大部分都用在了女人身上。当离婚让女人失去丈夫的保护时，我们在集体无意识中依然想保护女人。

而女人在集体无意识中依然想得到保护。比如说，一位圣地亚哥的警官由于在当地的沙滩上强奸妇女而被判56年徒刑，而他的妻子正起诉警察局讨要本该由丈夫提供给她的收入……她希望政府能成为她的替身丈夫，她还起诉警察局在开始的时候雇用了她丈夫……[2]还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变化……

男人制定的那些法律是否反映了男性的价值观？一部分是。男人的价值观有一部分是要保护女人，甚至胜于对自己的保护。这些法律是否为了男性的自我利益而制定？可以说是。想要得到女性之爱的男人学着把女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

几乎所有的立法者均为男性，难道这一事实不正好证明男性掌权，而且他们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照顾女性的利益而什么时候不照顾吗？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来讲，美国的法律系统和选举人是分不开的。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54%的选举人是女性而男性占46%[3]（女性的票数比男性的多了700万）。

总之，立法者和选举人的关系就像私人司机和雇主的关系——看上去权力都在前者手中，但如果他们不去后者要求去的地方，就会被炒鱿鱼。如果立法者看似没有保护女性，其中的原因几乎都是因为女性无法在如何保护她们上达成一致（比如，在克林顿之前的四次总统大选中，女人为共

和党和民主党投的票数都差不多）。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给予女性特殊保护的立法倾向是如何开始打破美国宪法关于平等保护的承诺的。例如，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见证了正当防卫的两个定义：一个适用于女性，另一个适用于男性；一级杀人罪有两个定义，选择哪一个定义取决于你的性别。我们会看到，90年代出现了12大辩词，同样是杀了人，为何女性可以用它们来辩护但男性却不能用。我们会看到，在很多高校，为何女人可以指控男人约会强奸使其被学校开除——即使是她选择了饮酒并在饮酒期间“同意”了事情的发生。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了解到为什么政府会针对性骚扰和约会强奸进行立法；这些行为在21世纪会给商业、政府、法律，以及女性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困境；在我们自己陷入困境之前我们需要做什么。

最初的女权主义者反对由男女两性不同的生理特征而造成的法律歧视，后来这些人演变成喜欢利用不同的生理特征而扩大妇女权利的人群——例如，女性既可以在孩子父亲反对的情况下怀孕生子，也可以起诉孩子的父亲索要18年的抚养费。我们将在这一部分看到这个演变过程。

我们将看到，雇主在给予女性特权的同时又被要求给予女性同等的尊重时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例如，女权主义者支持怀孕女性享受伤残补贴，很快，怀孕成为唯一不在工作场合发生的因工“致残”，也是唯一的雇员有意为之的“伤残”。

这些已经生效的“妇女保护法”可能已经跻身于历史上最无声无息的法律变革之列。1970年，女权主义法学界尚不为人所知。如今，在最近出炉的一份长达71页的女性和法学类文献目录中，大部分书籍和文章为女权主义法学学者所著。[4]没有学者在法律杂志中批评女权主义。有人问这是为什么，耶鲁大学法学院的Geoffrey Hazard教授解释说，现在大学里

有一种“政治正确性”的氛围，如果有学者反对，就会被打上“反妇女”的标签。[5]

但是仍然没有人证实这个系统确实在保护女人。或者说实际上我们有两套法律系统——适用于男性的法律和适用于女性的法律。

注释：

1. 1824年密西西比州Calvin Bradley诉州政府156号案件。见R.J. Walker，《密西西比最高法院判案报告》第73页。（St. Paul，Minn.：West Publishing，1910）

2. 美联社，《警察被判有罪，妻子起诉政府》（“Wife of Convicted Cop Files Claim Against City”），《北县刀锋公民报》（*The North County Blade-Citizen*）1992年10月1日。

3. 纽约市选民研究与调查机构向《华盛顿邮报》的Rich Morrin提供了该信息，1992年11月17日他接受了采访。

4. Terry Pristin，《女权主义者制造了他们的法律诉讼》（“Feminists Make Their Legal Case”），《洛杉矶时报》1991年3月15日。

5. 同上。

第十二章
两套不同的法律系统

罪行同等，服刑时间不等

词条：男女同样被判谋杀罪，但是男人被判死刑的概率是女人的20倍。[1]

词条：自1954年以来，美国尚未对任何只杀害过男人的女性执行过死刑。[2]

词条：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真正被执行死刑的有120个男人和1个女人。[3]这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女人说她宁愿接受死刑。

词条：在北卡罗来纳州，同样是被判二级谋杀罪，男人平均比女人多判12.6年。[4]

词条：下表是全国范围内不同罪行的刑期差异，数据来自美国司法部：

同等罪行下男和女被判服刑的月数[5]

罪行	女性	男性	男性比女性服刑时间多%
强奸	117	159	74
故意伤害罪	49	83	59
入室盗窃罪	46	66	70
盗窃罪	36	48	75

词条：性别为男性这个因素，比种族或者其他因素——无论是法律方面的还是法律无法左右的——更容易招致更长的刑期。[6]而量刑指南中已大范围取缔了量刑中的种族歧视。

量刑指南中是否减少了对男性的歧视？可以这么说吧……

词条：华盛顿州的量刑指南是美国最严苛的量刑指南之一。然而总体来说，男性的刑期仍然比女性的长23%。[7]即使犯罪史一样、罪行的严重程度相同，女性有57%的概率被判社区矫正而不是入狱服刑。[8]女人也更容易获得提前出狱的资格，而一旦条件符合，其中又有59%的人能被提前释放。以下是1991年的一些数据：

提前释放的首犯者比例，按性别[9]

	女性	男性
住宅入室盗窃	63	35
伤害罪三级	20	13
入室盗窃罪二级	40	32
偷盗罪二级	38	25
偷盗罪一级	17	9
伪造罪	48	35
越狱/B或C级	36	15

词条：检察官一直发现，在同等罪责下，女性的保释金通常比较低。[10]

从本质讲上保释金分为两种：男性保释金和女性保释金。女性缴纳保释金后被释放的概率更大。但是真正的性别歧视在保释金程序之前就开始了……

同伙犯罪，不同的服刑时间

辩诉交易成了女性交易

在夫妻双方的辩诉交易中，我们常说："来吧，看看这个男人怎么说。"我们对丈夫认罪、撤销对妻子的指控这种结果很满意。当然，从此以后他就会留下犯案记录，而她就不用。如果他们两个人再次犯案，他被判更长的刑期就是"很合理"的。

——助理检察官J.Dennis Kohler[11]

词条：丈夫和妻子非法进行毒品生意，二人均在自家餐桌上包装毒品。审

判之后，丈夫被打上了“大毒贩”的标签并入狱服刑。但妻子得到的是缓刑，她被释放了。一位毒贩辩护律师将这种双重标准称为“毒贩模式”。[12]

这种毒贩模式和成为女性交易的辩诉交易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平等保护、反对性别歧视的宗旨。如果检察官有计划地告知被指控的白人，只要他做出对黑人不利的证词，他遭到的指控就可以被撤销，那么我们面临的将是种族危机。

在一男一女犯案的情况下，往往双方都同意让男方承担刑事责任——尽管男人更容易被判更长的刑期，而且在监狱里更容易遭到强奸。如果黑人同意为白人这么做的话，黑人社区就会很机智地将其称为“习得性服从”。

男人是主犯时，服刑时间更长

如果一男一女共同作案但男人是“主犯”的话，女人的刑期会短很多或者不用服刑，因为她会被认为遭到对方洗脑，对此事无能为力，而且只是不情愿地服从而已。但是如果女人是主犯而男人服从于她，如果他声称自己被洗脑了，量刑会不会轻一点？在McMartin托儿所事件中，托儿所所长Peggy McMartin雇用了自己从大学辍学的19岁外孙到托儿所工作。[13]5年之后，他和外婆一起被指控对园中幼童进行52起性骚扰。他外婆的保释金只有他的1/3，[14]而且在陪审团最终裁定他们两人无罪之前，他已经蹲了5年大牢。而她，也就是托儿所所长，只在监狱里待了2年。

如果是一位男校长雇用了自己19岁的外孙女，那么她还会不会在判决之前遭受5年的牢狱之灾？在这次美国犯罪史上历时最久的审判中，如果是一位少女因涉嫌接触幼童而在监狱度过了5年的青春年华，但最终被判无罪，我们是否还能容忍这一切？

死刑：只有男性适用的死刑

（行刑者）发现，他难以接受对某个性别的人行刑，养育他的所有人

都告诉他，他应该对这个性别的人给予尊重并温柔以待，因为这个性别是生命的给予者。[15]

词条：有23位美国人在被执行死刑后被发现是无辜的。这23个人全部都是男人。[16]

词条：美国每年有约1900名女性犯杀人罪。[17]

词条：在女性杀人案中，几乎90%的受害者都是男人。[18]

自1954年以来，约有7万名女性犯凶杀罪，她们的受害者包括6万名男性，但是我们可以从本章的第二条词条中看出，没有一个女人会因为杀死一名男性而被执行死刑。[19]

近40年来，我们对女性的保护越来越多、对男性的保护越来越少，即使是小男孩和未成年人，比如Heath Wilkins。

词条：Marjorie Filipiak和16岁的Heath Wilkins被指控共同犯下一起谋杀案。两个人都不是惯犯。但是Heath Wilkins被判处死刑，而Marjorie Filipiak被释放了。[20]

词条：后来法官发现，Heath Wilkins幼年遭到过性虐待，但是这也改变不了他被判死刑的命运。[21]当年Josephime Mesa用马桶塞杀死了23个月大的儿子，后来陪审团发现她幼年遭到过性虐待，于是将她释放了。[22]

在美国的监狱里

关押女性重刑犯的地方以前是一所学校，在州议会大厦东侧几公里远。关押男人的是监狱，乏味、坚固。里面有牢房、保安和监狱帮派……关押女人的地方就像当初建设的学校，里面的员工鼓励她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David D. Butler律师在解释爱荷华州的区别待遇时如是说[23]

词条：在监狱服刑的男人因自杀、被杀或死刑而死的概率仍是女人的100倍。[24]

尽管女子监狱比男子监狱更安全，而且在设计上更利于重新做人，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近期的新闻报道都在强调服刑女性的困难，就好像只有服刑的女性才会面对这种困难一样。那么结果如何呢？加利福尼亚州现在拨款对服刑女性的健康状况进行专项研究。[25]而威斯康星州为此每月在服刑女性身上花费约2000美元而在服刑男性身上花费约1000美元。[26]

一般来说，女子监狱确实在某一领域具有歧视性——职业培训。男人得到的技能培训更倾向于一些高报酬的岗位，如电焊工或者机械师，而很多女子监狱培训的重点放在一些低酬岗位，如美容师或者洗衣工。[27]这种现状应该改变了。

尽管如此，由于服刑女性的数量增多——美国的犯人中有6%是女性，[28]于是很多州开始制定一些给予女性特权的计划。马萨诸塞州兰开斯特的母亲们享有接受子女探视专用的房间，但父亲们没有。[29]在纽约的贝福德丘监狱，母亲们有权使用监狱内的育儿室，但父亲们没有。在明尼苏达州，女子监狱建在学校旁边的居民区里面，重刑女犯人被安置在破旧的女子避难所内做社区服务。这对男人来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

一旦进了监狱，女人往往成为“依赖型”犯人：相比男性犯人而言，她们对监狱工作人员、戒毒计划和顾问的依赖性更强。[30]她们往往因为头痛、胃部不适或者其他身体不适而更经常地出入监狱医疗机构。

这种不平等合理吗？

判刑的复杂因素

当检察官优先让女方做辩诉交易，同时得到额外的证据显示男方隐瞒了有关女方的证据之时，媒体会报道对男方不利的证据，这将进一步在公众面前强化男人有罪而女人无辜的陈旧观念。于是，最开始认为女人更无辜的观念成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继续允许女方拥有做辩诉交易的优先

选择也成了合理的。

如果他们都再次犯案，不仅男方是唯一有犯罪记录的一方——这会导致他的刑期更长，而且较长的监狱服刑时间会让他变得更无情，这也会导致他更容易成为累犯。由于这些因素，男人的犯罪记录成倍增长，而女人的犯罪记录则降到了最小数量。不公平待遇就这样产生了恶性循环。

性别偏见是如何被合理化的

最近，州立性别偏见委员会声称女性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比如：

词条：在女人被判缓刑、无须入狱而男人被判入狱时，州立性别偏见委员会认为女人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因为女人的缓刑期更长！[31]

委员会还提到，女人受到性别歧视，因为女子监狱数量少，所以她们的亲属不得不长途跋涉去看她们。他们没有提到这个原因：每个城市附近只需要一所女子监狱就够了，因为所有的性别歧视都对女人有利。如果女人面对的是同等指控和同等的量刑标准，需要缴纳同等金额的保释金，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女子监狱。

女人可以用缓刑来逃避入狱服刑，被判刑后服刑时间更短，被判社区矫正的概率大于被判入狱服刑的概率，她们得到了这些特权却抱怨女子监狱不够多，恐怕很难找到比这更肆无忌惮的例子了。然而，《纽约时报》不加质疑地报道了这些结论。

为什么没有哪一个政府性别偏见委员会看透其中的性别偏见？因为这些“政府”委员会不是真的政府委员会——他们是女权主义委员会。也就是说，政府在决定哪些问题该研究而哪些问题该忽略时依赖于一些组织的推荐，例如女权主义的全国妇女组织和大部分都是女权主义者的美国女法官协会。[33]他们组成了政府委员会只是因为他们拿着政府——也就是我们——发的薪水。甚至连核心工作人员也更有可能是女

人而不是男人——女权主义运动积极分子，里面几乎没有男权主义运动积极分子。[34]

于是，委员会在注意到女子监狱过满的同时忽略了男子监狱更为严峻的情形；他们会注意到女子监狱需要关注女性的特殊问题，但不会注意到男子监狱需要关注男人中更常见的问题，比如男人之间的强奸。

女权主义的性别偏见政府委员会如同共和党的政党偏见政府委员会。试想一下，一个政党偏见政府委员会由一个政党发起，由同一政党的人士任职并集体排斥其他政党人士，《纽约时报》未经质疑就刊登了它的发现，而你的税率被提高了，用来给他们发薪水，这会是怎样的情形。如果一个政党真这么做了，这会是一个丑闻；但当女权主义者这么做的时候，却是官方做法。女权主义已然成了性别政治中的一党制。

将性别偏见合理化的是否只有女权主义者？

一个由女权主义者发起的、致力于消除性别偏见的委员会带有性别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要由男性构成的政府部门，例如美国司法部，在报道中也很容易显示出相似的性别偏见。比如：

美国司法部在报告中称男人的刑期比女人的长。[35]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容易被押送监狱服刑，而监狱的服刑期一般比较长[36]（拘留所的刑期比较短，所以刑期比较长的那个性别自然要被押送监狱）。这就是性别歧视。为什么在罪责相同、犯罪史相同的情况下，男人会被判更长的刑期呢？

想象一下，一份政府报告称有两兄妹偷泡泡糖被抓住了，哥哥被送往监狱而妹妹回到自己房间关禁闭，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报告解释说哥哥被关在监狱里时间比较久，只是因为被判入狱的刑期本来就比关禁闭的时间要久，我们难道不会问："等等，重点错了：为什么兄妹两个人犯了同样的罪，但是哥哥在监狱而妹妹在自己的房间？"

当性别歧视伤害男人时，我们需要拒绝性别歧视，它比女权主义有更深的意义：它是我们利用政府来替代男人的保护角色这个集体无意识过程的一部分。

骑士精神因素[37]

刑事审判系统里的中产阶级白人基本上认为，女人根本无法完成一些被指控的罪行，所以他们会试着找出女人没有真正牵涉其中的逻辑原因。但是那些被同情的女人都是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而非穷人和少数族裔。

——女子监狱项目负责人Barbara Swartz[38]

骑士精神因素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法院本应给予所有人平等的保护。一个法官（或陪审团）越是将女性视为弱势性别，就越是断定（一般是无意识地）法院应该给予女性额外的保护（作为对弱势性别的补偿），以此实现平等保护。这就是所谓的沙文主义法官、骑士精神法官或者父权主义法官的推理过程。幼稚的女权主义者亦是如此推理。沙文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都保护女性。然而很多女性法官在保护女性的程度上比二者弱一些。正如一位律师所说："如果有更多的女法官的话，就会有更多女性进监狱。"[39]

骑士团：法官、陪审团、律师和女性当事人

我告诉女人要穿什么衣服、怎样打扮、梳什么样的发型。她们必须在陪审团——还有法官——面前显示自己的非凡魅力。但同时她又不能打扮得太招摇，以免引起陪审团中女性的反感。如果她能在审判期间小哭一下，那就太棒了。

——律师Frank P. Lucianna[40]

"检察官很难严厉地质问一个女人，否则他会不招陪审团喜欢。他行事必须小心翼翼，"新泽西州律师Michael Breslin解释道。[41]他发现每个人都有保护女性的本能，而且这一点在年长的陪审员身上尤为明显。所

以在他为女性辩护时，他会尽量选择年长的陪审员。一位民权方面的刑事律师非常坦率地说："我一般宁愿选择为女当事人辩护，这个体制明显偏向女性。"[42]

于是，法官、陪审团、律师、女当事人和警察一起构成了"骑士集成电路"。很多城市的律师均表示，陪审团一般不会对醉驾的女性定罪，警察甚至都懒得逮捕她们。[43]"这是一个由男性沙文主义法官构成的男性体制"，没错，但这么说不公平。被判刑期更长的男人都认为这种说法不公平。

这种保护女人的本能不仅渗透到刑法之中，而且也渗透到婚姻家庭法之中。这一点在父亲和母亲的不同待遇中已经表现得异常明显了。我们告诉女性，她们拥有孩子的抚养权，但告诉男性他们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不过在对夫妻双方共有财产的双重标准中则没那么明显。还记得Jim和Tammy Faye Bakker吗？

夫妻共有财产中的双重标准：她有权，他有责

Tammy Faye Bakker和Jim离婚时，夫妻共有财产法保证了Tammy有权得到他们传道收益的一半。为什么？婚姻令夫妻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夫妻可以通过个人事业区分各自的角色，但夫妻共有财产法应该让夫妻双方为事业的收益或债务承担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事实是这样吗？

尽管Jim和Tammy在收益上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论Tammy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然而他们的事业陷入困境时，Jim被判入狱40年而Tammy未被判有罪。Tammy甚至都不用出现在法庭上。

表面上看来，如果她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么做就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平等权意味着她有权分配婚姻存续期间的收益，即便这些收益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那么她也要为这些非法获得的收益承担法律

责任——不论她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夫妻共有财产指的就是“夫妻共同收益”而不考虑角色，那么也必须设立“夫妻共同责任”，而不考虑角色。

然而，如果一个男人因为其被任命的角色责任而导致财务运营陷入困境，我们难道不应该让他负更多责任吗？如果他无视妻子的质问并蓄意伪造信息的话，当然没错。但是，如果已婚男人应该为背离正道的财务活动负更多责任的话，那么已婚女性就应该为走上邪路的孩子负更多责任。没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只让母亲为未成年子女造成的破坏负经济责任，“因为父亲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会说他的忽视是造成子女犯罪的一部分原因。忽视孩子的父亲是玩忽职守，但不是无辜的。

当孩子走上邪路时，父母双方不仅承担着平等的责任，而且就实际情况来说，一般父亲要赚更多的钱用来赔偿孩子造成的破坏。没有人告诉母亲：“你丈夫批评你的教育方式时你骂了他，所以他不管了——所以现在你要承担你儿子车祸造成的50万美元的债务，而且没有保险赔付。你，作为他的妈妈，要么掏钱要么在监狱里待上40年。”所以，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角色出了问题，掏钱的都是男人。

夫妻有共有财产却没有共有责任，这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它鼓励女人把所有经济风险都转嫁给丈夫。她只要说“你来签这个法律文件”或者“你来签这张支票”，就可以避免坐牢却可以获得收益。如果他通过逃税、内部交易、贩毒或者非法集资的方式发了财而且没有被捕，她就可以分享收益。如果他被抓住了，蹲大牢的只有他自己。在其现实版本中，夫妻共有财产是缺乏平等责任的平等权利。这不是平等。

当一个女人发觉她不参与财务运营就可以分得收益却不用坐牢时，她往往没有意识到她的不参与更容易让他犯罪。她越不参与财务运营，

经济负担就越是落到他一个人身上，他就越容易铤而走险。同样，如果他从来不关心孩子，他的“不参与”更容易让她感到不堪重负，她对孩子也更野蛮。法官们没有考虑过她不参与财务运营与他的金融犯罪之间的联系。

当妻子不参与财务运营却又面临着经济压力时，她的丈夫就会出事。一旦他在心理上感到买更大的房子的压力，刚开始他会游走于法律边缘。如果成功了，他会被寄予更高的期待，而他会感到新的压力（送孩子到更好的大学去读书），于是他会尝试一些违法的事情。如果他被发现了，他不会在法庭上说：“法官阁下，我有这种心理压力是因为我妻子。我有种‘习得性无助感’。”如果他真这么说了，他会成为法庭上的笑柄。

夫妻共享财产但只有男人承担责任，于是我们回到了一个视女人为孩童的时代。它使得家庭的协作依赖于女人的不参与，而不是女人平等地承担权利和责任。它使我们回到了第一阶段的家庭，在那个阶段，劳动分工导致了兴趣的分化。夫妻共享财产和责任时，他们整合了劳动也整合了二人的兴趣——有了协作精神的第二阶段的家庭。这是一个第二阶段的家庭单位，也是一个第二阶段的协作式家庭。

夫妻共有财产但不共有责任是如何伤害女性的

夫妻共有财产但不共有责任最终会使女性自食其果。当她不参与财务运营能让她和丈夫共享财富却不用同进牢房之时，无知能在短期内带来财富。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会造成最普遍存在于女性的“习得性无助感”——经济上的习得性无助感。然而如果她质疑自己的婚姻并且明白不参与财务运营不是她离婚后赖以生存的最佳工具，那么她就会害怕表达感受，而且会觉得自己像一名婚内妓女。

这种如婚内妓女般的感受是女性遇到的道德困境之一。在弄清楚自己

在财务上能为家庭做出什么样的妥协之前，我们真的无法认定自己是有道德的。但是，由于很多女人不懂财务运营，所以她们就可以奢侈地注重精神世界或家庭，而不用“脏了她们的手”。它让一些忽略了经济责任中道德责任的女人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然而，正是因为她觉得自己道德高尚，所以她才会觉得自己像婚内妓女。于是，女性的道德困境产生了。

支持夫妻共享财产但只让男人承担经济责任，这种集体无意识观念也保留了将女人视为孩童的需要。在第一阶段的世界里，这种分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2020年，美国总统就有可能是一位女性（可能是某位前任副总统）。将这位女性视为孩童，如同预见美国很快将由孩子统治一样。这个说法太夸张？那么，想想我们是怎么把Geraldine Ferraro当孩童看待的：她用丈夫的钱竞选国会议员时，我们把这笔钱视为“家庭资金”——至少一半是她的；然而当这笔钱被认为是非法所得的时候，只有她丈夫有被判刑入狱的风险，而且外界认为她丈夫“拖了Geraldine Ferraro的后腿”。我们并没有认为Ferraro夫人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我们是否在无意识当中把她当成了孩童？我们来看看。

如果哪个丈夫用他妻子赚的钱竞选，我们肯定会认为他在“利用”她。我们肯定会质疑，一个不能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男人又何以能在经济上领导一个国家。而如果他妻子的钱是非法所得，我们就会说：“如果他家里不能和腐败脱离干系，他又怎么能让政府不腐败呢？如果他不能和他所爱的人共同承担腐败的责任，他又怎么能和他任命的数千陌生人共同承担这个责任呢？”

然而，一个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女权主义者用了丈夫赚回来的钱时，没有人提出质疑。即使在逃避承担责任时，也没有人质疑过她共享那些财产的权利。没有人问过：“如果他们是一个‘未来会更好’的组合，那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是一个‘未来会更差’的组合？”我们将对他的攻击视为

对她的性别歧视，而不是对他的性别歧视。（如果男人是候选人，女人只是他的配偶，男人要接受调查；但如果情况反过来的话，仍然是男人接受调查。这是对男性的性别歧视。）

要鼓励女人竞选高层政治领域中的职位，就必须同时把女人视为完整的成年人——不是那种享有权利、生儿育女的成年人，而是能承担责任的成年人。有没有其他方案？由孩子来统治国家。有没有解决办法？二者共享财产和共同承担责任，为第二阶段的国家造就第二阶段的家庭。

注释：

1. 全国司法报告程序数据显示，犯谋杀罪或非预谋杀人罪的男人中约有2%被判死刑，而女人则只有0.1%。引自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以下简称USBJS）《州法院重罪犯档案》1990年1月刊，第9页，出版编号：NCJ-120021，作者：Patrick A. Largan博士与John M. Dawson（司法统计局统计员）。

2. 1954年1月15日，Dovie Smarr Dean因谋杀丈夫被判死刑，在俄亥俄州执行。在Victor Streib对1954年以来死刑执行情况的分析中，美国人很清楚，只杀害一个男人的女人没有被执行过死刑——个别被执行死刑的女人至少杀害了一个女人。见Victor L. Streib教授，《美国女死刑犯：性命、日期和其他信息目录》，1988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克利夫兰州立大学马歇尔法学院。

3. 1990年1月18日《死刑数据更新》，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NAACP LDF）。

4. Matthew Zingraff 和 Randall Thompson，《美国男性与女性的不同量刑》（"Differential Sentencing of Women and Men in the USA"），《国际法律社会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1984年，第12期，第401~413页。相差12.6年的相关内容见第408页。该杂志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

5. USBJS，《1985年28家重罪法庭的判刑结果》，1987年7月，出版编号：NCJ—105743，表5.5 "1985年平均被判刑期（按月），按罪犯性别的罪行"。

6. 不同种族受影响较小的数据见USBJS《重罪犯档案》，同上。

7. 华盛顿州量刑指南委员会《量刑改革法下的量刑实例：财政年度1987年》，作者：David L. Fallen博士（研究主任），第72页表37 "平均刑期，按性

别”。女性的平均刑期为3.5个月，男性为8.3个月。

8. 来自华盛顿州研究主任David L. Fallen博士，《量刑改革法下的量刑实例：财政年度1991年》，来自与作者的往来通信中，未出版，1992年3月15日。

9. 华盛顿，《量刑改革法下的量刑实践：财政年度1987年》，同上，第74页，表39。19%的女性和14%的男性有资格提前释放。

10. 见Howie Kurtz，《法院对女性更宽容》（“Courts Easier on Women”），《周日记录报》（*The Sunday Record*）1975年10月5日。

11. 同上。

12. 律师David D. Butler，《男性刑期更长》（“Males Get Longer Sentences”），《变迁》（*Transitions*）1990年1月/2月刊。

13. Seth Mydans，《一次审判刚结束，McMartin家又面临第二次审判》（“With One Trial Just Ended, McMartin Figures Face 2d”），《纽约时报》1990年3月5日。

14. Ann Hagedorn，《性骚扰儿童案审判结束，嫌犯被无罪释放》（“Child Molestation Trial Ends in Acquittals”），《华尔街日报》1990年1月19日。

15. Justin Atholl，《左右为难的刽子手：行刑者James Berry的故事，1884~1892年》（*The Reluctant Hangman: The Story of James Berry, Executioner, 1884~1892*）。（New York: J. Long, 1956）

16. Hugo Adam Bedau 和 Michael L. Radelet，《死刑案件中或存在误判》（“Miscarriages of Justice in Potentially Capital Cases”），《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1987年11月刊，第21~179页。此项研究覆盖了1900年至1984年的350起案件，所有被告人被判死刑或可能被判死刑，但后来发现他们是无辜的。23名被告（全部都是男人）被执行死刑以后才发现他们无罪，而8人（全部都是男人）在服刑期间死亡。

17. USBJS，《刑事司法统计资料集》，1991，第442页，表4.7。

18. John T. Kirkpatrick 和 John A. Humphrey，《北卡罗来纳州女谋杀犯的生活压力》（“Stress in the Lives of Female Criminal Homicide Offenders in North Carolina”），《人类的压力：当前部分研究》（*Human Stress: Current Selected Research*）第三期，编辑：James H. Humphrey。（New York: AMS Press, 1989）

19. Streib，《美国女死刑犯：性命、日期和其他信息目录》。具体信息见前面引文。

20. Ron Rosenbaum，《现在要死还太年轻？》（Too Young to Die?），《纽约时报杂志》1989年3月12日。，

21. 同上。

22. Tom Gorman，《杀害幼童的妇女仍然逍遥法外》（“Woman Who Kills Child Remains Free”），《洛杉矶时报》1989年4月26日。

23. Butler，同上。

24. 1987年的数据显示，96名男囚犯自杀，91人执行了死刑或者被杀，共187人。监狱里有555371名男性，这个比例相当于每10万个男人中有33.67名男性死亡。相比之下，1987年29064名女囚中有1人死亡，或者10万名女性中有3.44人死亡。男女囚犯死亡差距为978.8%。1987年自杀、被杀和执行死刑的数据来自USBJS《美国矫治人口》，出版编号：NCJ-118762，1989年12月刊，第105页，表5.17“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管辖下死亡的服刑人员”。1987年的监狱统计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991年美国统计摘要》第195页，表338，其中的数据来自USBJS的年度报告《1987年监狱囚犯》。

25. 加州专门工作组受命研究女性囚犯的健康问题，该工作组根据州众议院法案900（Assembly Bill 900）成立于1992年，由洛杉矶女议员Lucille oybal-Allard发起。

26. 1988~1989年间，威斯康星州男性服刑人员每个月的人均成本为1120美元，女性为2100美元，见《截止1989年6月30日年内人均成本分配报告：第五部分》，由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卫生与社会服务部改造局政策、规划和预算办事处出版。

27. George J. Church，《铁窗背后》（“View from behind Bars”），《时代》1990年秋季特别版第20页。

28. USBCS《1991年中囚犯》，第6页。最新数据为：758294名男性和46230名女性。

29. Fred Strasser 和 Mary C. Hickey，《女监空间不足》（“Running Out of Room for Women in Prison”），《管制》（*Governing*）1989年10月刊，第70页（女性的其他特权实例见上述杂志）。

30. 同上。

31. Allan R. Gold，《法庭普遍存在性别偏见》（“Sex Bias Is Found Pervading Courts”），《纽约时报》1989年7月2日。

32. 同上。

33. 美国国家司法教育计划的创会理事Norma Juliet Wikler在1979年该办事处成立时的发言，该办事处由美国全国妇女法律保护与教育基金和美国女法官协会赞助。见Wikler的《石头上的水：关于取消法院性别偏见问题的观点》（“Water on

Stone：A Perspective of the Movement to Eliminate Gender Bias in the Courts”），来自1989年5月18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法院性别偏见全国会议专题演讲。

34. 大部分机构男女比例为1：3或1：4。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机构中没有男权积极分子但有半拉子女权积极分子。比如Bruce Hight的《男性组织称委员会中女性太多》（“Male Group Says Too Many Women on Panel”），《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Austin American Statesman*）1992年1月21日。

35. USBJS《州法院重罪犯档案》第5页，表3。

36. 同上。

37. Howie Kurtz，同上。本条注释归功于Barbara Swartz女士。

38. 同上。女子监狱计划是纽约对女犯进行法律教育的计划。

39. 同上。文章中的话引自（新泽西州）伯根县助理检察官Ronald Schwartz。

40. 同上。

41. 同上。

42. 1991年7月16日采访了Alex Landon。

43. 律师David D. Butler，同上。

第十三章
十二大“女性专用”的辩词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可能杀死自己所爱的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自己会遭遇什么。有了十二大“女性专用”辩词，犯谋杀罪的女人可以使其指控被撤销或者刑罚大大减轻。没有男人在相似的情况下成功利用这些辩词。男人也没有对等的“男性专用”辩词。这些辩词中的每一条都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平等保护、反对性别歧视的宗旨。而且，十二大辩词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正当防卫中使用双重标准的确凿证据，它们会破坏司法系统持续数十年，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决定是否要结婚。

1.“女人无辜”之辩词

我以“女人无辜之辩词”开头，是因为十二大辩词中的每一条中都有它的影子。起初，我将这一辩词称为“女人的可靠性法则”，因为大众认为女人更无辜所以女人比男人更可靠。即使女人承认，自己遭到强奸或者遭到丈夫的虐待是错误的指控，而且承认自己说了谎，但是往往没有人相信。因此说，相信女人是无辜的这种观念比相信女人本身这一倾向更加根深蒂固。比如说，Bessie Reese……

Bessie Reese的丈夫出门旅行的时候决定永远地离开Bessie。由于她的丈夫是和James Richardson一起出门的，所以她决定在Richardson的7个孩子

的午餐里下毒进行报复。结果这7个孩子全部死亡。[1]

Bessie Reese从未遭到过怀疑，也从来没做过测谎测试。她真的值得被如此信任吗？非也。她曾经因为给第一任丈夫下毒而遭到审判（但她被无罪释放了[2]）。而且她因为枪击第二任丈夫被判刑（在拘留所里关押了很短的时间）。

James Richardson被判了死刑。然而在Bessie给孩子们准备午餐的时候，James和他的妻子正在佛罗里达州阿卡迪亚的柑橘园里工作，离家有8公里远。Richardson被指控未通过测谎测试——当时处理Richardson上诉请求的检察官承认，在最初的审判中没有任何人看到过那个测试。[3]

James Richardson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棺材被建造好。但是……1972年他获得了暂时的减刑。之后，James在监狱里度过了20年之后，Bessie Reese终于坦白是自己毒死了这些孩子。但是“女人无辜”而“男人有罪”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即使Bessie已经签署了第二份宣誓书，法院也没有对James进行重新审判。这件事情透露出的正是“女人无辜之辩词”的根基所在——“女人无辜法则”：女人说她们没有实施暴力的时候，人们会相信她们；她们承认她们有暴力罪行的时候，大部分人很容易质疑其真实性。

此事引发了对种族歧视（James是黑人，Bessie是白人）的政治抗议，最终促使法庭进行了第二次审判并释放了已经坐了21年牢的Richardson。

我问过新的检察官，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Bessie Reese。他未能给出正式的答案，只是说有几个月“有几个居民看见治安官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总是往Bessie Reese家跑”。[4]他只是说：“有传言说他们有婚外情。”

可见的种族歧视 vs. 不可见的性别歧视

这次事件只是被视为一个种族歧视的案例。但是如果其中只有种族歧视，那么Richardson太太也是黑人，也应该接受调查才对。尽管投毒事件发生时Richardson太太和丈夫在一起，但不论是她还是Bessie都从来没有被怀疑过。事实上，两个女人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嫌疑人——嫌疑人只有男人。

整个Bessie Reese案都弥漫着性别歧视的气息。且不说Bessie有过杀夫的历史以及婚外情传言，整个社区也不愿意形成一种迫使Bessie成为嫌疑人的政治压力。同时，或许其中最主要的性别歧视在于Bessie在性关系中的力量使治安官付出了代价：为了保护Bessie，将自己从一个制止犯罪的角色变成了一个罪犯。

保护女性杀人凶手和保护男性杀人凶手的代价是相同的：杀人凶手将继续杀人——被杀的不仅是被随意支配的男人，还有可爱的孩子们。

到了今天，Bessie Reese也没有因为她忏悔的谋杀罪而遭到指控。[5]

质疑女人的代价

TaWana Brawley案

词条：15岁的黑人少女TaWana Brawley声称自己遭到白人种族歧视者的轮奸，事后被塞进一个大塑料垃圾袋里，而且身上遍布粪便秽物。[6]但一位医生证实并没有任何依据表明她遭到了强奸或者性侵犯。而且一位妇女作证，称她亲眼看见TaWana自己爬进了垃圾袋。后来有人发现TaWana的鼻子里塞了棉花团，这样她就不会闻到污秽物的气味了。尽管如此，纽约州长Mario Cuomo说：“除非你告诉我她的动机，否则你不要告诉我是她自己这么做的。”

实际上，有人给了州长Cuomo一个她这么做的动机：TaWana和她妈妈

企图制造一个TaWana离家不归的理由，好向她妈妈的同居男友解释。但是或许这位州长在需要把女人当成无辜者的同时，又害怕被民众认为他是性别歧视兼种族歧视者，他甚至不承认听到过这个说法——后来这一说法被证实了。

在TaWana Brawley恶作剧案的背后，这个国家看到了其中的种族歧视，却没有看到，在两位女性合谋捏造的故事中存在着性别歧视。她强化了强奸犯——或者说轮奸犯——都是男人这一刻板观念；或者说加重了女性对男性的恐惧；又或者说迫使每个男人都必须在赢得女性的信任之前不得不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种族歧视是可见的，但性别歧视却是不可见的。

“毒药与老妇”案

Blanche Taylor Moore和她的丈夫在度蜜月时，他突然被紧急送进医院，医生发现他是砒霜中毒。本来剂量不足以毒死他，于是Blanche给他喝了几杯加了砒霜的奶昔。这次事件传开之后，有一些人想起Blanche的第一任丈夫就是死于砒霜中毒。还有人想起她有一任男朋友“死于心脏病”。所以现在警察对她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们挖出她男朋友的尸体进行尸检，发现尸体体内的砒霜剂量足以使人中毒。后来她父亲的遗体也被挖出来进行尸检，尸体内仍然含有砒霜。[7]

随着Blanche的所作所为被公之于世，人们开始报警称他们有理由认为Blanche也杀害了他们的亲属。然而Blanche在二十几年内都是清白无辜的。据我所知，在美国历史上，如果一个男人的母亲、第一任妻子和某任女朋友死于中毒而第二任妻子也险些死于中毒时，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被认为是清白无辜的，尤其是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同一社区时。

男人犯了相同罪行时会接受调查，倘若Blanche接受了同样的调查，她还有可能在二十几年来继续杀人吗？

埃克塞德林[①]中毒事件

Stella Nichell花了5年时间查阅图书馆的书籍寻找如何让人中毒的知识，而且还在丈夫Bruce的身上做试验。[8]她终于成功了：她在埃克塞德林中掺了少量的氰化物，静待Bruce头疼病发。验尸官的报告中显示未检出氰化物成分，所以Bruce的死因记录为肺气肿。但是，这让Stella非常生气。她希望氰化物成分能被检出，这样的话，他的死因就成了意外身亡，她就可以指控埃克塞德林修改了配方。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死于意外，她就可以得到17.6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如果他死于心脏病，则只能得到7.1万美元的赔偿）。因此，为了证明这是一场意外，她将氰化物掺入当地超市的埃克塞德林中。一个名为Sue Snow的漂亮女子购买了埃克塞德林之后死亡了。[9]85名FBI探员和警察马上介入调查。最终，Stella被判有罪。但是导致Stella被判刑的原因是她的贪婪。

和Blanche Taylor Moore一样，我们在无意识中假设“她是女人，她是无辜的，不用调查她”时，就会使其他无辜男女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释放Willy Horton足以毁掉一个总统候选人，但是案件发生后，Stella和Blanche没有遭到调查，这就如同给了女Willy Horton自由一样——自由地做母亲、得到保险赔偿金、再婚——她们并没有被称为缓刑期罪犯，而是被称为寡母。这些披着羊皮的连环女杀手会再一次夺走他人的生命。

相信男人要付出什么代价

Delissa Carter刺死她母亲的时候，她声称是她丈夫Nathaniel干的，而且她亲眼看见他干的。[10]有两位证人证明惨剧发生时Nathaniel身处纽约的皮克斯基尔（距事发地点相当远）。尽管Dellisa身处罪案现场，然而纽约州立最高法院选择相信她的话而不相信那一个男人和两个证人的

① 埃克塞德林：一种止疼药。——编者注

话。Nathaniel被判入狱25年。如果不是另外发生了3件非同寻常的事情，Nathaniel的冤情永远无法昭雪。[11]到真相大白之时，Nathaniel已经在狱中服刑一年多了。

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分别试图说服法官和陪审团相信自己时，如果他们的可靠性是相互对立的，她会被无意识地假设是无辜的，除非有证据证明她有罪，而他会被假设有罪，除非有证据证明他是无辜的。女人无辜的法则不仅隐藏于女人无辜的辩词中，而且存在于几乎所有其他辩词中。

2. 经期综合征之辩词

1970年，Edgar Berman医生提出，在经期和停经期间女性的荷尔蒙对女性作决策会产生不利影响，此言论引起了女权主义者的愤慨。很快，他被视为医学界男性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12]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女权主义者声称，一位妇女之所以有意杀害一名男性是因为经期综合征，她应该被释放。在英格兰，Christine English坦白自己有意开车将其男友撞向电线杆杀死，她利用经期综合征这个理由辩诉后成功脱身。还有，Sandie Smith杀害了一位同事后被判缓刑，但有一个条件：她必须每个月注射黄体酮以控制自己的经期综合征。[13]

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期综合征的辩词为其他有关荷尔蒙的辩词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于是，Sheryl Lynn Massip能够将自己6个月大的儿子放在汽车下面之后反复碾压，后来她不确定他是否已经死了，于是又重复了一遍，之后她宣称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而且接受了药物治疗。[14]没有女权主义者对此进行过抗议。

在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者在说“我的身体我做主”。到了80~90年

代，女权主义者在说“只要能增加我杀人的自由，我的身体我做主”，也可以是“只要能增加我杀人的自由，我的身体，我做不了主”。

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Ms.》杂志是这样辩护的：“每个女人都是不同的。”[15]确实如此。但是将经期综合征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辩护理由，这会导致对女性的歧视。为什么呢？如果一个女人可以在经期综合征的影响下杀人，难道她就不会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司机吗？如果她自己并不清楚她什么时候受到了这种影响，难道这不应该成为一个不让女性开车的理由吗？我们又把女人当成了孩童。

“有些女人比其他女人更容易受到荷尔蒙的影响”，有了这种借口，一个女人在应聘管理岗位时可以说：“选我吧——我不受经期综合征的影响。”另一个女人可以在杀人之后说：“放了我——我受了经期综合征的影响。”在女人得到管理岗位而后来又杀人之后，她可以说：“放了我吧——我刚受到经期综合征的影响。”这句话会影响审判结果。如果愤怒的荷尔蒙继续充当女人杀人的合法理由，那么它将成为雇用女性时值得考虑的合理问题。对女性给予差别对待造成了对女性的歧视。

经期综合征的辩词也为睾丸素中毒的辩词的出现铺好了道路。如果女人杀了人可以用经期综合征为由来辩护，那为什么男人强奸他人之后不能辩称是睾丸素中毒？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正确的做法是惩罚罪犯，女性或者男性的荷尔蒙因素只能作为次要的减缓刑罚的因素。

3. 丈夫爱妻子之辩词

电影《我真的爱死你》（*I love You to Death*）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中，一个女人发现丈夫不忠之后企图杀死他。她和她母亲试过给他下毒、雇用抢劫犯殴打他并用枪射穿他的头。一次意外使她们被绳之以法。但是她丈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丈夫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恢复之后

没多久，就通知当局他不会起诉。那么他的第二反应呢？他为企图杀害自己的妻子作辩护。他因为自己身体“出轨”而感到非常内疚，后来他“感谢”他的妻子！后来他再次向她求婚。她用语言羞辱了他，然后接受了求婚。

《我真的爱死你》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喜剧。想象一下，如果真实的故事是丈夫企图谋杀妻子，那么被改编为喜剧的话会引发怎样的抗议。

这种来自丈夫的辩词是特例吗？不是。下面这件事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新闻标题是这样的：“一名向丈夫开了5枪的妇女获得缓刑。”[16]

Jennifer Eidenschink和她的丈夫Steven开始分居的时候，Jennifer买了一把枪。有一次她邀请Steven到家里帮她把一个鹿头从墙上拿下来，然后就在他忙着搬鹿头的时候，她将0.22口径的半自动手枪里8发子弹全部上膛。[17]5发子弹击中了他，其中3发击中了腹部。

Steven是一位运动员。这次枪击对他造成了无法修复的神经损伤和永久的跛行，因此他再也无法回到对他意义重大的运动场上去了。Jennifer声称他曾虐待她。但由于Steven活了下来，他出示的证据迫使她承认自己在说谎。[18]威斯康星州的戴恩县法院没有判她进拘留所或者监狱，一天也没有……只是建议做两周半的志愿服务。这是对一个杀人未遂者的判决。那位法官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孩子们需要妈妈，还有Steven为他的妻子作了有利于她的证词。[19]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

待Steven身体康复之后，他搬回去和妻子住在一起了——简直像电影情节一样！噢，对了，法院确实责令Jennifer支付她丈夫2.2万美元的医疗费用。但是Jennifer没工作。猜猜看是谁帮他的妻子付了枪击他的钱？

人们很容易想道：“喔，天哪，这两个人可真般配！”但是这其中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之所以将其称为“丈夫爱妻之辩词”，是因为到目前为

止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妻子为企图谋杀自己的丈夫作合法辩护的。

丈夫之辩词就是习得性无助感的典型表现。女人只要表现出些微的习得性无助感，我们不仅会认为这是一种疾病，还为这一疾病严重到可以在杀死男人之后作为辩词来脱身。当男人体验到这种习得性无助感时，他企图谋害她之后永远都无法利用它来脱身。男人只能为企图谋杀他的她进行辩护。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4. 受虐妇女综合征之辩词

词条：1990年12月。美国俄亥俄州的州长释放了监狱里25名因杀害或攻击其丈夫或伴侣的妇女。[20]她们每一个人都宣称受害人虐待过她。之后的几个月里，其他州长纷纷效仿。[21]

在1982年之前，将预谋杀人辩称为正当防卫会在法庭上引起哄堂大笑。但是到了1982年，Lenore Walker第一次利用她提出的、只有女性才有的“习得性无助感”理论赢了一场官司，她在该理论中指出，受到丈夫或男友虐待的女性会对人生产生恐惧而且对离开他感到很无助，所以她杀死他是一种真正的正当防卫——即使她预谋杀害了他。[22]

这个女人被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的受害者。女人是否有可能会为了保险金而杀人？Lenore Walker说不会，她声称：“除非女人被逼到绝望的境地，否则她们是不会杀害男人的。”[23]讽刺的是，女权主义者常常说：“没有任何理由对女性使用暴力。”现在他们又说：“但如果是女性对男性使用暴力……那么总是有理由的。”这种性别歧视现在在15个州内已经变成了法律。

至20世纪90年代，加州和俄亥俄州等允许女人在其丈夫熟睡时以正当防卫的理由杀死他，因为她“感到无助”。[24]这些州允许女人在杀死熟睡的男人后辩称正当防卫，就等于将这种行为定义为女性专用的正当防卫。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在正常情况下定为一级凶杀的谋杀称为正当防卫——但仅限于女人遭到指控时；而且仅限于男人被谋杀时。有受虐妇女综合征，却没有受虐男人综合征——就好像只有女人才是习得性无助感的受害者一样。

是否男女两性都会有习得性无助感？是的。比如说……

一个男人患有“受虐男人综合征”时会发生什么？

Tom Hayhurst在成长期间目睹母亲将电话和盘子扔向父亲，他的父亲从来不还手。[25]他父亲在感情上依赖性太强而无法离开，最终饮弹自尽。

Tom的母亲还虐待家里的每一个孩子。最后，除了因先天发育不良致残的姐姐，Tom和其他孩子都离开了家。后来Tom的母亲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她要求Tom回家照顾自己和他的姐姐。Tom辞了亚利桑那州的工作回家照顾母亲。因此，他没有钱租房子。他知道自己无法忍受和母亲住在同一屋檐下，于是他住在马路上的一辆货车里。然而，如法庭报告所说：“她开始在身体和言语上虐待他，对他挥刀相向还朝他扔东西。”[26]“最后，”Tom解释说，“我就爆发了。我抄起一条铁棍打了她。”他爆发之后杀死了她。

Tom身材略健壮，根据心理学家的评估，他是一个“有责任心、无私……消极且不好斗的人……他是一个会欣赏生活中的美感的人。”Tom被判入狱15年，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遭到其他罪犯的强奸，他们喜欢选择身材略健壮的人作为强奸对象。杀害丈夫的母亲们往往因为要照顾孩子而被判缓刑，与她们不同的是，Tom并没有因为要继续照顾他残疾的姐姐而可以不去监狱。

一个儿子，目睹父亲宁愿自杀也不离开或者还手，恐怕没有人能找到比这更有习得性无助感的事来了。一个儿子，他贫困潦倒是因为要照顾残

疾的母亲和姐姐，恐怕没有人能找到比这更受困的情境。一个杀了人的凶手，在为自己辩护时说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受到了比自己更严重的虐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这么做。

如果是女儿，比如叫Theresa，接到有虐待倾向的父亲的电话后答应照顾他和残疾哥哥，法院的判决会是什么样的？如果Theresa的父亲继续虐待她，而她终于殴打了他并意外杀死了他，她是否会被判刑？还是会被判缓刑，接受心理咨询，成为一个女权英雄？然后还有以她为原型的电影问世，电影讲述她“直面虐待，奉献自己”，还有一个大圆满结局：她“奋起反击并打破了依赖怪圈”，而她自己也得到了自由，可以照顾她因发育不良而致残的哥哥。

“燃烧的床”谋杀案

1984年，Farrah Fawcett主演了一部NBC电视电影《燃烧的床》（*Burning Bed*），该电影以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了一位受尽虐待的妻子在丈夫熟睡时点燃了床致其死亡的故事。法院将她无罪释放，因为她受过虐待。[27]这部电视电影的尼尔森收视率超过了世界大赛的收视率，是“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电影之一”。[28]在《男人何以如此》一书中，我提到了我的担心，这部电影的广受欢迎反映出，大众愿意看到一个女人在受到虐待时可以选择杀死丈夫而不是离开他。最终，这个现象要不导致有性别偏见的正当防卫机制出现，要不就应允许受到女人虐待的男人杀害女人而不是离开女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类似《燃烧的床》的谋杀案大量涌现。北卡罗来纳州的Judy Norman趁其丈夫熟睡时向他的头部开了枪。她声称自己是正当防卫，因为自己受到了虐待。州立最高法院认定，只有在一个人的生命陷入危机时才能够正当防卫，而且尽管她遭到了虐待，但是她可以在他入

睡之后离开。最高法院没能救她，这时州长介入了。他为她减了刑。Judy只服了两个月的刑，而且在此期间她正致力于获得高中毕业证。[29]

妇女在杀害熟睡中的丈夫后声称过去遭到虐待（她们的丈夫已无法对此辩护）就可能免于受刑，到1990年，俄亥俄州也成为第15个允许这种做法的州。她们无须证明自己的生命陷入了危机而且没有逃跑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俄亥俄州的州长释放了监狱中的“俄亥俄州的25个人”。[31]

释放这些女人的理由何在?

理由1：一个女人在身体不断遭到虐待的时候，她情感上的创伤将常年伴随着她，因而，她攻击虐待她的人是一种情感上的正当防卫。

事实：很多女人受到身体上的虐待后，情感创伤都会常年伴随。而常年受到虐待的男人也会有这样的情感创伤。唯一以男女双方为对象的研究发现，不论受伤的严重程度如何，女人和男人使用家庭暴力的概率都是一样的。[32]被刺伤或者被平底锅打伤脸带来的情感创伤对男人来说也很严重，但他们觉得说出来太丢脸了。

同样，所有从战场上下来的退伍军人都以创伤后应急障碍的形式承受着受虐男人综合征的折磨。情感创伤也常年伴随着他们。但是如果有一个痛苦不堪的人由于Zumwalt将军下令喷洒橙剂而杀了他，这个人就会被判凶杀罪。受到受虐男人综合征困扰的男人不能在攻击虐待他们的人之后称为自己是在正当防卫。即使法律要求他们受此虐待而且他们无路可逃，但是他们仍然不能这么做。

理由2：这是身体上的正当防卫。

事实：在女人因杀害丈夫而被判入狱的案件中，近1/3的男人被杀害时没有行为能力（例如在熟睡中、在轮椅上或者因醉酒而不省人事），近60%是

谋杀。[33]然而，有半数以上的女人在殴打了无行为能力的男人之后声称自己是正当防卫（就好像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似的）。[34]

理由3：“除非女人被逼到绝望的境地，否则她们是不会杀害男人的。”

事实：因杀害男人而入狱的女人中，30%有暴力犯罪史。[35]

事实：有一些因为杀害丈夫而入狱的妇女被虐待过。然而，Coramae Richey医生对6大城市中因杀害丈夫或情人而入狱的数百位女性做了调查，调查发现没有一个女人曾被男人虐待过。[36]所以说，有些女人没被虐待过也会杀人。

事实：当女人杀害男人时，最常见的原因莫过于这个男人的保险金超过了他能给女人提供的财务支持[37]（女人很少杀害自己的收入来源）。

理由4：女人比男人更害怕向当局举报虐待者。

事实：有14项对两性所做的不同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施虐的概率相同，[38]但是警察接到的举报中有90%以上都是女性举报男性，而且美国颁发的限制令中有90%以上是发给女人以限制男人的。[39]所以说，女人向当局举报男人虐待的概率是男人的9倍左右。男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的“像个男人一样忍受”的观念令男性害怕举报虐待者。

理由5：女人说她们求助无门。

事实：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服务热线、避难所和妇女中心都是女人摆脱丈夫的完美途径。电视广告中会播放女人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几乎所有社区都有为受虐妇女设立的避难所，但是没有为男人设立的避难所；大部分社区都有妇女中心，而唯一的“男人中心”就是监狱。由于女人更便于发展女性朋友的社交网络，在她遭到虐待时她们更易表现

出对她的同情心。男人们则不是这样。只有女人能到政府资助的机构躲避虐待者，而且只有当受虐者是女人时杀害了虐待者才能被释放。

理由6：不论女人多么努力想逃跑，男人总是能找到她、“抓住她”，就像电影《与敌共眠》（*Sleeping with the Enemy*）一样。

事实：男女都面临着这种问题。Kevin Svoboda的妻子因“雇凶杀人”而被判入狱。尽管如此，他也无法阻止她继续这么做。在等待判刑期间，她再一次雇凶杀害Kevin。[40]她被抓住只是因为她雇用的其中一个杀手正好是一位卧底警察。Kevin说：“我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他觉得她可能是想要杀死他之后拿到13万美元的意外保险赔偿金。我们会允许Kevin杀死他的妻子进行“正当防卫”吗？

和他一样的还有Daniel Broderick，他想要摆脱前妻Elizabeth的虐待。Elizabeth开着卡车从他家的前门闯进来，无视限制令入室洗劫了他家，毁坏了珍贵的艺术品而且还向他发出很多死亡威胁。即使如此，作为圣地亚哥最出色的律师之一，Daniel很明白，如果他先杀了她，自己就一定会被判一级凶杀。没有受虐男人综合征可以帮他减轻刑罚。然而他是否真的身处险境？告诉你吧，Elizabeth买了一把枪，然后趁Daniel和他的新婚妻子Linda熟睡时闯入他们的卧室，朝他们俩开枪并打光了枪里所有的子弹。两个人都死了。

理由7：女人举报受到虐待时警察不会认真对待，所以报警没有用。

事实：现在，在美国的12个州和很多城市，只要有女性声称遭到虐待，警察可以强制逮捕涉事男人，即使没有证据表明曾发生过虐待，即使女性拒绝提出指控。[41]这就意味着女人举报时会受到极其严肃的对待，她只有在拒绝提出指控时才会被忽视。这也构成了女人无辜法则。

尽管很多强制性逮捕涉事人的法律规定是中性的，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它们不是用来保护男人不受女人虐待或保护同性恋男性不受虐待的。同性恋男性报警称遭到虐待时，警方一般的做法是逮捕双方当事人。[42]

在没有强制逮捕涉事人这种规定的地区，只有女人被鼓励在她怒气冲冲时立即提出指控，哪怕警察看不到虐待的证据。通常不会有人告诉她，即使她稍后撤销指控，他也仍然要接受审判。也就是说，在违背她意愿的情况下他们会遭到审判——接受政府的审判。她举报时会得到极其严肃的对待，但是当她说“让我来承担责任吧”时，就被当成一个孩子。人们宁愿愿意相信她本身是无辜的，也不愿相信她自己所说的话。

真实生活中的受虐妇女综合征

Marlene Wagshall等她丈夫Joshua入睡之后，站在床边，想象着他们像往常一样乒乒乓乓地打了一架，然后用一把0.357口径的马格努姆手枪顶住他的胸膛扣动了扳机。[43]他们的女儿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她的父亲挣扎着想要挪到门口，希望女儿不会眼睁睁地看到自己死去。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父亲。

在手术台上躺了18个小时之后，他的脾脏、部分肝脏、胰脏还有上部的肠都被摘除了，Joshua活了下来，成了一个不完整的人。但他的孩子们不见了——Marlene绑架了他们。

大陪审团发现，Marlene应该被起诉的不仅是杀人未遂，还有很多其他的罪行。然而，女权主义检察官Elizabeth Holtzman将她的杀人未遂罪降为二级攻击罪，而且接受了只将Marlene关押在看守所一天的请求。Marlene被判处5年缓刑。[44]

为什么？Marlene声称自己是受虐妻子综合征的受害者。然而，她没有

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虐待——没有孩子看见、没有医院证明、没有邻居作证。报纸报道称，她发现丈夫和一个裸女在一起的照片之后怒气冲冲地拿着枪去找他。不过Joshua作证称，二人对质时很有条理。

想想看，如果所有妻子都有权杀死有婚外性关系的丈夫，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第十四条修正案平等地保护男人，丈夫们就可以得到杀死所有有婚外性关系的妻子的权利。这种平等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大概都要去投资殡仪馆了。

是否枪杀男人的女人被释放会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Elizabeth Holtzman，那位将谋杀罪和绑架罪通过辩诉交易降为看守所关押一天的检察官，作为纽约市的检察官、美国职位最高的女性官员之一，她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或者任职于美国最高法院。

受虐妇女综合征之辩词是政治性的辩词吗?

Delia Alaniz给了一个穷困的年轻人200美元让他杀死她的丈夫。但是在她被抓捕并被判有罪时，西班牙裔群众和女权主义组织疯狂拨打州长办公室的电话，他们轮番上阵，不眠不休并组织游行。Delia声称遭到虐待，他们希望她能因此免于坐牢。[45]《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上播放了这则消息，消息中忽略了她死去的丈夫（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只对她的处境报以同情，之后州长受到了更大的压力[46]（在《60分钟时事杂志》结束时，主持人只提到一句题外话：那个女人雇凶杀人时有个情人）。

华盛顿州长Gardner感到压力重重。[47]1年零10个月之后，他释放了Alaniz。

而她雇用的那位社会地位低下的年轻人仍然得服刑30年。[48]没有人像问Alaniz那样询问他是否也受到过虐待。而且即使他被虐待过，他是否可以杀死虐待他的父母然后求得州长的原谅?

在州长Gardner释放Delia Alaniz时，他解释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女人和孩子遭到的暴力太常见了。”[49]现在请注意：她杀了他，但是女人遭遇的暴力却成了唯一需要关注的问题。她利用了社会底层的年轻男人，但女人遭遇的暴力仍然是唯一要关注的问题……当一个女人杀死一个男人时，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个女人使用了暴力而那个男人死了。习得性无助感和受虐妇女综合征释放给女性的信息是：死了的丈夫好过活着的证人。最好的防卫就是致命的攻击。

一个女人不断虐待丈夫之时，女权主义者是否会关注同样的问题？佛罗里达州的Betty King往丈夫Eddie身上泼酸性液体、用地毯刀划伤他的脸、在他背上捅了一刀之后把他扔在一个停车场里，还朝他开枪。Eddie没有举报Betty的所作所为。Betty被举报过两次并被逮捕都是由公共场合的目击者报的案（一次是在酒吧刺伤对方）。[50]

结果，有一次他们在一个朋友家发生了剧烈的争吵，Betty又一次伸手准备掏出包里的枪。Eddie害怕被杀死，于是他掏出枪抢先开了枪。调查发现他的生命确实危在旦夕。然而女权主义者和媒体强烈抗议将Eddie——一个受到虐待的丈夫——的行为判决为正当防卫。

习得性无助感如何延续女性的虐待倾向

当用习得性无助感来为母亲们辩护时，它制造了最大的灾难。研究发现，由杀人犯母亲抚养长大的孩子也会杀人。[51]杀人犯母亲往往会“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对他人产生暴怒情绪，而且她们认为，只有她们自己深受折磨，而全世界都在谋害她们。”[52]显然孩子们会习得这种处世态度。尤其是女孩，因为她们的角色模型就是自己的母亲。那么，我们是否希望这样的母亲如此抚养下一代呢？

空想的女权主义者们也常常把世界看成一个阴谋。甚至Gloria Steinem

在发言中仍然使用“我们”和“敌人”这样的字眼。[53]她们认为别人要为她们遭受的苦难负责。这几乎和Kirkpatrick和Humphrey[54]在他们对女谋杀犯的研究中发现的特征一模一样。习得性无助感将一种危险的人格问题变成了一种合法的辩词。这让一些女人更坚信她们只要杀死问题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释放这样的母亲无异于将这种无助感心理传递给下一代。当杀了人的母亲回到她们的女儿身边时，我们是在把这些女孩训练成未来的杀人犯。这就是不能释放杀人犯父亲回家抚养孩子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新的“所有母亲杀了人都可以被释放”的合法辩词会给被这些母亲抚养长大的孩子们带来大灾难。

5.“抑郁妈妈”之辩词

产后抑郁

还记得Shery Lynn Massip吧，那个把自己6个月大的儿子放在车轮下反复碾压的二十几岁的年轻妈妈？在她的罪行被发现之前，Massip有条不紊地掩盖了她的行为。后来她宣称自己患了产后抑郁症。那么法院对她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社区矫正。[55]

父亲们是否会患上产后抑郁症?

母亲们当然会患产后抑郁症。父亲们也一样。做了父亲之后，男人常常会感到妻子为了“另一个情人”而离开了自己。丈夫们常说“她和孩子在沙发上拥抱在一起，我只有在旁边看的份”，或者“我现在总算知道‘二人结伴，三人不欢’的意思了”，或者“自打孩子出生以后，我们这两年很少做爱了”。如果一个父亲像Shery Lynn Massip一样杀死自己的孩子，我们不会用产后抑郁症或者婚姻综合征来为他辩护。为什么

她就能以产后抑郁症为由在谋杀了孩子之后接受社区矫正，而他有没有产后抑郁症都要因为谋杀孩子而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呢？

可怕的两岁

Josephine Mesa用马桶塞的木柄把两岁的儿子打死了，[56]然后她把这个满是伤痕的孩子埋到垃圾桶里。当加利福尼亚州欧申赛德的清洁工在她家公寓外发现孩子时，她说自己不认识这个孩子。当证据越来越确凿时，她终于承认是她杀了孩子。她的理由是什么？她精神抑郁。那个孩子正处于可怕的两岁。她得到了怎样的惩罚？心理咨询、缓刑和抗抑郁药物。她一天也没进过看守所，[57]（Mesa多次不遵守规定之后，连她自己的缓刑监护官都建议至少应该将她在看守所关押30天）。

6.“母亲不会杀人”之辩词

词条：美国伊利诺伊州。Paula Sims报警称大女儿Loralei被一位持枪的蒙面男人劫持。实际上是她杀害了Loralei，但是她没有被绳之以法。[58]所以，当她的二女儿Heather Lee令她失望时，被她闷死，扔进了垃圾桶。Paula声称又一个持枪的蒙面男人劫持了她。真正的调查是从第二次“蒙面男人”劫持事件发生之后才开始的。只有严肃的调查才能让证据浮出水面。

如果那些母亲没有免于受到严肃调查的特权的话，Heather Lee今天是否尚在人间？

7.“孩子需要妈妈”之辩词

词条：美国科罗拉多州。Lory Foster的丈夫从越南战场返回家乡，由于受到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和糖尿病的困扰，他情绪波动很大。[59]后来他们大吵了一架，他还虐待了她。于是她杀死了他。然而，公诉人甚至没有提出关押

她的请求。为什么没有？因为Lory要照顾孩子……

Lory接受了心理咨询和职业培训，都是州政府出钱。从本质上来讲，在她犯法之后，州政府花钱让她得到她需要的帮助，却没有在他遵纪守法的时候花钱让他得到他需要的帮助。

Josephine Mesa、Paula Sims和Lory Foster都是被释放的杀人犯母亲。释放杀死孩子的母亲最常见的理由是孩子需要她们。但是Josephine Mesa杀死的是自己唯一的儿子，也被释放了。而Paula Sims杀害第一个孩子之后，她的逍遥法外导致第二个孩子被杀。如果母亲们被释放是因为“孩子是最重要的”，那么父亲们也应该如此。但是他们并没有被释放。孩子需要妈妈的辩词体现出的不正是释放女人的合理性，而不是关爱孩子的重要性吗？

男人可以使用“孩子需要爸爸”辩词吗？

据我所知，历史上没有一个男人谋杀了妻子之后因为“孩子们需要爸爸”而被释放。即使他有证据证明她企图杀死她。记得Daniel吧？他有大量证据显示前妻Elizabeth有意杀他，却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能够阻止她（虽然他自己是圣地亚哥最优秀的律师之一）。甚至在Elizabeth开着小货车闯进他家前门，并威胁到他和孩子们（Daniel有孩子们的单独监护权）的生命安全时，Daniel仍不能以“父亲辩词”为由杀死Elizabeth。他也不能进行正当防卫。为什么不行？因为对男人来讲，只有他遇到非常紧急、近在眼前的生命危险而且无法逃脱时采取的暴力行为，才会被法庭判定为正当防卫，[60]而Daniel在死之前无法证明自己遇到了非常紧急的生命危险。

鉴于Elizabeth威胁到了Daniel Broderick和孩子们的生命安全，他是否能够杀死Elizabeth而不违法？不行。法律只鼓励像Daniel这样的人以擅自闯

入、危害儿童和蓄意谋杀之名提出控告。同样，法律也必须鼓励女人在受到虐待时报警。不论男女都不应该得到先斩后奏的权利。

8.“理解妈妈、责怪爸爸”之辩词

词条：Ramiro Rodriguez从超市出来后开车回家。路上，女儿坐在他妻子的腿上。[61]就在Ramiro左转弯时，一辆小型货车突然撞了上来，女儿瞬间毙命。Ramiro被判杀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女儿没有坐在儿童安全座椅里面。

Ramiro解释称当时女儿生病了，希望能有人抱着她，所以他妻子决定抱着她。然而遭到指控的只有Ramiro一个人。

虽然决定抱着女儿的人是她母亲，但是受到杀人罪指控的只有她父亲。她母亲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由于遭到种族歧视的抗议，最终Ramiro被无罪释放。[62]但是没有人看见其中的性别歧视。

家长双方都决定由母亲抱着女儿，由父亲来开车。那么，要么双方都应该遭到车祸致死的指控，要么双方都不遭到指控。Romiro和他的妻子共同教育子女，但是遭到杀人罪指控的只有Romiro。Sheryl Lynn Massip故意开车碾压自己儿子的头部却被释放，而Romiro为何遭到了杀人罪的指控？

9.“孩子是我的，我有权虐待他”之辩词

词条：Kimberly Hardy在她儿子出生几个小时之前使用了强效可卡因。她儿子自出生起就染上了毒瘾，于是她被认定有罪（理由是通过脐带向她儿子输送可卡因）。然而这一裁定被密歇根最高法院推翻了。[63]

词条：自1987年以来，有100万染上毒瘾的婴儿出生，但是受到有罪指控的母亲只有60位，被判有罪的只有1位。[64]

词条：在美国，有11%的新生婴儿的母亲滥用毒品，[65]这一情形主要发生在单亲母亲家庭当中[66]（虽然只有21%的儿童来自单亲母亲家庭[67]）。（“母亲节”对于毒贩子来说是母亲领到社会救济后在毒品站前排队等候的日子。[68]）

一个母亲流产时，被流产的胎儿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人尚存争议。但是当一个母亲在胎儿诞生之前几个小时内给他喂食毒品，导致他一出生就是瘾君子，这显然是在虐待婴儿。如果婴儿出生后马上夭折，就会构成过失杀人罪。有选择的权利就意味着有虐待的权利吗？

到底为什么？问题出在胎儿是否具有合法权利上吗？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比如说，如果一个瘾君子母亲开车出了车祸而且杀死了另一个女人腹中的胎儿，那么这个瘾君子母亲要负法律责任。一个女人没有权利虐待另外一个母亲的胎儿，她有权利虐待自己的胎儿。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辩词被称作“孩子是我的，我有权利虐待他”。其中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胎儿的权利，也不在于婴儿的权利，而是母亲的权利。在华盛顿，婴儿因毒瘾致死的案件中有3%的母亲没有因此入狱，有选择的权利就意味着有杀害的权利——不是胎儿而是婴儿。

如果我们能让醉驾司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负责，那么为什么不能让瘾君子母亲为自己造成的伤害负责？在生活中，醉驾司机只是在偶然间伤害了他人，但瘾君子母亲无时不刻在伤害另一个人。一个让自己的孩子染上毒瘾的母亲难道应该比其他虐童的人或者毒贩享有更多权利吗？在普通的毒贩会被判终身监禁的时候，我们怎能声称给自己孩子喂食毒品的母亲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审判？如果我们对令她陷入毒瘾的境况抱以同情的话，那么我们对令毒贩陷入贩毒的境况、虐童者陷入虐童的境况的同情心又在哪里呢？

让自己的孩子染上毒瘾的母亲不仅是毒贩和虐童者。1991年，一大批

出生前接触过毒品的儿童开始上学了。一些孩子表现出智力发育迟缓、轻微的语言障碍和脑瘫的症状。还有一些孩子语言能力发育迟缓、写不清楚自己的名字、不理解数字的含义或者无法做到安静地排队。[69]这些孩子迫使最优秀的老师辞职离开，因此，那些母亲不仅虐待了自己的孩子，她们也虐待了她们社区的其他孩子。

吸毒的孩子被分离出来放在专门的教室读书之后，每年平均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成本是1.5万美元，而普通的孩子则是3500美元。[70]这就是公立学校比私立学校的学费高出很多的原因之一。从这方面来讲，普通的纳税人花了钱却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得到等价的教育，而是出资资助让自己的孩子被“虐待”。

10. 辩诉交易之辩词

在一男一女协同犯案的案件中，一旦一个女人被视为更无辜，那么她的证词就越显得有价值，检察官就会给她辩诉交易的机会。如果地方检察官重选辩诉交易人选，这时如果男方有罪，那么骑士精神会让他成为一个英雄；但如果他将女方投入监狱，那么他就是在仗势欺人。此外，他很快就会发现将男方刻画成主犯简直易如反掌，反之，如果他判女方有罪，她的律师就会搬出“Svengali”之辩词……

11. “Svengali”之辩词

词条：一位漂亮的女士持枪抢劫银行，并被冠以“抢匪中的美国小姐”的名号。根据联邦政府的量刑指南，她将在联邦监狱中度过至少4年半至5年。但是联邦法官只判了她2年，因为她告诉法官说自己爱上了一个发型师，是发型师让她去抢银行的。法官总结道：“男人总是带给女人一些不良影响，女人似乎很容易受到影响，尤其是当二人有性关系时……在我看

来，这种Svengali与Trilby[①]式的关系就是这位女士的驱动力……最主要的因素是性。”[71]

试想一下，一个法官会因为一个男人坠入爱河而且“女人总是带给男人一些不良影响”就给他减刑吗？如果这不是公正与否的问题，那什么才是？“抢匪中的美国小姐”很漂亮。而法官和大部分男人一样会保护漂亮的女人。如果这样一位“天使”犯了法，法官必须要把魔鬼揪出来（当然这个魔鬼一定是男性）。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燃烧的床》这部电影由当时公认为最美貌的演员Farrah Fawcett担纲女主角。

哪个性别最容易说服自己的性伴侣去做罪恶的事呢？我们来看看吧。

12. 买凶杀人之辩词……收买他人、保护自己

买凶杀人是女性选择的方式?

在我第一次回顾买凶杀人的资料时，不禁为其中的模式感到震惊。第一，所有女人雇用的都是少年或者男人。第二，她们的目标通常是自己的丈夫、前夫或者父亲，也就是那些她们曾爱过的男人。第三，成为被杀目标的男人往往都买了保险，而且保险金额远远大于未来几年内他赚取的收入。[72]第四，在某些巧合事件暴露她们的阴谋之前，这些女人通常不会成为真正的嫌疑人。第五，通常她们会从以下三种杀人方式中选择一种：（1）她会说服男朋友为她杀人（与Svengali相反的方式）；（2）花点小钱雇用社会地位低下的少年杀人；（3）雇用职业杀手，于是她们常常用自己丈夫赚回的钱雇用别人杀死自己的丈夫。

词条： Dixie Dyson为丈夫盖好了被子，这是他最后一次睡觉了。她安排好友和男朋友假装“擅自闯入”，“强奸”她并杀死她的丈夫后“逃走”。

① Svengali是一个虚构的角色，能像催眠一般说服无辜的Trilby。

然后，她就能拿到保险赔偿金了。[73]

就在最后一刻，她的好友退出了，但是她和那位男朋友刺了她的丈夫27刀，杀死了他。他们都被抓住了。为了获得减刑，Dixie“做了一笔交易”，她出卖了那位男朋友和那位好友。那个退出的好友最后因为同谋罪而被判25年刑期。[74]

词条：Deborah Ann Werner能够继承她父亲1/3的遗产。她指使女儿找了几个青少年将父亲割喉杀害。[75]

词条：Diana Bogdanoff和她的丈夫到裸体海滩游玩时，Diana安排她丈夫和她在不同的区域玩。她丈夫并没有在意，不过Diana当然没有说她雇了两个年轻男人杀他，此时，她还在旁边看。他头部中枪以后，她举报了杀手，[76]但说不出对方杀人的动机——没有被盗财物，她也没有遭到性侵。[77]

Diana一直没有被列为嫌疑人，直到有一天，全国犯罪热线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对方正好在电台听到了这起凶杀案，然后他想起自己有位朋友拒绝了一次类似的谋杀业务……地点在一处偏远的裸体海滩，有一个叫Diana的在现场。如果没有这个电话，Diana可能永远也不会遭到怀疑。[78]

词条：Roberta Pearce是一位教师助理。她许诺给她的两名15岁学生每人5万美元、性和一辆汽车，只要他们做一件事——杀了她的丈夫。[79]Roberta会得到她和丈夫争抢的房子，还有2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

词条：Mary Kay Cassidy和她的少年小情人杀死了她丈夫。[80]虽然她丈夫曾经告诉过朋友，说他怕他妻子可能要杀他，但是他妻子被当作嫌疑人只是例行公事。她和她的小情人为她丈夫的死而“悲痛不已”，宾斯法尼亚州莫农格希拉镇上的人们都来安慰他们。

碰巧，她丈夫有位亲戚来清理房屋时发现了一个窃听装置，里面有一盘磁带，记录了Mary Kay和她的小情人密谋杀害她丈夫的对话。很明显，她的丈夫在被杀的几个小时之前开始用电话窃听。而他还没有机会听到那

盘磁带。面对铁证如山的磁带，Mary Kay才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词条：Pamela Smart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中学教师，她说服十几岁大的小男友杀死她丈夫。[81]Pamela和她的男友企图让一个十几岁的女生参与这次谋杀。这个女生将一盘关于Pamela策划谋杀的磁带交给警方后，Pamela请杀手杀了她。[82]Pamela从来没有指控丈夫虐待自己，那么她的动机是什么呢？她丈夫是一位保险销售员。然而近500篇文章中没有一篇承认她的动机可能是为了保险赔偿金。[83]

大众对此有何反应呢？有人成立了名为“Pamela Smart之友”的世界粉丝俱乐部支持她。他们在她所在的监狱外守夜时，狱政官员允许她通过连接着扬声器的电话和外面四百多人讲话。

我找不出有人为杀害女人的男杀人犯成立粉丝俱乐部的例子，尤其是在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虐待过这个男人时。

或许最可怕的是，在这些买凶杀人的案件中，很多女人利用的业余杀手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往往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少年。那些女人不仅使这些少年犯了杀人罪而且在心理上强奸了他们。雇用15岁少女杀害妻子的任何成年男人都会成为死囚。如果他和这个女孩发生了性关系那就更是难逃一死。

在职业杀手受雇杀人时，能够支付职业杀手的佣金这一点说明雇主属于中产阶级。雇用职业杀手的女人一般是中产阶级，她们拿着丈夫赚回来的钱雇凶杀夫。于是，Constantina Branco从丈夫的银行账户中取出钱来雇了一个男人杀害了丈夫。[85]

贫困的女人和中产阶级的女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男人当前的收入足以保护她们时，她们都不会杀害他们，除非他们的保险赔偿金可能会超过未来几年内的收入。[86]实际上，这些女人不会杀害自己的收入来源，但会为了获得收入而杀人。

男性和女性在谋杀自己曾经爱过的人时会采取不同的杀人方式。男人会亲手杀人，女人会雇用另一个男人。一般来说，男人会在盛怒之下杀害一个女人。他是“一时失控”，而买凶杀人是预谋杀人。男人预谋杀人时，他通常会杀死妻子、孩子和自己，但是女人很少杀死自己。

男人是不是有时也会买凶杀女人？有些男人确实会买凶杀女人，但杀人途中会发生一些事情。职业杀手不能容忍杀害女人，他向警察举报了雇他杀人的那个男人！[87]（要杀害的对象是女人时，甚至连职业杀手都有保护女人的本能。）所以说，并不是男人都不会使用买凶杀人这个办法，只是他们打算这么做的时候，情况总是有所不同，或者可以说总是事与愿违。

如果有男性专用的辩词，会是什么？

男人杀害女人后没有任何男人专用的辩词，也不应该有。但是如果真的有，对应女性经期综合征之辩词的应该是睾丸素之辩词；对应女人无辜之辩词的应该是男人理智之辩词——同样是带有性别歧视的假设，假设男人不会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犯罪，也会有作为父亲的正当防卫、受虐男人综合征以及就男人的角色而设计的专用辩词……例如私人保镖之辩词。

私人保镖之辩词

Marlon Brando之子Christian因为姐姐Cheyenne遭到她男友的“暴力”而大发雷霆，他掏出枪指着对方并在争抢之中将其打死了，还记得吗？他说那是不小心的。

Brando是否应该以私人保镖的理由进行辩护？为什么呢？如果一个女人在杀死虐待自己的男人后可以被释放，那么为什么一个男人杀死了另一个虐待女人的男人就不能被释放？

妇女个体何以比整个美国政府更有权力杀人

总结起来，十二大女性专用辩词使得几乎所有女人都将“执行死刑”视为己任。令人讽刺的是，我们认为支持女性执行死刑就是民主，却反对政府使用死刑。政府不能先杀死某人，然后才宣布他/她虐待他人——只有女人能对男人这么做。或许最令人称奇的是，女人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就夺走男人的生命，这种行为被称为“解放”；但任何其他人对女人这么做就成了“极权主义。”

男人杀害的女人比女人杀害的男人多?

司法部宣称男人杀死的女人数量是女人杀死的男人数量的2倍。[89]但是我们来仔细瞧瞧吧。当然男人比女人更易成为连环杀手。基本上连环凶杀案都遵循一定的模式，犯案的男人都会被找到。因此司法部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一事实。其他男人杀害女人的案件也很容易找到证据——男人在失控后枪杀妻子或者女朋友后会向自己的脑袋开上一枪。证据就躺在地上。

然而，六大盲区让我们无法看清女性杀人的手段。首先，女人更容易选择毒死男人，而不是枪杀他，中毒身亡常会计入心脏病发或者意外事故。因此，Branche Taylor Moore（“毒药与老妇”案）杀死了几个男人之后过了二十几年才被发现。而Stella Nickell的“埃克塞德林”谋杀案中受到的指控是故意毁坏他人财物。

买凶杀人也相对不易发觉，因为这种行为是有预谋而且是由雇用职业杀手下手的。买凶杀人被发现后，司法部会将其定性为“累犯杀人”——永远不会以女人杀害男人的性质登记在册。[90]这是第二个盲区。

杀害女人的男人大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底层，而杀害丈夫或者男朋友的女人则大多出自中产阶级。所以第三个盲区便是：经济因素。例如，Jean Harris（她杀害了《斯卡岱尔饮食法》一书的作者）是一所私立学

校的校长；[91]Elizabeth Broderick曾是一位小学教师，后来嫁给了上流社会人士；Pamela Smart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教师。[92]有了钱，就能请最好的律师辩护，于是就会产生更多的无罪宣判，因此进入司法部数据库的女杀人犯的数量就变少了。

或许最主要的盲区还是骑士精神和“女人是无辜的”这一观念因素，二者使很多女人一开始就没有成为真正的嫌疑人。另外，女人可以通过辩诉交易撤销一些指控。例如，在女人雇用了未成年少年、男朋友或者职业杀手的时候。

当六大盲区——伪装成中毒、伪装成事故并登记为累犯作案的买凶杀人、经济因素、骑士精神因素、“女人是无辜的”观念因素以及辩诉交易——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有意或无意地就看不见那些杀害了男人的女人们了。

六大盲区使数据出现了偏差。但是，媒体倾向于将男人杀害女人的事件打造成国际新闻，而把女人杀害一个男人的事件做成当地新闻——除非那个男人很有名。这种倾向让大众也在观念上产生了偏差。

总而言之，我们无法对比男女两性杀害对方的具体数量。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杀害的男性数量都大于女性数量。

寻求解决方案

无人向弱势者承诺

如果法律让两性中的一方更有力量，那么就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没有人向弱势者做出承诺。当其中一方不向另外一方做出承诺时，双方就都得不到爱。澳大利亚正发生着这样的事，比如说，澳大利亚现在规定，家庭暴力包括男人大声和妻子说话，这是所谓的“家庭分贝准则”。然而相反的是，女人跟自己的丈夫大声说话被看成是对男人控制权

的合理防卫。[93]这些双重标准让澳大利亚的男性非常害怕结婚。然而，澳大利亚的女权主义者仍在施压，试图让所有适用于婚姻的法律也适用于同居者。与此类似的法律是在分离男人和女人。

如何减少虐待和凶杀案？

如果一个女人因为感到无助而杀害了丈夫，那么男人虐待自己的妻子也可能是因为感到无助。对于两性而言，虐待并非源于力量，而是源于无力。虐待是力量的临时表现，通常是由无力感和失败感引发的。

所以，人为区分身体上的虐待和心理上的虐待并不能解决虐待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于对男女两性重新进行社会化，让他们能够用新的方式去倾听彼此——我们大部分人的父母都无法奢望学到这些方式；让他们能够选择这样的伴侣：在进行言语攻击或者人身攻击之前，他/她能好好地倾听他们的心声。

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是无法得到绝对保证的，但是单靠划分出危险区域和杀死让我们对生活产生恐惧的人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更多的是要避开这些危险区域。

要解决问题，就要在学校里就进行沟通教育，而不是原谅婚姻中发生的谋杀案。要解决问题，就要对女生殴打男生的比率（20：1）和男生殴打女生的比率（1：20）一样敏感。[94]简言之，解决虐待问题的办法始于心理咨询，而不是杀戮；始于男女双方都了解如何保护自己，而不是允许其中一方让政府充当其保护者。

注释：

1. 美联社，《21年牢狱之灾之后，投毒案男犯被无罪释放》（“After 21 Years，Man Is Freed in Poison Case”），《纽约时报》1989年4月27日。又见Mark Lane《阿卡迪亚》（*Arcadia*）。（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70）

2. 同上。

3. 1990年5月15日采访了处理Richardson上诉案的检察官Don Horn。

4. 同上。该治安官的名字是Klein。Bessie Reese向护士Belinda Frazier忏悔了自己的罪行。

5. 洛杉矶时报新闻社《因投毒入狱的父亲被释放》（“Father in Prison for Poisonings is Freed”），《洛杉矶时报》1989年4月26日。Bessie Reese的忏悔由于她“精神无能力”而未被接受，但州政府仍然可以用收集到的独立证据控告她，而且极有可能因此释放Richardson。然而州政府并没有这么做，这让人不禁质疑将她归为“精神无能力”是不是州政府用来免于面对审判她的代价和复杂情形。

6. 见Robert D. McFadden，Ralph Blumenthal，M.A. Farber，E.R. Shipp，Charles Strum 和 Craig Wolff，《出离愤怒：Tawana Brawley恶作剧背后的故事》（*Outrage： the story behind the Tawana Brawley Hoax*）。（New York：Bantam Books，1990）

7. Eloise Salhoz 和 Andrew Murr，《毒药与老妇》（“Arsenic and Old Lace”），《新闻周刊》1989年8月4日。

8. Jorce Wadler，《Stella Nickell杀死丈夫还不够，为了成功，她毒死了一个陌生人》（“Killing Her Husband Wasn’t Enough for Stella Nickell；To Make Her Point，She Poisoned a Stranger”），《人物》1988年7月4日第87~92页。

9. Donald Dale Jackson，《是谁杀死了Sue Snow？》（“Who Killed Sue Snow？”），《读者文摘》（*Reader's Diagest*）1991年2月刊第149~154页。

10. 美联社《妻子认罪1981年的刺杀案，丈夫被释放》（Wife Admits 1981 Slaying；Husband Freed），《每日摄影》（*Daily Camera*）1984年1月刊。另见Edward Frost，《前妻忏悔，被判刑凶手无罪释放》（“Ex-Wife’s Confession Frees Convicted Killer”），《新闻快讯》（*Reporter Dispatch*）1984年1月刊。

11. 首先，Nathaniel的律师在他被判刑后仍在私下调查此案。其次，他们找到的新证据足以促成重审。第三，侦探找到德丽萨准备告诉她将举行新的听证会时，她以为他们是要逮捕她，所以自行决定坦白。

12.Mary Brown Parlee，《新发现：经期与行为》（“New Findings：Menstrual Cycles and Behavior”），《Ms.》1982年9月刊，第126页。

13. 同上。

14. Andrea Ford，《杀害半岁儿子的女人接受门诊治疗》（Woman Who Killed Infant Son Allowed to Get Mental Help on Outpatient Basis），《洛杉矶时报》1989年3月11日。

15. Parlee，同上。

16. Marv Balousek，《向丈夫连开5枪的女人被判缓刑》（Woman Who Shot

Mate 5 Times Gets Probation），《威斯康星州报》（*Wisconsin State Journal*）1988年8月19日。

17. 同上。

18. 1990年4月19日采访了威斯康星州戴恩县地区助理检察官Judy Schwaemle，当时是她处理了这起案件。

19. 同上。

20. Isabel Wilkerson，《25名犯袭击罪或谋杀罪的妇女得到宽恕》（"Clemency Granted to 25 Women Convicted for Assault or Murder"），《纽约时报》1990年12月12日。

21. 例如马里兰州长Schaeffer和华盛顿州长Gardner。

22. Nancy Ray，《法官允许"受虐妇女"正当防卫》（"Judge Allows 'Battered Woman' Defense"），《洛杉矶时报》1992年9月21日。

23. Wilkerson，同上。

24. 例如州议员Gerald R. Eaves 提出的加州众议员法案785，于1992年1月1日生效。

25. Tom Gorman，《法院称儿子被恶毒老妈逼入绝境举刀杀人》（Court Told How Son Was Driven to Kill Spiteful Mother），《洛杉矶时报》1991年4月14日。

26. 同上。

27. 该片根据Francine Hughes的故事改编。见Susan Oaterno，《暴力的遗产》（"A Legacy of Violence"），《洛杉矶时报》1991年4月14日。

28. Leonard Maltin，《电视电影与电视指南：1991年版》（*TV Movie and Video Guide: 1991 Edition*）。（New York: Signet/Penguin, 1990）

29.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James G. Martin为她减了刑。Jane Ruffin，《受虐妻子出狱》（"Battered Wife Released from Prison"），《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新闻观察者报》（*The News & Observer*）1989年7月8日。

30. Howard Schneider，《与受虐妇女面对面》（"Meeting Battered Women Face to Face"），《华盛顿邮报》1991年1月15日。

31. Wilkerson，同上。

32. 例如，14项两性研究中有2项全国性两性研究发表，Murray A. Straus 和Richard J. Gelles，《两项全国调查反映出1975年至1985年的社会变迁和家庭暴力变化》（"Societal Changes and Changes in Family Violence from 1975 to 1985 as Revealed by Two National Surveys"），《婚姻与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86年8月刊，第465~479页。

33. Coramae Richey Mann，《要打成平手了？女人因家庭冲突杀人》（Getting Even? Women Who Kill in Domestic Encounter），《司法季刊》（*Justice Quarterly*）1988年3月刊，第9页。（Academy of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s: 1988）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上，第33~51页。这一点我不是很确定，所以我在1990年4月23日打电话给印第安纳大学刑事司法系的Coramae Richey Mann博士。她确认了这一发现。我问她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她说没有任何一个女人的档案中有关于她们遭到自己杀害的丈夫或情人虐待的信息。显然，很多女人受到了虐待，一些受过虐待的女人会杀死虐待她们的人，但是很明显，她们要么刑期很短，在他们做此研究期间，这些女人并不在监狱里，要么就从来没有进过监狱。这项研究是1982年（当时受虐妇女综合征第一次用于法律辩护）之后完成的。她的此项发现的价值在于，和理由3不同的是，有一些女人并未遭到虐待也会杀人。此外，41%的女人甚至动机不是自我防卫，而在剩下的59%遭到虐待的女人中，Mann博士找不出任何一个人的正当防卫辩护定义与法律规定的“非常紧急、近在眼前的生命危险而且无法逃脱”相符。

37. 同上，采访纽约市警察局警督Harvey Wyche。又见Mike Clary，《快车道传奇结束：寡妇被发现谋害丈夫》（“Fast-Lane Saga Over: Widow Guilty in Murder of Husband”），《洛杉矶时报》1989年1月17日。

38. Straus 和 Gelles，同上。

39. Fred Hayward，《西方世界》（*Westworld*）1989年9月5日。其中关注法院限制令的问题。

40. Kevin Svoboda的家距关押他妻子的兰开斯特县拘留所约40公里远。见新闻电报与杂闻报道，《妻子在关押期间设法杀夫》（“Jailed Wife Plots to Kill Husband”），《华盛顿时报》1992年1月23日；又见《妻子判刑后设法杀夫》（“Wife Sentenced in Plot to Kill Spouse”），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1992年2月12日。

41. 12个州分别为：特拉华州、缅因州、明尼苏达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犹他州、康涅狄格州、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州、新泽西州、威斯康星州和罗得岛州。其中城市包括：华盛顿市和洛杉矶市。数据来自美国全国反家庭暴力联合会（NCADV）的Karyl Spriggs，1991年。

42. Craig Anderson，明尼阿波利斯市家庭与儿童服务中心的一位同性恋顾问，引自Julio Ojeda-Zapata《圣保罗先锋报》（*St. Paul Pioneer Press*）1990年10月

21日。

43. Steve Metzger，《Josh Wagshall》（*The Shooting of Josh Wagshall*），《变迁》杂志1988年3/4月刊第2页。

44. 1991年2月7日电话采访Elizabeth Holtzman新闻办公室的Nancy Young时得到了确认。

45.《受虐妇女杀夫后被无罪释放》（"Battered Woman is Freed in Slaying of Husband"），《纽约时报》1989年10月29日。

46.《60分钟时事杂志》的节目于1989年10月播出。

47. 当时的州长为Booth Gardner。

48.《受虐妇女杀夫后被无罪释放》，《纽约时报》，同上。

49. 同上。

50. Paul Dean，《丈夫们羞于承认遭到妻子虐待》（"Husbands Too Ashamed to Admit Abuse by Wives"），《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Newsday*）1981年1月20日。

51. John T. Kirkpatrick 和 John A. Humphrey在北卡罗来纳矫治中心对76名女谋杀犯人进行了研究。见John T. Kirkpatrick 和 John A. Humphrey，《北卡罗来纳州女谋杀犯的生活压力》（"Stress in the Lives of Female Criminal Homicide Offenders in North Carolina"），《人类的压力：当前部分研究》第3卷第109~120页，编辑：James H. Humphrey。（New York：AMS Press，1989）

52. Glen Collins引自John T. Kirkpatrick，1986年7月18日，《纽约时报》。

53. Nancy Gibbs 和 Jeanne McDowell，《如何重振革命》（"How to Revive a Revolution"），《时代》1992年3月4日。

54. Kirkpatrick 和 Humphrey，同上。

55. Ford，同上。

56. Tom Gorman，《杀害幼童的妇女仍然逍遥法外》（"Woman Who Kills Child Remains Free"），《洛杉矶时报》1989年4月26日。

57. 在缓刑期间，Mesa对她的缓刑监护官隐瞒她再次怀孕之事，并多次逃避任务。她的缓刑监护官甚至建议对她判刑30天。但她又一次逃脱了惩罚。是否因为她需要照顾另外一个新生命？并不是，新生儿的监护权属于其父亲。

58.《伊利诺伊斯州——两次，太过分》（"Illinois—Two Times，Too Much"），《时代》1989年7月24日，第25页；及美联社《'失窃'婴儿实为被杀，母亲被判有罪》（"Mother Found Guilty in Death of 'Stolen' Baby"），《洛杉矶时报》1990年1月31日。

59. Bruce Langer，《妇女自卫杀害暴力丈夫，获缓刑》（“Ward Woman Gets Probation for Killing Abusive Husband”），《每日摄影》1989年12月15日。

60. 来自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全国刑事与司法报告》，出版编号：NCJ-105506，1988年3月第2版：

在任何一个州，若有市民有合理理由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那么他们可以使用致命暴力。然而，这种危险必须是非常紧急、近在眼前的。例如，有人持枪闯入家中，与其对峙的人有理由认为自己身处非常紧急、近在眼前的生命危险。如果他/她与闯入者相安无事，对方离家几个小时后自己并不存在非常紧急且近在眼前的生命危险，此时则没有使用致命暴力的合理理由。在大部分州，如果攻击者遭到挑衅、激怒，也不能认定被攻击者有使用致命暴力的合理理由。

61.David Margolick，《女儿未系安全带遭遇车祸死亡，父亲被判刑》（“A Father Is Charged in Crash after Unbelted Daughter Dies”），《纽约时报》1990年12月29日头版。

62.同上。

63.Isabel Wilkerson，《孕期吸毒案中法院支持妇女》（“Court Backs Woman in Pregnancy Drug Case”），《纽约时报》1991年4月3日。

64. 同上。

65. Dianne Klein，《一位验尸官眼中的吸毒婴儿》（“A Coroner's-Eye View of Drug Babies”），《洛杉矶时报》1991年3月3日。1992年4月30日采访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Mona Brown时确认了11%这个数据。

66. Judith A. Stein等人，《8年研究：吸毒及其后果的多重影响》（*An 8-Year Study of Multiple Influences on Drug Use and Drug Use Consequences*），《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年12月刊，第1094～1105页。

67. 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1990年美国统计摘要》第53页，表69“有父母陪伴的18岁以下儿童：1970~1988”。

68.《新闻周刊》1989年9月18日“小道消息”版面，其中引用《纽约时报》的部分做了强调。

69.Suzanne Daley，《生来触毒，幼儿园也成难题》（Born on Crack，and Coping with Kindergarten），《纽约时报》1991年2月7日。

70.《纽约时报》1990年3月25日。数据是根据洛杉矶教育系统的花费计算出来的。

71. 这位联邦法官为美国区法官A. Andrew Hauk，他是联邦法官席上地位最高

的成员之一。见Gale Holland，《圣地亚哥联合报》1989年5月10日。

72. 采访纽约市警察局警督Harvey Wyche，见Coramae Richey Mann上述文章，又见Mike Clary上述文章。

73. 见Jerry Hicks，《陪审团将决定嫌犯是否被雇杀人》（"Jury Will Decide if Suspect was Killer for Hire"），《洛杉矶时报》1989年10月11日。1990年5月15日采访加州亨廷顿海滩警察局的Sergeant Peterson确认了其中的细节。

74. Greg Zoroya，《虽有陪审团请愿，但谋杀罪被判最长刑期》（"Murder-Conspiracy Convict Gets Maximum Term Despite Jury Pleas"），《橘郡纪事报》1990年6月6日。

75. Steve Emmons，《女儿及其他三人合伙杀父》（"Daughter, 3 Others Held in Killing of Man"），《洛杉矶时报》1989年4月23日，第18页。

76. Miles Corwin，《海滩杀人案震惊圣芭芭拉》（"Murder of Beach-Goer Shocks Santa Barbara"），《洛杉矶时报》1989年9月23日。

77.《妇女在裸体海滩谋杀丈夫被判刑》（"Woman Is Charged in Death of Husband on Nudist Beach"），《纽约时报》1989年10月11日。

78. I.P. Weston，《海滩谋杀只为金钱和复仇》（"Money, Revenge Motives Claimed in Beach Slaying"），《圣巴巴拉新闻报》1990年1月3日。

79. Eric Bailey，《少年参与杀害Wayne Pearce被判刑》（"Teen Sentenced for Helping Kill Wayne Pearce"），《洛杉矶时报》1989年5月25日。又见Rocky Rushing，《Pearce承认与高中生发生性关系》（"Pearce Admits Having Sex with High Schooler"），《北县刀锋公民报》1990年3月2日。

80. CBS "Hard Copy"新闻节目，1991年3月；美联社《已故丈夫的录音带揭发妻子与小情人》（"Dead Spouse's Recording Trips Up Wife, Teen Lover"），《芝加哥论坛报》1991年3月26日。

81. Bob Hohler，《Smart其他控告被撤销》（"Further Smart Charges Dropped"），《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1991年4月2日。

82. 同上。

83.《新闻周刊》1991年4月1日，第26页。

84. Barbara Carton，《Pamela Smart的后援俱乐部》（"Pamela Smart's Booster Club"），《波士顿环球报》1992年6月29日。

85. Branco从她的百万富翁丈夫George Archer Mueller的银行账户中取出了1000美元给Ronald Tellez，让他杀死自己的丈夫。见Matt O. Connor，《前蓝岛警察谋杀印第安酒吧老板被判刑》（Ex-Blue Island Cop Convicted in Murder of Indian Bar

Owner），《芝加哥论坛报》1992年4月29日。

86. 采访纽约市警察局警督Harvey Wyche，见Coramae Richey Mann上述文章，又见Mike Clary上述文章。

87. David Brown雇用职业杀手欲杀死自己的妻子，部分原因是他希望从她的保单中获得835000美元的保险金，其中有几份保险是在谋杀她之前刚刚投保的。这位职业杀手交代了Brown雇凶杀人。他协助警察拿到了一份与Brown的谈话录音带，其中Brown称杀死自己的妻子之后会支付21700美元的佣金。这位杀手还在法庭上指证了Brown。和Pamela Smart不同的是，没有人为Brown组织粉丝俱乐部。人们常把他形容为一个可耻的人。见Eric Lightblau，《检察官称雇凶杀妻的丈夫为可耻的操纵犯》（“Prosecutor Portrays the Husband of a Slain Woman as a Despicable Manipulator who Designed His Wife’s Death”），《洛杉矶时报》1990年6月3日。

88. Eric Malnic 和 Scott Harris，《Marlon Brando之子因开枪杀人被捕》（“Marlon Brando’s Son Held in Fatal Shooting”），《洛杉矶时报》1990年5月18日。

89. 自1985年至1988年间，有4986名男人被女人杀害，有10190名女人被男人杀害。数据来自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88年的《美国罪案》，表“受害人与施害人关系，按种族和性别”。

90. 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1990年的《美国罪案》第11页，表“受害人与施害人关系，按种族和性别”。表的注解里注明“累犯”凶杀案不计入性别分类，只有“偶然受害和偶犯”罪行计入性别分类中。

91. Wendy Cole，《时代》1991年5月20日人物版面。

92. Lucy Hoard 和 Gregory Cerio及司法部报告，《时来运转？》（“Reversal of Fortune？”），《新闻周刊》1991年6月10日，司法版面。

93. 1990年4月11日，采访了澳大利亚心理学家Frank Brennan。

94. 美国加州欧申赛德市埃尔卡密诺学院中学数学部主任Elizabeth Brookin对中学生进行了3年的观察（1989~1992）后得出了这一结论。

第十四章
性之政治学

为什么女人认为性骚扰是个大问题?

如果一个女人在工作时抚摸了一个男人的臀部，他会谢谢她，而不是起诉他。所以，男人怎么能理解女人认为性骚扰是个大问题呢?

男人们想象一下，在成长过程中，你被女人赞赏的总是你的机械技术能力（就像很多女人被男人赞赏的总是她们的身体一样）。然而，一位社工突然要评估你作为父亲的能力，如果她评估不认真，你就可能失去你的孩子。你正在帮孩子换尿布，社工却告诉你，你指甲上残留的润滑油让你看上去很性感。你注意到她的心思并没有放在观察你的育儿技巧上面。你是否感觉她好像在说“男人的地盘在车底”？如果评估不认真，你的孩子就有被带走的危险（就像一个初级女性管理人员没有获得严肃认真的评估，就可能丢掉工作），这时你可能会很矛盾，你分不清到底什么才算是赞赏。

现在设想那位社工是在赞赏其他男人的机械技术，你会不会松了一口气？在一定程度上，是的。但是，如果你发现她让其他男人帮她免费修车，然后将这些男人评估为最佳父亲，此时你会不会对其他男人因机械技术能力而被赞赏变得特别敏感?

男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大部分男人在青春期都是通过为女孩

做事和追求女孩而获得关注的，工作只是做事和追求的延伸。而且在工作场所，做事和追求意味着获得薪酬和升迁。然而青春期少女获得的最多关注是来自身体的吸引力。但对于一个工程师而言，身体的吸引力并不能带来薪酬和升迁。于是，工作场所对很多女性来说较为陌生，因为工作场所并不是女性青春期活动领域的简单延伸。

如何让一个男人在本能层面来理解这一点呢？想一想，每个女人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像在参加一场选美比赛（她是否具有吸引力是由父母、亲属、男人和其他女人评估的）。在我的研讨会——尤其是企业研讨会中，我要求男士们真切地感受一下“女性每天都像选美比赛的生活”。在他们的身体被评估时，我要求他们尽量把裁判想象成一位女性管理者，能够决定他们是否能晋升管理层。最后入围的男士都有被赞赏的感觉，但他们感到自己是因为错误的原因被赞赏，所以有些灰心。他们体会到了一种既爱又恨的感受，这是很多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另一方面，那些没有入围的男士则感到自己遭到了否定。虽然方式不同，但每位男士都感到自己身处一个对自己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当中。一些男士离开时眼含泪水。这些男士“穿着女士的鞋走过了一段路”。

为什么工作场合的美女海报让女性不安？

对很多女性来说，工作场合出现美女海报意味着这个男人更看重女性的身体而不是她的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女性会感到她面对的是一个两样都想要的男人——不管她自己是否愿意。

很多女性对美女海报的回应是贴上俊男的海报，但这会适得其反。男人从中得到的信号是，这个女人对男人的身体和性非常感兴趣，连上班时亦无法停止这种想法。

女人如何才能让男人了解自己真实的想法呢？我建议女性贴上“成功男性”的海报，尤其是那些年轻时就在自己的领域有所作为的男性。如果

她从事的是电脑行业，她可以挂一张乔布斯的照片，或者自己所在公司的老板的照片，或者她上司的上司的照片；如果她是在大学教书，她可以贴Bon Jovi或者Axl Rose的照片，或者干脆挂上“福布斯”富豪一百强的榜单。为什么？这会让男人像女人看到美女海报时一样感到不适。一个人在自己发挥最大价值的那个行业里有了被否定的感受时，就会感到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

为什么性骚扰法对男性不公平?

词条：1991年。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化学工程教授由于“长时间”注视校园游泳池内的一位女生被学校认为犯了性骚扰罪。他的罪行营造了一个对她充满敌意的环境。

词条：1991~1992年。一所高中学校由于没有及时去除男卫生间里的涂鸦而被控告性骚扰，并被判向涂鸦中提到的那个女孩支付1.5万美元的“精神损失费”。[2]

词条：1992年。6岁的Cheltzie称跟她同乘一辆公交车的男生对她说了下流的话并取笑她。她妈妈以Cheltzie的名义提出了性骚扰诉讼。学校负责人回应道：“将来，我们不得不认为语言与其说是用来律人律己的工具，倒不如说是用来‘性骚扰’的工具。”[3]

在20世纪60年代，“性骚扰”这个词尚未出现。随着60~70年代的离婚女性能够获得工作收入，她们开始要求在职场中得到她们在家中得到的那种保护。职场规则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

过去，男人想都没想过运用起诉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免于被他人开攻击性的玩笑。波兰男人听到关于波兰的笑话时，应该大笑而不是起诉别人。但是男人确实有保护自己的方式。如果有位同事具有攻击性，他们会避开他。他不被信任，就不会有好名声。如果一位老板很专制或者给下属布置

超负荷的工作量，有些人就会“消极抵抗”——嘴上说“好的，老板”，但工作只做一半；有些人会加班；有些人会把老板拉到一旁跟他说清楚；有些人会在书面评估中提出投诉。如果所有办法都没有效果，他们会申请调岗或者换一份工作。

男人从来不会考虑起诉那张能让他填饱肚子的嘴。为什么呢？因为那张嘴也能让他的家人填饱肚子。男人所做的所有斗争都是为了让全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要么活着的时候能拿到更高的薪水或者领取工人补偿金，要么死了之后家人能拿到保险金或者寡妇福利。实际上他的斗争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家人，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20世纪70年代早期，“性骚扰”一词开始为大众所知，但它的含义通常是指：女性被告知，如果不和上级发生性关系就会丢掉饭碗。大部分人同意，这是性骚扰。很快，性骚扰的范围包括上级为了获得性而承诺早日提拔对方。几乎所有男性都反对这种行为，因为这么一来，大部分男人会失去工作中的优势，而且他们的性一文不值。但是大部分男人认为，炒掉这个利用服务便利来谋求个人享乐的上司关乎公司的利益，政府无须插手。

然而就在男人们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之时，联邦政府扩大了性骚扰的法定范围。被女性定义为“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的所有因素均被定义为性骚扰。[4]男人都很健忘，直到有一天Clarence Thomas听证会将他们埋在沙堆里的鸵鸟脑袋拉出来。他们看到扩展后的性骚扰定义已经包含了讨论色情文学、讲色情笑话、称员工为“亲爱的”或者长时间注视穿短裙的女性。

联邦政府是否真的可能将讲色情笑话变成违法行为？是的。[5]看也不行？没错。称员工“亲爱的”也不行？也没错。如果某个女士不喜欢这些行为而一位男士却“冒犯”了她，那么这些行为就是违法的。

这些规定难道不是两性都适用的吗？有时候是的，一般情况下不是。比如说，性骚扰准则规定员工应该把“消除”女性认为“有敌意”或者“有恐吓意味”的行为——例如“不当的性挑逗”[6]或者色情笑话——当成自己的“反歧视职责”。有一份出版物解释了劳工部的准则，题目是《职业女性的工作权利指南》，而不是《工人的工作权利指南》。[7]实际点来讲，如果一个男人起诉一个和他讨论色情文学或者约他出去的女人，诉讼文件上的墨水尚未干透，他就会沦为公司的笑柄。

“充满敌意的环境”由谁来定义？女人。男人的意图根本不会造成任何法律上的区别。在其他犯罪行为中，犯罪意图会造成天壤之别。即使在凶杀案中也是如此。目前的性骚扰法律中并没有让所有男人得到与所有女人平等的权利。它公然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中平等保护所有公民——不论男女——的宗旨。然而只保护女性的政治意愿战胜了平等保护所有公民的宪法规定。

假设她和他说法不一致会怎样？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指南准则刚形成时，规定“凭空断言”受到性骚扰时——女性和男性说法不一致，如果没有事实证据支持则无法对被指控者定罪。讽刺的是，Clarence Thomas当时正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是他推翻了这个规定。现在，如果她和他说法不一致，“凭空断言”受到性骚扰不需要事实证据的支持就可定罪！[8] Clarence Thomas现在应该明白，立法者必须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重要性了。

但是现实情况更糟糕：女人甚至不用告诉男人说他骚扰了她，她现在可以向工作中的女性朋友抱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决议编号84-1规定，向工作中的女性朋友抱怨“足以构成发生性骚扰事件的证据”。[9]过去，这种行为叫作八卦。现在，它叫作证据。

因此，仅在1980年至1990年间，全国就收到了5万起性骚扰诉讼，[10]美国

近3/4的大型企业害怕受到类似事件牵连，因而制定了相关计划。在这10年里，女性被保护不在工作场合受到侵犯性笑话的骚扰，这种保护甚至比一个世纪当中，男人被保护免于因工死亡的力度更火。随着女性进入工作场所而政府成为女性的替身丈夫，很多男人开始感到受害者比创业者得到的好处更多，于是这个国家的职业道德发生了变化：创业者的国家变成了受害者的国家。

间接主动性的政治学

不管你信不信，这仍然不是最让男人头痛的问题。那么什么才是呢？首先，男人看到的是女性仍然玩着她们过去玩的性游戏。其次，男人看到性骚扰法律没有规定女性要为她们的性游戏承担责任。比如，在单身职业女性中最受欢迎的《时尚》（*Cosmopolitan*）杂志指导女性如何在工作中采取间接主动性，使男人无意识地回应自己。[11]假如回应她们的是错的人呢？文章会告诉她如何提出性骚扰诉讼，这些间接主动性会引出那个错误男人的直接主动性！[12]

《时尚》杂志这样告诉女性如何在职场中运用间接主动性：[13]

- 当你走过他的办公桌旁时，把一堆文件或者提包掉落在地上，然后伏身整理。他会过来帮忙。你屈身紧靠着他，然后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保持平衡……
- 如果你有双迷人的长腿，那就穿上紧身超短裙，登上恨天高吧。然后背对着他，弯下腰来（捡地上的东西或者在文件柜里查找东西等等）……
- 制造电梯巧遇……
- 工作午餐或晚餐的时候，说一些稍显不当的话题，比如“你穿蓝色很好看”。你要在正说着其他事情的时候突然插进来这些话，比如你说：“我正准备参加一个比赛呢。你知不知道你穿蓝色很好看？”

间接主动性的力量在于女性不用押上自我价值和职业前途。例如，《时尚》杂志建议："在你遇到他之后，你要在几秒钟之内马上设法接触他的身体，哪怕是摘下他衣服上你想象出来的线头也好。"[14]现在，如果他做出回应，邀她约会，后来却不再继续，他可能会因为性骚扰而遭到起诉（是他"主动"）。一旦上了法庭，男人无法自如地告诉法官："法官大人，我约她出去是因为她从我夹克上摘下了那根根本不存在的线头。"

如果他对那个线头的暗示视而不见，该怎么办呢？《时尚》杂志建议说："看向他的胯部……要带着顽皮的表情或者笑容。"[15]那么如果他忽视这个胯部的暗示呢？她可以"穿上华丽的红色内衣，然后'不小心'露出来——解开一两颗衬衫扣子，这样他就可以瞥见你的红色蕾丝内衣了……坐下来的时候双腿交叉，你的短裙就会滑上去……"

但故事并没有止于《时尚》杂志。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禾林公司（Hale quin）的爱情小说发现了一个吸引职场女性的公式。在这个公式里，成功男性追求职场女性，职场女性拒绝他的追求，而他克服了她的拒绝，然后她"被征服"了。这是一个古老公式，他：追求、坚持；她：吸引、拒绝。但现在它也成了性骚扰定义中的内容。

女人是不是不那么买这个公式的账了？算不上。喜欢阅读爱情小说的普通女性平均每个月读20本书，是1983年这类型女性阅读量的2倍。[16]由于禾林公司使用了这个职场女性的爱情公式，禾林从一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濒临破产的公司发展到现在占据爱情小说市场80%份额的大公司。[17]同时，爱情小说市场本身也兴旺蓬勃了起来，目前，它占据了全美大众平装书销量的46%。[18]

"被征服"的是她的幻想，而不是他的。他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当他看到一位女性正在阅读《职场爱情：利用工作找到真命天子》（*Love*

at Work: Use Your Job to Find a Mate），[19]这种感觉更强了。在这本书里，作者还列出了男性职业中权势最高的前十类职业，也就是让女性最容易“锁定目标”的十佳职业。[20]

迷你裙有什么大不了的？

很多女性问道：“在工作场合穿迷你裙、用点香水、调点小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男人的反应不会让人大惊小怪，那么这个问题对大部分男人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对于女人来说问题就大了——如果她的目标是在工作中得到认真对待的话。原因在这里：她的间接主动性是在告诉男人，她想逃避直接责任。间接主动性是在告诉男人，他面对的是一位传统女性。而从传统意义上来讲，间接主动性是在为婚姻铺路、为她的职场生涯断路。所以说，迷你裙、香水和调情都在无意中告诉男人：这个女人希望结束职场生涯了——或者，至少减少她的工作职责。假设你是一位老板，你必须从一个可工作可不工作的人和一个必须工作的人（比如必须养活配偶和3个孩子）中间选择一个人来提拔，你会更认真对待谁？

女性的这些行为和男性采取直接主动性一样本来就是错的。纵观人类历史，几乎在所有文化中，女性的间接主动性都是在暗示男人采取直接主动性。在一些文化中，使用口红是女性暗示自己愿意口交的一种方式。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如果一个女人的头发上插着一朵鲜花，就表明她单身。鲜花、口红或者迷你裙发出的信号足以引起每个男人的兴趣。只有她引起了每个男人的兴趣时，她才真正有了选择——选择“最好”的男人。

那么，她的界线——她说“不要，不要”——的历史重要性在哪里？那是她选择男人的方式，这样的男人能够承受生活中的拒绝并生存下来，能够因为足够在乎她而甘冒风险，能够在发生了任何不妙的事情之后承

担所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性骚扰诉讼是女性选婿过程的最新版本，让她能够选择这样的男人：因为在乎她而置自己的职业于危险之中；有足够的谋略采取主动却不用卑鄙手段；虽然面临遭到起诉的风险但有勇气采取主动。在这个过程中，她能了解他是否值得信任，他是否信守承诺，他是否有能力克服障碍，也会了解他遭到拒绝后他如何处理。这样，她就能将能做事、能承担全责的男人挑选出来。接着，更多的变化发生了……

在过去，他克服她的壁垒的这一过程叫作“求爱”。现在，它可能叫作“求爱”，也可能叫作“性骚扰”。这个地带到底有多灰色呢……

成功了，就是“求爱”；不成功，就是“性骚扰”

我曾经问我那些进入职场时单身而后结婚的女性听众：“有谁嫁给了工作中认识的人（或者通过工作认识客户，或者你是别人的客户）？”近2/3的女性举起了手。[21]还有15%正在和工作中认识的男人同居或者和他们保持了很长的恋爱关系，但是并没有结婚。这是一个让人左右为难的现实。

娶了职场女性的大部分男人职位都比她们高，而且，几乎都是男人先采取主动的。在职场中，男人向职位比自己低的女人采取性主动是最容易被定为性骚扰的行为。一旦成功了，它就叫作“求爱”。如果没成功，它就叫作“性骚扰”。

只有在他坚持要求的情况下才叫“性骚扰”，不是吗？法律上不是。对于部分女性来说，任何主动行为，哪怕只有一次，都有可能让她感到不舒服并就此认为这是一个敌意环境。而这就足以让她的起诉得到支持。

很多女性承认自己嫁给了当初她们拒绝过的男人。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她们是嫁给了性骚扰者。但是她们中的一些人很高兴这些男人追求了她们。

同事应该相爱吗?

女人常说在发生性关系之前了解那个人是很重要的。职场给了女人观察男人的好机会，包括他如何对待职位比他高和比他低的人、他的能力如何、他的脾气怎么样、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是怎样的、他有哪些习惯。对于大部分女人来说，这比在酒吧更容易了解一个人。在美国，有3500万人声称每周都会在工作中发生某种“社交性性行为”。[22]各行各业都有80%以上的人声称他们在工作中有过这样的行为。[23]如果成功了，就会有婚礼，女方的照片将出现在证书纸上；如果不成功，就会有诉讼，男方的照片会出现在报纸上。

男人为什么讲色情笑话?

首先，男女都会讲色情笑话。就算男性成员占多数的国会已经通过了相关法律，将讲色情笑话列为构成“敌意环境”的因素，女国会议员仍在传播男人出糗的笑话。[24]比如说呢？“政府债券和男人有什么区别？”“债券会到期（mature）。”讲这个笑话没问题。但是如果男人问：“政府债券和女人有什么区别？”而答案是：“债券到期后比较值钱。”那么他们可能会被起诉。同样，女人会开玩笑说：“带着女宇航员有什么好处？”答案是：“如果大家在太空中迷路了，就有人张嘴问路了。”现在男议员害怕问她们：“女宇航员问路时是谁指的路？”

尽管男女双方都有自己表达幽默的方式，但在Thomas和Hill对质期间，我们常听到的色情笑话是关于男老板利用自己的权力占女人便宜的。不见得。男人会和自己的同伴、兄弟和所有不会对此感到不适的人分享色情笑话。男老板往往无意识地通过讲色情笑话的方式让员工不要怕他；他用这种方式制造一种氛围，希望员工能更轻松地反馈意见，和老板打成一片。女人被排除在外的时候觉得受到了冷落，但是她们没有被排除在外的

时候会起诉！男人对此很困惑。

我们花了数百万美元来研究幽默对保持身体健康的好处，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花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审查这些幽默，这真是讽刺。[25]能让人大笑的色情笑话和“普通”笑话一样，都会给我们的身体系统带来氧气。“色情”笑话并不是真的比普通笑话更肮脏，它们只是表达出我们的伪善而已：我们把性称为“肮脏的”，然后又去和我们相爱的人做爱。

当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吸引时，希望他在性上采取主动并不能增强他的力量，而是增添了他的无力感。当他面临吃官司的可能性时，这种无力感只会进一步加强。讽刺的是，在越危险的水域，玩笑就越容易成为一种试水的工具：如果她开怀大笑了，说明她可能有兴趣；如果她看起来很厌烦，说明她可能没兴趣。如果她负责试水的话，他就会觉得更有力量。

目前，性骚扰顾问鼓励女性将有关敌意环境的行为记录在私人日记里，比如色情笑话。大部分老板认为他们的员工不会被色情笑话吓到，如果真的吓到了员工，他们宁愿员工私下告知他，而不是发现一位女士在私人日记里记下色情笑话，之后在办公时间告诉其他女性朋友，然后起诉他们。如果他冒犯了一位女士，他希望她能告诉他，而不是起诉他。

女人认为是骚扰的，男人认为是欺凌

一位女性海军心理学家告诉她的一年级女生，如果男人问她们：“你们为什么要来美国海军学院？”这就是典型的骚扰。[26]《今日心理学》赞扬了这种做法。[27]然而有人不禁要问，军队中女性的退学率比男性的高出50%是不是因为她们如此敏感？[28]为什么呢？因为它并没有帮助一年级女生明白，不论一年级的男生还是女生都会因为某种原因受辱，而女性受到的侮辱可能会被称为“性别歧视”，但矮个子男生可能会受到“矮子歧视”

（“你的智商和你的身高哪个更高一点？”）；口吃的人可能会被别人模仿口吃；南部乡下来的男人可能遭到“乡下人歧视”（别人会模仿他的口音）；犹太新生可能会被称为“鹰钩鼻船长”；得到长官夸奖的新生可能会被称为“马屁精”……

欺凌的基本前提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区域。欺凌的目的在于训练新手（或者新生）在自己的脆弱区域遭到攻击后能生存下来，以及训练他们服从于集体。新生要学习笑对批评，学习将批评当成进步的动力，而不是躲起来。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受过欺凌，那么她也没有接受过考验，因此，她是不被信任的。

平等权包括同样受辱——或者说得到相同的生存技巧训练。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有生命危险的职业领域中欺凌如此严重，例如在军队中，以及在救火、打击犯罪、伐木等工作中。讽刺的是，海军学院的“生存技能”课程并没有把骚扰和欺凌与生存联系在一起。[29]于是，在一份与生死息息相关的工作中，未受过欺凌的人不被信任。

海军学院的新生或者企业的新手要学着“不把这种攻击当成是针对个体的”吗？非也。这种攻击一般都是有针对性的。虽然其实有些批评确实是一种人身攻击，但是新手要学着适应它。人身攻击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成为食物链中更强的那一位，否则，如果他选择继续做弱者，他就会被淘汰。这确实是人身攻击，因为受到人身攻击后你才能回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愿意让自己的人格屈从于这个机器吗？”“你明白自己是一个可更换的零件吗？”女人更难以接受批评和欺凌，是因为女人没有受到过将自己视为可更换零件的训练。

这个将性骚扰制度化的体制，我们想要继续吗？必须权衡利与弊。未来女性可做的贡献之一便是遏制它的膨胀。敏感的艺术家不会去屠龙。但是有了男人的保护就像有了铠甲，其他人不必再穿上铠甲。如果没有男人

的保护，美国可能会协助希特勒将犹太人塞进毒气室。骚扰并不是一种能让男人产生力量的体制，它是一种会削弱男人力量的体制。然后，它又会促使男人看清大局——他们无关紧要。

那位海军女心理学家并不了解欺凌训练会帮助一个人发展自我牺牲的性格，她们希望只让男人做出这些牺牲。最可悲的就是《今日心理学》赞成她的观点：欺凌训练是一种性别歧视，仿佛欺凌训练是一个对女性的阴谋。[30]她并不认为欺凌训练其实是一种对男性的阴谋。最终它遭到了抗议，因为它伤害了女性。

性骚扰法律会不会伤害希望得到真正平等权的女性?

有关性骚扰的法律增加了聘用女性的成本，因此，雇主们有了歧视女性的合法理由。我有一位朋友曾掌管加州最大的调研公司之一。他解雇了一个无法和公司大部分同事和平相处的女人。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女人起诉他性骚扰。他对她完全没有兴趣，也从来没被其他人投诉过他有性骚扰的行为。不过，事出意外：这个牢骚满腹的女人曾骚扰两位不同的男士，没有得到回应便排斥他们。尽管如此，陷入官司纠纷之后，公司昔日的辉煌不再、业绩下滑（加上美国国内经济萧条），最终公司倒闭。

我的朋友感到自己好像被强奸了。起初，他试着和朋友们聊这件事，但是他看到了朋友们质疑的眼神。所以他现在不再提起这件事。但是他付出了代价。就像女人，在她们认为自己被强奸了之后，朋友、家人和警察都带着质疑的神情看着她。

一个公司雇用的男性员工越多，每多雇用一个女性都迫使公司更加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免公司的男性员工遭到起诉。这种现状使得几乎每一位男性管理人员的事业都很容易毁于一旦，也使得几乎每一家雇用男

性管理人员的公司所精心打造的管理团队很容易被打散。公司士气遭到破坏，而留下来的男性管理人员则整日如履薄冰。这一切都在引诱管理层带上虚伪的面具：所有反歧视的规定都被有序地执行，但是每当有女士踏入办公室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闭口不言。真正的歧视产生了，玻璃天花板变得更厚。

希望得到平等权的女人则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性骚扰法律往往会导致敌意环境的产生：一个视女人为孩童的环境，一个连女性雇主都更倾向于雇用男性的环境。男人如履薄冰的同时，过去顺畅的工作环境变成了一个运作不良的环境。

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一个政府强迫企业更保护女性，而且不论女性的执行力是否势均力敌都要给予女性平等的晋升机会，那么它就是在破坏这个国家的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于是，向美国女性开放的工作岗位和晋升机会会越来越少。

一些企业发现一个讽刺的现实：苏联不再是老大哥之后，美国接手了老大哥的位子。（更讽刺的是，要求接手老大哥位子的是女权主义者！）

要如何解决呢？找到既不会损害工作环境又能保护员工的方法——找出真正受到伤害的人。在我们看清职场中发生的七种真正的性交往行为之后，这一点就会渐渐明了了。

七种办公室隐秘性事

● 性勒索。上司威胁称，如果她/他不同意发生性行为就会辞退她/他。

例如，如果一位男性副总裁威胁女秘书，声称如果不和他发生性关系就会辞退她，那么从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最好让他走人。为什么呢？如果一位副总裁意欲辞退一个能为公司盈利的人，那么他是在为了性而

出卖公司。几乎每一位副总裁都明白，只要性勒索事件被抓到一丁点儿证据，她/他就会被辞退。这就是大型企业中极少发生性勒索事件的原因。

● 性贿赂。管理人员承诺提拔对方，交换条件是性。它既可能是直言不讳的，也可能是旁敲侧击式的。

如果一位管理人员为了性而提拔了一位能力不足的员工，那么这个公司就得破财。所以说，辞退这位管理人员是出于公司自身的利益。但是，如果那位为了晋升而发生性行为的人后来发现事未如愿，他/她不得提出诉讼。否则，未得到正当晋升的那个人可能会起诉她/他。

● 职场性交易。员工为了晋升而献身，销售员为了销量而出卖肉体，包括已经发生的或者承诺会发生的性交易。

例如，如果一位女员工承诺以性换得晋升而一个男人接受了，他们二人可能会遭到公司所有员工——包括所有男女员工——的集体诉讼，起诉他们的行为让其他人失去了通过合理手段得到晋升的平等机会。

同样，如果一个女人为了得到潜在客户的订单而承诺发生性关系并且成功了，那么，首先这个客户的雇主应该辞退他——如果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性生活质量，他压根不会购买该产品。其次，应该起诉这个女人。谁起诉她？和她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他们在和一个女性的肉体进行非法竞争，而不是公平竞争。

● 职场乱伦。员工之间双方都同意发生性关系。办公室就像是一个有等级序位的大家庭，性关系会玷污这种序位。办公室乱伦基本上有两种形式：

（1）老板与员工之间的性关系。如果双方都同意，那么这种性关系就会产生和父母与子女乱伦一样的问题：它会削弱老板与员工保持距离的能力，因为老板常常会感到该员工需求太多。其中也会出现父母与子女乱伦

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父母不再有威信了，因为子女察觉到自己对父母的影响。如果只有一位员工能产生这种影响的话，那么这会引起办公室其他同事的嫉妒和怨恨。

（2）同级性关系。办公室家庭中的同级性关系如同普通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乱伦。

因性产生的联盟关系通常会让其他员工感到自己遭到了排挤。如果性关系保持在地下，就会如干柴烈火。这种关系最好公开，这样就能创造一种可以公开讨论的氛围。

职场乱伦关系会让公司和其他员工变得容易受到伤害。

● 性骚扰。在办公室同事拒绝的情况下不断进行性挑逗。

为了打赢官司，受害人可能需要把拒绝的情况写下来，否则将无法把它和绝大多数办公室单身男女之间（有些人还不算单身！）的求爱区分开来。为什么要区分口头拒绝和书面拒绝？原因如下条。

● 职场调情。惹火的短裙、挑逗的眼神再加上抚摸和眼神发出的信号……这是《时尚》杂志鼓励职业女性在职场中采取的间接主动性。

在职场调情就是在办公场所向对方发出邀请，请他/她想一想或者做一做工作以外的事情。

职场调情就像电脑中的病毒，会破坏预期的程序。它会使员工为了不破坏可能会发生的恋爱关系而不向公司如实反馈情况。它也使得很多男性管理者聘用破坏公司目标的人。

● 职场色情。海报、黄段子、群体色情暗语（没有针对某个人的眼神挑逗）。

职场色情，比如黄段子、性别歧视笑话和海报，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男性试水的一种手段，而且根据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定义，这属于性骚扰。男人可能会为此丢掉升迁的机会。职场调情更大程度上是女性采取间

接主动性（见《时尚》杂志的例子）的一种方式，它完全遭到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忽视，女人可以这么做，而且毫无风险。于是，它产生了一种扭曲的结果……

有位男士曾写信告诉我，他有位女同事敞开衬衫纽扣、露出内衣（和胸部）、穿着迷你裙很风骚地坐在办公室，于是他拍了一张她的照片。他把这张照片钉在一个文件柜上。照片中的她脸转向了别处，所以不会马上认出是她。

老板让他马上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命令他“把文件柜上的色情照片取下来”。于是他开玩笑似地解释说：“那就是我们办公环境的真实写照。”老板明白他的笑话，大笑之后仍然要求他取下照片。而这位色情照片的主角却没有接到穿衣应该更得体的通知。有些女性创造出的办公室环境是：如果她们被拍了照，那么其他女性就会抗议办公室出现了色情照片。

几个月后，这位男士再次被请到了老板办公室。他被老板炒了鱿鱼，原因是有人投诉他“沉迷于男人的问题”。这些投诉没有显示他出色的工作是否受到过干扰。而且，这位男士身处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而他的老板也是男性。

这位男士并没有希望用办公室色情来撩拨那位女士，尽管她穿着暴露的目的是让男人产生性冲动。然而被炒鱿鱼的是这位男士。职场色情（只有部分女性会感到困扰的男性行为）遭到了谴责，而轻浮的裙子（让绝大部分男性都感到非常困扰的女性行为）得到的却是保护。

教员性关系：“强势的教授”和“世故的学生”

词条：在编写《男人何以如此》一书期间，有一次我正坐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院的图书馆里，我听到隔壁办公室传来断断续续的喘息声。当然，

我也在克制自己不去看！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巧合”，办公室窗帘有一条缝，我看到一位教授和一位学生正在……你懂的……

倘若我举报了他们的话，受到惩罚的会是谁呢？（多选题）

1. 二人都不会受到惩罚——他们是自愿发生关系的成年人。

2. 如果她17岁，被惩罚的将是教授——法定强奸罪。

3. 如果她18岁，被惩罚的仍是教授——性骚扰罪。

4. 由于双方的角色而成为一种乱伦（“教员乱伦”，她可能会在学业上得到优先于其他学生的好处）。

5. 这位女学生应该接受审查其性贿赂、学生卖淫以及与教员乱伦的行为。

这些都是“教员性关系”可能的发展走向。但是到了今天，不论是她还是我举报了这次事件，她会得到帮助而他则前程尽毁。

教员性关系也会产生像办公室性关系一样的问题。但是诉讼不是解决的办法。法律系统具有对抗性，而男女间的性关系可以是协商性的同意。法律面前非黑即白，而男女之间却很微妙——他们不仅会看，他们还会嗅、会听、会感受、会相互交流。

于是更深层的困境出现了。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一位女生考试要挂科了，她在临近期末时去找他，她自己非常紧张。然后他们去了学校的酒吧谈心。她哭着承认自己的想法很愚蠢。他拉起她的手试图安慰她：“你很聪明，考试会通过的。”

然而到了期末，她考试没有通过。考试结果下来之后不久，她起诉他性骚扰，而且有一位学生作证，称自己在酒吧看到他们时，“教授正拉着她的手，而她看上去并不高兴”！假期结束后刚一开学，他就成了校园报纸上的大罪人。

3/4的哈佛女性会选择“在私人层面了解自己”的教员。[31]这不可避免

会让教员无法进行客观的判断。女性能否在大学保护她们不受“性利益”伤害的同时，又要求教授给予她们学业上的关照呢？

大学教育的贡献之一是让人了解所有事情并非只是“好人/坏人”的问题，或者，在“教员性关系”中也并非只有“强势的教授”/“世故的学生”的错误两分法。

女人是受害者，男人承担责任

如果一个男人摸了酒吧女服务员的臀部，他可能会惹上官司——虽然她赚取小费的方式是把他灌醉。但是如果猫王深夜身着演出服走在大街上被粉丝抚摸臀部，而他起诉了粉丝，他会被告知自己应该承担挑逗别人的责任（因为他的服装）。有些人甚至可能会谴责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诱惑”少女。如果一个天生如明星般的女性利用自己的地位，我们会保护她；而一个男明星利用了他的地位，我们也会保护她。应该承担责任的性别调换了，但我们谴责的是同一个性别。

在“教员性关系”上，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双重标准。司机被警察拦下时，他会感到自己的弱势。学生接受教授的测验时，学生会感到自己的弱势。如果司机亮出一张百元大钞，那她/他会被控行贿。如果女生向教授露出“到这里来吧”的诱惑表情，这算是性贿赂吗？如果教授回应了她，她就翻脸起诉教授，这算是性圈套吗？

调情和“到这里来吧”的表情相当于在警察面前亮出的百元大钞。或许，一个女人甚至在考试迟到时靠“卖弄风骚”就可以进入考场，这可以视为一种性贿赂，就像教授“长时间”注视一个女人时被视为性骚扰一样。如果警察和司机都要为这种金钱交易负责，那么教授与学生双方不都应该为二者之间发生的性交易负责吗？否则，性骚扰法律就是一条男性专用的贞操带，而钥匙掌握在女性手中。

有性骚扰，就有可能滥用职权

女性提出性骚扰诉讼可以让政府偏离轨道（例如Anita Hill案），可以摧毁一个企业（如我朋友的调研公司）或者毁掉一个男人的事业（如Brock Adams议员）。女人可以以性骚扰为理由对抗政府、企业和男人。政府和企业也可以用这个理由针对男人。相比之下，如果一个政府可以将它认为不恰当的性语言归于性骚扰，而另一个政府将它认为不恰当的政治语言归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前者更有可能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和前者做法相同的企业可能会把所有美国男性员工都变成“新的‘唯唯诺诺先生’”。

词条：Gordon Hamel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员工，他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当他发现他所在的公司做了不光彩的事时，他揭发了公司。公司感到无力还击。有一天公司想起可以给他安一个性骚扰的罪名。只要他让女员工感到他营造了“敌意气氛”，小到对她们眨眼或者讲色情笑话都可以被定为性骚扰。这样，公司就可以毁了他。结果，Gordon Hamel在为自己辩护时家庭破裂，而他承认，如果他知道结果会是这样，就不会这么正直了。[32]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美国最为人熟知的两起性骚扰案件是Frances Conley医生起诉斯坦福大学员工的性骚扰案件以及Anita Hill起诉Clarence Thomas的性骚扰案件。没有人知道事实真正的来龙去脉。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美国人脑海中的画面是：一个全是男性的参议院委员会对女性抱有偏见，一个全是男性的医学院找一位医生的麻烦。

Frances Conley宣布辞去医学院的职务，她说她这么做是因为自己受够了这25年来周围的人“对性别不敏感”。一夜之间，她上了黄金时段的新闻，也成了《人物》杂志、《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魅力》（Glamour）杂志的封面人物。之后的几个月里，没有一篇文章提到过遭到她控诉的男同事的处境如何。媒体也基本上没有想过去采访他们。而男人

们担心引起口水大战，也没有人自愿站出来说话。

等到下面有关Frances Conley辞职的这则重大新闻出来时，人们对此事件的印象已经定型了。以下是我们所没有听说过的观点。

据Conley的同事称，“标准的Frances”经常拿男性的睾丸开玩笑，还威胁说要阉了男人，“割掉”他们“左边的那只”。[33]她将她的男性病人称为“这先生”（Mr. This）和“那先生”（Mr. That）。她指导男住院医师对男病人进行手术时，她会大喊：“水管工，标准的水管疏通工作。”她会告诉男住院医师说她发现他们长胖了，如果他们胆敢抗议，她会回敬称：“好吧，可能你的脂肪都重新分配到你的大脑里去了。”[34]

Conley声称不断有男人向她提出不当要求，不过后来她承认最后一次是10年前。有一位神经外科的护士在手术室中直接接触Conley有14年了，她看过Conley的控诉之后，说道：“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件都没有发生。我喜欢Conley。她和我是朋友，真的。但是我觉得她有点过分了。”[35]

Conley的动机是什么呢？她的同事、母亲和姐姐都说她想成为神经外科主任，但是两位外聘顾问认为Gerald Silverberg是最佳人选，于是她怒火中烧。[36]从此以后，她一直威胁要辞职。

在Conley的辞职正式生效的前一天——此时她遭到恐吓的事情已经天下尽知了，她打电话给医学院院长称自己改变主意了。她想留下来。[37]还有比这更让人瞠目结舌的吗？有，在全国人民面前遭到羞辱的医学院又请她回去了。

更深远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记者和女权主义者都只听取女性的观点，而另一个性别默默地坐在“冷冻室”中不发出任何声音，那么大众对男人的愤怒就会加深。这种愤怒的情绪为Anita Hill事件创造了条件……

保守派女性Anita Hill向一个完全由男性组成的委员会指控保守派

Clarence Thomas，但是“没有成功”。这次事件中似乎有其他动机，而不是勇气。Anita Hill没有被晋升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的首席律师顾问，[38]但是这无法解释整个事件。她很多EEOC的同事都认为她是Clarence Thomas手下众多顾问中最不称职的一位。[39]Anita的一位同事Phyllis Berry写道：“我觉得她靠不住、自私。一位同事被调任为EEOC的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之后，她非常气愤。”[40]离开EEOC之后，Anita到奥罗-罗伯特大学和被称为四等法学院的俄克拉荷马大学教书。

在奥罗-罗伯特大学，那里的学生曝光了Anita一些诡异的行为。Lawrence Shiles现在是一名律师，他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递交了宣誓书，他说自己还是Anita的学生时，“我发现发下来的作业本里面有几页夹了10~12根短短的黑色阴毛。我快速翻了翻Jeff Londoff的作业，他的作业里面也夹了相似的阴毛。”[41]Mark Stewart也是她的学生，他也说自己的作业本里面夹了阴毛。他们都没有提出性骚扰诉讼，而是像普通男人一样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一个在很多学生身上发生了的笑话。

在俄克拉荷马大学，Anita因为她的言论而声名远扬：进化论中最低等的生物莫过于白人男性和“经常被占便宜的女性”。[42]男生写论文的时候曾经用华丽的书法让她误以为那些论文是女生（写）的。有一位同事提到：“她言辞轻浮，衣着也具有挑逗性，但不是那种性感或者甜美的风格，更像一种愤怒的表达，像一种武器。”[43]

Anita Hill到EEOC工作前是什么样的？她曾在Wald，Harkrader & Ross律师事务所工作过。有人发现她曾为了向客户多收费而伪造计时卡。[44]由于她的综合执行能力太差，她的搭档John Burke曾提醒她。[45]之后她马上提出了性骚扰的指控，办公室的同事认为，这是在故意让大家不去注意她的执行能力差这一事实。[46]

几乎没有美国人知道，Anita在EEOC工作时确实有一位上司收集色情

作品而且对此并不避讳，但那不是Thomas法官，[47]也不是4位证人中唯一支持Anita的那位。那位证人是唯一声称Thomas法官对Anita进行性骚扰的人，但在他指证的时间段内，Anita还尚未和Thomas共事。

事实的来龙去脉我还是无从得知。我所知道的是，在公众的印象里，她是一个没有动机的保守派女人，而不是一个动机复杂的女人。

女人可能会在她们没有得到晋升而感到气愤的情况下提出控告，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判定男人性骚扰，就像不了解男人会因为被剥夺了子女的监护权而提出控告。媒体尚未做出调查就将女人塑造成无辜的受害者，把男人塑造成邪恶的行凶者，这样做是在审查女人的光明面和男人的阴暗面，也制造出后来他们所谴责的敌意。

解决之道

如果一个女人认为自己受到了性骚扰，鼓励她直接告诉那个男人。我怎么知道这个办法有没有用呢？有两位女权主义者采编了100个女人遭到性骚扰的故事，只要女人直接告诉男人她觉得他在性骚扰自己，所有男人都会马上停止。[48]所有男人都会道歉，一部分人还会送上鲜花。如果女人不懂得男人的脆弱，她们会想念当初男人如何取悦自己，而不会想到男人是如何激怒自己的。虽然作者采编了很多故事，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每个被告知的男人都马上停止了自己的行为！

其次，让男女双方理解对方的好意。例如，男人和女人现在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是几百万年以来男女的分工不同所致（男人追求、坚持；女人吸引、拒绝），但是在眼前这个追求平等的时代，这已经行不通了。

第三，让男女双方社会化，对性发动平等承担责任。如果男女双方不共同承担这个责任的话，那么性骚扰法律就会成为一个套环，职场男性必须跳进去，才能证明自己值得被职场女性爱慕。

第四，与稚嫩型女权主义者相反，成熟型女权主义者会鼓励女性平等地进行第一次接吻、第一次碰触生殖器官的冒险。只有稚嫩型女权主义者才会鼓励女性起诉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男人，嫁给做得好的男人（他们是在正确的时间主动出击的正确人选）。成熟型女权主义者愿意用间接主动性的力量来交换直接主动性的责任承担。她不愿意再做受害者，而愿意成熟、长大。

第五，不再通过女权运动的观点高喊性骚扰，而是通过性别转换运动的观点来提高性接触的讨论水平。

对在职场和校园内发生的任何形式的性接触，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由所在单位来促进沟通，而不应该通过政府强制立法来解决。如果所在单位可能受到伤害，它们就有意愿更正这种方式。这个方案并不完美，但相对于这样的做法——利用法律来错误地起诉我们不喜欢的人，要更好一些。

结　论

性骚扰对20世纪面临的众多重大挑战来说，是一个完美隐喻。这些挑战包括：对我们保护女性的天性的挑战、对女人无辜/男人有罪的陈规旧习的挑战；将僵硬、功能不良的职场变成一种灵活、流畅的环境的挑战；通过沟通而不是法律来解决性行为理解差异的挑战——要知道，至少沟通能够用微妙来回应微妙之处，而不是像法律那样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两性间的微妙差异。如果用第一阶段的规矩死板地看待两性之舞的微妙之处，那么我们不是在向前看，而是在向后看。

如果我们想保护人们不受伤害，那我们也得制定爱情方面的法律，还有婚姻、汽车方面的，以及八卦绯闻方面的。如果我们想保护男人不受伤害，就得规定女人拒绝和男人发生性行为是不合法的。然而，大多数人都

宁愿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犯错的国家，而不愿生活在一个大家都要因每一个犯过的错而受到制约的国家。

早期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是这样的：他们强烈反对保护性法律。他们知道，只要公主受到保护不被豌豆硌到，女人就无法享有平等权。而现代女性的“床垫下有颗豌豆”的问题，是职场中的难点。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拥护保护性法律，他们是在反对平等权。

性骚扰法律具有性别歧视的色彩，因为它让男人因为性关系中的男性角色而成了唯一要负责的角色。它保护着女性的性感，却不保护她的同事不受她的利用——她想通过性不劳而获，也不保护企业不受这类女性的伤害。最终，它忽视了女性的角色，因此也忽视了女性本身，除了让她们成为受害者。

注释：

1. John Leo，《性骚扰的里程碑》（“A Milestone in Sexual Harassment”），《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92年1月27日。这位化学工程教授为Richard Hummel，那位学生为Beverly Torfason。

2. Jane Gross，《学校成为性骚扰问题的最新舞台》（Schools Are Newest Arenas for Sex-Harassment Issues），《纽约时报》1992年3月1日，教育版面。这所学校是明尼苏达州德鲁斯中央中学。

3. 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新闻社（Scripps Howard News Service），《二年级学生提出性骚扰诉讼》（“Second-Grader Files Sex Harass Lawsuit”），《北县刀锋公民报》1992年9月30日。

4.Gretchen Morgenson，《秋波暗送按兵不动，笑话送上笑容欠奉》（Watch That Lerr，Stifle That Joke），《福布斯》1989年5月15日，第69~72页。

5. 美国劳工部《职业女性的工作权利指南》，编号：leaflet no. 55，1988年6月。

6. 同上。

7. 同上。

8. Clarence Thomas于1988年10月25日签字确认了这些修改。修改条目在1988年的《性骚扰指南》第12页的脚注中进行了解释。引自Richard Pollak，《预测无

辜？》（“Presumed Innocent？”），《国家》（*The Nation*）杂志1991年11月刊，第573 页和第593页。1992年4月6日我采访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证实即使1990年修改了指南书，但是我在文中所提到的内容依然是准确的。

9. Pollak，同上，第593页。

10. Morgenson，同上。

11.《如何影响一个男人》（“How to Make an Impact on a Man”），《时尚》杂志1989年2月，第177页特别版《如何让男人神魂颠倒》（“How to Attract Men Like Crazy”）中的一个部分。见《男人何以如此》第18~23页。（New York：Berkley，1988），

12. Ronnie Snadroff，《财富500强中的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 in Fortune 500”），《职业女性》（*Working Women*）1988年12月刊。

13.《时尚》杂志，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见Dana Wechsler Linden 和 Matt Rees，《我饿了，但饿的不是胃》（“I'm Hungry. But not for food”），《福布斯》1985年7月6日，第70~75页。1983年的数据是在1985年2月18日采访John Markert时得到的。他是一位独立研究员，是《浪漫时代》（*Romantic Times*）1984年9月刊第18期《让读者感受爱：读者统计档案》（“Romancing the Reader：A Demographic Profile”）的作者。

17. 同上。

18. 同上。

19. 有《利用你的工作找男人》的章节，却没有《利用你的工作找女人》的章节。见Margaret Kent 和 Robert Feinschreiber，《职场爱情：利用工作找到真命天子》。（New York：Warner Books，1988）

20. 同上，第54页。

21. 就这个问题我在1989年至1992年之间问过大约2000名美国和加拿大女性，她们的年龄在25~80岁之间，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

22. 见James Martin 和 Sheila Murphy，《浪漫横行的80年代办公室》（The Romantically Charged 80s' Office），《洛杉矶时报》1988年9月11日。

23. Barbara A. Gutek，《性与职场》（*Sex and Workplace*）。（San Franciscon：Jossey-Bass，1985）

24.《甜点而已》（“Just Desserts”），《新闻周刊》1992年8月10日。

25. 性骚扰立法不仅是对幽默的审查，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幽默。

26. Virginia Adams，《Annapolis的心灵战斗》（“Psychic Combat at Annapolis”），《今日心理学》1980年10月刊，第56~57页。

27.同上。

28.来自Richard Halloran，《军校对身体与心智要求更为严格》（“Military Academies Are Becoming Tougher On Body and Mind”），《纽约时报》1988年5月22日。例如，从海军军官学院毕业的8个班级的女生中，有35%的女生提前离校，男生为23%。

29. Adams，同上。

30. 同上。

31. 该研究由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Richard J. Light主持，名为“哈佛评估研讨会：学生与教员共同探讨教学、学习和学生生活”。1990年3月4日他公开发表了第一份总结报告。见Edward B. Fiske，《关于学习与大学：小团体是如何兴盛起来的》（“Of Learning and College: How Small Groups Thrive”），《纽约时报》1990年3月5日。

32. 见Jack Anderson 和 Dale Van Atta，《白宫委员会遭到审查》（“White House Board under Scrutiny”），《华盛顿邮报》1991年3月18日；Bill McAllister，《总统委员会遭到批评》（“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Carpet”），《华盛顿邮报》1990年12月11日。又见1991年1月23日《硬复制》（“Hard Copy”）新闻节目。

33. Martha Sherrill，《触到神经的神经外科医师：不敏感性切断了斯坦福医学院手术室的两条路》（“Brain Surgeon Who Hit a Nerve: Insensitivity Cuts Both Ways of Stanford’s Operating Room”），《华盛顿邮报》1991年11月6日。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同上。

38. David Brock，《真正的Anita Hill》（“The Real Anita Hill”），《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Spectator*）1992年3月刊，第26页。

39. 同上。

40. 同上。

41. 同上，第27页。

42. 同上，第26页。

43. 同上。

44. 同上，第21~22页。

45. 同上，第21页。John Burke在证词中称："……她的工作能力达不到我们期望的水平……我建议Anita Hill出于对她自己利益的考虑应该去重新找一份工作……她在这里的前途比较有限。"

46.同上。

47.同上，第25页。"后来教育部长Terrel Bell收到Anita Hill的多次举报，声称在该部工作期间遭到性骚扰……这些指控并非针对Clarence Thomas，而是教育部官员……Bell对这些指控一一进行了审核，但是什么也没发现。"

48.Amber Coverdale Sumrall 和 Dena Taylor，《性骚扰：女人大声说出来》（*Sexual Harassment: Women Speak Out*）。（Freedom, Calif.: The Crossing Press, 1992）

第十五章
强奸政治学

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男人全都是。

——《女卫生间》（*The Women's Room*）的作者

Marilyn French [1]

被诬告强奸的男人有时会因此而吸取教训。

——美国瓦萨学院副教导主任[2]

想象一下，和你儿子约会的女人出自瓦萨学院，她认为男人被诬告强奸后可以吸取教训。他假期回家告诉你说，他下学期要去的地方可能是监狱——他一进去就会被里面的罪犯称为“小鲜肉”，你会不会告诉他“被诬告强奸的男人有时会因此而吸取教训”？你纳税支持的学院就因为你儿子生为男人就对他如此无情，你会感觉很好吗？如果你儿子进的是美国空军部队而不是大学，而美国空军部队在研究中发现有60%的强奸指控实际上是诬告，但是他们没有公布这一研究结果，你发现这一点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3]

另外，再想想你的女儿。你知道约会强奸是法律问题。你希望你的女儿能在约会中体会到爱，而不是仇恨。你也知道，如果你女儿被约会的男人强奸了，她对他人的信任也会被强奸。所以大问题在于：怎样做才能让我们的女儿和儿子都认为约会是一种积极的经验？我们不插手就可以了

吗？还是通过刑事定罪（比如，把女人拒绝后仍然继续追求的男人都关进监狱）？或者重新社会化？如果是重新社会化，是意味着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还是把他们需要的东西教给他们？而他们需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呢？

20世纪80~90年代至今，我们一直重点关注刑事定罪。而刑事定罪的重点一直是将男性变成罪犯。我认为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刑事定罪，而是重新定位社会角色：男女双方的角色都要更新，并非只有男性。我们需要将第一阶段的约会过渡到第二阶段的约会——双方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从清扫引导我们目前重点关注刑事定罪的那些错误假设开始。

强奸是男性力量的产物？

传言：强奸是男性在政治、经济层面有力量的表现。

事实：黑人男性被举报为强奸者的概率是白人男性的3倍。[4]

那么黑人是不是突然间有了政治和经济力量？或许强奸并非源自力量，而是源自无力。

强奸是男性暴力的产物？

传言：强奸和性吸引力并无关联，它只是一种暴力行为。[5]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人遭到强奸，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事实：女性在最具有性吸引力的年龄段，她们被强奸的概率至少是50岁以上女性的84倍。[6]

年龄在16~19岁之间的女性遭到强奸的比例是84：20000，而50~64岁之间的女性遭到强奸的比例是不足1：20000。[7]所以，性吸引力确实和强奸有关联。

如果强奸只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它就不应该与其他暴力罪行区分

开来。其他暴力罪行并没有根据遭到暴力的身体部位进行区分。如果要区分的话，应该为容易遭到攻击的睾丸特别制定一个暴力罪名“攻击睾丸罪”，为最重要的头部制定“攻击头部罪”，而且犯了这种罪的人应该得到极度严厉的惩罚。除非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的阴道比女性的头部更重要，否则他们必须承认强奸是一种给予一个身体部位特殊对待的行为，而不只是暴力行为。

如果我们忽略了性吸引力的话，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忽略的是我们在文化上的责任，我们促使男人沉迷于女性的性诱惑力，又要剥夺他们的沉迷。在我们心甘情愿阻止女人从男人对自己的美色的沉迷中获得好处之前——为女人做事、为女人花钱、追求女人，我们不会阻止男人的这种沉迷。

约会强奸是一种罪行还是一种误解？

过去的观点：约会强奸是一种罪行，而非误解。

其他观点：与两个性别都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男人觉得只是做了爱而已，但有可能女人觉得被强奸了。也有可能女人傍晚兴奋时和他发生了性关系，等到早上一觉醒来觉得自己被强奸了——但他并不是强奸犯。或者有一天晚上男人说了“我爱你”，她就会认为那是做爱，如果第二天晚上他没有打电话过来，她就觉得自己被强奸了。再说一次，这并不代表那个人真的强奸了他。

也有可能女人跑回男人的房间，告诉他她真的不想发生性关系，然后开始接吻，接下来发生了性关系，等到早上醒来她真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怎么会这样？接吻就像吃薯片一样。我们说只吃一片，但等到我们发觉的时候已经吃太多了。

女人进入房间时只是说：“我想和你说说话。”但是对方揉抚她的肩

膀，手游走于她身上并亲吻她时，她回应了，她没有用语言告诉对方："我改变主意了。"而是用身体告诉了对方。因此，她说的最后一个字是在对身体接触说"不"。如果他要因为她最后一个字是"不"而承担责任，那么我们就是在让他——而不是她自己——为她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因为没有为她承担责任而变成罪犯，就等于让他为没有对她尽父母之责而承担罪行一样。这不是平等，而是把女人当成孩子来看待。

所有这一切让男人无法确定"听我的话"是指听她嘴里说出来的，还是听她的嘴唇动作表达出来的。

每一次对性行为案件的审判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审判案件的人对这件事不会带来促进作用。陪审团看着女人坐在死气沉沉的法庭上，问她当时的想法，然后假设她做的其他事情都应该由那个男人负责，这样做羞辱的不只是女人，还有性的力量。一个女人在发生了超出预期的性关系之后起诉男人，就像有人拿到比预期的数量多的薯片之后起诉乐事公司一样。总之，约会强奸可能是一种罪行，可能是种误解，也可能是买家反悔了。

要做出改变的是男性吗?

过去的观点：约会的问题出在男人身上，因为实施强奸的是男人，不是女人。

我的观点：问题出在两性的角色分工上。男女的角色分工导致了男女之间的问题——女人的问题是约会强奸，而男人的问题是约会抢劫、不平等的约会拒绝权、不平等的约会责任、约会欺诈和约会谎言。

约会强奸

经过几千年的性选择之后，男女角色为何造成了女性会遭遇约会强奸？

社会角色：[8]

● 社会促使男孩更沉迷于与女孩的鱼水之欢，同时又告诫女孩不要与男孩发生性关系。它告诉所有人性是肮脏的、危险的，会感染疱疹、艾滋病，等等……

● 社会告诉男孩“你要负责做这些‘肮脏’的事情”，这让男孩不被信任而遭到拒绝。

● 年轻男性学着把女人看成性对象，而不把遭到拒绝看成是针对他个人的，这样一来，被性对象拒绝就不会那么令人心痛了。

● 被性对象化的她感到被异化，被拒绝的他觉得自己被伤害了，他愤怒、无力。当拒绝和性别认同紧密相关时，暴力的种子已经撒下了——尤其是那些没有力量来源的男孩们。他的暴力和对女性的性对象化进一步印证了最初的假设：性是肮脏的、危险的，男人是不能信任的。

因此，男性有了性方面的困境：男人通过“不追求性”来证明自己值得信任，这样才能在性方面不遭到拒绝，然而他在“追求性”之前，他在性方面是被忽视的。

要知道，性是需要双方参与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如果我们希望男人停止约会强奸的行为，就必须停止女人的“被动约会”行为。迄今为止，女人还是沿袭采取被动态度和间接主动的老传统，不过她们有了新的选择，她们可以采取直接主动。然而，没有人期待女人采取主动，也没有人告诉女人不采取主动并不是正确的行为。因此，有些女性有了新的选择却没有被寄予新的期望。男人仍被寄予原来的期待却没有新的选择。如果他们没有扮演好原有的旧角色，那么他们就可能进监狱。

“约会强奸”的标签帮助女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出在约会中她们最容易受伤的面向，但是没有标签帮助男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出他们

在约会中最容易受伤的面向。当然，现在最容易让他们受伤的问题是有可能被女人指控约会强奸，而他以为那只是做爱。如果让男人给传统的男性角色打上最差体验的标签，它们可能会是“约会抢劫”“约会遭拒”“约会责任”“约会骗局”和“约会谎言”。

约会抢劫、约会遭拒和约会责任

从很多男人的角度来看，约会的最差体验是约会很像约定俗成的对男人实施的抢劫，也就是说，社会风俗认为他应该掏出钱来交给她用，这就叫约会。对年轻男人来说，最差的约会像被“抢劫”后还遭到了拒绝。男孩们为了避免遭到拒绝而甘冒生命危险（比如参军）。在那些付了钱还遭到拒绝的夜晚，男人觉得自己好像被约会“强奸”了。

很多男人开始拒绝接受约会中对男人的这种不容置疑的期待，拒绝承担这种不平等的约会责任和不平等的约会拒绝权。他们还发现，当账单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女人会消失在卫生间里。男人没有告诉这个世界，因为受到了这种被期待买单的压力，他们会选择自己不太喜欢的工作。这种现状会增加男人的压力，引发心脏病和自杀，这就是男人版的“我的身体，但我做不了主”。他们知道女人有了主动出击和买单的选择，但男人依然被期待主动出击和买单。

约会骗局和约会谎言

如果一个女人说“不”而男人忽略了它，这是约会强奸，那么，一个女人嘴上说“不”但身体在说“要”，那就是约会骗局。而一个女人说了“不”之后继续释放性欲，则是约会谎言。

女人还在这么做吗？两个女权主义者发现答案是“是”。近40%的女大学生承认自己在发生性关系时她们说过“不”，有时甚至“她们的意思是‘是’”。[9]我在工作中接触过15万名以上的男男女女，其中近一半女人是单身，她们的答案也是肯定的。几乎所有单身女性都承认，她们答应去

男性的住处“只是想聊聊天”，但是他吻她时她还是做出了回应。而且她们几乎都说过类似“够了”之类的话，但是她的嘴唇还在亲，她的舌头也没闲着。

我们已经忘记了，在我们将此称为“约会强奸”和“约会欺诈”之前，它们叫作“兴奋”。但不知道为什么，女性喜欢的爱情小说名称不叫《我说“不”时他停了下来》。它们的名字叫作《狂野的爱》，[10]小说女主角柔情似水的情人将她从强奸犯手中救了出来，但是她嫁给了屡屡强奸她的人。这种“嫁给强奸犯”的思路不仅让《狂野的爱》成为畅销书，也是女性爱情小说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在《飘》（史上最受女性欢迎的爱情小说）中，Rhett Butlter将边踢闹边尖叫的Scarlett扛到床上后，他成了女性眼中的英雄，但不是男性的英雄。女人的“是”和“不是”都要受到尊重，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身体说的“是”和口头说的“不”发生冲突时，如果男人选择了“是”而忽略了“不”，不应该将他送进监狱。他可能只是想成就她的幻想。危险存在于幻想和噩梦之间微妙的界限之中。

两性在这方面的感受差异非常大，我只能通过让他们在约会中调换角色的方式去理解对方的感受：让女性约男性出来，并发现男人什么情况下说“不”是永远“不”，什么情况下说“不”是在约会剩下的时间里“不”、什么情况下是几分钟以内“不”，而什么情况下只是慢一点的意思……然后让男人体会一下他们的“不”被忽略之后的感受。

陌生人强奸、熟人强奸和约会强奸的区别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强奸就是强奸，对吧？”不对。一个陌生人用刀指着一个女人强奸了她，和一男一女酒醉后发生了性关系却在早上醒来时后悔不已，两者是不同的。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女人应邀约会时，她并没有选

择要发生性事，但是她确实选择了发生性事的可能性。但被陌生人或者熟人强奸的女人则没做这种选择。从这方面来讲，约会强奸和被熟人强奸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两个词的用法不应该交叉替换使用。

这些复杂性为什么在近10年显现出来？让我们来看看……

让约会强奸频发并只让男人负责的政治学

近一半女性在她们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遭到强奸或者强奸未遂。[11]……在男人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如果正常情况下性是一种男人向女人做的事情，那么将“是”当成同意的信号就是一种误导。[12]

——Catharine MacKinnon，Tom Brokaw主持NBC节目时请她作为唯一的嘉宾对Clarence Thomas听证会进行分析

Catharine MacKinnon是美国女权主义法律领域的领军人物，是约会强奸方面的专家。她说，一个女人说“是”的时候不能认为这是她真正的想法。为什么？因为她是为了生存而被迫说的“是”。[13]如果一个女人在她说了“是”的情况下也能认定强奸成立，那么MacKinnon说“近一半女性在她们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遭到强奸或者强奸未遂”就很好理解了。

一份由《Ms.》杂志发起的调查称，所有女人中有25%的人在大学期间遭到过强奸，这一结论被广大媒体大肆传播，[14]25%的数据是通过下面这个问题得出的：[15]

你是否在不愿意但由于男方不断劝说和施加压力之后，因为压力太大而最终发生了性关系？[16]

注意，这些女人并没有说自己被强奸过，只是“压力太大”。她觉得“压力太大”的原因可能是她害怕自己说“不”就会失去这个男人。所以说，她可能是为了留住他而说了“是”。只有用这种方式扩大对强奸的定义时，也就是说将说过“是”的女人也纳入受害者，我们才会发现强奸行

为“增多”了。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女性并不一定觉得自己被强奸了呢？因为她们其中有42%的人称，她们和那些男人发生关系之后又发生过一次或多次关系（平均数为2.02次）。[17]

当然，这些问题都和男人在约会强奸这个问题上遇到的困境并不相同：我们还是要求男人在性方面主动出击，但是现在他们把这件事做好了之后我们又把他们称为“强奸犯”。

实际上，男女双方都参与过自己不希望发生的性行为。一位女权主义者大胆地向男男女女们问了很多类似问题，结果她惊讶地发现，有94%的男人（和98%的女人）表示他们在大学期间有过自己并不希望发生的性行为。[18]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她发表在《性研究期刊》（*Journal of Sex Research*）的结论：有63%的男人和46%的女人声称自己有过不想发生的性关系。[19]根据女权主义者将不想要发生的性关系归为强奸的定义，实际上每个人都被强奸过。因此，强奸好像成了一种频频发生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强奸问题遭到了轻视。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看到这个数据后对我说：“我很难想到男人可能不想和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具体实例。”为什么想不出来？如果男大学生发觉女生可能会把发生性关系理解为一种承诺而他还不想给出的话，他就会害怕发生性关系。无论如何这件事还是会发生，因为在女方讲清楚性关系就意味着对她的承诺之前，他迫切地想要做这件事。而且由于心中激情澎湃，他不知道如何开口说“不”。其实正是因为男人害怕第二天打电话会进一步误导女方，所以没有打电话。而发生性关系后女方没有接到他的电话，觉得自己被拒绝了，于是她有了被“强奸”的感觉，而且有时候真的会报警称自己遭到了强奸。

和女人一样，双方都喝醉了或者筋疲力尽的时候，男人开始并不想发

生性关系，但有时候会害怕拒绝对方因而仍然发生了性关系。

那么发生强奸的概率到底是多少？有一份全国家庭调查给出了最接近的答案，这份调查中所有女性都是匿名的，她们被询问“是否被强奸过”“是否报过警”。结果显示，有1/3的女性遭到强奸后没有报警，约一半女性没有举报过强奸未遂。[20]我们把这些人和报过警的女性加起来之后发现，有1/25的女性一生中遭遇过一次强奸，有1/23的女性在一生中遭遇过一次强奸未遂。[21]

这种越来越扩大化的强奸定义是否会影响较为客观的政府调研结果？有可能。例如，在William Kennedy Smith和Mike Tyson的约会强奸案审判之前，司法部发现1973年至1988年之间强奸率和强奸未遂率下降了33%（女性遭到强奸的比率从1000：1.8下降到1000：1.2）。[22]审判之后，女性开始认为，只要她们觉得自己是被迫的，那么她们就是被强奸了，然后司法部发现强奸率和强奸未遂率开始增长了。[23]

对于这种广义的“约会强奸”的法律定义，法律就像设置88公里/小时的限速，让每个人都成为违规者，却忽视了真正的违规者。但这种“开车的人都违规”的限速法律至少男女都适用。而“所有约会的男人都可能是强奸犯”的法律只适用于一个性别。这些法律带有性别歧视。广泛定义强奸的法律很像为男人制定了88公里/小时限速，但不对女人限速。

每一次有人将强奸率的增长夸大其词时，每个女人都更加害怕深夜走在大街上。这也增加了女人对男人的不信任感。总之，夸大其词的说法会伤害女人。将强奸率夸大其词或许在政治层面上是好事，但对想要爱上男人的女人是坏事。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女人，不是我对解放的定义。

如果男人和说“是”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他是否会被判强奸?

词条：1990年，美国威斯康星州。Mark Peterson被判性侵一位经医生鉴定有46种人格的女性。[24]她声称，其中一个6岁小女孩的人格事后告诉她自己刚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她指控Mark Peterson性侵了她。这个女人以6种不同人格的身份被传换到证人席上，其中4种分别当庭宣誓。她承认当时那个“爱玩”的人格并没有拒绝该性行为。

雪上加霜的是，Mark Peterson以罪犯的身份出现在全国媒体上。他的强奸罪名在社区内广为传播。有人对他进行任何调查时他的犯罪记录都会被翻出来，然后他就要解释过去发生的事。与此同时，那个女人并没有被媒体曝光。威斯康星州的男人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遇到她或和她一样的人。

我们希望男人发现哪个“不”是真的“不”，现在我们又希望男人知道哪个“是”是真的“是”。不对，我们不只希望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我们就会判他有罪。

这个具有多重人格的女人说“是”的时候可能是“不”的意思，她的故事应该就是印第安老人讲给即将成年的男孩们听的故事。这是一个古老的印第安传说，它是一种隐喻，用于告诫男孩们，女性散发的混合信息会让他们很无助。然而，这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法律诉讼案件，这一案件的审判被认为是法律上的进步。不过，它是当今法律系统保护女人、控诉男人到何种地步的一个象征。如果一个女人在法庭上对《圣经》发誓称她说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又发誓称她说的是另外的意思，我们判那个男人有罪，因为除了她做过的事情，他不知道她还有其他想法。这不正是一个告诉男人女人只有权利而男人只有责任的完美隐喻吗?

这个多重人格的诉讼案是否象征着一个新的现实？是的。在整个美国，那些目前所谓的“进步”大学，从伯克利到哈佛和斯莫斯沃尔，已经

允许醉酒女生在第二天指控强奸，即使前一晚她说了“是”！[25]简单地说，你儿子可以和喝了点小酒的女生发生她想要的性关系，到第二天一早醒来之后，她可以说你儿子强奸了她，因为前一晚她受了酒精的影响，那个说“是”的是她另外一个人格。

美国婚内强奸与约会强奸交流中心的MacKinnon和其他女权主义者打算将这一概念扩展到校园以外——扩展到刑法中去。[26]这在法律上可行吗？可行。很多州已经立法规定一个人在“受到了影响”——如果致使他们的判断能力下降的话——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其有同意做某事的能力。

一旦一个女人可以声称自己“受到了影响”因而她说的“是”并不是真的“是”，就等于打开了防洪闸。我们已经看到，Sheryl Lynn Massip的“抑郁症”成了用车碾过儿子脑袋的合法理由。一个女人可以称自己被强奸了，因为她受到了离婚创伤或者重病子女的影响，或者只是压力太大。甚至一个男人在前一晚暗示想要和她发展长期的恋爱关系，也可以说成让她“受到了影响”。（“他第二天早上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就知道他在骗我了——如果我觉得他不想给我承诺的话，我是不会和他睡觉的。昨天晚上他说他爱我，我受了他的影响。他骗了我，他强奸了我。”）

在一个平等的时代，我们没有让她负责，因为她喝醉了，但即使他也喝醉了，我们也会让他负责。女权主义开创了这种新的不平等，真是讽刺。

当然在性方面，两性确实不平等。正是因为女人在性方面有更大的力量，所以常常令男人害怕遭到她的拒绝。为了减轻这种恐惧，有时他会买醉。实际上，她的性力量常常让他迷醉，但是他的性力量很少让她迷醉。如果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她的力量比他的大的话，那就是他被期望掏出钱包帮她买醉，但没有人期望她帮他买单。总之，很多男人在看到漂

亮女人那一刻就感到自己“受到了影响”。

这种“受到了影响”的法律——或多重人格的法律——很有可能给女人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女人购买香水就是在影响男人。女人会嘲笑男人成了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我们看到几乎所有文化都促使男人沉迷于年轻女人的美色，这样他们就会在“受到了影响”时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决定。在“受到了”美色“影响”时，判断能力下降的是男人。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为醉驾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女人为醉酒后的性爱承担的责任却越来越轻。当然，如果她醉酒之后只是发生了性关系而已，那么那是她自己的事。但是如果她醉酒后称那个男人强奸了她，那么她就是在伤害一个男人。这种伤害有时会持续一辈子。因此，她应该和酒后驾驶造成事故的司机一样为酒后声称强奸负责。[27]

女人喝酒之后说“是”和“不”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女人正喝着酒，而且不论她的语言还是身体都说着“不”，那么这个男人就应该负责。如果她在酒后说了“不”，他就应该为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负更多的责任。

这个社会让男人去做性爱推销员，而他们推销工作做得很好时又只把男人送进监狱，这种做法是一种性别歧视。如果其他推销员为客户买了酒、最终成功地把客户的“不”变成“可能”，又变成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推销员送进监狱。如果客户自己喝醉了而且说“是”被证明是一个坏决定，那么被炒鱿鱼的应该是这个客户，而不是推销员。我们希望成年人能负起责任。

被错判的男人是否算被强奸过?

如果一个女人说她遭到了强奸，我们就应该听她诉说，在她身旁支持她、相信她，帮助她挨过过渡期，让她能够在余生重新建立起对他人的最

大信任，这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在受到伤害时都更需要别人倾听他，给他爱——包括帮助他解决问题。

当一个男人说自己被诬告强奸时，他也是在告诉我们他被“强奸”了。他被自己一生中遇到的最卑鄙的人控告了。即使控告他的是一个在审判前承认自己撒了谎的未成年少女，这个男人的一生也可能会毁于一旦。比如Grover Gale。

一位年仅13岁的北卡罗来纳州女孩指控Grover Gale强奸了她4次。[28] Grovel Gale被关押了36天，期间他丢了建筑工的工作还欠了债，他没钱帮家人付房租，婚姻濒临破裂。之后，这个女孩承认这一切都是她杜撰的，她只是想引起她17岁男友的注意。[29]她的名字至今未公开过。

然而，当Grover Gale从监狱返回家中时，他的儿子不敢拥抱他。不论他走到镇上的哪个角落，都会有人对他指指点点，还给他取名“强奸犯”和“娈童变态者”。他走进商场时，有人朝他吐口水。虽然身负债务，但是他们不得不搬了家。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州，在一个没有人知道他的小镇上住了下来。两年之后，他仍然身负1.5万美元的债务，包括保释金、庭审费用和他永远也还不上的欠租。

Grover不知道自己是应该上诉还是应该忘掉此事。当他试着遗忘时，内心总是被愤怒填满。有时他会突然怒气冲冲地冲出家门、跳进车里，开车在乡间公路上毫无目的地乱窜。他会停下车，然后不断地踢自己的车，直到他冷静下来。他说：“从那时开始我已经迷失了自己。”他的妻子只要一提起这起诉讼，就会哭泣不止。[30]

Grover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失去了妻子。他被“强奸”了。然而他付不起咨询服务费，州政府也不会付钱让他去接受心理咨询。心理学家们害怕惹上官司：“如果你不把他当成强奸犯来对待，但他后来犯了强奸罪，你会被起诉，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强奸犯来治疗——作为一个心理学

家你应该早就知道才对。”[31]

一个男人一旦遭到控告，任何审判都无法抹去他内心的阴影。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称William Kennedy Smith医生为“医生”。他被指控强奸时，新墨西哥州大学医院内科暂停了他的职位。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他被无罪释放之后，新墨西哥州大学决定不了是否该恢复他的职位。[32]审判之后，这个阴影仍然伴随着他。

Grover的案子是例外吗？诬告强奸的案例很少，对吗？

诬告强奸的案例很少，对吗？

我们发现强奸案中至少有60%是诬告，这让我非常气愤。

——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处特工督查

Charles McDowell博士[33]

美国空军对556起强奸指控进行了调查，最终有27%的女性承认她们说了谎（包括参加测谎测试之前承认自己说谎和测谎测试失败的人数）。[34]空军任命了3位独立调查员对其他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审查期间他们采用了承认诬告的女性身上共有的25条标准。如果3位调查员都认为某个强奸指控是诬告，那么该案件则被认为是诬告案（这些女性都没有被判有罪——只是参与调查而已）。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所有指控强奸的案件中有60%是诬告。

特工督查McDowell博士是审查Cathleen Crowell Webb控告Gary Dotson强奸案的调查员之一，而事实证明此案确实是诬告。Webb对他的分析印象非常深刻，并把他的分析作为附录收入在她写的《原谅我》（*Forgive me*）一书中。[35]尽管如此，McDowell博士害怕发表这一结论，他认为它们或许只能代表部队中的这一现象，如果发表了这一结论或许会误导读者，所以他又调查了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城市和一个西南城市的警局档案。60%的

强奸案为诬告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但是他们要求匿名发表结论，因为他们害怕引起政治动荡。

大部分县市都不对外公开他们的档案。他们一般都会将诬告案，也就是说女方承认自己说谎的案件归类为“证据不足”（而不是诬告），也就是说这些案件和其他因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而无法判决的档案是被归为一类的。华盛顿的一些县区向《华盛顿邮报》公开了他们的档案之后，《华盛顿邮报》发现，其中最大的两个地区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村和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各有30%和40%的诬告案或“无证据”强奸案件。[36]（相反，诬告入室盗窃、抢劫和盗车的案件在1%~5%之间。[37]）

媒体刊登了FBI发布的《统一犯罪报告》（*Unifrom Crime Reports*），其中称强奸指控中只有9%为诬告或证据不足案件。这个结论不是和上面的数据相互矛盾吗？[38]并非如此。FBI掌握的数据包括声称自己遭到强奸的女人，但没有关于被指控者有罪还是无罪的数据。有47%的强奸案中的被指控强奸者身份无法确定，要么没有找到他们，要么找到了他们但没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们。[39]剩下的53%的案件中，嫌疑人被逮捕，但是FBI没有收到任何数据显示他们最终是被判有罪还是被无罪释放。[40]总之，根据FBI的数据，诬告强奸的比例可以是0~100%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

每一个遭到诬告的男人其实都在情感上遭到了强奸，诬告也常常使他的经济状况遭到强奸。1993年，一位女性谎称自己在诺德斯特龙商场被强奸了，结果实验室发现没有证据支持她的陈述（因此迫使她承认自己说了谎），[41]但在此之前，诺德斯特龙商场已经更换了10个州内72家商场的安保系统。诺德斯特龙商场作为受害者在全国媒体上臭名远扬了两个礼拜，但是施害者的名字是保密的。地方检察官拒绝对这位女性提起诉讼，但是没有人对诺德斯特龙商场给予赔偿，也没有人对到诺德斯特龙商场购物并为

此付出代价的人给予赔偿。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诬告并不罕见，诬告本身就像一种强奸，它们也是一个政治难题。一个女政治家无疑要非常正直才能正视这个问题。但是具体的诬告率数据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法官和陪审团都应该认识到：男女都有可能是受害者；在约会强奸案中，其实有可能发生了误会；女性可能会害怕提出指控；即使男人被判无罪，他的生活也可能毁于一旦（失去工作、妻子和孩子）。因此，男女双方都应该遵守正当程序（以防强奸受害人保护法保护女性多过保护男性）。

女人为什么要诬告男人强奸?

我第一次听说“约会强奸指控”这一说法以及存在诬告的可能性时，我个人的反应是：“很多男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不’是真的‘不’，而且如果没有一点证据的话，女人为什么要诬告别人强奸？”然而，在纽约州州长被Tawana Brawley谎称的轮奸（结果是场恶作剧）愚弄，伊利诺伊斯州州长在DNA检测结果显示Gary Dotson无罪却拒绝重审该案之后，我觉得我必须扩展自己的思维了。这让我很想知道诬告强奸的动机是什么。

《华盛顿邮报》在一项调查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诬告动机。[42]很常见的一个动机是生前男友的气。在Kathryn Tucci承认自己说谎之前，她的前男友已经在监狱里待了13个月了。后来Kathryn接受的惩罚是社区服务。可能最常见的动机是小女孩需要给父母一个晚回家、在外过夜或者怀孕了的理由。

一个女人曾指控送报纸的人用枪威胁她然后强奸了她，因为她需要一个上班迟到的原因。这是她那一年第二次谎报强奸了。第一次谎报时她没有被惩罚，所以她认为再干一次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第二次确实产生了

一些后果：她接受了心理咨询。[43]

空军的研究结论只包括笼统的动机：

承认自己诬告强奸的女性的诬告动机[44]

原因	比例
怨恨或者报复	20%
为了补偿自己的内疚感或者耻辱感	20%
以为自己怀孕了	13%
为了隐瞒外遇	12%
为了考验丈夫对自己的爱	9%
精神障碍/情绪失常	9%
为了逃避个人责任	4%
没钱付款，或者敲诈	4%
以为自己染上性病了	3%
其他	6%
总计	100%

McDowell博士发现，大部分诬告都是“工具性的”——它们都服务于某个目的。如果目的不是逃避内疚感或者报复他人，那么就可能是一个借口，她可以用来告诉父母：“我没有故意要出门还把自己搞怀孕了——我是被强奸了。”或者要告诉丈夫：“我没有外遇。这不是我的错……我被强奸了。”[45]

社会对这样的女人——在发生性关系之前没想清楚——存有偏见，这使得一些女性为了避免这种偏见而故意诬告。空军部队在研究中发现了这起案件：

一位22岁的女兵参加了一个聚会，聚会期间她和同伴发生了性关系。她承认自己当时喝醉了，但是接着就开始感到非常羞愧，因为参加聚会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她决定说自己被强奸了。[46]

过去，女人可能要为性关系发生得“太快”而负责，而约会强奸罪给了她一个出口。她可以将罪恶感和羞耻感转嫁给男人。这个社会需要面对

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有必要给她们制造罪恶感，是否有必要揪出应该受到指责的人？

不过，如果男人不遵守承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指责。如果指控男人约会强奸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让整个美国海军部队感到害怕，而不敢调查女人是否在通过控诉的方式来逃避责任、不敢指责男人不遵守承诺，那么我们就是在为最不负责任的女性创造诬告的动机。

Kermit Cain是我的一位朋友，1980年他被选为“年度水手”，他发现自己的职业会让他成为这种动机的受害者。当时他和一位女队员约会之后回到了他的住处，Kermit说：

我告诉她说我要上楼回自己房间。她跟着我一起上了楼，门刚一关上，她就把大部分衣物都脱掉躺倒在我的床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她的住处。

过了几个星期，我被叫到部门长官的办公室，他们告诉我我要坐牢了，也没有解释我的罪名，只是说“你如果还要这样，只能增加你的刑期”。之后，司令部的内务长官开始询问我接触过的每一个女性，告诉她们我是一名强奸犯，暗示这些女性如果她们举报了我的话，他们会保护她们。我被诬告的案子又增加了两起，他们让那些女人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对的。

律师都不受理我的案子。所以我和我爸爸一起调查了3年，发现那个女孩曾为了逃避药物检查而擅离职守，此前她有一次未通过药物检查，而且她知道第二次没有通过会导致被撤销军职。她回家之后，她的父母问她为什么离开了军队，她说她被强奸了。她妈妈打了电话给一位国会议员，然后这位议员又打电话给立法事务办公室，办公室打了电话给指挥官，指挥官又打了电话给上校……

这个女孩的3个室友之一看着我的变化（当时我体重下降了将近23公

斤，濒临自杀），觉得我很可怜，于是告诉我她无意中听到的事：那个指控我的女孩和她的室友兼情人一起策划了整个事件，以此作为逃避药物检查的理由。她告诉我，她们在策划时说说笑笑还拿此事开玩笑。至此我才知道事件的一部分真相。

我的证据非常确凿，调查完成之后我找到了一位律师帮我。我们找到海军调查处时，发现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证词证明我无罪，却拒绝将证据直接交给我的律师，我们必须自己去找证据。只有在走完这个程序之后对我的指控才能解除。我恢复了原职，但很明显我的职业生涯已经毁了，若非如此，我的事业将是另外一番景象。如果我没有遇到Susan（他和她目前在一起生活），或者如果控告我的人的室友没有意外听到她们的计划，或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父亲没有帮助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今天。[47]

Kermit的经验让我知道，个别女性会启动“男性保护者机器”，这部机器因为害怕不能保护女性而粉碎了最基本的人权，同时又落入一个陷阱：为了不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傻瓜而帮助女人掩盖更多的谎言。男性的沙文主义是在保护女性。这是男性沙文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共同点。

保护女性不让她们承担责任并不是军队保守派的专利。在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和斯莫斯沃尔大学，女生晚上喝着男生为她买的酒，醉酒之后二人发生了性关系，等到第二天早上，女生可以称自己被强奸了，因为醉酒后她没有同意的能力。[48]社会期待男人来支付酒水账单，现在这一行为成了他给她“灌”酒然后把女人“骗”到床上的证据。目前，这一行为被视为男人是施压者而女人清白无辜的证据，尤其是在一些开明的大学里。

有人可能认为，拥有最优秀最聪明的女生的大学应该率先教会女生约男生出去、采取主动、为男生付酒水钱……为她们将来管理自己的事业

（和生活）做准备。相反，他们在把这些女生当作无法承担责任的孩子来看待，同时又教男生承担所有责任。然后，这些大学又在女人事业不及男人成功时责怪职场中存在歧视。

诬告强奸的社会动机

现在，诬告强奸不再只是女人逃避内疚感、逃避对不遵守承诺的指责和实施报复的手段。我们还在为诬告创造积极、主动的动机，因为女人指控男人强奸之后，甚至在审判之前她们就被塑造成女权主义英雄（就像TaWana Brawley和指控Tyson和Smith的人一样）。

除了以上诬告的动机，现在还出现了3种比较隐蔽的社会动机：（1）金钱动机；（2）堕胎的动机；（3）电视的影响。

金钱动机

词条： 11位参与美国黑人小姐选美大赛的女性都声称Mike Tyson摸过自己的臀部。因此，选美大赛的创始人向Mike Tyson提起了诉讼，包括6.07亿美元的赔偿。最终有一部分参与者承认她们撒了谎，因为她们希望能够借此提高曝光率并从中大赚一笔。[49]

想想看，如果每个女性都有可能分到2000~3000万美元，我们难道不是在向她们行贿让她们诬告吗？同时，美国黑人小姐选美大赛也因此得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曝光率。这些诉讼事件成了轰动性的头条新闻，但诉讼撤销的消息只出现在了背页。

如果诉讼初始阶段和最后的结果不能得到同等关注，被告的个人形象就会受到影响。这种因素再加上Tyson已经劣迹斑斑的形象，致使他被美国黑人小姐选美比赛的一位参与者（Desiree Washington）指控他约会强奸后，更容易被判有罪。然而，如果当时的新闻头条有“黑美人被重金收买”这样的表述，这个可能性就会小一些。

我们常听说，女人犹豫是否提出性骚扰和约会强奸诉讼时，原因在于害怕别人不相信自己、私生活会受到干扰、身份会被曝光，等等。对大部分女性而言，这是事实。但是对部分女性则不然。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几个女人就可以把约会变成雷区——不仅男人会遭到拒绝，还会有毁人一生的官司。如果约会变成了男人的雷区，男女都得忍受寂寞的痛苦。

堕胎的动机

词条：为了堕胎，Norma McCorvey，即“Roe”案中的“Jane Roe”，声称自己被强奸了。14年后，她承认自己撒了谎。[50]

如果一个少女只有在声称自己遭到强奸的情况下才能堕胎，她就会被迫声称自己被强奸了。另一个问题是：“谁强奸了你？”接下来便是一串男性的名字。这破坏了一个未婚少女的美好未来。再接下来，媒体会判他有罪。如果他想起诉对方诽谤，那么他只是给了那个女孩一个永远不承认自己诬告的动机。如果他不提起诽谤诉讼，那么他会无力反击。自我辩护会失败，而不为自己辩护同样会失败。

我们可否允许女人说“我要堕胎，因为我被强奸了”，但不用找出强奸犯？不可以。这和一经要求即可堕胎一样会带来负面影响，女人会撒谎，而强奸率也会急剧上升。

当法律认定“因乱伦怀孕以外的堕胎都是违法的”，女性为了堕胎就会被迫举报家庭成员——一般是她的父亲、继父、叔伯或者兄弟，这不利于家庭团结。

同时，即使后来女性承认诬告，但被诬告的男人也会失去工作和名誉。就像Jane Roe，她只是为了堕胎而“不得不说自己被强奸了”。通过控告一个男人来解放一个女人，我们真的比那个时期——通过指控黑人来解放白人——更进步吗？过去让两个种族相互猜忌的事物，现在使男女双方相互猜忌。它发生在黑人身上时，我们把它叫作“种族歧视”；当它发生

在男人身上时，我们把它叫作“妇女解放”。

现在的难处在这里：每一起诬告案都让警察和法官质疑，那些女性是否真的被强奸过。

电视的影响

词条：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年仅9岁的小女孩称她妈妈的男友Ivie Cornell Norris强奸了她。Norris在佛罗里达州拉斯县的监狱里待了513天，本来可能下半辈子都要在那里度过了。为什么他被释放了？因为这个小女孩11岁时，她说服很多人相信她说了谎。[51]

她为什么要说谎？她妈妈和Norris经常争吵，而她希望“赶走”Norris。年仅9岁的她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说服力？因为她看了电视剧《龙虎少年队》（*21 Jump Street*），她的证词是根据其中关于强奸案的一集杜撰的。

同样，在海军部队的女性诬告强奸案件中，也有一起照搬了前一晚她从电视剧中看到的强奸情节。[52]法庭发现她描述的情节前后矛盾之后，她才主动交代自己照搬了电视剧上的强奸情节。这个女人的动机是什么？她希望丈夫关心她。

男人对抗女人的政治学

提起Gary Dotson这个名字，大部分人都会想起他被诬告强奸。没有人意识到，Cathleen Crowell Webb指控Gary Dotson时人们马上就相信了她，但是当她说Gary是无辜的时候，人们并不相信她所说的。让Gary获得重审机会的是五个惊人的巧合。倘若其中任何一个巧合不曾发生，那么Gary Dotson都会被判刑25~50年。

第一个巧合是Cathleen的良心发现。她被内疚感折磨。这时她才承认自己捏造事实的目的是掩盖和男友发生了性关系。

第二个巧合是DNA检测证明Webb内裤上的精斑并非Dotson留下的，却和Cathleen当时的男友的精子吻合。然而，尽管足以使Dotson定罪的两个证据——Cathleen的证词和“Dotson”的精斑——已经被推翻，Dotson并未获得重审的机会。想想看，如果一位杀害男人未遂的女性被关进监狱，但是那个男人后来承认自己诬告那个女人。这个女人会得不到重审的机会吗？

第三个巧合是两位出色的记者及时对Dotson的案子进行了大起底。

第四个巧合是一位知名律师愿意为了这位已经被判刑的强奸犯辩护。

第五个巧合是最让人惊讶的。最开始法官拒绝批准重审Dotson案，但此时正值州长Thompson再度参与竞选。由于他曾任伊利诺伊斯州罪犯审查委员会的检察官，所以他有足够的信誉对这起案件进行特殊的公开“审理”——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应对法官拒绝重审的做法。

州长的公开“审理”成了一部现实版的肥皂剧。公众日益感受到Cathleen和Gary的痛楚，他们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此时州长认为他可以采取一些政治措施，但不会自毁前途。尽管Dotson在监狱期间完成了高中学业并开始了大学的学业，但是Thompson认为他应该“强硬”一点，让Dotson获得假释。

我知道，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那么她会被视为受害者，遭到了男性的不公平判决。如今，她克服了重重困难，被世人赞为英雄。我知道，各种节目会竞相把她的遭遇制成电视电影，然后她会因此得到几十万美元的报酬。尽管Dotson案是此类案件中最知名的一个，而且包含了所有肥皂剧的元素，但是拥有Cathleen故事版权的John Hoover发现，在将这个故事拍成片子时遭到了女权主义制作人的内部抵制，他找不到大型工作室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53]最令他惊讶的是，有很多女权主义制作人至今也无法接受此案的结果——一个女人会谎称遭到强奸。

最让人发人深省的是一个16岁的女孩声称遭到强奸时人们很自然地相信了她，但是她承认此事并非事实时人们不相信她了——此时她已经23岁，心智已经更为成熟。Cathleen在她的《原谅我》一书中也表示，这种差异令她感到很惊讶。[54]

在经历了12年的噩梦之后，Gary终于被释放了，那么他对Cathleen持什么态度呢？Dotson说："我很久以前就已经原谅她了。我已经不恨她了。"（我无法确定哪一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是男人原谅他人的能力，还是男人压抑自己情绪的能力。）

在CBS电视台上午的脱口秀节目中，Phyllis George要Dotson和Webb拥抱。想想看Dan Rather会要一个女人去拥抱强奸自己的人吗？

关于诬告的发现是否激励了法官们要求陪审员注意有罪判决必须"排除合理怀疑"？没有。目前加州要求法官明确告诉陪审员，强奸罪的定罪可以只建立在原告的证词上，无须进一步求证。[55]

强奸案保护法的双重标准

强奸受害人保护法保护女性的性史在法庭上不遭到询问，但不保护男性的性史在法庭上不遭到询问。相关法律第一次由女权主义者提出时，公众认为它公然违反了宪法关于正当程序的规定（因为它对审判中的双方提供了不平等保护，否定了其中一方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它也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权条款，因为它对男性的保护小于对女性的保护。

然而，随着人们越来越被"女人没有动机谎称遭到强奸"这一说法说服，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声称遭到强奸的女性被认为已经遭到了实质的伤害，所以倘若在法庭上搬出她的性史就会给她带来双重伤害。法庭开始相信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女性应该得到额外的保护才算是平等保

护。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最高法院将这一提议正式制定为这个国家的法律。[56]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谎称遭到强奸的动机不仅有很多，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社会诱因。同样重要的是，诬告强奸本身也是一种强奸的形式。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知道在审判中给予女性比男性更多的保护，避免追问她们的性史，是违反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法的做法。审判的目的在于确定强奸是否真的发生过，而不是假定审判中谁需要这种保护。律师的职责是让法官相信一个人的过去与现在的行为是有关联的。法律的职责不是假定女性的性史不能再遭到询问而男性的却可以。

从实际的操作来看，当一个女人指控一个男人强奸时，FBI或者警察会找出这个男人性史中的女性，告诉她们他被指控强奸，询问她们是否也感到自己被他强奸过，如果她们有人说："可能有一次……"就会有人鼓励她们作证，"以防此事继续发生在其他女人身上"。与之相比，在最高法院最近裁定的一起案件中，他甚至不能出示此前她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证据，除非他提前通知法庭以便于她应对。[57]

而且，实际上在审判期间，女权主义者在电视上告诉公众，唯有在强奸案中，受害人才不被他人相信。这种说法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我们尚不知道受害者是谁。在刑法中，声称受害的人一般都会遭到合法怀疑，而且相关证据也会被交互诘问，直到排除合理怀疑后被告被证实有罪。这就是自由和独裁的区别。一旦我们忽略了被告的宪法保护权，我们有的就只是麦卡锡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猎巫行为。

强奸受害人保护法被宣布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不会怀疑一个声称自己遭到强奸的女人。但是相反，没有人想为一个有可能是强奸犯的人辩护，除非他是我们所爱之人。在女性被强奸的案件中，最邪恶的男性和最无辜的女性成了最典型的对照。我们最初的本能都不是

替最邪恶的男性辩护。

保护原告身份和公开被告身份的违宪行为

在William Kennedy Smith遭到指控的第二天，他出现在所有新闻媒体和所有电视台银幕上，出现在超市中，出现在家家户户的卧室中——大部分人看见他的次数比看见自己家人的次数还要多。然而原告身份却是保密的，即使人们今晚在酒吧遇上了她，也没有人会认出她。他们假设受害者需要保护。但这是在审判前就假定她是受害者。如果我们知道她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进行审判？如果一个男人是被诬告的，他才是受害者。如果审判的目的是确认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谁是受害者，那么为什么我们只保护她的身份？

其他案件中则不会保密原告的身份。如果一个男人指控Kennedy夫人企图谋杀他的话，他的身份会保密吗？保护女性身份并通过曝光男性身份的做法会害了男人一生，即使最后他被判定无罪。真的是这样吗？在Kennedy Simith案审判之前，如果你的女儿打电话告诉你，她正在和Kennedy家族的人约会，你会是什么感受？那么你现在有何想法？

法律是否保护被女人强奸的男人？

词条：一位女保姆承认自己和一位她照顾的12岁少年保持了6个月的性关系。她没有被判刑，一天也没有。法庭判她缓刑，她只需要帮那位少年支付500美元的心理咨询费。[58]

这个被定强奸罪的女人被释放后并没有引起民众不满。这起案件发生在1992年，同一年，Mike Tyson被判刑6年。

成年男性是否会遭到女性的强奸?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我们允许男人把强奸定义为不希望发生的性行为——就像女人声称的那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94%的男人称自己在大学期间发生过不希望发生的性行为。[59]姑且不论诬告强奸，来看看女人会通过什么方式“强奸”成年男性。

技术型强奸

我们常说男人不可能被女人强奸，因为男人想发生性关系需要先勃起，而“勃起的男人显然是‘想要’，所以说那不算强奸”。和男人需要勃起一样，女人需要阴道润滑，但是被指控强奸时，男人不能说：“是的，法官大人，她说了‘不要’，但是她很湿润，显然她很想要，所以这算不上强奸。”

勃起——或者湿润——通常是一个人性兴奋的标志，但不尽然。男人深更半夜时可能会勃起，但会因为筋疲力尽而不想做爱。如果一个婴儿勃起了，我们就可以跟他发生性关系了吗?

避孕法强奸

或许成年女人强奸男人最常用的方式可以被称为“避孕法强奸”。如果一个女人可以在晚上同意发生性关系但第二天早上认为自己被强奸了，那么一个女人当时说自己采取了避孕措施但第二个星期说自己可能怀孕了，那么这个男人可以认为自己被“强奸”了。如果她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都要把孩子生下来”，那么这类强奸会“囚禁”他一生。为了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他不得不从事自己不是很喜欢的工作，这种情况往往会增加他的压力并令他早逝。她做了一个和他有关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关乎他的身体，那么这件事也就是他的事了。如果这个决定未经他的同意便侵犯了他的身体，那么这就是强奸。

当男人强奸男人时，依然有受害人，但是……

男人被强奸大部分发生在监狱里。但是在监狱之外，也有大约9%的强奸案是男人遭到强奸（可能大部分是男人作案，但无法确定）。[60]即使是在监狱之外发生的强奸案，男人面临着和女人一样严峻的艾滋病问题——死于艾滋病的人群中约有10%是女人。[61]我们听到关于男性遭到强奸的新闻多还是女性身患艾滋病的新闻多？

然而，真正遭到忽视的问题是监狱里发生的男性强奸。一方面是因为他受到的创伤，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在监狱中被其他男人强奸过的男人出狱后更容易强奸女人。[62]电影《黑帮大时代》（*American Me*）将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刻画得非常生动。如果我们关心女人遭到强奸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在监狱里的男人都经历了些什么。

自他们被关押在拘留所等待审判的那一刻起，就会被其他犯人视为“小鲜肉”，他们很容易遭到强奸。我们对自己说：“好吧，这是一个男人和另外一个男人做而已，毕竟他们身在监狱。”但是被其他男人强奸并不能让强奸受害者感到欣慰，或者说，被那个强奸自己的人常年称为“同性恋”或者“基佬”并不能会让他有性安全感。这些男人中有很多人成了“庞克”（Punk）——监狱暗语，意指“性奴”，第一个强奸他们的人将他们租赁给其他男人，以换取毒品或者其他东西。很多人遭到轮奸。很多人被其他犯人用拳头或扫帚柄插入肛门，直至肛门撕裂。[63]

每年在监狱和拘留所内遭到强奸的男性数量和在监狱外遭到强奸的女性数量不相上下。[64]和监狱外遭到强奸的女性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给予在监狱内遭到强奸的男性同样的重视，所以我们只能从最近一项相关的研究（加州监狱1982年的研究）结果中看到相关的数据。如果14%这个数据接近正确值的话，那么每年约有100万男性在拘留所和监狱中遭到强奸。[65]相比之下，每年约有12万女性在监狱外被强奸或强奸未遂。[66]

如果女性在狱中被其他女囚强奸的比例和男性的相同，[67]我们很快就会指出这种行为违反了宪法第八条修正案中禁止采取“残酷和异常的惩罚手段”的规定以及第十三条修正案中禁止奴役的规定。我们会要求为每个囚犯提供单独的牢房、严惩行凶者、增加狱警并解雇置被强奸女性于不顾的狱警。相反，很多州政府投入在每个女囚犯身上的资金是男囚犯的2倍。[68]随着监狱中女性数量的增加，电视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特别报道来关注女性在监狱里的难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忽视男人就是在强奸女人。

婚内强奸

词条：澳大利亚的一对夫妻在做爱（或者他以为是这样）时，她要他停下。第二天早上她报警称他强奸了自己，声称过了30秒之后他才停下。但他说自己马上就停下来了。他被判刑4年。[69]

澳大利亚的男人的反应是像往常一样隐藏自己的感受，而澳大利亚的女性杂志依然在抨击男性害怕承诺。

词条：在美国，William Hetherington将下面的话印在传单上请求重审：[70]

我叫William Hetherington。我是一个被诬告、被错判婚内强奸而面临15~30年刑期的男人。我现在只希望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能让我在法庭上讲出自己的感受……

我被诬告和错判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中强奸我的妻子。我没有强迫她，也没有证据能证明我强迫她。她也没有受伤。对我判刑和将我送进监狱唯一的依据就是她的证词。

她指控我强奸的动机是，她想利用我们尚未判决的离婚官司得到3个孩子的监护权。过去3个月是我在照顾孩子们，而我的妻子离家出走了。

这已经是我妻子第4次提出相同的指控了。其他指控都被撤销了。

我没有钱请律师或者调查员，因为在离婚诉讼期间我妻子拿到了一张财产冻结令冻结了我的财产。刑事法庭的法官拒绝为我指定刑事辩护律师，原因是虽然我无法使用我的财产但是我有财产。我甚至没有办法上诉，因为想免费拿到上诉副本的人必须一贫如洗。

我的生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因为我和我妻子结婚16年后被控强奸，我已经坐了4年的牢。

我想要聘请法律顾问的权利。

我想要拿到我的财产付诉讼费。

我想要和我的孩子们定期见面。

传单上没有提到的是：

● Hetherington的妻子提起的4次强奸诉讼都发生在二人为争夺孩子的监护权而发生争执的时间段。[71]

● 政治动态：Hetherington的妻子想要撤销诉讼，然而此时正值检察官重新选举，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和女权主义组织向法院施压判他有罪。[72]

● 由于Hetherington没有犯罪史，根据州判刑指南，他应被判10年以下的刑期。但法官判了Hetherington15~30年。[73]

婚姻制度存在了几千年之后，为什么婚内强奸在一夜之间成了一个问题？在离婚率高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婚内强奸的诉讼率也很高。婚内强奸法成了女人手上的原子弹。大部分丈夫都意识到，一旦他们遭到指控并被曝光，自己的职业生涯就会就此完蛋，他们的雇主害怕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一位普莱森特维尔的教师被控强奸"。

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男女都有不想要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即使是第一次约会时。但是在一段恋爱关系中有一点是非常正确的：男女都会有"安慰性爱"。这就是恋爱关系和非恋爱关系之间的区别——所有美好的恋爱关系都需要"让步"，尤其是另一半特别想要的时候。《Ms.》杂志的

民意调查可以将其称为强奸，而爱情顾问会说那是恋爱关系。

婚内强奸法是一种敲诈。如果一个男人想要起诉离婚，他的妻子可以说："你要这么做的话，我就告你婚内强奸。"对婚内强奸立法比政府做替身丈夫还要糟糕：躺在卧室的正是政府。

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这项法律是否有它的作用呢？

寻求解决方案

法律能否阻止约会强奸？

法律可以阻止一部分约会强奸的发生。如果一个男人会因为释放情绪压力而坐牢的话，他就会少释放这种压力；如果一个"受到了影响"的女人可以在第二天清晨大喊自己被强奸了，那么帮女人付酒水钱的男人就会减少，所以性关系的发生会减少，然后不想发生的性关系也会跟着减少。同时，严格的法律规定也会让数百万男性因为害怕一个浪漫的夜晚会变成毁己一生的噩梦而不愿开口约会女人。约会强奸也会因此而减少：没有约会，就不会有约会强奸。

法律可以阻止大部分犯罪——但问题是，它的代价是什么？

从第一阶段的"男人追求/女人拒绝"到女权主义的"男人追求/女人起诉"，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老大姐"会让美国成为感情缺乏症患者，就像"老大哥"让苏联公民成了贫民一样。

法律能给我们安全感——但是约会希望得到的是爱。爱需要冒险，就像生活需要冒险，我们希望在生活中分享爱。能阻止风险的法律也阻止了爱。

如果我们继续保留关于约会强奸的法律，那么刑罚必须和罪行的严重程度相匹配，像对凶杀分级一样对强奸罪进行分级。如果一个女人自行选择赴约、选择喝酒、选择口交（比如Tyson和Kennedy Smith的证词），之

后发生的性关系和用刀逼迫发生的性关系属于同一犯罪级别，那么这是对强奸罪的轻视，同时也是只对男女两性角色中的男性做刑事定罪。

同时，如果我们继续保留关于约会强奸的法律，那么诬告者应该得到和被判有罪的强奸犯一样的刑期。

最终，如果我们继续保留关于约会强奸的法律，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必须使用测谎仪和DNA检测。测谎和DNA检测都必须由中立人士监督，如有疑问，应该重测。测谎仪并不完美，但是被检测者要想糊弄过去必须经过特殊的训练。如果取缔这种证据，就相当于取缔了使男人的生活免于被强奸的最强大的保护手段。

话虽如此，刑事定罪从根本上反映出来的是防止犯罪的失败。那么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犯罪。

重新定位社会角色

解决这一切的方法不是对它们进行刑事定罪，而是重新定位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法律无法分辨微妙的差别。肢体语言比口头语言更有说服力。眼神说出的“是”比口头说出的“不”更响亮。如果法律试图对我们的“是”和“不”进行立法的话，它会造就“紧身衣似的一代”——害怕调情、担心在法庭上看见自己情书的一代人。关于约会强奸的法律会迫使求爱者进法院，求爱的过程变成诉讼。

使女性强大的方式并不在于保护她们不受约会强奸的伤害，而是让男女两性进行其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在主动约会和约会花费上分担责任，这样才能使约会强奸和约会欺诈的发生率最小化。我们将主动出击不够快的男人称为“胆小鬼”，将主动出击太快的男人称为“强奸犯”，将主动出击却做不好的男人称为“傻瓜”，这样做并不能终结约会强奸的发生。如果我们只将行动的压力加到男人身上，就会进一步强化男人将女人对象化的需要——这会导致更多强奸案的发生。只要男人是主动出击的一方，

那么他们就会是强奸犯。只增加男人的责任并不会让男女平等，它会无限期地延续女性的权利。

约会强奸的法律造就了一种厌恶约会的气氛。只有相互沟通才能走向爱。那么，我们如何摒弃性别歧视而对两性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呢？如何用沟通取代立法呢？通过传播新的“恋爱关系语言”。

从强奸语言到关系语言

正如学校会教学生使用计算机语言，以此来接触第二阶段的科技，现在学校也要教学生关系语言以便了解第二阶段的沟通方式——教男性和女性为自己给对方的口头和非口头暗示（包括着装和化妆）负责，告诉他们是什么在吸引他们，怎样改变这些暗示并运用它们获得美好的爱情关系。让我们来看看电影《末路狂花》，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做法可能可以防止约会强奸。

Thelma想要找个男人。第二阶段的关系语言训练也会教她确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想要和这个男人有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发现，在电影里面，她绝不希望对方忽视她说“不”，但她也可以敞开自己，与之发生性关系。所以说，如果她想要找一个有点敏感但又让她兴奋的爱人，那么她可能应该去超市找挑哈密瓜的男人，而不是到酒吧找占女人便宜的男人。

尽管如此，即使在酒吧里，关系语言训练也会教Thelma寻找愿意倾听女人的男人，而不是对女人的“不”视而不见的男人。如果她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就应该离开酒吧。

如果她发现了这样的男人，第二阶段的关系语言训练会教Thelma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她可以主动接近这个男人和他搭讪，并通过肢体语言告诉对方，自己并非“花花公主”也不是在调戏他。要怎么做呢？帮他

买酒或者邀他跳舞。这是在告诉他她拿好主意了。如果他接受不了，她可以将他踢出局——为什么要和一个不能接受可靠女人的男人有瓜葛呢?

Thelma真正的做法与此相反。她喝得酩酊大醉，也没有搭讪任何人。但是她后来和一个男人勾肩搭背，还和他跳舞、接吻，而这个男人已经被她和Louise拒绝了7次——有一次Louise还把烟吐到他脸上，让他滚。她从最糟糕的环境中选择了最糟糕的男人，唯一那个经证实对“不”字视而不见的男人。然后，当她和他走到一个黑漆漆的停车场时，她拒绝和他发生性关系，但他依然坚持。这个情节给观众留下了一种印象，就是男人——所有男人——都是冷血无情的强奸犯。电影里没有告诉Thelma和Louise运用恋爱关系语言去把握自己的生活，相反，她们愿意去杀人和自杀，被刻画为女权主义英雄。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既反男性又反女性。让女性强大的方式是给予她们掌控生活的工具，而不是为她们杀害男人和自杀喝彩。

第二阶段的关系语言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主动性训练，以便掌握“初始的选择权”，而不是“否决权”——比较典型的女性权力。如果一个女人仍然需要否决的话，她至少要了解不同的否决代表的潜意识信息是什么。例如，一位男士想邀请一位女士喝酒，她说了“不”，然后这位男士冒着第二次被拒绝的风险再次邀请，而她再次拒绝了，但是第三次的时候她说“好”，我们对他们的关系语言有了基本的了解：在她的“不”变成“好”之前，他要承担被拒绝三次的风险。如果这种语言在他们之间一直保持不变，那么它为什么应该在发生性关系之前改变呢?

关系语言训练也必须教会男人理解以下3点：（1）相比不主动的女性，采取主动的女性成为受害者和责怪对方的概率会小很多；（2）主动型女性愿意承担责任和被拒的风险；（3）由于她们会体验和男性一样的经历，所以她们最能理解男性的感受。

男孩们必须学会对改变进行投资。这样做是值得考虑的：大部分男人

会爱上主动邀约、爱抚他们的身体并掏钱买单的女人。让男人沉迷于女性的身体之后又让他们戒掉其沉迷，只会让男人觉得男女不平等。（这会不会是女权主义者不建议角色对换的原因？）

男孩们必须知道，一直承担被拒的风险会迫使他们不再表露自己的感受。父母必须支持女儿对自己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让她们和儿子们一样肩负起责任。也就是说，父母们必须对自己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这样才能为子女树立良好的角色榜样。

如果我们想要减少强奸的发生，法律需要规定高中和大学增设有关性别转换的课程，帮助双方理解对方的想法。就对性别角色的理解而言，人类正处于青春期。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之间的过渡是一个尴尬的时期。就像正常人的青春期一样，女性已经发育成熟了但男性还在长青春痘。

对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由他们通过课堂上的角色扮演和后续讨论来训练较为成熟的女生邀请男生赴约。训练男生对不太有吸引力的女生提出的邀约表示感谢，从而降低男生对美色的沉迷并使男生更关注女生的内在。总之，我们应该培训教师进行角色转换练习，这样一来，即使过去的角色依旧存在，至少男女都对对方的角色有进一步的体会。

既然我们可以让违规驾驶的司机重新参加驾驶培训，那么我们也可以给第一次约会违规的人提供关系训练课程——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的一种课程。当我们对女性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让她们像男人一样承担各种各样被拒绝的风险（包括眼神接触到发生性关系）时，我们会将男性的愤怒和无力感最小化。而男性的愤怒和无力感正是造成约会强奸以及女性的愤怒和无力感的罪魁祸首，而女性的愤怒和无力感则会导致诬告强奸的发生。二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第二阶段的关系语言训练必须教会男女双方都能对性说“是”和

“不”。女人比男人更有说“不”的权力：女性不想发生性关系时我们不会质疑她的女性气质，但是男性不想发生性关系时我们就会“怀疑”他是不是个男人。我们不会觉得她性功能不正常，但是我们会觉得他性功能不正常。男性要学习说“不”，其重要性如同女性要学习约男性出来，而很可能他对她并不感兴趣。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答案不可能从女权主义的单一背景中推导出来，而是需要男女双方相互帮助，重组传统，因为这一传统在数世纪以来传了一代又一代，在过去可行现在却已经不可行了。

注释：

1. Gail Jennes，《罄竹难书》（“Out of Pages”），《人物》1983年2月20日。

2. 感谢瓦萨学院副学务教导员Catharine Comins的帮助，见Nancy Gibbs，《什么时候算强奸？》（“When Is It Rape？”），《时代》1991年6月3日，第52页。我打电话给Catherine Comins，并传真了一封信给她想确认这句话的出处有没有错误，但是她没有回复。

3. 1992年3月20日我得到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处特工督查Charles P. McDowell博士（兼公共管理硕士、图书馆学硕士）的书面回复。该项空军研究项目涉及556起强奸报案，其方法和具体细节见下文。

4. 受害人举报的所谓强奸犯里面有32%是男性黑人，而男性人口中有10%是黑人。见《1987年美国刑事受害报告》，出版编号：NCJ-115524June 1989，第47页，表41“偶犯罪犯犯罪化的百分比，按罪行和罪犯种族”。

5. 这一传言经由Susan Brownmiller的《违反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与强奸》（*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一书被广泛传播。（New York: Bantam，1976）

6. USBJS，《1987年美国刑事受害报告》第18~19页，表5。

7. 同上。

8. 关于为什么男性的社会化过程会让强奸变得可以预料，详情见Warren Farrell《男人何以如此》第57~66页、第110~138页、第242~252页。

9. Charlene L. Muehlenhard 和 Lisa C. Hollabaugh，《有时女人说“不”时是否意味着“是”？女人象征性拒绝性行为的盛行和关联》（“Do Women Sometimes Say No When They Mean Yes? The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Women’s Token

Resistance to Sex”），《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8年第54期，第874页。

10. Rosemary Rogers，《狂野的爱》（*Sweet Savage Love*）。（New York：Avon Books，1974）

11. Catherine MacKinnon，《走向女权主义的国家论》（*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2. 见Neil Gilbert，《性侵的莫名盛行》（“The Phantom Epidemic of Sexual Assault”），《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1991年春季刊，第61页。用MacKinnon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在男人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如果性常常是一种男人向女人做的事情，问题就不在于是否用了暴力，而在于同意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见第177~178页。MacKinnon将此概念归功于Carol Pateman。Pateman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意无法和习惯性默许、赞同、无声的异议、服从甚至被迫服从区分开来。除非真的有可能做到拒绝或同意或取消同意，否则我们再也无法坦白地说‘同意’了。”见Carol Pateman，《女人和同意》（“Women and Consent”），《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1980年，第8期，第149~168。

13. MacKinnon的原话为：“作为一种生存谋略，女人必须忽略、降低或者压制自己的渴望，尤其是缺乏渴望时，这样就给男人一种想要得到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行凶者的角度出发去衡量同意行为的真实性是对法律的改造，这是在制造问题。”见MacKinnon，同上，第181页。

14. 这项研究是Mary Koss、Christine A. Gidycz和Nadine Wisniewski共同完成的，《强奸的范围：性侵的发生率与盛行及高等教育学生受害的全国抽样》（“The Scope of Rape：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Sexual Aggression and Victimization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诊疗与临床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87年第55期，第162~170。这些传播媒体包括1989年4月21日的《纽约时报》和Peter Jennings的ABC特别栏目“强奸论坛”（Rape Forum），1992年5月5日该栏目播出了纪录片《男人、性和强奸》（*Men，Sex and Rape*）。

15. Koss等人，同上，第167页。

16. 同上，第167页，表3。

17. 见Robin Warshaw，《我从未说过那是强奸：〈Ms.〉杂志关于如何识别、反抗和逃脱约会和熟人强奸》（*I Never Called It Rape：The Ms. Report on Recognizing，Fighting，and Surviving Date and Acquaintance Rape*）第63页。这本书是根据Mary Koss的调查结果编写的。（New York：Harper & Row，1988）

18. Charlene L. Muehlenhard 和 Stephen W. Cook，《男人口中不想要的性行为》（“Men’s Self Reports of Unwanted Sexual Activity”），《性研究》（*Journal of Sex Research*）1988年第24期，第58~72页。

19. 同上。

20. 在62830名真正被强奸的妇女中，有37%的人没有报警；在67430名被强奸未遂的妇女中，有54%的人没有报警。见USBJS《1991年美国刑事受害报告》，第102页，表101“犯罪比例，按犯罪类型和是否报警”。

21. 全国犯罪调查报告的最新强奸率数据为每年1.2：10000。《美国刑事受害报告年报（1973~1988）》第15页。这就意味着每1000名女性中有80人——或者说每12个女人中有一个人——可能在一生中遭遇强奸。每年有62830名妇女真正遭到强奸而67430名妇女被强奸未遂，所以有1/25的女性在一生中可能被强奸，有1/23的女性在一生中可能被强奸未遂。强奸和强奸未遂的具体数据见1990年的刑事受害报告，同上。

22. 强奸率从1973年的1.8/1000下降为1988年的1.2：1000。见美国司法部司法项目办公室司法统计局《美国刑事受害报告年报（1973~1988）》第15页。这个数据来自一项全国家庭抽样调查。与举报强奸报告的数量相比，这项数据中的强奸率被认为更可信，因为在过去10年中，举报强奸的数量上涨原因在于公众对强奸的意识增强而且强奸的范围扩大了。但是，即使在这项调查里面，1981年到1990年之间警察局的强奸报案数量上升了9%，而以男性为主要受害者的事件在警察局的报案数量上升了36%。上升9%的数据来源：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美国罪案》第15页、第51页。（Washington，D.C.：USGPO，1991）

23. USBJS美国司法统计资料新闻署《1991年刑事受害统计》，1993年即将公布。这项调查是在Mike Tyson和Willianm Kennedy强奸审判期间和之后进行的。尽管其中涉及的被强奸或被强奸未遂的妇女数量较少，因此，存在样本偏差然而统计结果让人吃惊，妇女被强奸和被强奸未遂的数量上升了59%，而且两性的整体被强奸率和被强奸未遂率也有所上升（1990年为0.6/1000，1991年为1.0/1000）。

24. 美联社《男人被判性侵一个有46种人格的女人》（“Man Guilty in Sex Assault on Woman with 46 Identities”），《洛杉矶时报》1990年11月9日。

25. 比如，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办公室的Ira Michael Heyman《熟人强奸》，1987年1月20日。他解释称，校园规定“如果使用酒或者药物使受害者失去抗拒能力……即为强奸”。1992年5月18日采访伯克利防止强奸教育计划的Jessica White时，她证实了她的计划中对约会强奸的定义即为本文中的定义。关于索斯摩学院，见John Wiener，《在索斯摩学院收到暗示后强奸，约会强奸》（“Rape

by Innuendo at Swarthmore, Date Rape"），《国家》杂志（*The Nation*）1992年1月20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哈佛约会强奸工作组建议大学将这些行为纳入强奸：女人因"喝酒或服用药物"而造成判断能力降低而发生的性行为。见Cathy Young，《什么是强奸，什么不是》（"What Rape Is and Isn't"），《华盛顿邮报》（全国周报）1992年6月29日～7月5日刊，第25页。

26. 美国婚内强奸与约会强奸交流中心位于美国加州伯克利。

27 如果我们通过了允许女人在酒后伤害男人的法律，那么我们也必须判女人酒后发生性关系有罪，因为司机酒后开车是违法的。

28. Charles Salter, Jr.,《挥之不去的阴影》（"A Lasting Shadow"），《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新闻观察者报》1992年2月17日。

29. 同上。

30. 同上。

31. 1992年5月13日，我采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犯罪控制和公共安全部的心理学家Michael Teague。

32. Salter，同上。新墨西哥州大学医院最终恢复了他的职位。

33. 1992年3月20日我得到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处特工督查Charles McDowell博士（兼公共管理硕士、图书馆学硕士）的书面回复。

34. Charles McDowell博士，《诬告》（"False Allegations"），《司法科学摘要》（*Forensic Science Digest*）1985年12月刊，第64页。本刊是美国华盛顿空军特别调查处发行的出版物。

35. Cathleen Crowell Webb 和 Marie Chapian，《原谅我》（*Forgive Me*）附录B。（Old Tappan, N.J.: Fleming H. REVELL Co., 1985）

36.Stephen Buckley，《"无证据"强奸报告考验调查员》（"Unfounded Rape Reports Battle Investigators"），《华盛顿邮报》1992年6月27日。

37. 同上。

38. 9%包含在47%中（见正文），但是这部分不一定是诬告——只是没有证据而已。或许"无证据"分类是诬告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但是据FBI所知，诬告的比例可以是0%~100%的任何一个数字。"无证据"分类在102655起被举报的罪行中占8.6%，即8818起。数据来自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1990年美国罪案》第16页。（Washington, D.C.: USGPO, 1990）1992年5月11日我电话采访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部主任Harper Wilson时确认了这一数据。

39. 同上。

40. 这53%分类为"嫌犯被逮捕或通过异常方式结案"。嫌疑犯被逮捕了，

但是联邦调查局没有信息显示对方是否被判有罪还是无罪释放。同上（两个数据源）。

41. 美联社《圣地亚哥警察：妇女谎称在诺德斯特龙商场遭到强奸》（“San Diego Police: Woman Lied About Nordstorm Rape”），《刀锋公民报》（*Blade-Citizen*）1993年1月16日。

42. Buckley，同上。

43. 同上。

44. 1983年3月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处特工督查Charles McDowell博士的《军队中的强奸诬告》（*The False Rape Allegation in the Military Community*），未发表。总共有75名承认自己诬告的妇女主动说出了她们的动机。

45. McDowell，《诬告》，同上，第68~71页。

46. McDowell，《军队中的强奸诬告》，同上。

47. 来自1991年9月份Kermit Cain写给我的书面信件以及1991年6月、7月和1992年6月对Kermit的采访内容。

48. 见Heyman，《熟人强奸》；Wiener，《在索斯摩学院收到暗示后强奸，约会强奸》；还有Young的作品。

49. 《选美比赛官方撤销对特森的起诉》（“Beauty Pageant Official Drops Tyson Lawsuit”），《洛杉矶时报》1991年，12月2日。

50. Kennth B. Noble，《重要流产案原告现在否认遭到强奸》（Key Abortion Plaintiff Now Denies She Was Raped），《纽约时报》1987年9月9日。

51. 美联社，《女孩承认谎称强奸，男人被关押513天后释放》（“Girl Admits Rape Lie; Man Free After 513 Days”），《达顿新闻日报》（*Dayton Daily News*）1990年2月18日。

52. McDowell，《军队中的强奸诬告》，同上。

53. 来自1992年7月17日对John Hoover的现场采访内容。

54. Webb 和 Chapian，同上。

55. 美联社，《强奸案判决中倾向于听取受害人证词》（“Ruling Favors Victim’s Word in Rape Cases”），《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1992年3月8日。

56. 见1991年5月密歇根州诉 Lucas案。美国最高法院规定禁止被告一方对女人以前的性行为进行交叉调查。

57. 同上。美国最高法院规定禁止被告一方对原告以前的性行为进行交叉调查，甚至是与被告发生的性行为也不行，除非他提前通知法庭。

58. 美联社，《恋童癖被罚款并判缓刑》（“Pedophile Fined, Given Probation”），《刀锋公民报（圣地亚哥）》1992年3月3日。那个名叫Pam Mouer的女人当时45岁。注意，虽然她承认了法定强奸罪，但是她没有被称为“强奸犯”——只是恋童癖而已。而且，新闻标题写着“恋童癖被罚款并判缓刑”而不是“女人强奸小男孩”。标题忽视了一个女人承认了性罪行的事实。

59. Muehlenhard 和 Hook，同上。

60. USBJS，《美国刑事受害报告年报》，同上。

61.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991年美国统计摘要》，第83页表120，“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致死人数”。

男人	69929	（90.4%）
女人	7421	（9.6%）

62. Deryck Calderwood博士，《男性强奸受害者》（“The Male Rape Victim”），《人类性活动的医疗方面》（*Medical Aspects of Human Sexuality*）1987年3月刊，第53~55页。

63. 同上。

64. 主流媒体在此问题上并无遮掩，除1990年8月21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刊登的《美国监狱超员问题》（“Overflowing in U.S. Prisons”）以外。该文指出：“美国监狱中遭到强奸的男性数量超过全国任何地方被强奸的妇女数量。”这只是大概的估计和预测。见Wayne S. Wooden 和 Jay Parker，《铁窗里的男人》（*Men behind Bars*）。（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2）研究中提到的刑罚执行机关位于加州，它的监狱呈关押的男性数量超过2500人，其中80%为异性恋，10%为双性恋，还有10%是同性恋。其中14%因为感到压力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发生性关系——他们要么被强奸要么被性侵。由于每个监狱都有异常现象，所以除非在全国范围内的监狱中做抽样调查，尤其要包括最高警戒级的监狱（这所监狱不是），否则这种预测是不可靠的。

65. 在看守所和监狱中遭到强奸或性侵的男性数量达到100万甚至以上，因为每年在州监狱和联邦监狱以及地方看守所中进出的男性数量为8643525人。见1990年《刑事司法统计数据》，表6.33为1987~1988年的看守所人口数据；表6.89和6.90是联邦监狱的数据（根据1988年和1990年数据计算）。包括任何特定时间在内，共有14%的人称自己遭到过强奸或者性侵，所以总数为1210094人。然而，因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个数据也只是大概的猜测。

66. 12万（119780）的数据比报道数据略高，因为司法部在调查全国妇女在遭到强奸后是否报过警时发现有55%的强奸案并未报警。见美国司法部司法项目

办公室全国刑事犯罪调查报告部1991年7月《美国刑事受害报告：1973~ 1988年趋势》，出版编号：NCJ129392，第15页表6“强奸：受害程度和受害率”。55%的数据见美国司法部司法项目办公室司法统计局犯罪调查报告部1991年6月《1989年美国刑事受害报告》，出版编号：NCJ 129391，第89页表103“1989年个人犯罪：受害者报警比例，按犯罪类型、受害人—罪犯关系及受害人性别”。

67. 1992年7月，我用Lexis/Nexis数据库对1980~1991年6月全国700多种新闻报纸、杂志和期刊中的数据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女犯人遭到其他女犯人强奸（比如用扫把柄、拳头或者强迫口交）的报道。但是发现了41起发生在犯人和保安之间的性交行为，有些很明显是强奸，有一些则是女犯人希望通过性交易换得香烟、毒品和优待等。

68. 比如，华盛顿矫治局的平均日常成本为37.62美元/天/男性囚犯和80.62美元/天/女性囚犯。在威斯康星州，1988年至1989年期间平均每月人均成本为1120美元/男性囚犯和2100美元/女性囚犯。见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政策、规划与预算局卫生与社会服务部《截至1989年6月30日一年内人均成本报告》第五章。

69. 1990年4月11日，采访了澳大利亚心理学家Frank Brennan。

70. 来自美国全国单身男人联合会为William Hetherington辩护基金会和William Lasley律师事务所印发的传单。在1992年5月1日的访谈中，William Lasley解释说，Hetherington的财产在民事案件中被冻结是为了防止他将其用于他的刑事辩护，或者防止他声称自己贫困而得到公共辩护律师。

71. David Zeman，《父亲、受难者、骗子？》（“Father, Martyr, Fraud?”），《底特律自由新闻报》1990年5月25。

72. 1990年10月26日采访了报道过此案件的俄亥俄州记者Fran Hovey。

73. Zeman，同上。1992年3月17日采访了Hetherington的律师David Wright，其中他证实法官确实判Hetherington 15~30年的刑期，这一量刑确实超过了量刑指南中关于此类案件的标准。

第十六章

从丈夫到山姆大叔：作为替身丈夫的政府

真或假？政府禁止雇主在招聘和晋升员工时性别歧视。[1]

答案：假。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规定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可以雇用资质稍逊色的女性。[2]但是它并没有规定女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可以雇用资质稍逊色的男性（比如小学教师、护士、秘书、鸡尾酒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办公室接待员和空乘人员）。除此之外，法律还规定在招聘中要有一定的性别配比，要求用人单位大量招聘女性，要求接受政府资助的所有机构与女性（或少数族裔）创办的企业保持一定比例的合作。

今天，如果一位雇主招聘了一位女性，那么雇主他可能要在她怀孕期间继续付她工资（《联邦怀孕歧视法案》[3]）。她在婚假和抚养孩子期间（需要买房子、付额外的保险金，还需要为孩子请老师、请保姆）依然会得到经济资助，而雇主得到的是压力。

替身丈夫式的政府为女性所做的，工会至今尚未为男性做到。男人向工会缴纳会费，纳税人向女权主义组织支付账单。很快，女权主义组织和政府变成了纳税人赞助的女性工会。

拯救女人大赛

数百项联邦计划都在资助“女性专享俱乐部”：例如有“妇幼营养补助俱乐部”（即妇幼营养补助计划），却没有“男幼营养补助俱乐部”。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资助了1.5万名女性和91名男性参加培训学习。[4]几乎所有州政府都用纳税人的资金建立了妇女事务部门，却没有对等的男性事务部门。[5]

在女权主义意识产生的初期，它对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内设立男性俱乐部持反对态度，很快它就开始支持在女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内设立女性俱乐部。把资金用在男性身上被视为拿走了女性的资金。正因为如此，家庭计划办公室在一开始时同时服务于两性，但到了1982年，它就只为女性提供资助。[6]这种态度将男人从家庭中推了出去。男性俱乐部被宣布非法之后，女性俱乐部继续享有资助。

在加拿大，政府为女性的专有利益（根据女权主义者的定义）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加拿大教育部帮助筹资建立了全国妇女组织[7]并在每一个省份都建立了妇女理事会（安大略省的妇女理事会有51位员工，他们得到的拨款是每年800万美元）。[8]

若以女权主义定义的女性视角去认真看待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就会产生数量庞大的财政补贴。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很快被称为“女性学”，而女性学的毕业生会呼吁意识形态教育出笼。随着数千份女性岗位都建立在女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于是女权主义被官僚化了。就像共产主义一样，女权主义从一种革命性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也和共产主义一样，这种政治正确得到了大部分大学的大力拥护。

政党是否为了选票让女性依赖自己?

各政党就像为了监护权而战的父母，为了得到女儿的爱而争相承诺自己会为了她尽最大的努力。

这种做法对女性的害处有多大？我们已经限制人为熊和海豚提供“免费”食物，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喂养方式会让它们产生依赖性，最终

导致它们灭绝。但是当这件事发生在人类身上时，我们很难看到这种短暂的善意和长期的伤害之间的关联：我们资助女性让她们生育更多的子女，这一做法使她们产生依赖，且不鼓励她们开发工具寻求自我谋生的积极性。所以说，对女性真正的歧视就是“免费喂养”。

讽刺的是，当各政党或者父母为了得到女性的爱戴而抢着给予她们时，她们并没有感激，而是觉得理所当然。不过她们并不应该心存感激，因为政党就像索求无度的父母一样，无意识中依赖着女性对自己的依赖。于是女性成了“他者”——一个被给予的人，而不是平等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家长和每个政党需要做的工作——将孩子抚养成人，而不是让孩子永远是孩子——都没有完成。

但这么做有困难。当孩子掌握着大部分选票时，问题已经不是我们的社会是母系还是父系社会了——我们是“选举系”社会。像孩子一样的女性真的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因为她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争取她自己所期待的东西。然而，她所学到的争取方式是告诉别人：“这是女人的权利。”但是她并不会感觉到那种自己一生都想获得的掌控感。而且即使定额制让她被纳入决策过程中，她依然会迁怒于“由男性主导的政府”，因为“平等”是被给予的，这令她感到屈辱，又觉得很矛盾。她仍然是“他者”。所以说，在她掌握了大多数选票的时候，她既控制着这个体制也迁怒于这个体制。

两个政党都需要女性的票数，而民主党尤其需要它。所以民主党尤其不让孩子长大，因为它害怕失去她。女性希望能有独立自主的选择性又不想失去政府这个替身保护者，她一直让它继续做她的保护者。

与此同时，很多男性不再支持民主党，于是民主党对女性的依赖愈演愈烈。正如一位投票人所说的：

我和我的家人一直是“传统民主党选区”的支持者，但是我们最近开

始支持共和党了。

因为民主党……一直在工作招聘、大学招生、离婚和子女监护权方面拥护对男性的歧视。

荒唐的法律（比如那些关于“婚内强奸”和“性骚扰”方面的），导致单凭女人的一面之词无辜的男性就可以被判有罪……

民主党似乎有意把美国男性变成二等公民。[9]

Eric D.Sherman

贫困妇女也有三重选择

我们已经看到，中产阶级男人的收入可以让已经做母亲的妻子在生活上有三种选择（全职工作、全职妈妈或者二者兼顾）。但是贫困男人则无法让妻子有这种选择。所以政府为女性提供了贫困男人无法为她们提供的选择——足以让女人“嫁给”政府而不是贫困的男人。就这样，贫困的男人变得可以被随意支配。

问题不在于女人和孩子衣食有了保障，而在于这种做法使得这些男人被排除在女人和孩子的生活之外。政府没有建立“男幼营养补助计划”，于是“妇幼营养补助计划”成了一个联邦政府资助的女性专享项目。而每个州政府都会在联邦政府的拨款基础上再拨款。

这种项目的名称，比如“妇幼营养补助计划”，带着明显的性别歧视；像“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的性别歧视却是隐藏其中而不可见。AFDC或者其他大量的所谓“家庭”补助项目对男性申请者的审查比对女性的要严格很多。比如，AFDC的“100小时规则”[10]规定，一位母亲每个月工作100个小时仍然可以领取补助金，但是一位每个月工作100个小时的父亲却不能领取补助金。[11]即使一位父亲刚开始创业而且处于亏损状态，他也无法领取补助金。相反，如果一位母亲身处此境，她可以领到全额补助金。

这显然违背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平等保护的宗旨。然而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只补助女性的做法在法律上将没钱的男人固定在“他的地盘”上，也就是让他无家可归，直到他成为一个钱包。如果他做不到，那他就得继续流浪街头；如果他成功了，他就要为了得到女人的爱与其他男人以及AFDC和妇幼补助计划竞争。当然，他赚回来的钱不仅不能少于AFDC和妇幼补助计划补助给她的数目，而且还要能养活他自己。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话：“AFDC给女人的补助不够养活一个家。”确实是这样。单项政府补助计划发给女人的补助金不会超过一个低收入男性的收入。AFDC每年发给超过1000万女性的补助金只有100亿美元。[12]单靠这一项补助金是无法支撑一个家庭的。但是，这项补助金不包括食品救济券、医疗补助、住房补助、学校午餐计划给予的补助、妇幼营养补助或者其他未申报的灰色收入。

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一种新型的核心家庭诞生了：女人、政府和孩子。在孩子长到6岁之前，女人依然合法保有那3个选项，然后她再生一个孩子，这些选项可以继续保留6年。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无穷无尽的。对一个男人来说，却无从开始。

尤其在黑人社区，这一做法强化了黑人男性的陋习：发生了性关系之后不承担责任，“回家只是为了发生更多的性关系”。很多黑人男性离开家庭是因为他们要承担经济责任——并非因为他们在感情上不负责任。对很多黑人男性来说，离开自己爱的来源是很痛苦的。这是一种牺牲。为什么我们只把它视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很多白人和很多黑人女性都忘了，黑人男性也渴望爱情和稳定的生活。

同时，在一个家庭中，父亲的缺席是孩子堕落的最大原因。为什么？父亲的缺席会对孩子的“社交免疫系统”造成伤害。当孩子的社交

免疫系统受到伤害时，孩子更容易滥用毒品、犯罪和早孕等。政府的补助使孩子和他的父亲分离进而伤害孩子的社交免疫系统，就是在为孩子的恶习提供补助。也就是说，我们在为孩子的恶习提供补助。

我们为什么要容忍这种做法？因为我们本能地保护女人不受即刻的伤害，这一本能强过了给予孩子们长时间保护的本能。这一做法源于我们在第一阶段里的传统，生存是最重要的，如果女人活下来，就总会有孩子的。我们的法律就是从那个传统演化而来的，但是第二阶段的生存依赖于这样的法律：孩子们有父亲，父亲们也能拥有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下一代的孩子们所需要的是稳定感和内心的安全感，这样他们才能用爱去解决世界争端，而不是诉诸战争。

政府计划支持的是孩子……而不是女人

词条：有个孩子，3岁多。法官认为可以找一个好的保姆照顾他，但是他家里太穷了，如果他妈妈工作，孩子就会好过一点。[13]法官裁定这位母亲得找份工作。

女权主义者认为，法官的判决违背了这位母亲的“选择权”，而不是认为法官对孩子的最大利益判断有误。这位母亲的选择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孩子的最大利益是次要的。然而，女性有权选择堕胎的一个理由是“让孩子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很重要的。

既然大部分税款都是男人缴纳的，所以说，她的“选择权”就是强迫大部分男人为她的选择买单。在他养家糊口的同时还要肩负这一责任，所以他常常被迫选择他不太喜欢但是薪酬比较高的工作，由此产生的压力最终导致他的早逝。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女人的选择可以杀死一个男人。如果这个选择只关乎她的身体，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但是这个选择导致他的早逝意味着也赌上

了他的身体。如果家里一贫如洗的话，那么这也赌上了孩子的一生。

无礼孩童的心理

当政党们依赖于把女人当成孩童时，我们就会助长女人发展出无礼孩童的心理：她犀利的眼神只能看到对她的歧视，却看不到为了她而造成的歧视。例如，女权主义者声称社保制度歧视女性，因为普通女性每个月得到的社会福利比普通男人的略少。[14]他们没有提到普通男人每个月付出的更多。

他们也没有提到其中真正的歧视：男人集体缴纳的社保金额是女人的2倍，[15]但女人从社保制度中得到的数额是男人退休金总额的150%。[16]男人作为一个整体在任何一年收到的社会福利都不及女人。但是并没有男性运动提出抗议，称男人只应缴女人所缴数额的33%（因为就整体而言，男人缴纳的数额是女人的2倍，但收到的不及女人的1/3）。

一切都是从女性角度出发的，我们来看看养老金计划和保险费的情况吧：

词条：过去，养老金计划利用死亡率表来合理调定每个月给女人支付较少的养老金，否则女人退休时获得的退休金将是男人的2倍多。这一做法被视为对女性的歧视并被宣称不符合宪法规定，[17]但她们余生收到的金额更高却没有被视为歧视。

词条：保险公司使用同样的死亡率表，每个月向男人收取比女人更高的保险费，因为男人寿命较短，所以减少了他们活着时缴费的次数。男人每个月缴纳更多的保险费没有被视为对男人的歧视，也没有人说这个做法不符合宪法规定；男人余生得到的补偿款较低，也没有人说这是性别歧视或者不符合宪法规定。

总之，当女人付出更多时，它就被宣称不符合宪法规定；当男人付出

更多时，却没有人在意。性别政治变成了宪法政治。

真男人不起诉……他们只负责成功

女权主义让女人不但在职场中获得成功，还要在职场中起诉——而且二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成功的男人很少有人学过这种连续打击法。1914年，Thomas Watson被国家收银机公司解雇后，开了一家小公司。他为公司取名为IBM。当Henry Ford二世解雇福特汽车公司总裁Lee Iacocca时，Ford告诉Iacocca：“我就是不喜欢你。”[19]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女权主义者会起诉。而Iacocca获得了成功。

成功人士极少将解雇自己的人视为仇人。George Steinbrenner在担任纽约洋基队的经理时解雇了Billy Martin，虽然当时他在锦标赛中获胜了。然后Steinbrenner又回聘了Martin，之后又解雇了他，后来又回聘，接着再次解雇他——虽然Martin在7个赛季中赢得了2次锦标赛和1次世界冠军赛。倘若Martin将Steinbrenner视为仇人，而不是认为后者只是在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么他是不可能被回聘的。

当然，这不是所有男人的态度，也不只是男人会这样做。这是成功人士的态度——一种“我负责做一个为公司带来效益的人”的态度。成功的员工会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照顾他们。他们将照顾公司视为己任，所以公司才会照顾他们（从而他们才能照顾自己的家人）。他们变成了“公司的顶梁柱”（为了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成功的人不会期待每个公司都能奖罚公平，他们为公司遮风挡雨，公司会认可他们的贡献。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认可，他们会换老板，但是他们不会起诉老板。

在金钱和精神上都获得成功的人不会认为男人是拥有力量的那个性别，男人只是最愿意为了获得力量而付出代价的那个性别。他们知道没有

责任就没有特权，同时，如果一份责任不能让他们获得特权，那么他们不会要它，他们不会抓着它不放却要抱怨不已。

教女人在有人讲色情笑话时起诉公司有着“敌意环境”，就是在教女人进入作为替身丈夫（或者父亲）的政府的怀抱。这让企业害怕女人，而不是尊重女人。为了让女人在职场中获得成功，我们给予她们最好的准备就是让她们准备好克服各种障碍，而不是起诉谁；成功的人不起诉，他们只负责成功。

注释：

1. 感谢Fred Hayward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部分答案。

2. Johnson诉圣塔克拉瑞镇运输代理局（Johnson v. Transportation Agency of Santa Clara County），480 US 616（1987年）。

3.Tarmar Lewin，《怀孕和职业风险引出‘模糊的’法律界限》（“Preg-nancy and Work Risks Posing ‘Fuzzy’ Legal Arena”），《纽约时报》1988年8月2日。

4. Michael Levin的《女权主义与自由》（*Feminism and Freedom*）第175页。（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88）书中讨论了15000~20000名女性的学习课程。美国心理学会成员Sam Femiano在《美国与加拿大的男性学习课程指南》（*Directory of Men's Studies Courses Taught in U.S. and Canada*）一文中列出了91名男性参加的培训课程。

5. 例如马里兰政府每年拨给马里兰妇女委员会的预算是20万美元，其中巴尔的摩拨给妇女委员会17.5万美元。见Jack Kammer，《男人与孩子的事》（“A Matter of Men and Children”），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Sun*）1992年3月26日。

6. 国会最初授权家庭计划办公室“为需要计划生育服务的人服务”。1982年，联邦办事处向地方办公室下发了一份指示，要求他们将资金只用于女性身上。见Douglas Beckstein和Kevin McNally，《联邦计划生育办公室歧视男性》（“Federal Office of Family Planning Discriminates Against Men”），《男性生殖健康》（*Men's Reproductive Health*）1987年秋季刊，第1页。

7. 与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类似的加拿大机构是加拿大全国行动委员会，教育部每年都会拨款50万美元给它。还有一个加拿大妇女地位内阁部。见Betty Steele，《女权主义者接手：20年内父权制变女权制》（*The Feminist Takeover: Patriarchy*

to Matriarchy in Two Decades）第9~10页，第68页。（Gaithersburg, Md.: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 1990）

8. 同上，第69页。

9. 引自Eric D.Sherman的《性别问题》（*Gender Issues*）信件第2页，稍加压缩，1988年6月。

10.《1988年家庭支持法案》自1990年1月开始生效，它给了家长——实际上是母亲（理由已述）——在孩子6岁之前选择全职或兼职照顾孩子的权利，如果她想工作或者接受教育，孩子可以享受交通、保育和食物方面的福利。

11. "100小时规则"只是大量直接或间接歧视男性的工作福利和社会福利计划中的一项而已。其他规定（如一次性奖金）让那些男人在家中帮忙的家庭比男人缺席的家庭更难得到福利。圣地亚哥法律援助协会的Colleen Fearn为我解释了这些规定。

12.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991年美国统计摘要》第358页，表584。

13. 见Lorie Hearn，《女人的工作》（"A Woman's Work"），《加州律师》（*California Lawyer*）1989年2月刊，第26页。圣地亚哥法官Murphy裁定，出于对孩子最大利益的考虑，一些母亲应该在孩子3岁以后出去工作并为孩子请一位负责的保姆等。然而这位母亲赢了这场官司。见Hearn的文章，其中讨论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法规定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可以不工作。

14. 男人每年的平均得益金额为8150.40美元，女人为6223.20美元。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公报年度数据增刊》第145页，表5.A1 "截止1990年的平均每月得益及数量，按种族、年龄和性别"。（Washington, D.C.: USGPO, 1991）

15. 男人缴纳750亿美元，女人缴纳380亿美元。这些数据来自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社会保障局研究与统计部1988年10月发布的《1985年有社保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数据，按州和县》，编辑：Lilian A. Fribush，出版编号：13-11784，第1页表1。

16. 如果普通男人和女人在65岁退休后能得到全额社保福利而且能活到平均寿命的话，那么他还有7年的寿命，每年能领到8150.40美元，他总共能领到57052.80每年；她还有14年的寿命，每年能领到6223.20美元，她总共能领到87124.80美元——比男人能领到的金额多出约153%。见《社会保障公报年度数据增刊》，同上。

17. 美国洛杉矶水电局诉Marie Manhart案，1978年。

18. 1992年8月10日采访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经理Tim Kime。

19. Kerry Pechter，《被解雇的6个人》（"6 Who Were Sacked"），《男性健康》1988年夏季刊，第22页。

The Mgth of Male Power

第四部分

接下来怎么办？

第十七章
结　论

将所有男人联结在一起的那个伤痛就是他们的被随意支配性。他们作为军人、工人和父亲的被随意支配性。他们的伤痛在于，相信他们只有在为了拯救他人、为了他人的生存而杀人或者被杀的时候才会被爱。

第二阶段的科技已经颠覆了人类为了生存而做事的需要。第二阶段的社会所创造的科技让人类不用再为了生存而厮杀，但人类一旦厮杀起来就会毁灭自身。我们的回应是，只让女人不再为了生存而做事。我们通过避孕、人口增长和科技来解放女人，让女人不再受生理状况的限制，但我们也通过避孕、人口增长和科技让女性的生理状况来决定男性的命运：她可以选择流产或者起诉索要抚养费。

女性从生理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男性并没有从生理限制中解放出来。我们没有要求男女平等分担危险的工作和死亡的风险，我们仍然将男人的社会角色定义为“我们的杀手”，所以他们不被爱……所以他们被随意支配。

要改变存在了数百万年的固有传统，男女双方都会遭遇很多陷阱。女人会认为离婚意味着她们独立了，即使这时她们要依赖作为替身丈夫的政府；男人会认为他们在帮助女人获得平等，即使这时他们通过的法律在保护女人免于色情笑话的困扰，而不是保护他们自己不会死在建筑工地上。

理想的状况是不要出现男性运动，而是发起性别转换运动。只是女权运动的力量还需要一场男性运动的临时矫正。这会让男性面对一种特殊的

挑战：政治运动的主体很少有身心健康的人们，但是没有了政治运动，也很少能促成健康的转变。

男性运动是否能真正起到作用，取决于它是否能告知天下，充当这个世界的坏人并不是男人的职责：战争不是男人引起的，而是生存的需要。男人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指挥官，是保护他人的命令在指挥着他们。如若没有男人的保护，现在就没有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但是在未来，社会在教一个性别更愿意为我们杀人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个杀人的性别；社会教一个性别更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必然会产生一个被忽视的性别——自尊心和内心感受被忽视的性别。我们告诉男人，他们是发起战争的行凶者，所以只有他们应该被送上战场，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男性的自尊。

有了核技术之后，人类的生存问题终于和让男人学习爱和被爱的问题协调一致了。男人的方方面面都使得他们被随意支配，这种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他们每一个细胞中。当他们的被随意支配性被称为“力量”时，他们被它收买，被它蒙蔽了双眼看不到自己的无力，待男人发现这一切的那一天，男人就会需要这种社会化。

最显而易见的无力感标志

一个群体因其身份特征而遭受暴力，这是证明该群体的无力感的清晰标志，比如基督徒被送去喂狮子，而下层人士被送到战场上。

在美国，我们用法律（征兵制）、宗教和习俗（割礼）、社会化和激励制度（告诉男人，他们和另外11个男人比赛互相击打头部，谁胜出就能得到奖金）、美女们的认可（啦啦队为“打脸”比赛加油）、家长的认可和爱（感恩节让孩子们在游戏中相互殴打）、纳税人的钱（组织高中生摔跤、足球运动、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建立军队）和娱乐消费（拳击、足球、冰球、牛仔竞技、赛车、西部片和战争片）让男人遭受暴力。但北美

洲明确禁止男人参与暴力的斗牛比赛——因为我们觉得这项竞技对牛来说太残忍了。在让（未达到承诺年龄的）儿子们遭受这些暴力之后，我们责怪他们成了一个更为暴力的性别。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其他群体遭受暴力时，我们承认他们的无力感。而我们让男人遭受暴力时却说男人拥有力量，这暗示了什么？当我们承认一个群体的无力感时，我们承认有帮助那个群体的责任。到了男人身上，我们责怪的是受害人。我们责怪男人，因为我们教男人成为施害者的做法掩盖了这一事实：男人也是受害者。男人的施害者身份掩盖了男人的受害者身份。

至于女人，我们常听到，有一半人——也就是女人——生活在对另外一半人——也就是男人——的恐惧之中，原因是，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哪个男人会成为强奸犯”。我们忘记了，数据显示，人口中50%的男人面临的被杀和被暴力对待的风险要大的多，所以说，男人也害怕大部分男人，因为男人同样忘记了遭到暴力对待的也有男人。

我们只了解女人的恐惧，所以公共资金都用来建设女性专用的避难所，让女性享受心理咨询服务。更高的税率意味着大部分白人男性从事着自己不太喜欢但是报酬较高的工作，同时他们的寿命也较短，这样才能延长女性的寿命。

实际的结果就是女性的寿命延长了，而且白人女性寿命最长，其次是黑人女性，白人男性第三，黑人男性第四。在工业化世界中，男人就是新时代的“下等人”，黑人男性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这个结果帮助我们认识到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的另外一种关系……

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的伪平行

过去二十几年所犯的根本错误之一，是将民权运动的成果用在女性身

上，仿佛她们过去是男性的奴隶而如今有资格得到这些权利，就像黑人过去做白人的奴隶而现在有权享有这些权利一样。这一做法助长了女性是受害者的心理，而且让我们看不清男女之间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哪一方占了更大的优势，而是男女都要服务于真正的目的——下一代人的生存需要。

在种族关系中，一个种族的获利常常就是另一种族的损失。在男女关系中，不论哪一方成为赢家，双方都是输家。当一个女人从反歧视行动中获利从而得到晋升，那么她打败的那个男人的妻儿就失去了因晋升带来的利益。所以说用一方获得特权的方式去解决机会平等的问题是下策。

认为男人有力量而女人是无力的，这种旧观念必然会造成两性之间的战争。为什么呢？“女性无力”这种观念会让我们害怕限制女性权力的扩张。这个性别具有更强大的购买力、更强大的美貌影响力、更强大的性力量、（作为一家之主）更强大的资产净值，而且在婚姻、子女抚养、职业和生活中拥有更多选择，我们不敢限制这些权力，这将造成绝对权力的腐败，并最终导致两性之间发生更血腥的战争。

相反，新型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相结合的框架能让男女相互理解对方，理解一位母亲抚养孩子的数量象征着她所承担的责任是多少（而不是她所享有的权力有多少），而一位父亲赚回来的钱的数量象征着他所承担的抚养子女的责任是多少。这样一来，我们会理解男人和女人为何在自己承担更多责任的领域享有更多的权力和力量；男人和女人为何在自己最容易遭遇死亡的领域最具有支配权；男人和女人是怎样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为对方付出的；男人和女人是如何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而付出代价的。

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相结合的框架中，另一方的力量或重负不会遭到否定，这种做法能解放我们，用相爱取代两性战争，让性别转换运动取代女权运动。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转换？

第二阶段的道路

我们要从质疑第一阶段的有效途径开始，即使在当时是最有效的方法也要接受质疑。比如，Joseph Campbell笔下鲜活的英雄之旅就是第一阶段的旅程。其中的仪式也是第一阶段的仪式。这一旅程和仪式是为了训练男人的被随意支配性设置的，这就是第一阶段男人的新兵训练营。“英雄”的称号是被保护者为了让保护者甘冒生命危险而给他的贿赂。感激之情让奴隶永远是奴隶。然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英雄”这个词是从“仆人”“奴隶”和“保护者”这几个词演变而来的。

在第一阶段，我们需要的是结构性的仪式，这样才能为了生存而培养强硬的角色；到了第二阶段，我们需要的是选择性的仪式，目的是做好转换角色的准备，而这是现阶段人类生存必需的。在第一阶段，男人考虑自己的内心感受是行不通的；到了第二阶段，男人不考虑自己的内心感受是行不通的。在第一阶段，我们认为，那些让自己的需要屈服于角色功能的男人和女人具有崇高的自尊；到了第二阶段。自尊包括知道如何在他人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之间寻找平衡。在第一阶段，超人要侦测外在的地震，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不受伤害；到了第二阶段，超人要侦测自己内在的地震，他会就自己的发现和心爱的女人（或男人）进行交流。在第一阶段，为了人类的生存而牺牲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结果；到了第二阶段，为了人类的生存而牺牲会得到不同的结果——Campbell将这种结果称为“追求天赐之幸福”。

男人还有另一个层次的工作要做，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正是那个让女人有时间踏上她的第二阶段道路的过程让男人滞留在第一阶段。有了他的收入，她就可以奢侈地思量她和他的哪些部分让她不喜欢。但是他会陷入矛盾：他害怕如果自己失去了让她得到解放的成功事业，她就会离开他；然而他也害怕，如果他仍然一心只想着成功的话，她也会离开他。

这暗示了什么？除非男女同时踏上第二阶段的道路，否则以后出现的是第二阶段的个体（一般是女性），而不是第二阶段的男女关系。我们的下一代还得遭受孤独的“我”的痛苦。第二阶段的男女首先必须找出自己想要扮演什么角色，然后在家庭中协商如何过渡。

在第二阶段的道路中，我们不能不分好坏摈弃所有的生存技能。相反，它会让男女双方都掌握生存技能和自我实现的技能。女性已经开始发展这两种技能了，当下的男性运动是否意味着男性也开始发展这两项技能了？

男性运动是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已经得到公众关注的男性运动（由Robert Bly领导的神话诗意的男性运动）已经帮助男人踏上了第二阶段的道路。人们发现第一阶段的男人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做这些事：允许自己脆弱、亲密、自我决定，也就是拥有真正的力量。从击鼓开始探索并无不当，因为这样会帮助男人表达自己的情感。从树林中开始也是有帮助的，因为男人需要向内看，而且应该和女人、子女、父母和工作隔离——他们全都希望男人首先能听从他们指挥，之后才会允许男人去思考“我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男性的聚会是进入第二阶段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这一阶段的男人永远不会学着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恐惧。这是参加聚会的男人发明出“说话杖”的原因。这根杖上缠着藤蔓，是古代医学技术的象征。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说出自己的感受就是在治疗；感到有人听取自己的心声时治疗效果更好。

“说话杖”象征着男人的一种直觉，对男人来说，让女人和孩子坐下来听他讲自己做他们的钱包时的困惑，好比IBM公司在决定是否继续生产

计算机时希望员工能乖乖听着。男人渐渐明白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放在女人和孩子身上，这对男人和女人都没有好处。

很多女人担心男人周末独自离家之后会和其他男人聚在一起指责女人的不是。不用担心。男人过去的社会定位是拯救女人而不是指责女人。所有男性运动都不会教输了的团队指责对手——也不会企图让对手改变。对男人来说，自我提升和拥有力量并不意味着指责男人或者女人，尤其是不是指责女人。

男人第二阶段的道路是从认可第一阶段的英雄历程开始的——它的结构、纪律和仪式都是在帮助英雄克服困难、保护女人并坚持下去。把周末称为野男人和战士的日子也是这一认可的部分。

为什么认可是必需的？或许没有必要，但是人类往往在肯定自己之后才会开始转变，所以，黑人说出了黑人的骄傲和黑人的美丽；女人宣布："我是女人，我很坚强。"男人在说："我是男人，我很好。"在男人互相打了二十几年之后，这个开头不算坏。

为什么男性的牺牲在更大程度上被制度化、纪律化和仪式化？因为相对生理角色来说，社会角色更具有选择性，所以对男性角色的社会化必须异常强大，才能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男婴转变为一个有自我牺牲精神、愿意为了他人的生命而捐躯的成年男性。因此，第二阶段男性的社会化也必须以异常激烈的方式与男性保护女性的习性进行对抗，这就需要与保护女性的4种诱因进行对抗，在第一阶段社会中，正是这些诱因，令男人们将死亡视为"光荣"。男人必须要对抗的4种诱因是：

1. 社会强化了男人对女性的美色和性的沉迷；

2. 男人想得到美貌的女人和她的性就要保证为她提供经济保障；

3. 用对女人的保护来交换地位、赞赏和其他"贿赂品"，尤其是他愿意为此冒生命危险或为此身亡；

4. 惯例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比如割礼）降低了男性对痛苦、音乐和宗教的敏感性，激励男性忍受痛苦。

对第二阶段儿童重新社会化

男教师

在第二阶段，在一些学龄前儿童与母亲交流多于父亲的地区，小学学校需要聘请更多的男教师。

这些男教师应该是这样的男人：即使有时孩子失败了、受伤了、偶尔遭到羞辱了，他也懂得风险的价值；他会懂得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嬉戏的价值，并且愿意在社区反应过度、认为他猥亵儿童时站出来维护这种价值；他可以取代毒贩并帮助他/她如何将贩毒的交易技巧转换成自己创业所需要的交易技巧；他知道不在学校过度保护孩子，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在生活中得到更好的保护；他也懂得，在学校保护孩子，通常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免于被个别家长指控。

第二阶段青春期的道路

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第二阶段的道路中都有选择仪式。

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在第二阶段中有一款为青少年设计的电子游戏，名为“初次约会”。同一个选择（“吻她”）有时会产生一种结果（热恋），有时会产生另一种结果（被拒绝）。男女双方在真实世界中扮演新角色之前，可以先在这个游戏里面有所体验。

第二阶段的学校要在告诫性的性信息和娱乐化的性信息之间进行平衡。它不会把性变成一场讨论，内容只与安全性行为、艾滋病、疱疹、避孕套、性虐待、约会强奸、陌生人强奸、性骚扰、力量和暴力相关，然后告诉男生，只让他们采取主动。

求爱期的仪式可能会包括这些内容：一个青春期男孩这个周末是他女

友的仆人，而下个周末他女友又成了他的仆人；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他为她下厨，第三个星期六由她来下厨；这次带她去吃烛光晚餐，下次她带他去吃……待他们长大后，他们可能会选择更为传统的角色，但这至少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因为害怕得不到同龄人的认可或者因为自己不会下厨。

第二阶段的学校不仅要求男女都参与团体性运动，而且利用运动结束后的时间来领悟这些体验。学校将一些运动设为选修课，如橄榄球和棒球（每个棒球手在每一局的位置都要变换）。即使足球只有一个性别参与而且形式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足球不能由私人赞助，也就是说它不该由公共资金支持。或许摧残小男孩看上去很有趣，但是不应该要求纳税人必须资助这项运动。

第一阶段运动的目的是建立对外界的防御，所以“我们队好，他们队不好”是可以理解的。第二阶段运动的目的是帮助我们与外界打交道——在全球经济环境下，我们都属于同一支队伍。第二阶段运动帮助我们欣赏他人的特殊才能，而不是嫉妒。

第二阶段的办学模式将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个人运动和团体性运动会促使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如果Jane只专注于体操运动，那么她就不会学会和她的同伴沟通。如果Dick只专注于团体运动，他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有主动精神的人或者一个有创意精神的人——这正是成为一个为自己着想的（而不必担心是否政治正确）创业者、作家、艺术家或知识分子所需要的技能。

在第二阶段，男女双方要从以下陈规陋习中学习：男性得承担风险，而女性得提高警惕；男性得压抑对伤筋断骨的恐惧，而女性不需要通过伤筋断骨的方式来证明自己。

第二阶段家庭的道路

由于处于第二阶段的个人可以不依赖对方而独自生活，所以他们的结

合是一种选择，而不是生存手段。相对于生存需要而言，选择是一种比较脆弱的黏合剂。不过大部分人都希望选择与稳定兼得。所以在第二阶段的仪式中，既要赞扬选择性，又要肯定持续性。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搬出家门时，家人或许可以举行一次重新结婚的仪式来认可新的家庭形式，以此庆祝这种变化的发生，又肯定其持续性。

这种改变需要观念上的改变，这就意味着需要激进主义和政治行动。

男性运动会不会变得政治化或激进?

男性运动是一种误称，它既不像民权运动一样有政治性也不像女权运动一样激进。

——1991年7月8日《时代》杂志[1]

在将来不到10年内，《时代》杂志必然会收回这句话。为什么？首先，政治架构已经形成而且还在形成中。其次，政治议程已经确定。第三，男性的情感伤痛和经济伤痛足以刺激改变的发生。

首先来看一下政治架构。全国男性与儿童大会（The National Congress for Men and Children）和全国自由男性联盟（NCFM）多年来致力于解决诸如离婚后享有共同监护权的父亲如何与子女共处等问题。媒体在报道这些男性时常常将重点放在“父亲的权利”上，但要把他们刻画成爱子女的父亲也一样容易。处理法律问题会让这些男人的痛苦——想要被爱的痛苦——漫溢。

神话诗意的男性运动正处于发展中的政治意识的边缘。其政治意识源于男性的个人发现，其演化是比较无意识的。周末男人聚会时，很多男人会讨论两个“F”：“抚育”（fathering）和“感受”（feel）。然而，在男人发现他们的父亲被剥夺了父亲角色的时候，他们开始问自己是否也会

被剥夺作为父亲的角色。当男人发现其他男人也有类似的个人经历时，他们会慢慢地意识到这种个人经历是政治性的。这会导致父亲们发现他们的第一项权利。

父亲的第一项权利——抚育（在他的妻子分担他的经济压力时共同照顾子女）——需要进行重新商议。重新商议就需要男人开口。这就是第二个“F”感受需要进入的地方。

到今天为止，男人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入一个篮子里——自己心爱的女人身上。所以他们害怕说出自己的感受之后会失去自己唯一的情感支持。周末聚会为他们的情感支持来源提供了选择，男人获得了表达自己感受的勇气，而不用害怕情感上遭到孤立。尽管部分女性发现男人有了这种新的勇气之后对她们产生了威胁，但是其他女性觉得这一点很吸引人。很多夫妻都发现，它给死气沉沉的夫妻关系带来了一些鲜活的色彩。

但是男人真的想要改变吗？他们真的想要花更多的时间陪子女吗？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近90%的男人愿意在不损害家庭经济条件和得到妻子认可的情况下，全心全意照顾孩子半年到一年。

男人开始更愿意全心全意照顾子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父亲和子女都会感受到对方的爱，也会更爱对方。同时，其中也隐藏着政治含意。如果法官声称子女对母亲来说是最重要的但对父亲来说是次要的，父亲们将会抗议这种说法。从政治上来讲，对那些法官——将60%以上的有争议的监护权利给其中任一方的，父亲们会想方设法让他下岗。

一个男人允许自己深爱自己的孩子，他就希望得到平等的爱的权利。他发现，一个女人怀上了他的孩子之后，这不是女人和胎儿的权利问题，而是女人、胎儿和父亲三者的权利问题。他发现，女人说：“身体是我的，这是我自己的事。”然后她可以选择留下孩子，让他付抚养费，于是他被迫选择自己可能不太喜欢但报酬较高的工作，被迫承受着极大的压

力然后早早去世，而且被迫利用自己的身体18年。如果他的身体被利用18年，因而早早逝去，这不也应该是他的事吗？一个男人近20年的光阴难道比不上一个女人9个月的时光吗？

抚育和感受的议题是从部分政治架构中浮现出来的。但是最让男人有无力感的还是被随意支配的问题。下面是解决男性被随意支配问题的具体议程。

男性被随意支配的十大“玻璃地下室”

就像“玻璃天花板”让女性得不到平等的晋升机会，或许十大“玻璃地下室”可以被认为是造成男人被随意支配的罪魁祸首。男人需要的不是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帮助他们指出问题所在，而是希望有一个平等生活机会委员会（ELOC）来帮助他们。男人的议题涉及生命与死亡。ELOC的具体议程是什么呢？最开始要做的是拆除十大玻璃天花板：

自杀：如果配偶去世后男人自杀的概率是女人的10倍，[2]那么ELOC的任务就是为丧偶男性制定特殊的服务计划。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如果在性别角色明显分化之时，男孩的自杀率是女孩的250倍的话，[3]或许我们应该在男性角色确定之前改变它。

罪犯：如果ELOC能够阻止监狱内男人和男孩被强奸，出狱后强奸别人的男人数量就会下降。如果在监狱里服刑的母亲和孩子相处之后会变得温柔，那么服刑的父亲难道不会吗？

无家可归：为什么大街上无家可归的人中间有85%是男人？ELOC应该找出其中的原因[4]并制定干预计划，避免让男人从无望变成无家可归。

高危职业：在孩子幼年时期就进行高危职业的社会教育。ELOC可拨款以培训学校的辅导老师，由他们教育男生无须在年纪尚幼时就为女生买单，以免将来为了获得更多报酬而从事危险的工作。

疾病：ELOC的职责应包括对15大重大疾病和事故原因进行研究，以及帮助男人进行早期自检教育，以防男人因此早逝。

暗杀和劫持人质：制定“平等生命权修正案”（Equal Life Amendment），需考虑外交政策。萨达姆·侯赛因只释放女性和儿童时，美国应该如何回应？纳税人的资金用于支持暗杀国外领袖时，又该怎么办？如果卡斯特罗是女性，我们是否应该纵容我们的政府多次刺杀她？

死刑：我们会判女人死刑，但是最终分析结果发现，被执行死刑的只有男人。如果我们只对女人执行死刑的话，会不会出现抗议？

征兵：“平等生命权修正案”应承认只强制男性参与的征兵注册制度是一种奴隶制度。或许可以组织一个男性平等生命权办公室，然后以被征兵且现在心理素质低下的男人的名义提起集体诉讼。这种做法会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再掩饰战斗中失踪的人员和战俘的问题——他们全部都是被随意支配的那个性别。

战斗：ELOC应确保男女共同承担直接参与战斗的责任，如若这一点无法实现应曝光于天下，这样会导致福利减少。

早逝：ELOC的职责也应包括发现导致男人早逝的非疾病性因素——做事、支付账单、求爱、孤独、被拒的风险以及缺乏支持等因素带来的压力。

我们可以认为，每个男孩自出生起就缴纳了10%的男性被随意支配性税收，也就是说他的平均寿命短了10%。为了面对他们被随意支配的问题，男人也许可以出台一项《平等权利修正案》。或许这项法规可以称为《平等生命权修正案》，实际上，只需要一项《平等权利与责任修正案》就够了，因为如果男人和女人拥有了平等的权利和责任的话，他们的平均寿命就会很接近了。

平等权利和责任修正案

有了《平等权利与责任修正案》（*ERRA*），在征兵注册制度中只要求男性承担应征责任就不合法了；有了它，男军人可以不被强制要求参与战斗，除非女军人也被要求参与战斗；有了它，夫妻共有财产只能与夫妻共有责任相关；有了它，学校就要教会女性在性方面共同承担主动的责任和被拒绝的风险，而不是教会男性怎么才能不把事情搞砸；有了它，在职场中，性话题讨论的将是男女如何进行性接触，而不是性骚扰。

ERRA会支持反歧视行动，对在特定专业领域内参与人数不足的那个性别进行培训，而不是让资质不够的那个性别被雇用；如果法官将60%以上争议性的子女监护权给了女人的话，它将取消选举区的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如果大学为女性开设的学习课程远远多于为男性开设的，它将撤消对其公共资金的注入；如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发现某个电视台倾向于持续播放男性暴力，或持续关注女性问题但忽视男性问题的话，它将吊销其营业执照。ERRA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个有共同责任和共同权利的时代，意味着两性分享彼此的观点，而非对立。

但是男性（如果女性能参与，则是最好的）有实现这一理想的积极性吗？

要发起一场运动究竟需要什么？

大型运动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促进因素：（1）情感上的排斥；（2）经济伤害。如果有很大数量的人发现过去自己在情感上遭到排斥，同时在经济上也受到了伤害，那么革命就蓄势待发了。

例如，当黑人被告知“坐到公交车最里面去”的时候，他们感到在情感上遭到了排斥；他们同时还要面对工作中的歧视，他们感到自己在经济上受到了伤害。一旦很大数量的人遭遇了这些，一种政治可能性就产生

了。我们就有了民权运动的基础。

同样，当数百万女性同时经历了离婚（情感上遭到排斥）和职场歧视（经济伤害）之后，我们就有了发起女权运动的政治基础、情感基础和经济基础。

和女性一样，离婚时男性也会感到自己在情感上遭到了排斥，但是和女性不同的是，男人更容易被迫离开子女，所以他们体会到的是双重的拒绝。很多男人离婚后感到没有人爱他们、没有人需要他们，这就是离婚男人自杀率比离婚女人高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男人还要付钱给离开他的人（妻子和子女），这意味着他还要经历经济上的伤害。

今天的父亲们常常要为自己的子女纳税，虽然这个数字和他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均衡。他们所经历的正是“纳税却无发言权”。当数百万父亲都体会到这一点时，男性运动的政治基础就形成了；他们在情感上遭到拒绝，于是它的情感基础形成了；他们在经济上遭到了伤害，它的经济基础也形成了。所以说，男性运动的下一个阶段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激进的。

如果我们忽视那些男性中的激进分子或者认为他们发疯了、生气了或充满仇恨，我们就不会了解数百万父亲的生活经历，他们要么因为害怕而不敢说出实话，要么忙着赚钱抚养子女和“前任”。如果不愿意倾听这些激进分子，那么很多男人会变得颓废，他们的孩子会受到伤害，他们的后代得到的仍是扭曲的爱。反之，如果我们听到了男人的心声，就可以将两性之间的战争最小化，将两性之间的爱最大化。

如果你觉得这些看上去很可怕，不用担心，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优先次序的改变，而是一种革命性转变。

革命性的男性运动

男性运动将是历时最久的运动，因为它没有仅仅提议将黑人或者拉美裔男性整合进入这个既存的体系，而是在系统内部提出了革命性的转变——终结“女人被保护”而“男人负责保护”的时代。这种分化源自我们的生理状况，在动物中也存在着这种分化。

男性运动将是史上最慢速进行的运动，因为要面对那些被压抑下的感受很难，要面对被我们保护的女人也很难。而且，尤其困难的是男人要冒着与唯一的爱的来源疏远的风险。

男性运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会是什么？是让男人请求别人帮助他们。只有他们开口寻求帮助，运动才能取得成果。男人常常能够为了他人的利益——群众、他的妻子和孩子或者一项事业——而求助，却不会为了自己去寻求帮助。为什么不会？几千年以来，抱怨对女人来说是可行的——它可以吸引保护者；但抱怨对男人来说是不可行的——吸引不了任何人。女人会避开抱怨的男人，而选择在女人求助时会做出反应的男人。所以，对男人来说，请求别人帮助是他们最大的挑战，也是任何一个革命性转变的催化剂。

女权运动有一部分已经发起了这种革命性的转变，这部分是这么说的：“我，作为一个女人，必须为我生命中发生的一切负起责任。”它说：“如果你丈夫虐待你，不要杀他，请走开。”它鼓励女人“为他的晚餐买单吧，就像他常为你买单一样”，它说“不要‘为了钱结婚’，要靠你自己”，给女人赋权，即使他希望她能在经济上助他一臂之力，女人也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爱人。女权运动中的这一部分是成熟型女权主义的分支。

女权主义的其余部分则强调陈旧的观念——希望得到战斗的权利却不想履行战斗的义务；只说“玻璃天花板”，却不提“玻璃地下室”；希望

政府能够保护受虐妇女，却否认受虐男人的存在；没有鼓励女性既能惬意地“高攀”男人，得到经济支持后做全职妈妈，也愿意“下嫁”，在经济上支持男人做全职奶爸。这部分只强调了女人生下来就接受的观念——找个英雄、嫁给他、依赖他；或者和他离婚，再让政府做自己的替身丈夫。它促使女人为了受到各种各样的保护而去发现各种各样成为受害者的方法。女权运动的这部分是青春期女权主义的分支。

对女人来说，抱怨和求助是她们在第一阶段的角色中必须要用的，目的是保护孩子。对男人来说，求助在第二阶段才有用。所以，抱怨和求助对女性来说不是革命性的转变，但抱怨和求助对男性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

如果我们帮助男人明白不会求助才是一种软弱，那么男人就会学着求助于他人。男人必须积攒一种新的力量——能打败一场世界大战的力量，在这场世界大战里，唯一的敌人是自己的感受。他们必须强大到找出这些感受，同时为了促成更深沉的爱，他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失去肤浅的爱的风险。

然而，如果男性运动真的要产生革命性的转变，那么它必须战胜能言善战的人和不善听取他人意见的人。我们必须帮助男女双方开始了解对方，做“探索频道”，而不是来一场“雌雄争霸战”。我们要尊重一个事实：要推翻现在已经固化的社会化角色就像从一张薄煎饼上刮糖浆下来一样难，有时候我们表示关心的最佳方式并不是帮助对方解决问题，而是承认和分享。

第二阶段的挑战

《男权的神话》面临的挑战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我们要关怀男人，帮助男人成长为第二阶段的男性，就像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帮助女人成长为第二阶段的女性一样：争取在高危职业和战斗角色中让两性承担平等的责任，而不只是在女性有需要之时享有“选择性的解放”；不再认为男人比女人赚得多才是“合格”的，而且还将这种期望称为“力量”“父权制”“统治”或者“性别歧视”，而不是称为“压力”和“责任”；为男人制定类似反歧视行动的服务计划，直到男女平均寿命持平；激励男人表达情感和观点并为这种表达提供特殊渠道，直到男性和女性的自杀率持平；我们要面对这一事实，即我们的货币激励机制让男人可以被随意支配；监督媒体中出现的性别歧视，以免媒体以女性视角在书、杂志、报纸、脱口秀和网站上对两性关系有不当的定位；对受虐丈夫和受虐妻子给予同样的关心；对职场母亲和职场父亲给予同样的认可；像关心拯救鲸鱼一样关心拯救男人；不再将女人视为性交对象，将男人视为成功的对象，而要把对方都视为爱的对象。

注释：

1. Richard Stengel的《快点敲鼓吧》（“Bang the Drum Quickly”），是对Sam Keen《腹中火》（“Fire in the Belly”）一文的评论，《时代》1991年7月8日，第58页。

2. 参考文献见1988年1月美国公共卫生杂志（AJPH）第六章“自杀性别”的脚注。

3. 参考文献见美国全国卫生统计中心《1988年卫生统计》第一章“男权真的是神话吗？”的脚注。

4. 参考文献见1985年10月~12月的《公共事务报告》（*Public Affairs Report*），引自第十章“像拯救鲸鱼一样拯救男人”。

“世图心理”社科书系

恶习的美德
著者：[美] 埃姆里斯·韦斯科特
书号：978-7-5100-7888-0
定价：39.80元

大人物与小卒子
著者：[美] 罗伯特·富勒
书号：978-7-5100-8251-1
定价：38.00元

我爱偷窥
著者：[加拿大] 霍尔·涅兹维奇
书号：978-7-5100-8600-7
定价：39.80元

父性
著者：[意] 鲁格·肇嘉
书号：978-7-5100-9491-0
定价：58.00元

内容简介：

男人真的就是那么强壮吗？男人真的是压迫者、施暴者吗？女人和小孩无辜死了，社会舆论会认为他们被残忍地杀害了，为什么男人们参加战争被杀死了却被认为是应该的？本书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受男人控制，而是受“生存的需要”控制。在某种程度上男人也是弱者、受害者。法雷尔博士主张，我们不需要女性运动也不需要男性运动，而是需要一场性别转化运动。两性关系的基石需要从依附转为平等，两性的平等也需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它既承认了当代女权主义运动中部分重要控诉的正确性，也指出了很多被忽视的因素：在当今社会，男人有先天生理上和后天社会习得的不利因素，常常遭遇偏见和不公正对待。它细致地展示了所谓的男人“霸权”的另一面，并解释了为什么忽视男性的脆弱会毁了两性。

——Albert Ellis博士，纽约市理性情绪治疗研究所主席
《新理性生活指南》（*A New Guide to Rational Living*）的作者

这本书对男性显示出鲜有的同情心，将会加深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话，这正是现在需要的。

——Sam Keen，《腹中火》（*Fire in the Belly*）的作者

沃伦·法雷尔让我对两性关系重新燃起了希望。以后每次约会的时候，我都要随身携带《男权的神话》。

——Cathy Guseiwite，专栏漫画家

太棒了！《男权的神话》简直就是两性关系的“大宪章”。要意识到这本书真正的重要性至少要经过一代人，但是社会在重写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则，沃伦·法雷尔就是那个重写者。

——Dan Kelly 博士，《彼得·潘综合征》（*The Peter Pan Syndrome*）的作者

上架建议：社科/心理学
ISBN 978-7-5100-9928-1
定价：59.80元